生 活 在 别 处

[捷克]米兰·昆德拉

作者介绍

米兰·昆德拉米兰·昆德拉(1929～）捷克小说家，生于捷克布尔诺市。父亲为钢琴家、音乐艺术学院的教授。生长于一个小国在他看来实在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童年时代，他便学过作曲，受过良好的音乐熏陶和教育。少年时代，开始广泛阅读世界文艺名著。青年时代，写过诗和剧本，画过画，搞过音乐并从事过电影教学。总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曾在艺术领域里四处摸索，试图找到我的方向。”50年代初，他作为诗人登上文坛，出版过《人，一座广阔的花园》（1953）、《独白》（1957）以及《最后一个五月》等诗集。但诗歌创作显然不是他的长远追求。最后，当他在30岁左右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后，他确信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此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

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连出三版，印数惊人，每次都在几天内售罄。作者在捷克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从此确定。但好景不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失去了在电影学院的职务。他的文学创作难以进行。在此情形下，他携妻子于1975年离开捷克，来到法国。

移居法国后，他很快便成为法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如《笑忘录》（1978）、《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1984）、《不朽》（1990）等等都是首先在法国走红，然后才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他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除小说外，昆德拉还出版过三本论述小说艺术的文集，其中《小说的艺术》(1986)以及《被叛卖的遗嘱》（1993）在世界各地流传甚广。

昆德拉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正因如此，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热”。

昆德拉原先一直用捷克语进行创作。但近年来，他开始尝试用法语写作，已出版了《缓慢》（1995）和《身份》（1997）两部小说。

作品目录：·被背叛的遗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搭车游戏·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本性·缓慢·

诗的意义（代前言）

——读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吕新雨

生存于人类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对于“诗”、“抒情”、“美”这样的字眼，总是保持着崇高的故意。人类不仅具有抒情的能力，而且具有这种需要，基于生存的需要。这样抒情诗就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性质的问题，抒情态度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范畴。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原名就叫做《抒情时代》。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抒情诗具有最古老的起源，它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G·B·维柯便把人类原初状态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称为“诗性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诗人。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产生，出现了专司诗歌的“诗人”。诗人与非诗人的分裂便产生了。诗、诗人总是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诗人被认为是由神灵所选中并赐予灵感的特殊而神秘的人物。曾几何时，诗与诗人成为一种神圣的价值体系的象征，屹立在宝座上，享受众人崇敬的注目和向往。

但是，对于米兰·昆德拉这位东欧作家来说，他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他看到了他所崇敬的法国大诗人艾吕雅，在他的布拉格朋友被斯大林最高法院送上绞刑架上之时，公开正式地宣布与之脱离关系。他深受创伤。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体系崩溃了。一切都变成了怀疑的对象，包括诗歌。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接近（进入）诗歌？小说中的主人公、年轻的诗人雅罗米尔第一次作为一个诗人而诞生是在他的初恋失败之时。在一种对自己的嫌恶和耻辱之中他蓦然面对的是自己的卑贱与渺小。他依靠写诗，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奇异世界，使他高出了现实的笨拙，得到了一个第二存在的可能性。并不是出于伟大和崇高的激情，而是它的负面，使雅罗米尔成为诗人。诗成为一种现实行为失败的补偿。诗人从诗与现实分裂的隙缝之中滑落下来。生活产生了离析，日常领域是单调乏味的空虚，“而天上却是另一个世界，到处是灯火辉煌的路标，时间分割为一道灿烂的光谱。他无比兴奋地从一道光跳到另一道光，每次都坚信落在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时代。”

自从诗获得了与现实相对立的象牙之塔的贵族含义之后，我们应该承认，这已不是原初意义上的诗的含义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分裂是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厄运。在昆德拉看来，诗人似乎成了这种厄运的象征和化身。“雅罗米尔究其一生辗转于两个世界的边沿。昆德拉认为，当诗人们处于无力突破现实的行动世界而面临的基本境遇时，所采取的对付方法，便是——抒情态度。但是处于这种境遇的，并不仅仅是诗人。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存在境遇，是人类对永恒、崇高、美等一切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而上追求所注定的宿命。

《生活在别处》所描写的时候被昆德拉称为一个“抒情时代”。50 年代的捷克，今天的人们把它视为一个政治审讯、迫害、禁书和合法谋杀的时代。但是，昆德拉说，我们这些还记得的人必须作证：它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抒情的时代，一个充满着激情的时代。大学生们的墙上刷的标语写道：“梦想就是现实”，“做现实主义者——没有不可能的事”；千百万人振臂高呼，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昆德拉认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描写一个时代，选择一个特定时代并非因为对它本身感兴趣，特定时代只是照亮了隐藏着的另一面，使不同环境中只处于潜伏状态的某种东西释放出来。是的，雅罗米尔是个“邪恶”的人，他毁灭了情人，也毁灭了自己。但这样的邪恶同样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所有制度所有时代的每个年轻人身上。并不是特定时代才产生雅罗米尔，只是特定时代释放了他的这种心理因素。所有的时代都产生潜在的雅罗米尔。他并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恶人，他是一个人性意义上的恶人。昆德拉展示了这位有天分的富有想象力和激情的年轻诗人一生的心理发展逻辑，这个逻辑的内涵是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雅罗米尔终其一生都在为进入现实的行为世界而努力。昆德拉告诫道，请别以为雅罗米尔是个低劣的诗人，这是对他一生的廉价解释。

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自我与现实的对立之中，我们都需要在现实环境中实现自我。这样，对自我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恐惧便与生俱来地高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之上。现代心理学认为，正是这种压抑的升华产生了文学。

问题便变成了这样：文学的存在论意义是什么？

昆德拉说，“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人类的生存是什么？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人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的回答形式。昆德拉所做的是这个问题形式的展开。

雅罗米尔的母亲把对爱情的浪漫梦想转移到儿子身上，她醉心于当一个天才儿童的母亲，并且最早把诗人的桂冠赋予了雅罗米尔。有一个文学史的现象是：抒情诗人大部分都诞生在由女人所主持的家庭。这种母性家庭从小给予诗人的是一种精神庇护，一种与现实隔断的耽于幻想的温床。母亲与诗人的关系同诗与诗人的关系有一种神秘的相似。母爱是不需要自身努力便与生俱来的，母爱是儿童的整个世界。儿童在母亲的眼光中寻找对自我的肯定、理解与世界的关系。当他意识到母爱变成一种专制的力量限制着他的现实行动时，往往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一辈子都无法逃脱母爱世界所加之于他的束缚。从母爱世界过渡到诗的世界，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它兆明了一切诗人们的宿命，这便是两个世界的分裂。现实的行为世界像遥远的地平线一样，永远在远方。“生活在别处”，对于诗人们来说，他们相信真正的生活，具有行动力的现实生活永远在召唤着，仿佛伸手可及，却永远被一层透明的墙所阻隔。他们永远是不成功的幻想世界的迷亡者。诗人写诗，让诗如行星般绕着他运行，以此来弥补对外界的焦虑和对自我渺小的恐惧。诗成为现实行为失败的补偿征明。它与我们通常对诗的理解是多么大相径庭。

雅罗米尔创造了一个叫泽维尔的人物，作为他在幻想世界中的替身。泽雅尔的生命是一个梦，他睡着了，做了个梦，在梦中他又睡着了，又做了个梦，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前一个梦里，梦的边沿模糊了，他从一个梦过渡到另一个梦，从一种生活过渡到另一种生活，不存在任何障碍。雅罗米尔在泽维尔身上否定了梦与现实的分界。而梦与现实的最大分界便是：梦是对无限、永远的可能的相信，而现实并不。他在爱情诗中描写死亡，死亡是个关于无限的梦。，因为生活是渺小的，死亡才是绝对的，死亡证明爱情的伟大崇高，他表达的渴望是在一种近似永恒幸福的死亡之中跟一个女人结合——省略掉现实的过程。他写老人的爱情是幸福的，因为老人已不再有未来，不再受变动不居的未知领域的侵略。对姑娘的裸体，他头晕目眩，“他并不向往姑娘的裸体，他向往的是被这裸体照亮的姑娘的脸庞。”“他并不想占有姑娘的身子；他想占有的是愿意委身于他以证明她爱情的姑娘的脸庞。”他需要的不是肉体，而是肉体的抽象。他采用给孩子们讲童话故事的语气描写子宫与乳房，因为他惧怕肉体的爱，并且试图从成人的领域中把爱取出来，把女人看作一个小孩，这意味着他没有能力把自己当成一个成熟的男人看待。诗成了他的“人造童年之乡"。他希望把爱情限定在它永恒不变的成分之中，以此战胜展开在他面前的潜藏着危险的肉体。他在诗中取消了肉体，用自然主义的丑陋衰老的身躯来替代一个年轻女性傲慢的身躯，剥除肉体躯壳以追求爱情永恒。

诗人在母爱世界中意识不到现实世界的对立，而在诗的幻想中则又逃避着这种对立。那么，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应该在幻想中过生活，还是在现实中过生活？人如果丧失幻想，是很可怕的。如果一夜之间，人类几千年的文学传统消失殆尽，人类便成了野兽。但是，文学传统美学原则并不能保障人类不成为野兽——互相残杀的野兽。现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意识的心理能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黑格尔早就把人类心理中的“恶”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文学往往根基于人类天性之中的乌托邦冲动，美学则赋予了这种冲动以科学的名义。而美学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一种神圣价值标准，因为这样一束，我们都

会沉溺在乐观的迷雾中认不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昆德拉笔下的雅罗米尔，他的一生都在追求一个崇高的美学原则，而且实践了它，他用诗歌的美学原则作为他现实行为的准则和解释，最终溺死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永恒的深渊之中。

看一看雅罗米尔的性爱经历吧。性爱是人生存的最本质状态。把性爱放到昆德拉所说的“抒情态度”的范畴之中，它便获得了另一个名字，叫做“爱情”。青春、诗、爱情，都属于人类抒情态度的表达方式。雅罗米尔的爱情总是在达到它的现实层面的时候归于失败。所以，当他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性爱关系时，就颇有意味了。这是一个平凡的很不漂亮的女售货员，所以他意味着一个被减轻了形而上压力的女性躯体。在雅罗米尔的爱情幻想猝不及防的时候，是女售货员俘虏了他。所以爱情幻想的作用只能在事后弥补了。雅罗米尔把减轻了的东西又重新压了上去。在他看来，女售货员标志着他与人群之间创造了一种肉体联系，标志着到达了真正的生活领域。他为此而激动，这才是爱情的涵义。对他来说，仅仅是美好的瞬间还不令人满足，除非是作为美好的永恒象征才有意义。所以，在爱情中，他要占有的不是别的，而是“永恒”，完全地和永远地属于。他告慰自己说，他需要的不是美貌。爱上美貌并不难，人人都会，那不过是机械刺激反应。但伟大的爱情却是在寻求从不完美的造物之中创造可爱。而伟大创造的主人是他，所以姑娘必须把自己完全浸在爱的浴缸里，满足于呆在被他的言语和思想淹没的水面之下，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必须完全属于这个世界。

爱情幻想所做的工作带来的结果是：忌妒。忌妒是对权力欲没有满足的忿忿不平。他很快意识到他的爱情并不能用“绝对”的观念去要求，他发现他是在以惩罚他对售货员姑娘的感情来弥补他对漂亮的电影拍片姑娘爱而不得的怯懦。他原以为现实领域的大门已经为他敞开，现在发现他们重新关闭，并且把他重新撞回原来的世界。

雅罗米尔走入国家安全局大楼，是他一生中最富于命运感的时刻。他看见了一道神秘的门槛，他一生都在企求跨越的门槛，那边是真正的生活。成熟的成年男人生活门槛的名字，不是爱情，而是责任。他告发了他的情人的兄弟。他终于完成了一个真正的行动，他一生所渴望的真正成年人所拥有的行动。

我们总是迷惑不解于艾吕雅与布拉格朋友绝交、海德格尔与纳粹涉嫌、周作人与汉奸为伍……这样的现象，空洞的道德谴责是无济于事的。在人性的深处，在善与恶的畛域分野之前的原初，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从那隐秘的所在涌流出的“诗”，它并不仅仅是美好的，它还是危险的，它能够杀人，让血迹变成玫瑰。

因此，我们该怎样反思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美学、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性？米兰·昆德拉诉诸我们的是，在一切神圣价值的后面潜藏着的往往是危险。这让我重新想起希腊那句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人能够认清自己吗？几千年的文明史，战争的硝烟依然弥漫。“人啊，认识你自己！”是恨铁不成钢的神谕，还是悲天悯人的天启？多么神秘的语言，人类的命运尽在于此了。

幸福是人类对命运的自我许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未来在静默中等待。文学，这从人类生存的根基深处生长出的花朵，在时间之中依次开放；浇灌它们的是人的血和泪，诗因此而美丽妖娆。文学的热带丛林一步步掩盖着人类历史艰苦跋涉的足迹，足迹之下是掩埋祖先骸骨的土地，这唯一实在的东西。

序

序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是兰波[1]的一句名言。安德列·布勒[2]在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结论中引用了这句话。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但是我这本小说最初的名字却是《抒情时代》。我在最后一刻改换了书名，因为我看见出版商们的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他们怀疑是否有人愿买一本题目如此深奥难懂的书。

----

[1]阿瑟·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2]安德列·布勒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抒情时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说是一部青春的叙事诗，也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抒情态度是每一个人潜在的态势：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抒情诗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就具有抒情态度的能力。诗人就是它的化身。

从但丁开始，诗人也是跨越欧洲历史的伟大人物。他是民族特性的象征（卡蒙斯[3]，歌德，密茨凯维奇，普希金），他是革命的代言人（贝朗瑞[4]，裴多菲，马雅可夫斯基，洛尔伽[5]），他是历史的喉舌（雨果，布勒东），他是神话中的人物和实际宗教崇拜的对象（彼特拉克，拜伦，兰波，里尔克），但他首先是一个神圣价值的代表，这个神圣价值我们愿意用大写字写出来：诗。

----

[3]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诗人，作家。

[4]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

[5]洛尔伽（1899－1936），西班牙诗人。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欧洲的诗人发生了什么？今天已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就已从这个盛大喧嚣的国际舞台上消失了。（他的消失显然是这个危险的过渡时代的征兆之一，在这个过渡时代中，欧洲发现了自己，而我们还没有学会给这个时代命名。）由于一种历史的邪恶嘲讽，欧洲的诗人仍然扮演着大众角色的最近一个短暂时期，是 1945 年以后中欧的共产主义革命时期。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特定时代充满了真正的革命心理，它们的信徒怀着巨大的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末世学信仰[6]体验了它们。诗人们觉得他们是最后一次站在舞台前部。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欧洲的辉煌戏剧中扮演他们惯常的角色，去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剧院经理已在最后的一刻改换了节目单，而代之以一出通俗的滑稽剧。

----

[6]末世学：宗教名词，是研究末日审判、天堂、地狱等的一门宗教学。

我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这个时代。我听到我所崇敬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7]公开正式地与他的布拉格朋友脱离关系，因为这位朋友即将被斯大林的最高法院法官送上绞刑架。这个事件（我把它写进了《笑忘录》）使我受到创伤：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并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得成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进步和革命。青春。母亲。甚至人类。还有诗歌。一个价值崩溃的世界呈现在我眼前，渐渐地，经过许多年，雅罗米尔的形象，他的母亲和他的情人在我的头脑里成形了。

----

[7]保尔·艾吕雅（1915－1952），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请别认为雅罗米尔是一个低劣的诗人！这是对他的一生廉价的解释！雅罗米尔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富有想象力和激情。他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邪恶的人。

但他的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兰波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时代所有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雅罗米尔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定时代只是照亮了隐藏着的另一面，使不同环境下只会处于潜伏状态的某种东西释放出来。

尽管雅罗米尔和他母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描写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图），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描写一个时代。“我们选择那个时代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它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个捕捉兰波和莱蒙托夫、抒情和青春的绝妙的圈套。”换言之：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就这本小说而言，同时还提出了几个相关的问题：抒情态度是什么？青春是什么？一个母亲在形成一个年轻男人的抒情世界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神秘角色？如果青春是缺乏经验的时期，那么在缺乏经验和渴望绝对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在渴望绝对和革命热情之间有什么联系？以及抒情态度怎样表现在爱情中？有爱情的“抒情形式”吗？等等，等等。

当然，这部小说丝毫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回答，正如海德格尔[8]所说：人的存在具有一种问题的形式。

----

[8]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最初想写这部小说的念头产生于很久以前，在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想解决一个美学问题：怎样写一部属于“诗歌批评”的小说，同时它自身又是诗歌（传达诗歌的激情和想象）。我于 1969 年完成了这部小说。它从来没有在波希米亚[9]出版过。1973 年它首次在法国刊行，一年后彼得·库西出色的译本在美国出版，他因此而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库西是美国最优秀的捷克语翻译家。为了修订这部小说，使它更忠实于原著，几年后他又重新修改了一遍，这一事实表明他一心追求完美；换句话说，他是翻译家中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衷心感谢他这部杰出的译作，以一个朋友的身分紧紧握他的手。

----

[9]波希米亚：捷克旧称。

第一章　　诗人诞生

第一章诗人诞生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怀上诗人的？

当他的母亲思考着这一向题时，似乎只有三种可能性值得认真考虑：不是某个晚上在公园的长凳上，就是某个下午在诗人父亲一个同事的房间里，或是某个清晨在布拉格附近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乡间。

诗人的父亲对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得出结论，怀上诗人是在他朋友的房间里，那一天特别倒霉。诗人的母亲不愿意去那里，为此他们吵了两架，后来又重归于好，当他们终于开始作爱时，隔壁房间有人大声地开门，诗人的母亲受了惊，他们停止了拥抱，慌忙仓促地结束了性交。他把怀上诗人归罪于这一瞬时的慌乱失措。

但是诗人的母亲却否认受孕可能是在借来的房间里（那是一个典型的单身汉的邋遢地方，她厌恶那张乱糟糟的床和皱巴巴的睡衣裤），玛曼也否决了第二种选择：受孕发生在公园的长凳上，她当时很不情愿在那里做爱，一想到这样的长凳是妓女和行人常去的地方，她

就感到恶心。因此她肯定怀孕只能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在绿色溪谷的背景上生动地衬出轮廓的一块巨石后面，布拉格的市民星期日常喜欢到这儿的溪谷郊游。

从多种理由看，这样的环境最适宜怀上诗人：在正午阳光的普照下，这儿是光明的白昼，而不是漆黑的夜晚；周围是广阔的自然，使人联想到翅膀和自由的飞翔；尽管离城郊的住宅不远，这儿的景致却有着浪漫的情调，到处都是裂罅、岩石和起伏不平的地面。当时这地点似乎生动地象征着她的经历。说到底，她对诗人父亲强烈的爱不正是对父母那种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的生活的浪漫的反抗吗？这块远离尘嚣、自由自在的风景区与她——一个富商的女儿——选择了身无分文的年轻工程师的巨大勇气之间，难道没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吗？

诗人的母亲一直陶醉在强烈的爱中，没有什么能改变这点，既使在那个美妙的下午，在那些圆石间的事仅仅几周后产生的失望也没有改变这点。她告诉情人每月烦扰她生活的那种不适没有按期出现。她兴奋万分地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他，可遇到的只是令人气愤的冷淡（现在我们回想起来，这种冷淡大半是表面上装出来的）。他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不重要的、纯粹暂时的和无关紧要的周期性生理失调而不予考虑。玛曼觉察到情人不愿分享她的欢乐后非常生气，直到医生正式宣布她已经怀孕了才跟他说话。当诗人父亲说他的一个好友是妇科医生，可以万无一失地消除她的烦恼时，玛曼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就是反抗的可悲结局！最初为了年轻的工程师而同父母对抗，后来又求助于父母来反对他。她的父母成功了；他们与工程师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他意识到别无出路，同意举行一次体面的婚礼。他欣然接受了一大笔嫁妆，这使他以后能建立起自己的建筑公司。他把他的全部财产塞进两只手提箱里，搬进他的新婚妻子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别墅。

尽管工程师迅速地妥协了，但诗人母亲仍然伤心地意识到她如此冲动地投进的这场冒险——它曾经象是美好得令人心醉——并没有变成她坚信有权期待的那种伟大的、彼此满意的爱情。她的父亲是布拉格两个生意兴隆的药房的老板，因此她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严格的平等交换的原则上。在她这方面，她把一切都投资到爱情中（她甚至愿意牺牲她的双亲以及他们那平静的生活）；反过来，她也希望对方在共同的帐户中投资等量的感情。为了恢复平衡，她逐渐取回感情的储蓄，在婚礼后对丈夫摆出一副高傲严峻的面孔。

诗人母亲的姐姐不久前搬出了住宅（她结了婚，搬到了市中心的一个公寓），于是老两口继续住在楼下，他们的女儿和工程师则住在顶楼。楼上有三间屋子，其中两间很大，布置得完全和二十年前老药剂师修建别墅时一样。工程师就这样继承了一套家具齐全的房间。总之，对他来说这是令人满意的安排，因为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两只拼凑的手提箱，他完全没有任何财产。不过，他还是极力主张把这套房间作点小小的变动，但他的妻子根本不打算让他——这个乐意把她献到堕胎术者刀下的男人——粗暴地对待这个代表她父母精神、也代表二十年的良好习惯和安宁的世界。

在这种场合下，年轻的工程师也毫无反抗地妥协了，只是对一件事提出了小小的抗议：卧房里有一张小桌，桌上盖着一个沉重的灰色大理石圆盘，上面立着一个裸体男人的小雕像；雕像左手握着一把七弦琴，支在臀部上。右臂以一种动人的姿势挥出去，就象手指刚触拨了琴弦。右腿伸直，头部微微后倾，目光向着上方。这张脸非常美丽，头发卷曲如波，白色雪花石膏赋予他一种温柔的、女气的、也可以说是处女般的非凡神态；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滥用“非凡”这个词：根据刻在底座的铭文，这个手握七弦琴的雕像即是古希腊神阿波罗。

一看见这个雕像，诗人的母亲就不由得来气。这个神像经常被扭转过去，背部冲着房间，要不就成了工程师的帽架，要不那沉思的头就成了工程师搁鞋的地方。偶尔还有一只臭袜子套在小雕像上——这是对缪斯和她们的首领不可饶恕的亵渎。

诗人母亲异常愤怒地作出反应。这并不是仅仅由于缺乏幽默感，而是由于她相当准确地察觉到，丈夫把阿波罗套在袜子里是为了发出一个他出于礼貌不能直接表达的信息：以这种玩笑的方式，他要让她知道，他拒绝她的世界，他的屈服只是暂时的。

这具雪花石膏的雕像于是成了一个真正的古代神祇：一个不时介入人类事务，使人的一生困惑，设下阴谋，显示神迹的冥冥之神。年轻的女主人公把他视为同盟，她那充满渴望女性想象力把他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瞳孔仿佛闪烁着生气，嘴唇颤动着声息。她爱上了这个为她而横遭凌辱的裸体青年。当她凝视着那张俊秀的脸时，她产生了一个愿望，希望腹部里正在生长的孩子与丈夫这个风度翩翩的情敌相象。这个愿望如此强烈，以至她一面瞧着自己的腹部，一面想象着这个希腊青年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她祈求神运用他的力量改变过去，改变她怀上儿子的经历，就象伟大的提香[1]曾经在一个拙劣画家毁坏的画布上画出了杰作一样。

----

[1]提香（1477－1576），意大利画家。

在圣母玛丽亚身上，她无意中发现了不需要生殖器而当母亲的典范，于是她向往着一种没有父亲参与的母爱。她如痴如醉地渴望孩子叫阿波罗，在她看来这名字就如同意味着“他没有人父。”当然，她知道儿子会因取了这样一个高贵的名字而遇上麻烦，人们会嘲笑她和儿子。因此她寻找一个能配得上年轻的奥林匹斯神的捷克名字，最后她选定为雅罗米尔，意思是“他爱春天”和“他被春天所爱。”这个选择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当他们驱车把她送到医院时，事实上春意正浓，盛开着紫丁香；几个小时的阵痛后，幼小的诗人滑落到这世界的肮脏被单上。

他们把诗人放在母亲床边的一个有围栏的小床上，她听着那悦耳的号哭声，疼痛的身躯充满了自豪。我们不要妒忌玛曼身子的满足，迄今为止，它还没有体味到多少欢乐，尽管它还算迷人：不错，背部没有轮廓，腿有点短，但是胸脯却非常丰满，在一头梳理得十分漂亮的头发（漂亮得难以相称）下有一张并不眩目但却动人的脸。

玛曼一直觉得自己相貌平平，没有魅力。这大半是因为同她一起长大的姐姐是一个舞会上的皇后，在布拉格第一流的女式服装商店工作，她活泼美丽，喜欢打网球，轻易地就进入了高雅男人们的世界。姐姐在社交活动中的成功助长了玛曼带有挑战性的庄重；完全出于反抗，她开始喜欢感伤严肃的音乐和书籍。

其实在认识工程师之前，她就经常同一个年轻的医科学生约会，他是她父母朋友的儿子，但这种关系并没能唤起她在身体上的自信。一天晚上，在一个夏日别墅里，她同他在一起第一次体验了性爱，第二天早晨她就同他绝交了，因为她悲哀地确信无论她的感情还是感官都注定不能分享伟大的爱情。当时她正准备完成毕业考试，这次经历使她能及时宣布，她已在脑力劳动中看到了生活的目的，她决定报考哲学系（尽管她有一个讲究实际的父亲）。

在大学课堂的硬板凳上坐了五个月后，她那失望的身躯一天在街上与一位刚毕业的年轻工程师相遇，他粗野地向它献殷勤，几次约会后就占有了它。由于当时肉体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满足，心灵很快就忘掉了学者生涯的抱负，与肉体息息相通了（一颗真实的心灵总是这样）。它欣然同意工程师的观点，赞扬他的快乐无忧，钦佩他那迷人的不负责任。玛曼虽然意识到这些特点与她长大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她却打算与工程师的特性认同，在这些特性面前，她那忧郁、纯洁的身躯获得了自信。对自己开始惊讶莫名地欣赏起来。

那么玛曼到底幸福不幸福？不完全幸福；她在信心和怀疑之间徘徊。当她在镜子前脱下衣服时，她试图通过丈夫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有时她好象很有魅力，有时又似乎索然无味。把自己的身子交给他人的眼光去评判，这正是产生不安和怀疑的根源。

然而不管她怎样在希望和怀疑之间徘徊，她还是完全消除了妄自菲薄。她不再为姐姐的网球拍而沮丧，她的躯体终于变得活跃了，玛曼学会了享受肉体存在的乐趣，她希望能确信新的生活会是一个永久的现实而不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允诺；她渴望工程师能带着她远离大学讲堂，远离她的儿童教养院，把一个爱情故事变成一个真实的生活故事。这就是她为什么这样热诚欢迎她的怀孕的缘故。她冥想着自己，冥想着工程师和孩子，这个三重奏好象是上

达星空，充满了宇宙。

在前一章我们已经提到：玛曼很快就明白了，那个如此渴望爱情冒险的男人却害怕生活冒险，不愿同她一道去遨游星空。我们也已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自尊经受住了情人的冷淡反应。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玛曼长期受情人目光支配的身躯，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不再是别人眼光中的一个十足的物体，而是变成了一个献身于某个还没有眼光的人的话生生的肉体。它的外表已失去了意义；沿着一个内在的、看不见的表面，它触及到另一个躯体。因此外部世界的眼光只能捕捉住它那无关紧要的外壳。工程师的评价不再有任何意义，它对这个身躯的命运一点没有影响。身躯终于变得完全独立和自足了；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丑的腹部充满了自豪。

分娩之后，玛曼的躯体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她第一次感到儿子的嘴摸索着触到她的胸脯时，一股甜蜜的颤动传到内部深处，辐射到身体各个部位。这种感觉与爱情相似，但却远远超过了情人的抚摸，它带来了极大的宁静的幸福和极大的幸福的宁静。她过去从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当情人亲吻她的胸脯时，那只是短暂地弥合了长时间的怀疑和不信任；但是现在她知道，有一张嘴在无限忠诚地依恋着她的胸脯，对这种忠诚她可以完全信赖。

如今还有了一些别的变化。过去，情人一触到她的裸体，她就会感到羞耻。相互的吸引总是能克服陌生的感觉，躯体接触的那一片刻是令人陶醉的，正因为它仅仅是片刻。羞耻从未沉睡，它使情爱更加令人激动，但它也监视着躯体，防止躯体完全屈服。可是，现在羞耻消逝了，不存在了。两个躯体忘情地互相畅开，无所隐藏。

她从来没有象这样献身于另一个躯体，也从来没有任何躯体象这样献身于她。情人使用她的肚皮，却从没有在那里生活，他抚摸她的乳房；却从没有从那里吮吸。啊，哺乳的欢乐！她钟爱地瞧着那张无牙的嘴鱼一般地游动，想象着她那些最隐秘的思想、观念和梦想通过奶水流进了婴儿的体内。

这是伊甸园的境界：肉体就是肉体，无需用遮羞布来掩盖；母亲和儿子沉浸在无限的安宁之中；他们象亚当和夏娃品尝知识果之前那样生活在一起；他们居住在超越善恶的躯体里。而且，在伊甸园里绝没有美丑之别，身体的各个部分既不丑也不美，而只是赏心悦目。无牙的齿龈是可爱的，胸脯是可爱的，肚脐和小臀部也是可爱的。内脏叫人愉快，它运行得有条不紊。那个滑稽脑袋上长出的短发也叫人愉快。她热心地观察儿子打噎，小便和咳嗽，这不仅仅是对婴儿健康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不，她是怀着激情投入了婴儿身体活动的每一过程。

这是一个崭新的态度，因为从幼年起，玛曼对包括她自己的一切身体的需要，就抱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每当坐在抽水马桶上她就憎厌自己，试图确信没人看见她走进浴室，她曾经一度不好意思当着众人吃饭，因为咀嚼和吞咽的程序使她感到厌恶。如今儿子身体的需要是那么崇高，超越了一切丑陋，对她产生了特殊的净化作用，也使她自己的躯体变得正当。那些偶尔渗出在起皱的乳头上的奶滴就象一滴露水那样富有诗意。她常常伸手去轻轻地揉挤乳房，以便产生那些神秘的奶滴。她用小指头蘸着那些白色液体，然后品尝它：她对自己说，她这样做是为了对滋养儿子的液体了解得更多一点，但实际上她是对自身的味道感到好奇，甜蜜的奶味使她与身体的其它排泄物和分泌物重归于好。她开始觉得自己是高雅的；她的躯体变得就象大自然的任何物体——一棵树，一丛灌木，一片湖——一样惬意，一样正当。

不幸的是，由于玛曼的躯体给了她无穷的欢乐，她没能充分注意到它的需要。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已经为时过晚：腹部的皮肤已变得粗糙多皱，下面的韧带呈现出微白的条纹；皮肤看上去好象不是躯体的真实部分，而象一床宽松的被单。玛曼对这个发现尽管感到诧异，但并没有因此过分不安。不管有没有皱纹，她的身子都是幸福的，因为它是为一双眼睛而存在，这双眼睛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模糊轮廓，这双眼睛（这双伊甸园的眼睛）还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堕落、残酷的世界里，身体是分为美与丑的。

这些变化，婴儿的眼睛虽然看不到，丈夫的眼睛却注意到了。雅罗米尔出生后，丈夫企图与玛曼重归于好。经历了一段长时间，他们又重新开始作爱。但已经和过去不同了；他们先得有一定的时间亲热，然后才在黑暗中犹豫不决地作爱。玛曼对这一点毫不在意，她意识到她那变得难看的身躯，她害怕充满激情，无所顾忌的作爱会使她失去儿子所赋予的内心平静。

不，不，她决不会忘记丈夫带给她的激动只是充满了风险和不安，儿子却给了她充满幸福的宁静；这就是她继续依恋儿子以求得安慰的缘故（儿子已经开始蹒跚行走，呀呀学语了）。一次孩子病重，玛曼几乎有两星期没有合眼，日夜守护在这个发着高烧，受病痛折磨的小躯体旁边。这段时间也叫人心醉神迷；儿子病愈后，她觉得自己好象抱着他的身子穿过了地狱，有过这样的经历，再没有什么能把她和儿子分开的了。

丈夫的躯体裹在外套或睡衣里，把自己单独封闭起来，离她愈来愈远，一天比一天变得陌生，儿子的躯体却继续依靠她；她已不再给儿子喂奶，而是教他使用抽水马桶，她为他穿衣脱衣，给他梳头，替他选择衣服，通过热心为他准备的食物，每天都与他的内脏保持接触。儿子四岁时开始显露出缺乏食欲的迹象，她对他严格起来，强迫他吃饭，她第一次感到她不仅是儿子躯体的朋友，而且也是它的统治者。这个躯体反抗着，不愿意吞咽，可最后不得不屈从；她带着愉快观察这徒劳的反抗，屈服，还有那瘦弱的脖子，通过它，她可以监视那不受欢迎的食物通过。

啊！儿子的身躯，她的乐园，她的家，她的王国……

那么儿子的灵魂呢？不也是她的王国的一部分吗？噢，是的，当然是的！当雅罗米尔发出的第一个词就是“妈妈”时，她简直欣喜若狂。她对自己说，儿子的大脑——现在还只有一个概念——全靠她来填充，甚至以后他的大脑开始发育，抽枝，开花，她将仍然是他的根。这想法使她欢欣鼓舞，她开始仔细留心儿子的学语，由于她觉得生命是漫长的，记忆是短暂的，她便去买了一本深红色封面的笔记本，开始把儿子嘴里发出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如果我们查阅玛曼的笔记本，就会看到在“妈妈”后面，紧接着又有许多词，“粑粑”，“呀呀”，“嘟嘟”，“呼呼”，“哼哼”，“噜噜”，第七个才是“爹爹”。看了这些简单的词语（玛曼的笔记本里常写有简短的注释和日期），我们感到对句子的初次尝试。我们得知在第二个生日之前他曾宣称“妈妈好”。几个月后，他又说，“妈妈是卡卡”[2]因为玛曼拒绝在午餐前给他山莓汁吃，为了这句话，他背上挨了一巴掌。他哭着叫嚷，我要另一个妈妈！但不一会儿他就说，我的妈妈很漂亮。这使玛曼非常快活。还有一次他说，妈妈，我舔你一个吻。意思是说他要伸出舌头，舔玛曼的整个脸。

----

[2]一种新西兰产的鹦鹉。

假如跳过几页，我们便会看到一个有着惊人韵律感的句子。女佣人安娜有一次答应雅罗米尔，要给他一串山楂，但她后来忘了，自己把山楂吃掉了。雅罗米尔感到受了骗，非常生气，激烈地反复说，丑安娜，偷山楂。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与前面所举的妈妈是卡卡很相似，但这次雅罗米尔的背上却没有挨巴掌，所有的人包括安娜都大笑起来，这句话以后还常被引用来给大伙逗乐（当然，雅罗米尔是明白这一点的）。当时，雅罗米尔还不可能知道他成功的内在原因，但我们却非常清楚，正是这句话的韵律使他免挨了一巴掌。这是雅罗米尔初次与诗歌的神奇力量相遇。

以后的篇页记满了大量押韵的词句、根据玛曼的注释，这些词句显然给全家带来了欢快和乐趣。例如，雅罗米尔对女佣人外表的速写是这样的：我家佣人的衣裳，就象一只山羊。紧接着又是这样的句子：我们在树林里欢闹，心儿是多么的美好。玛曼感到，雅罗米尔除了具有创造性的天赋，他那诗情的活跃还源于押韵的儿童读物的影响。她经常热心、固执地给他读这些书，以至孩子竟完全相信他的整个母语都是由抑扬格组成的。这里，我们得做点纠

正：雅罗米尔诗情的勃发并不是因为他的天资，也不是因为他对文学典范的模仿，真正的源头是他的外祖父。这是一个冷静而实际的人，与诗歌毫无缘分，他想出这些最拙劣的联句，暗地里教给他的外孙。

不久雅罗米尔就意识到他的词语产生的影响，于最开始表现起来。最初，他使用语言仅仅是为了让别人懂得他，现在他说话却是为了博得赞赏、钦佩和笑声。他期望他的言语会产生效果，由于常常不能得到所期待的反响，他便信口胡说一气，试图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一次，他对妈妈和爸爸说，你们都是刺。（他曾听到隔壁院子的一个男孩用过这词，还记得当时所有的男孩都高声笑起来）但爸爸非但不觉得有趣，反而给了他一耳光。

从那以后，他开始仔细注意大人的用词——哪些词是他们珍视的，哪些词是他们认为合适或不合适的，哪些词使他们感到震惊。这种观察使他有一天同玛曼站在花园里时，能学着外婆的口吻，说出一句忧郁的话：妈妈，生命真象这些野草。

很难说准他脑袋里在想什么。他显然没有想到野草那生机勃勃而没有价值的特性。也许他只是想表达生命悲哀和空幻这样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即便是他所说的话与他所想表达的话不同，这句话产生的印象却令人难忘：玛曼一下子惊呆了，然后她抚摸他的头发，眼泪汪汪地凝视他的脸庞。那充满狂喜、赞扬的凝视使雅罗米尔心醉神迷，他渴望着再次得到它。当他与玛曼散步时，他对着一个石头踢了一脚，然后说，妈妈，我刚才踢了石头，现在我为它感到难过——于是他弯下腰，轻轻地抚摸石头。

玛曼确信她的儿子不仅有才华（他刚五岁就学会了阅读），而且特别敏感，与别的孩子截然不同。她经常向外公和外婆表露这看法，雅罗米尔一边假装玩他的士兵或木马，一边侧耳倾听。他盯着客人们的眼睛，幻想着客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个非凡的天才儿童，或者看作是一个特殊人物，而不是一个儿童。

在他的六岁生日临近时，他准备上学了，家里人坚持认为他应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单独睡觉。玛曼感叹着时光的无情流逝，不过她还是同意了。她和丈夫决定把顶楼一个小房间送给儿子，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并用一张长沙发和一些适宜的家具布置这间屋子：一个书橱、一面提醒他保持干净和整洁的镜子，一张小小的写字台。

爸爸提出用雅罗米尔自己的画装饰房间，并着手把那些画有苹果和房子的幼稚的涂鸦贴在墙上。玛曼走到他身边，说："我想要你给我一样东西。"他瞧着她，她有点害臊但又坚定地继续说："我想要你给我几张纸和一些颜料"。她在自己房间的梳妆台前坐下，把纸铺开，练习写了很长时间的大写字母；最后她用笔蘸上红颜料，开始写第一个字母，一个很大的 L 然后是字母 I[3]，很快就写完了整个句子：生命犹如野草。她满意地检查着她的作品；这些字母笔划整齐，间隔均匀。她又拿起一张纸，重新写下这句话，这次用的是深蓝色，因为深蓝色更能恰当地表达儿子思想的深刻忧郁。

----

[3]LI 是英语 life（生命）的头两个字母。

接着她想起雅罗米尔还说过丑安娜，偷山楂。她嘴上带着幸福的微笑，开始用鲜红色写下；我们亲爱的安娜，喜欢上一串山楂。然后她笑着想起了你们都是刺，但她没有把这句话写下来。她用绿色颜料写道：我们在树林里欢闹，心儿是多么美好。她又用紫色写道：我家安妮的衣裳，柔软得象一只山羊。（雅罗米尔实际上说的是"我家佣人的衣裳"，但玛曼认为"佣人"这个词太粗俗）。然后她回想起雅罗米尔爱抚石头的情景，略微沉吟后，她用浅蓝色写道：我甚至不愿伤害一个石头。她有点窘迫地用橙色加了一句：妈妈，我舔你一个吻。最后她用金黄色写道：我的妈妈很漂亮。

生日前夕，父母把激动万分的雅罗米尔送到楼下和外婆睡在一起，然后开始搬运家具，装饰他的房间四壁。早晨，当他们把孩子叫到焕然一新的房间时，玛曼早已疲倦不堪。雅罗米尔的反应使她感到困惑。他显然吃了一惊，局促不安地站在房子中央，一言不发。他只对

写字台表现出兴趣，而这兴趣也是游移和迟疑的。这是一件古怪的家具，有点象学校里的课桌：装有活叶的倾斜的桌面，可以用来写字，还可作一个小贮藏室的盖子，同座位连成一体。

玛曼再也忍不住了；“咳，你觉得怎样？喜欢你的房间吗？”

“是的，我喜欢。”孩子回答说。

“你最喜欢什么？来，告诉我们！”外公提示道，他和外婆从半开着的门后面瞧着他。

“这个。”孩子说。他坐在写字台前，把装有活叶的桌面上下掀动。

“这些画你觉得怎样？”爸爸指着那些带框的画问。

孩子抬起头来微笑：“我熟悉它们”。

“但是把这些画挂在墙上你觉得怎样？”

孩子仍然坐在写字台前，点了点头，表示他喜欢墙上的画。

玛曼的心有点作痛，她很想躲起来，但她不得不坚持到底。由于她的沉默也许会被认为是责难，她不能不睬那些鲜艳的题字了，于是她说：“瞧瞧这些！”

孩子把头埋得更低，目不转睛地看着桌子抽屉。

“你知道，我想要……”玛曼不知所措地继续说，“我只是想要你回忆起一些事，这些事能提醒你是怎样长大的，从摇篮一直到课桌，因为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你使我们大家那样幸福……”她抱歉地讲着，非常窘迫，把同一句话反复讲了几遍，直到她不知道该再说什么，变得缄默下来。

如果她认为雅罗米尔不欣赏这个礼物，那她就错了。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他是满意的。他一直都为他的话而自豪，他并不希望它们消失在空中。看到它们被细心地记在纸上，变成图画，他有一种成功的感觉——的确，这个成功如此之大，如此出乎意料，以至于他不知道怎样作答，这使他感到不安。他知道他是一个出语惊人的孩子，他觉得这样的孩子在此刻应该说点有意义的话，但是他什么话也想不出来，所以他才缄默地垂着头。但当他从眼角瞥见自己的话牢固地展现在房间，比他自己更大、更长久，他不禁欣喜若狂。他觉得好象被他的自我包围起来，处处有他——他充满了房间，充满了整个别墅。

雅罗米尔在入学前就学会了识字。因此，玛曼决定让他直接上二年级；她设法得到了教育部的特殊许可，经过了一个委员会的考试，雅罗米尔获准坐在比他大一岁的学生中间。学校里人人都羡慕他，因此对他来说，教室不过是一面映照出家庭的镜子。母亲节那天，在学校的庆祝活动中，学生们为家长表演了节目，雅罗米尔最后一个出场，朗诵了一首关于母亲的动人诗歌，他为此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然而，有一天他却发现，在为他鼓掌的公众背后，还埋伏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危险的、敌意的公众。他按约去看牙科医生，碰巧遇上一个同学。他们站在拥挤的候诊室窗户旁边闲聊，这时雅罗米尔注意到一个成年男人带着友好的微笑在听他们谈话。雅罗米尔于是提高嗓子，大声问他的同学，假如他是教育部长，他将做些什么。那个男孩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于是雅罗米尔开始详细阐述他从外祖父那里经常听到的有关这个题目的见解。就是说：如果雅罗米尔是教育部长，学校将只上两个月课，假期持续到十个月，教师要听孩子们的话，从面包店里给他们带来蛋糕。雅罗米尔继续兴致勃勃、大着嗓门描述各种各样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

这时治疗室的门开了，护士送出来一个病人。一位妇女把书放在膝上，转过身带着愤怒的颤声对护士说：“小姐，请你管管那边那个小孩，他在那里吵吵闹闹，炫耀卖弄，真讨厌。”

圣诞节刚过，老师叫每个孩子到教室前面来谈谈节日。当轮到雅罗米尔时，他大谈特谈他所收到的不寻常的圣诞礼物——积木，滑雪屐，溜冰鞋，图书；但是不久他就注意到同学们并没有分享他的热情，一些同学以冷淡的甚至敌意的目光瞧着他。他突然停了下来，没有再继续列举其余的礼物。

不，不，不用担心——我们不打算重复一个富孩子和他的穷同学的陈腐故事。毕竟，雅

罗米尔班上有好几个男孩的家庭比他家富裕得多。可这些孩子与班上的其他同学都很融洽，没有人忌妒他们的优裕背景。那么，是什么使雅罗米尔得罪了他的同学呢？

几乎难以启齿：不是财富，而是母爱。这种爱到处留下痕迹；它粘在他的衬衣上，他的头发上，他装课本的皮包上，甚至他读来消遣的书上。一切都专门为他选择好，钟爱地为他准备好了。衬衣是节俭的外祖母为他缝的，不知怎么象女孩的罩衫，而不象男孩的衬衣。他的长发用玛曼的发夹别住，以免遮住他的眼睛。每逢下雨，玛曼总是拿着一把大雨伞在校门前等他，而他的同学却把鞋挂在肩上，赤足趟过水洼。

母爱在孩子前额上留下了一个排斥小伙伴友谊的印记。随着时间的流逝，雅罗米尔学会了巧妙地掩饰这个印记，但他在学校里初出风头后，紧接着渡过了一两年艰难岁月，在这段时期，同学们都极力嘲笑他，羞辱他，有好几次他们甚至痛打他。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雅罗米尔也有几个可靠的朋友，对他们的忠诚，他一生都感激不尽。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他们：第一个朋友是他的爸爸。他有时和雅罗米尔带着足球到院子里去（爸爸年轻时是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雅罗米尔总是站在两棵树之间，爸爸把球踢给他，雅罗米尔则充当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的守门员。

外祖父是他的第二个朋友：他常常带雅罗米尔去参观他的两个店；其中一个是个大药店，已经由外祖父的女婿在经营；另一个经营的是香水店，由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负责；她总是对孩子殷勤地微笑，让他闻各种各样的香水，以至雅罗米尔学会了靠气味来辨别不同的牌子。他总是要外祖父把小瓶子凑到他鼻子下，考考他鉴别香味的能力。“你是一个嗅觉灵敏的天才。”外祖父赞扬他，于是雅罗米尔就幻想着成为一个新型香水的发明家。

第三个朋友是阿里克，一条神经质的小狗，曾经在别墅里住过一段时期；尽管它没有经过训练，毫不听话，雅罗米尔仍然把它幻想成一个忠实的伙伴，在教室外面等他，陪伴他回家，它的忠诚引起了所有同学的嫉妒。

对狗的幻想成了雅罗米尔孤独的癖好，把他引向古怪的摩尼教：狗变成了动物中善的象征，一切自然美德的化身。他想象出狗与猫之间的多次战争（有将军、军官、所有设施，是他过去同他的锡兵游戏时采用过的兵法），他总是站在狗的一边，正如，个人应该永远站在正义一边。

很多时候，他都在爸爸的房间里拿着纸和笔画画，狗成了他绘画的主要对象：在种种不着边际的壮观场面中，狗被描绘成将军，大兵，球星和骑士。由于它们四肢的姿势与人物角色的适当举止相抵牾，雅罗米尔便把这些动物画成人的身躯。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每当雅罗米尔试图画人时，他总会遇到一个严重的困难：他不知道怎样画人脸。另一方面，他却掌握了画一个细长狗头的真正技巧，画完后在口鼻上点一滴黑墨水。这样，出于幻想和稚拙，一个狗头人身的奇异世界便诞生了。这个世界的人物能迅速地描绘出来，毫不困难地同描绘战争，足球比赛和海外冒险联系在一起。

第四个朋友是一个被大家鄙弃的同学；他的父亲是学校的看门人，一个疑心很重的小个男人，经常在校长面前告一些学生的状。这些孩子就向他的儿子报复，使他在学校里活得象狗一样。雅罗米尔逐渐被所有同学抛弃后，看门人的儿子仍然是他唯一的忠实崇拜者，有一次他还被邀请到别墅里度过了一天。大家请他在那里用了中饭和晚餐，两个男孩一起玩积木，然后雅罗米尔帮助他的朋友做功课。下个礼拜天，雅罗米尔的爸爸带他们去看足球赛。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爸爸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所有球员的名字，他谈起这场球赛就象是一个真正的行家，看门人的儿子听入了迷，雅罗米尔感到非常自豪。

在表面上，两个朋友是截然不同的一对：雅罗米尔总是穿着整洁，看门人的儿子却穿着一件磨损破烂的外套；雅罗米尔的家庭作业总是做得仔细认真，他的伙伴却是一个反应迟钝的学生。尽管如此，同这个忠诚的朋友在一起，雅罗米尔感到很自在。因为看门人的儿子身体非常结实。一个冬日下午，他俩遭到一大群男孩的袭击，他们成功地击败了这群男孩；雅

罗米尔很高兴他们干得这样棒；而且成功抵御所带来的光荣与进攻所带来的光荣是不同的。

一次，他们正漫步穿过城郊的空地，遇到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整整洁洁，好象是刚参加了一个儿童舞会。"妈妈的小宝贝。"看门人的儿子说，上前挡住这个男孩的路。他们戏弄他，向他提一些可笑的问题，对他畏缩的回答感到很开心。最后这个男孩鼓起勇气，想把他们推开。"你竟敢这样！你要为此付出代价！"雅罗米尔嚷道，好象这男孩的动作是一个莫大的侮辱；看门人的儿子把这话当成信号，给了那男孩脸上一拳。

智力和体力可以结成天造地设的一对。拜伦不就是对杰克逊拳师充满温情吗？后者以各种运动幸勤地训练这位虚弱的勋爵。"别打他，抓住他就行！"雅罗米尔对朋友叫道。他拔了一把长在垃圾堆里的带刺荨麻，强迫那个男孩脱下衣服，然后浑身上下抽打他。"看见你这样一个可爱的红小孩，你妈妈会高兴的！"雅罗米尔嘲弄道。一股对朋友的温暖友情，对所有娘娘腔的妈妈宝贝的同仇敌忾掠过了他的全身。

为什么雅罗米尔仍然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的母亲对一个大家庭不感兴趣吗？

恰恰相反，她渴望重温第一次当母亲时的那种幸福体验，但她丈夫总是找理由拖延。不久，她就不再恳求他，她怕遭到进一步的拒绝，怕拒绝所带来的耻辱。

但是，她越压抑自己不提想当母亲的欲想，这个欲望就越占据她的心；她把这种渴望看作是某种不可接受的，秘密的，甚至不正当的想法；丈夫能在她内部产生一个孩子的念头具有一种诱人的、淫荡的色彩。来呀，让我怀一个小女孩。她在内心恳求丈夫，这话听起来很有挑逗性。

一天深夜，这对夫妇心情愉快地从一个晚会上回到家里。雅罗米尔的父亲在妻子身边躺下，熄灭了灯（自从婚礼后他总是在黑暗中占有她，让触觉而不是视觉来引导他的欲望），拉过被子，跟她作爱。也许这在他们的房事中是少见的，或者是酒的影响，那天晚上，她神魂颠倒地把自己给了他，很长时间她都没有体验到这种狂喜了。

她整个身心都充满了他们正在造一个婴儿的想法；当她感觉到丈夫已接近高潮时，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狂醉地冲他大叫，要他别畏畏缩缩，同她呆在一起，让她怀一个孩子，怀一个小女孩。她痉挛着紧紧抓住他，以至他不得不使尽全力才挣脱开，并确信她的愿望是不会实现的。

后来，当他们筋疲力尽地躺在一起时，玛曼紧紧偎依着他，重新在他的耳边悄声说，她渴望和他再生一个孩子；她并不想让他烦恼，不，她只是想解释她刚才的举动为什么这样激烈和冲动（也许还这样下作，她乐意承认这一点）。她喃喃说这次他们肯定会有一个女孩，这个小女儿会成为他的掌上明珠，就象雅罗米尔是她的掌上明珠一样。

工程师提醒她（这是结婚以来第一次），他从来就不想要孩子；当时他是被迫妥协的，现在该轮到她妥协了；如果她真的想要他在另一个孩子身上看到他自己的形象，那么他可以告诉她，在那个绝不会诞生的孩子身上，他会更清楚地看到自己。

他们沉默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玛曼开始哭了起来，整个晚上她都在哽咽；她的丈夫没有抚摸她，只是喃喃说了几句安慰话。这些话甚至没能穿透她那悲哀的外壳。她似乎终于明白了一切：同她朝夕相处的这个男人从来就没有爱过她。

她陷入有生以来最深的悲伤之中。幸运的是，丈夫虽然没有给她任何安慰，另一个人却给了她安慰，这就是：历史。那天晚上的三周后，丈夫接到军事动员的命令。他打好行装，奔赴前线。空气中充满战争气氛，人们买下防毒面具，修建地下掩蔽所。玛曼把国家的不幸紧紧抱在怀中，好象这是她的救星；她沉浸在祖国的痛苦中，花了大量时间去教导儿子有关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

大国在幕尼黑会晤，达成了一个协议。德国军队占领了边境要塞，雅罗米尔的父亲回到了家。从那以后，全家入夜夜坐在楼下外祖父的房间，讨论历史的各种进程。在他们看来，历史迄今一直在沉睡（至少是假装沉睡），现在它突然伸伸懒腰，站了起来，它那巨大的身

影使一切黯然失色。啊，玛曼是多么欢迎这个巨大的阴影！一群群的捷克人逃离了边境，波希米亚就象一个剥了皮的桔子，毫不设防地袒露在欧州中部；六个月后，德国人的坦克突然出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而玛曼却献身于一个被骗取了为国作战机会的士兵；她完全忘记了这正是那个从来没有爱过她的男人。

但即使在历史风暴狂啸的时代，日常平凡的东西也迟早会从阴影中显现出来，夫妻床第生活在极端的琐屑和惊人的固执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一天夜里，当雅罗米尔的父亲把手放在玛曼的胸脯上时，她意识到正在抚摸她的男人就是曾经侮辱过她的那个人。她把他的手推开，轻轻地提醒他从前对她讲过的那些无情话。

她并不想报复。她只是想暗示国家的大事件不可能拭去卑微心灵对往事的记忆；她想给丈夫一个机会改正他那些无情无义的话，治愈她的创伤。她相信国家的灾难已使他更有情感，她乐意接受任何温柔的动作；作为他们开始新的爱情生活的标志。然而，丈夫伸过来的手遭到拒绝后，他只是翻了个身，很快就睡着了。

在布拉格的学生大示威以后，德国人关闭了捷克的大学，玛曼徒劳地等待丈夫在被子下面伸手摸她的胸脯。外祖父发现香水店里那个迷人的女人多年来一直在暗地里打劫他，大为震惊，死于中风。捷克学生被装在闷罐车里运到集中营，玛曼去看医生，医生忧虑地发现她的精神状况很不好，建议她长期休息。他告诉她温泉疗养地旁边有一个公寓，靠近几个湖泊和一条河。每年夏天，都有许多热爱大自然的人聚集在那里钓鱼，游泳，划船。现在正是早春，玛曼被沿着湖畔静静地散步的想法迷住了。但想到欢快的舞曲她又感到不安，这些音乐好象总是飘浮在野外夏日餐馆的空气中，令人留恋地回想起已逝的夏日时光，她自己的悲伤也使她忧虑，于是她决定不单独去度假。

当然，她很快就意识到该带谁去！近来，一半由于婚姻的烦恼；一半由于渴望生第二个孩子，她几乎把他忘记了。她真蠢，竟然忘记了她的宝贝，简直是在自我毁灭！他悔恨不已地俯向他：“雅罗米尔，你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我的第二个孩子！”她紧紧抱住他，喋喋不休地讲疯话：“你是我的第一个，我的第二个，我的第三个，我的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十个孩子……”她吻遍了他的脸。

他们在车站受到一个高个灰发、举止傲慢的女人的迎接；一个魁梧的马车夫提起两个皮箱，把它们送到外面人行道上，那儿已经等着一辆黑色轻便马车；马车夫爬上驾驶座，雅罗米尔，他的母亲和那个高个女人面对面坐在装有皮面的座位上；得得得的马蹄声伴着他们驰过小城街道，通过广场，广场的一边是文艺复兴时期式样的拱廊，另一边是围着绿色栏杆，有着爬满长春藤的古老府第的花园。然后他们朝着河边驶去；雅罗米尔看到一排黄色的船舱，一个跳水板，白色的桌椅。再往后他瞥见一行沿河的白杨，接下来马车已载着他们驶向散布在河边的孤立的别墅。

在一座别墅前，马停了下来，马车夫跳下车，拿起行李。雅罗米尔和母亲跟在他后面穿过花园，门厅，上了一段楼梯，进到一间屋子，里面按照为夫妇安排的习惯并排放了两张床。有两扇大落地窗，其中一扇通向阳台，面对花园和河流。玛曼扶住阳台栏杆，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啊：多么美好的宁静！”她说，又深深地呼吸，眼望着码头，那儿有一只红色的划艇正在轻轻地簸动。

那天晚上吃晚餐时，玛曼和住在这所公寓的一对老夫妇交上了朋友；此后，每天晚上，小饭厅里便响起低低的倾谈声；大家都喜欢雅罗米尔，玛曼喜欢听他的故事，看法，谨慎的夸耀；是的，谨慎的：雅罗米尔决不会会记在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受到那位女人羞辱时的经历，他总是在寻找一个盾牌来防备她那嘲弄的目光。当然，他仍旧渴望赞美，但他已学会了用天真、谦逊的态度和简洁的语言来得到它。

雅罗米尔进入了一个心旷神怡的世界：别墅座落在宁静的花园中间，深沉的河流和停泊的船只令人幻想起远航；停在车道上的那辆黑色马车不时把那个仪表象神话故事中伯爵夫人

的高个女主人带走；人们可以乘轻便马车去偏僻的浴场，就象往返于世纪、往返于梦幻之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广场上，勇敢的骑士曾在它那狭窄拱廊的阴影里决斗。

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世界还包括一个带着狗的男人。他们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正伫立在河岸上，凝观着滚滚的河水；他穿着一件皮外套，身旁蹲着一条黑色的德国狼狗，人和狗僵化的姿势使他俩看上去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再次碰到他时是在同一地点；他仍然穿着那件皮外套，他把树枝扔出去，然后狗把它们叼回来。当他们第三次同他相遇时（仍然是同样的景色：河流和白杨），这人对玛曼微微鞠了鞠躬，他们走过去后，好奇的雅罗米尔发现他回过头来看了好几次。次日，当他们散步归来，看见那条黑色的德国狼狗蹲在别墅的大门前面。他们走进门厅，听见了谈话声，他们毫不怀疑说话的男人就是那条狗的主人。他们好奇不已，便留在门厅里，懒懒地转悠和说话，直到女主人走出来。

玛曼指着那条狗问："它的主人是干什么的？我们散步时好象总要碰到他。"

"他是我们这里中学的美术老师。"玛曼表示她很想同一位美术老师谈谈，因为雅罗米尔喜欢绘画，她渴望听到一个专家的意见。女主人把那个男人介绍给玛曼，雅罗米尔于是被打发跑上楼，到他的房间去取素描薄。

然后这四个人在小客厅里坐下来——女主人，雅罗米尔，狗的主人和玛曼。那个男人翻看着画簿，玛曼在旁边不断地作解说；她解释道，雅罗米尔总是喜欢动的场面，而不喜欢静的风景；她说，她真的觉得他的画具有不寻常的生命和动态，尽管她困惑不解为什么所有人物都是狗头人身；要是雅罗米尔画真正的人像，他的作品或许会有点价值，她不太有把握孩子这种尝试是不是有道理。

狗的主人愉快地审视着这些画；然后他评论说，他感到如此着迷的恰恰是动物的头和人身的结合。这两个世界的奇异结合显然决非偶然，大量有关这个题目的画清楚表明，这个观念深深地吸引住孩子，在他神秘的幼小心灵深处生了根。仅凭孩子再现外部世界的能力来判断他的才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能学会这样做。作为一个艺术家（这就暗示教书仅仅是为了谋生的一个必要的不幸），使他着迷的是小家伙在纸上表现出来的富有创造性的内心世界。

玛曼听见夸赞雅罗米尔，感到很高兴，女主人抚摸着孩子的头发，宣告他有一个远大的前程，雅罗米尔盯着地板，把每一个字都铭刻在他的记忆中。画家说，明年他将转到布拉格的一所学校，他希望玛曼继续把雅罗米尔此后的作品带给他看。

内心世界！多重要的词，雅罗米尔非常满意地听到它们，他从来没有忘记，他五岁时就已被称为是一个不寻常的孩子，与别的小孩不同。同学们的态度，他们对他的皮包和衬衫的大肆嘲笑，都在不断使他想到他的卓然超群（尽管是痛苦的）。然而，迄今为止，他的与众不同一直是某种空洞的模糊的东西，一个不可理解的希望，或者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否决；如今，它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名称：有创造性的内心世界。同时这个名称还被赋予了具体明确的内容：一个狗头世界的意象。当然，雅罗米尔非常清楚，他对受到称赞的狗头人的发现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仅仅是由于他不会画人脸；这使他产生了一个印象，他那内心世界的独特不是出于任何积极的努力，而是他头脑里乱七八糟掠过的一切。这是赐予他的一个天赋。

从此，他开始细心注意他的所有思想、念头，并赞赏它们。比如，他突然想到，假如他死了，他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就将不再存在。最初；这个思想只是在头脑里一闪而过，但现在既然意识到了他的内在创造力，他就没有让这个思想象过去许多想法一样溜掉。他抓住它，观察它，从各个方面检查它。他沿着河边散步，不时闭上眼睛，然后问自己，当他的眼睛闭上时，这条河是不是还存在。当然，每次他睁开眼，河水都在他的面前继续流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当雅罗米尔不看它时，河水还在那里。他觉得这非常有趣，在这个实验上花了大半天时间，然后把这事全告诉了玛曼。

假期愈临近结束，他们就觉得谈话愈快活。夜色降临后，他们走出去，坐在正在碎裂的木凳上，手拉着手，凝视着波涛，一轮圆月在河面上来回晃动。"真美啊！"玛曼叹道。她的

儿子望着月光映照的漩涡，幻想着在河上远航。然后玛曼想到很快就要重新开始的乏味日子，说："亲爱的，我心里感到非常忧伤。但你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她望着儿子的眼睛，它们看上去充满了爱，充满了渴望的理解。这使她感到害怕：把一个女人的心事吐露给一个孩子！但那双富于理解的眼睛仍象一个隐密的邪恶吸引着她。他们紧挨着躺在两张并排的床上，玛曼回忆起在雅罗米尔满六岁之前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睡在一起，那些日子他们是多么幸福啊；她突然想到儿子才是唯一使她在床上感到幸福的男人。这个想法使她感到好笑。可她又看了看他那温柔的眼睛后，她对自己说，这孩子不仅能分散她的心事（这样就给了她遗忘的安慰），而且还能专注地听她诉说（这样就给了她理解的安慰）。"让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在我的生活中很少有爱情。"她对他说。还有一次她甚至告诉他："作为一个妈妈我是幸福的，但妈妈也是一个女人。"

是的，这些半吞半吐的亲昵具有一种罪恶的诱惑力，她知道这一点。一次，他出乎意料地回答她："妈咪，我并不是您所想的那么小，我理解您。"她吃了一惊。当然，孩子头脑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念头，他只是想对母亲表示他渴望分担她的全部忧伤。不过，他的话有几种可能的意思。它们突然使人看到了危险的深渊，遭禁的亲昵的深渊，以及不正当的理解。

雅罗米尔独特的内心世界进展得如何呢？

不太顺利：在小学期间，学业对他来说就象轻松的儿童游戏，进入中学后却变很困难多了，他那内心世界的荣耀开始消失在暗淡的日常功课和家庭作业之中。老师以嘲笑的口吻谈到那些只描写人世痛苦和不幸的悲观主义书籍，雅罗米尔关于生命犹如野草的看法现在对他来说就象是带有侮辱性的陈词滥调。他不再有把握他过去的任何思想和感觉是否真正属于他自己，他的想法是否仅仅是人类思想库藏中的一个公共部分，它们永远是现成的，人们只是借用一下，就象图书馆里的书籍。那么他是谁？他的内在自我到底象什么？他试图就近探索一下内在生命，但他所窥见的不过是他自己在觑伺的眼光。

于是，他开始想念两年前第一个谈到他内心世界的那个男人。他的美术成绩一直都很一般（当使用水彩时，颜料总是溢出铅笔草图外）。玛曼因此决定完全有理由应允儿子的恳求，去找到那个美术家，安排家庭教学，帮助雅罗米尔在班上赶上去，提高他的美术成绩。

就这样，雅罗米尔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来到画家的工作室。工作室在一个公寓楼房的顶楼，有两个房间；第一间摆满了书架；第二间没有窗，只有一个安在倾斜的屋顶上，由几块穿乳白色大玻璃镶成的天窗。在这间画室里有几个画架，装着未完成的画，一张散乱着纸张和有色墨水小瓶的长桌；墙上贴满了奇形怪状的黑脸，画家把它们画得象非洲人的面具；雅罗米尔很熟悉的那条狗蹲在角落里的长沙发上，默默地打量着来访者。

画家让雅罗米尔在长桌旁坐下，然后翻看他的素描薄。"这些画千篇一律，"他最后说，"这不会使你有所造就。"

雅罗米尔很想提醒画家，这些画正是他从前非常喜欢的狗头人，他是专门为了他才画的，可他是那样的失望和自怜，以至于说不出一句话来。画家在雅罗米尔面前摆了一摞白纸，打开一瓶墨水，然后把画笔放在他手中。"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别想得太多？尽量随心所欲……"但雅罗米尔是如此畏怯，什么也想不出来，当画家再次鼓励他时，他不安地又画出长在瘦瘦的身躯上的百试不爽的狗头。画家感到不满意，困惑不解。雅罗米尔说，他想学会正确使用水彩；因为在学校里，他从来无法让颜料干净地留在铅笔草图内。

"这你母亲对我讲过。"画家回答，"但现在把水彩忘掉，也把狗忘掉吧。"然后他把一本厚书放在孩子面前，翻到一页，上面画着一条顽皮、稚气的线条，扭动着穿过着色的背景。这线条使雅罗米尔想到蜈蚣，海星，爬虫，星星和月亮。画家要孩子发挥他的想象力，画出相似的东西。"可我应该画什么呢？"雅罗米尔问，于是画家告诉他，"画一条线。画让你快活的那种线条。记住，画家的工作决不是摹仿，而是在纸上创造出一个他自己的线条世界。"于是雅罗米尔画着那些他一点都不喜欢的线条，画满一张又一张，最后，按照母亲的嘱咐，

他交给画家一张钞票，便回家去了。

这次访问的结果与他所期望的完全不同。它没有导致重新发现他失去的内心世界。恰恰相反，雅罗米尔可以真正称作自己唯一作品——长着狗头的足球队员和士兵被夺走了。尽管如此，当母亲问他对这堂课的看法时，他还是向她作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汇报；并不是因为他虚伪：他的访问虽然没有把内心世界归还给他，但至少向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从不向任何人开放，却特许他瞥了几眼，以此奖赏他：比如，他看到了一些不寻常的画，这些画尽管使他茫然失措，但却传达出与家里所挂的风景画和静物画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他立刻就认识到这特征是多么鲜明）；他还听到几句很有价值的话，这些话他顿时就接受了：比如，他明白了"布尔乔亚"这个词是一种侮辱；布尔乔亚就是那种要求绘画看上去象现实生活的人；但我们可以嘲笑这样的人（雅罗米尔喜欢这句话），因为他们已经死亡，但却不知道这一点。

因此，雅罗米尔渴望继续去看画家，希望能重新获得那些狗头人身画曾经得到的成功；然而，白搭了：那些被认为是米罗[4]画的变种的潦草涂鸦，全是呆板的摹仿，一点也没有儿童幻想的魅力，那些非州人面具的画仍然是笨拙的复制，不能象画家希望的那样激发起孩子自己的想象力。雅罗米尔已经数次访问了他的家庭教师，竟没有得到一句赞扬的话，他感到无法忍受，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他带去他的秘密素描本，里面有他画的裸体女人画 。

----

[4]米罗（1893－）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

这些画主要是雅罗本尔从外公书房的一本杂志上看到的照片摹仿下来的。因此素描簿头几页上的画都是些成熟、端庄的女人，姿态高贵，典型的十九世纪的讽喻人物。不过，接下来的部分倒是有一些更有趣的东西：有一页画了一个无头女人，在画着女人脖子的地方纸被剪掉了，看上去好象头是被砍掉的，留下一个想象中的斧子痕迹。纸上的切口是雅罗米尔的铅笔刀搞的；雅罗米尔发现班上一个女孩特别迷人。他经常凝视她那穿着衣服的身子，渴望看到它裸露出来。碰巧他有一张这个女孩的照片，于是他把照片上的头剪下来，把它贴在素描簿上的一个切口，从而实现了他的愿望。后面几页的裸体画都是无头的，都有一个切口。其中一些人物的状态稀奇古怪：蹲着的仿佛是在小便，在燃烧的木柴上的象是圣女贞德[5]，或者是其它一些遭受折磨的场面。比如，一个无头女人被钉在柱子上，另一个的腿被砍掉，第三个失去了一只臂膀。还有一些场面我们最好不要提了。

----

[5]贞德（1412－1413），法国民族女英雄，唤起法国民族精神抵抗英国，后被烧死。

诚然，雅罗米尔不知道画家对这些画会作何反应；它们肯定远远比不上画家画室里的画和他那些厚书里的画。尽管如此，雅罗米尔还是觉得他这本秘密素描本上的画与画家的作品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不合惯例的；它们都与家里的画不同；象画家这样的画，肯定会遭到雅罗米尔家庭中任何成员或他们家常客的谴责和误解。

画家轻轻翻完了那本素描簿。他一言不发，递给孩子一本大画册，然后坐下来，忙乎着整理桌上的纸张。雅罗米尔开始仔细翻看画册。他看到一个裸体男人臀部翘得老远，不得不用一根拐杖支住；一个鸡蛋开出一朵花；一张脸爬满了蚂蚁；一个人的手在变成一块岩石。

画家走到雅罗米尔身边。"注意，"他说，"达里[6]是个多么出色的制图员！"然后他把一个裸体石膏像放在雅罗米尔面前。"我们一直都忽视了绘画技巧，这是一个错误。在我们能对世界作根本改变之前，我们得学会以本来的面目看它。"于是雅罗米尔的素描簿上开始画满了女人的躯体。凡是画家仔细检查过的地方，轮廓和比例都作了修改。

----

[6]达里（1904－），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

如果一个女人不能从她的肉体充分地享受生活，她就会把她的肉体看作一个敌人。玛曼

对雅罗米尔从外面带回家的那些奇怪涂鸦一直不太满意，当他开始把裸体女人画给她看时，她的不安变成了强烈的反感。几天以后，她从窗口看见女仆马格达正在摘樱桃，雅罗米尔为她扶着梯子，他的眼睛一直在姑娘的裙子下面瞟来瞟去。玛曼觉得他近来一直被成堆的女人胸脯和臀部包围起来了，她决定反击。那天下午，雅罗米尔又该去上他的美术课；她很快穿好衣服，赶在儿子之前到了画家的工作室。

“我绝不是清教徒，”她说，一屁股坐进扶手椅，“但你知道，雅罗米尔现在正进入一个危险的年龄。”

她曾仔细想过该对画家讲些什么，可现在她却笨嘴笨舌。当然，在家里熟悉的环境中，衬着花园里总是默默为她的思想叫好的青枝绿叶的背景，她已排练过要讲的话。但是这里却没有绿色大自然的痕迹。这里周围都是画架上奇特的画和一条蜷伏着的狗，这条狗就象一个多疑的斯芬克斯从长沙发上盯着她。

画家几句话就驳回了玛曼的批评，接着说，他对雅罗米尔在学校的成绩丝毫不感兴趣，因为学校的美术教育只能扼杀一个孩子身上可能具有的任何才能。不，她儿子的画深深吸引他的是，他那独特的、几乎是病态般敏感的想象力。

“注意这奇怪的形式。几年前你给我看的那些画——都是狗头人身像。最近，他一直在画裸体女人——但她们全都是无头的。你不觉得他拒绝承认人脸，拒绝赋予人以人性是有意义的吗？”

玛曼说，她认为很难相信她的儿子已经变得这样悲观，竟然要剥夺人的人性。

“自然，他并不总经过了悲观的思索才画出这些画来的。”画家反驳道，“艺术并不是源于理性。雅罗米尔画狗头人身或者画无头女人的冲动都是出于本能。我敢肯定他不清楚怎么会想到这些东西的。他的潜意识低声告诉他这些形体——奇特的、但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形体。你不认为在雅罗米尔的想象和这场战争之间有一条神秘的链环吗？战争震撼着我们，使我们每日每夜、每时每刻都在战栗。难道不是这场战争夺去了男人的脸和头吗？我们不正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渴求得到无头女人躯干的无头男人的世界里吗？所谓对世界的现实主义看法不正是最大的幻觉吗？我问你，你儿子的画难道不是更有真实性和现实性吗？”

她来是为了责备画家，可现在她却象一个害怕受到责罚的胆小女孩那样慌乱失措，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画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画室的角落，那里有几幅未装框的油画靠在墙上。他拉出一幅，把它转过来，使有画的那面朝着外边，往后退了几步，蹲了下来。“过来，”他对玛曼说。她顺从地走过去，他把手放在她腰上，把她拉得更近一点，于是他们并排蹲着，玛曼瞧着一组奇特的红棕色的形状，这些形状可以看作是一片烧尽的、光秃秃的景物里的暗火，但也可能是血的纹路。在这片景物中几笔抹了一个拿着调色刀的人形，一个奇特的人形，好象是由白色绳子构成的（这效果是由空白的画面造成的）。它好象是在漂浮而不是在行走，是在远处闪烁而不是实际存在。

玛曼再一次不知道该说什么，画家继续他的演说；他谈到战争的变幻不定，它远远超过了现代画家们的想象；谈到令人恐怖的意象；树枝上缠着人肉的树，树上有人的手指，一只眼睛从树干往外凝视。然后他说，处在这样一个毁灭的时代，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再感兴趣，除了战争和爱情。一种在血淋淋的战争现实后面闪烁的爱情，就象玛曼在那幅面上所看见的人形一样。（在这次谈话中间，玛曼第一次感觉到她理解了画家的话，因为她也看出这幅画是一种战争场面，她也认出那个白色形体是一个人形。）画家谈到他们初次见面时的河岸。他说，她就象那团幽晦的白色的爱从雾般的朦胧里现出来。

然后他把蹲着的玛曼转过来对着自己，并且吻她。他在玛曼还一点没意识到所发生的事就吻了她。这同他们之间已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是一致的；事情往往来得太突然，好象总是出乎她的意料；她还没来得及想一想，就被吻了，随之而来的反应无法改变已发生的事，只

能证实这个事实：发生了某种不对头的事；玛曼甚至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不对头，于是她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以后去解决，集中精神对付眼前的时刻。

她感觉他的舌头伸在她的嘴里，立刻意识到她自己的舌头软耷耷的毫无生气，画家准会觉得它象一块湿漉漉的面巾。她感到惭愧，忿忿地想，度过了这些没有爱的岁月，难怪她的舌头已经变成了一块面巾！她迅速地用舌尖去回报画家的舌头，他把她抱起来，带到长沙发那里（那条一直盯着他们的狗跳起来，躺到门边去了），轻轻地把她放下，爱抚着她的胸脯。她感到一种满足和骄傲；画家的面孔显得年轻、动情。她担心她已不再知道怎样作出反应，因此，她命令自己要力图表现得年轻、动情，在她还没有意识到时（事情的发生又一次快得使她来不及思索），他已经成了深深进入她的体内和她的生活的第三个男人。

突然，她意识到她的确不如道自己是否需要他。她想到自己的举动仍然象一个愚蠢的、缺乏经验的小女孩，如果她对正在干的事稍加考虑，决不可能发展到目前的状况。这个想法使她平静下来，因为这就是说，她对婚姻的不忠不是由于情欲而是由于无知。这个想法反过来激起她对那个使她处于一种不成熟的天真状态的男人愈加忿恨，这种忿恨象帷幕遮住了她的头脑，使她完全停止了思索，只感觉得自己快速的心跳。

他俩的呼吸使她平静，头脑苏醒过来，为了躲避自己的思想，她把头埋在画家的怀里，让他抚摸她的头发，呼吸着令人镇静的油画气味，等待着看谁先说话。

但是第一个发出声音的不是他，也不是她——是门铃。画家站起来，迅速穿上裤子，说：“雅罗米尔。”

她吓坏了。

“没关系，别着急。”他抚摸她的头发，然后走出画室。

他迎着孩子，让他坐在外间屋子的桌旁。“画室里有我的一个客人，我们就待在这里，把你带来的画给我看看。”雅罗米尔把素描簿递给画家。画家细看了一道他的作业，在他面前放好颜料，递给他纸和画笔，出了一个题目，要他开始画。

他返回画室，发现玛曼已经穿好衣服，打算离开。“你干嘛让他留下来？你干嘛不把他打发走？”

“你这样急着要离开我，是吗？”

“真是疯了，”她说。画家再次搂住她。这次，她对他的抚摸既不抵抗也不回报。她象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靠在他的怀里。画家对这个迟钝的躯体悄声耳语，“是的，是疯了。爱情要么是疯狂的，要么什么都不是。”他让她坐在长沙发上，吻她，抚摸她的乳房。

然后他又走出去看雅罗米尔画得怎样了。这次，他布置的题目不是想要提高孩子手上的灵巧。相反，他要他画一个最近给他留下印象的梦的场面。画家瞧了一眼雅罗米尔的作业，开始大谈起幻想来。梦最美丽的是幻想中的见面可以发生，是在日常生活中决不可能发生的人和物之间的邂逅。在梦里，一只船可以从开着的窗户驶进房间，一个死了二十年的女人可以从床上站起来，走进那只船，然后船突然变成一具棺材，棺材可以漂浮在撒满鲜花的河岸。他引用劳特蒙特[7]关于美的名言——在手术台上邂逅一把雨伞和一台缝纫机就是美。然后画家说：“这样的邂逅是美的，但在一个画家的房间邂逅一位女人和一个孩子则更美。”

----

[7]劳特蒙特（1846－1870），法国诗人。

雅罗米尔注意到他的老师好象比往常更加活泼。他感觉到当画家谈到梦和诗歌时，声音里有一种特殊的温情。雅罗米尔喜欢这种温情，他很高兴自己激起了这样热情洋溢的谈话，他明白画家最后那句关于邂逅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的话。当画家最初告诉他，他们要待在外间屋子时，雅罗米尔马上就猜到画室里可能有一个女人；要是连雅罗米尔都不许瞅她一眼，那她就不是一般女人，而是一个特殊的人。但是，他距离成人世界还太远，不可能试图解答这个秘密；他更感兴趣的是画家说话的方式，是把他雅罗米尔的名字同那位神秘的女士连在

一起的最后那句话。雅罗米尔觉得，不知怎么，正是他的在场使那位女士在画家眼中显得更加重要。他很高兴，画家喜欢他，也许还把他看作对他生活有影响的人，在他俩之间有一种深刻的、秘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年轻而无经验的雅罗米尔不可能完全理解，而他那聪明、成熟的家庭老师却一清二楚。这些想法使雅罗米尔快乐，当画家又给他布置作业时，他急切地用画笔蘸上颜料，俯在素描簿上画起来。

回到画室，.画家发现玛曼在哭泣："行行好，让我马上回家吧？"

"走吧，你俩可以一道离开。雅罗米尔就要做完作业了。"

"你是个魔鬼。"她流着泪说，画家吻吻她。接着他又穿梭般地回到邻室，夸赞雅罗米尔的作业（呵，那天孩子是多么幸福呀！）把他打发回家。他回到画室，把哭泣的玛曼放倒在颜料斑斑的旧沙发上，吻着她柔软的嘴和湿湿的面颊，然后跟她作爱。

玛曼同画家的恋情从未失去打一开始就已注定的那种特性：这不是她梦寐以求的爱，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爱；这是一种未曾料到的爱，出其不意地就抓住了她。

这个爱不断使她想到，对事情的发生她心里总是毫无准备。她缺乏经验，不知道怎么行动，怎么谈话；当着画家那富有特色、急切的脸孔，她对自己的每句话、每个姿势都感到惭愧。她的肉体同样没有准备好；她第一次开始后悔生下雅罗米尔后她对身躯的忽视，镜子里映照出来的腹部上暗淡、褶皱的皮肤，使她感到恐惧。

呵，她多么向往一种肉体和灵魂会在其中和谐到老的爱。(是的，那种她预先期待的爱，坦然自如的爱。）但是，在她如此唐突地进入的这个苛刻的关系中，她的灵魂显得令人痛苦的年轻，而她的肉体却显得令人痛苦的苍老，竞使她在通过这场冒险时，好象双脚战战兢兢走在绷紧的绳索上，灵魂的不成熟和肉体的衰老都同样能给她带来毁灭。

画家对她关怀备至，并想把他拉进他那绘画和思想的世界。玛曼喜欢他这样。这证明了他们的结合不只是两个躯体在合谋开拓一个有利的境遇。但是，如果爱情不仅要占有肉体，而且还要占有灵魂，那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为了替她经常不在家辩护（特别是对外婆和雅罗米尔），玛曼不得不常常编造一些新朋友。

她总是在画家工作时坐在他身边，但这并不使他满足；他向她解释，艺术，按他所理解的，仅仅是发掘生活中神奇礼物的一种方法；这样的礼物甚至一个正在玩要的孩子或一个沉浸在梦中的普通人也能发现。他给了玛曼纸和有色墨水，要她在纸上点上墨水，然后把它们吹散；斑斓的色彩参差不齐地在纸上渗开，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状。画家把玛曼的作品裱在书橱的玻璃板上，骄傲地向客人炫耀。

就在她最初的一次访问中，当地准备离开时，他把几本书放在她怀里，要她带回家去读。她不得不偷偷地读这些书，因为她害怕雅罗米尔产生好奇，问她这些书从哪儿来的，或者家里其他人问同样的问题。要作出一个合适的回答是困难的，因为这些书的封面甚至看上去都很特别，与她的亲戚和朋友们书架上的任何书都不一样。因此，她把这些书藏在胸罩和睡衣下面的衣服篮子里，在她独自一人的时候才拿出来读。也许是感到自己在干犯禁的事，害怕被发现，这使她不能专心致志地读书。可以想见她收获其小，实际上有许多页她都没看懂，尽管她读了两三遍。

她把这些书还给画家时，就象一个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的女学生那样紧张。他会马上问她对某本书的看法，她知道他对似是而非的回答不感兴趣，他想同她分享共同发现的真理。玛曼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能帮助她理解这些书的全部内容，也不能帮助她理解画家认为十分重要的地方。因此，象一个狡黠的女学生，她找到一个借口：她抱怨说她不得不偷偷地读这些书，以免被人发现，所以她不能全神贯注在它们上面。

画家相信了她的辩解，并找到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在雅罗米尔下次来上课时，画家给他作了关于现代艺术潮流的讲演，然后借给他几本有关这个题目的书，孩子乐巴巴地接受了。当玛曼最初看见这些书摆在雅罗米尔的书桌上时，意识到这些违禁品是偷偷为她准备的，她

感到非常害怕。迄今为止，她冒险的全部重担一直都是由她独自承担，而现在她的儿子（纯洁的象征）却成了他们私通的不知情的信使。但是，毫无办法。这些书就放在他的书桌上，除了以关心儿子为借口，把它们翻阅一遍外，玛曼没有别的选择。

一次，玛曼鼓足勇气告诉画家，他借给她看的那些诗歌好像毫无必要地含混不清。她刚一说出口就后悔了，因为对画家的观点只要有一点异议，他都会认为是不忠。玛曼赶紧弥补这一损害。当画家把不悦的脸转向画布时，她迅速地脱下外套和乳罩。她的乳房很美丽，她知道这一点。此刻，她骄傲地（但有点犹豫地）挺着它们走到画室的另一头，在由画架半掩着的画家面前停下来。画家阴沉沉地在画布上方调着画笔，不时气恼地瞥一眼从油画后面偷觑的玛曼。她从他手中拨下画笔，咬在牙齿之间，咕哝着说出一个她从未对任何人讲过的字眼，一个粗俗的、猥亵的字眼。她把这个字重复几次，直到看见画家的愠怒变成含情脉脉的欲望。

不，她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现在这样做也是非常费力，僵着肌肉。从他们暧昧关系一开始，她就清楚地知道，他盼望她带着戏谑和放纵表达她的感情。他要地完全放荡不羁，不受习俗、羞耻和禁锢的束缚。他喜欢说："我不想要你任何东西，只要你的自由。我要你把自己的完全自由作为礼物送给我！"他要求不断地证明这个礼物。渐渐地，玛曼多少有些相信，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准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但同时她又担心她永远学不会它。她愈是努力想学会放浪，她的放浪就愈成了一个负担。它变成了一项任务，一项必须在家里准备好的任务（考虑好哪句话，哪个愿望，哪种行为最能使画家惊异不已，并相信她是出于自然的），结果她开始在放浪的责任下呻吟，就象在沉重的负担下呻吟一样。

"最糟的事不是人世不自由，而是人们忘却了他们的自由。"他常常对她讲，她觉得这句话用在她身上真是恰如其分，她正是属于那个画家认为应该完全舍弃的旧世界。"假如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我们至少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自由自在地活着。"他总是说，"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那就让我们独特地生活吧。让我们抛弃一切陈旧的东西。绝对的现代是必要的。"他引用兰波[8]的话，她虔诚地听着，对他的话充满信任，对自己充满怀疑。

----

[8]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他的诗强烈表现现代人对文明社会的反抗。

她想到艺术家的爱也许完全是出于误会，她老问他为什么爱她。他总是回答，他爱她就象拳击手爱蝴蝶，歌唱家爱沉默，恶徒爱村姑。他总是说，他爱她一如屠夫爱小牛胆怯的眼睛，闪电爱宁静纯朴的屋顶。他告诉她，他喜欢她是因为她是从一个沉闷的世界中解放出来的一个令人兴奋的女人。

她喜欢不尽地听他说话，一有机会就去看他。她感到自己象一位凝目旖旎风光的旅游者，因为太匆忙而透不过气来，竟不能饱赏眼前的美景。她的确不会享受她的恋情，但她明白这是一个重大而美好的东西，她决不能轻易放过它。

雅罗米尔呢？他感到很自豪，画家把自己书房里的书借给他（画家有好几次告诉孩子，他一般决不让他的书出房间，但他把雅罗米尔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外），由于有大量时间可以支配，他梦幻般地沉浸在这些书页里。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还没有成为布尔乔亚大众的陈旧货色，还保留了一个流派的有吸引力的气息，一种对童年——一个总是向往着秘密会社，团体，帮派的浪漫色彩的年龄——有着神奇吸引力的孤芳自赏。雅罗米尔陶醉在这些书的神秘氛围中，他的阅读与母亲截然不同，母亲读这些书就象读会受到考查的课本一样，孜孜不倦，一字不漏。而不用害怕考试的雅罗米尔实际上却没有读完一本书。他信手翻着它们，不时在一页上停下来，沉思冥想着几行诗句，对诗的其余部分全无兴趣，好象它们根本没有意义。一行诗、一段散文都足以使他快活，不仅因为它们很美，而且因为它们是通向上帝选民王国的神秘之门，这些人的灵魂对众生昧昧的事物是很敏感的。

玛曼知道，儿子不会满足于仅仅当一个信差，那些只应该传给她看的书，他却带着真正的兴趣去阅读。因为她开始同他谈论共同的读物，问他一些她不敢向情人提的问题。当她发现儿子甚至以比画家更大的热情捍卫这些借来的书时，她不禁大吃一惊。她注意到，在一本艾吕雅[9]的诗选里，他用铅笔在一些诗句下划了线：睡着了，一只眼睛里有月亮，一只眼睛里有太阳。“你在这句诗里看见了什么？为什么我应该在一只眼里含着月亮睡觉？石头的腿，穿上了沙的长袜。长袜怎么能用沙子缝制？”雅罗米尔怀疑母亲不仅在取笑诗，而且也在取笑他，认为他太小，读不懂这些诗。于是他生气了，粗暴地回答了她。

----

[9]艾吕雅（1895－1952），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天哪，她甚至在一个十三岁的孩子面前都失败了！那天她去看望画家，觉得自己象一个穿着敌服的间谍。她的行为失去了任何本能的意味，一言一行都象一个怯场的业余演员，胆怯地念着台词，生怕被哄下台。

那会儿，画家刚发现了照相机的妙处，他把他初次照的照片给玛曼看，一个奇怪地堆积着的物体的安宁世界，一个被抛弃、被遗忘的东西组成的古怪风景。然后，他让她在天窗下摆好姿势，开始给她照相。起初，玛曼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她不必说话，她只需站立、坐着，微笑，听从画家的指挥，听着他不时给予她身材或脸庞的赞美。

但是突然，他的眼睛炯炯发亮；他拿起画笔，蘸上黑颜料，轻轻地将玛曼的头往后摆，在她脸上画了两条粗线条。“我把你划去了！我取消了上帝的创造！”他大笑起来，给鼻子上交叉着两条粗线的玛曼拍照。然后把她引到浴室，给她洗脸，用毛巾揉干。

“刚才我把你划掉了，为的是我能重新创造你。”他说。他再次拿起画笔，又开始在她脸上画起来。他画了些象古代象形文字的圆圈和线条。“面孔——预言，面孔——字母。”他说，又把玛曼安置在倾斜天窗的光线下，不断地揿着快门。

过了一会儿，他让她躺在地板上，在她头旁放了一个石膏模型的古头像，在上面也画了同玛曼脸上一样的线条。他给两个头照相——一个真的，一个塑像——然后洗掉玛曼脸上的符号，重新画上线条，又照了几张相。然后把她放在沙发上，开始给她脱衣。玛曼担心他会在她的胸脯和腿上画上符号，她甚至想微笑着表示反对（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她总是害怕她的幽默企图会失败，会被认为是趣味不高），但是画家不再对面她感兴趣。他同她作爱，抚弄她的头，仿佛他觉得同一个他自己创造的女人、他自己想象的作品、他自己的心象作爱特别令人激动。仿佛他是上帝，躺在他为他自己创造的女人身边。

实际上，此时此刻，玛曼不过是他的心象，他的发明。她知道这一点，她极力控制自己，不让他知道这一点，不让他意识到她不是他的另一半，不是一个值得爱的神秘的匹配，而仅仅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反照，一面顺从的镜子，一个他在上面投射了他们渴望的心象的被动表面。她成功了。艺术家达到了兴奋的高潮，快活地从她身上滑下来。当她回家时，她好象经历了一场严酷的考验，那天晚上入睡前，她哭了。

在下一次对画室的访问中，又是绘画和照相。这一次，画家让她的乳房裸露，在那对美丽的弓形表面上画起来。但是，当他打算把她的衣服脱光时，玛曼第一次反抗了她的情人。

很难察觉她那聪明的技巧，在与画家各种各样的调戏中，她都成动地遮掩住了她的腹部。甚至在脱去衣服时，她也总是扎着宽腰带，暗示这可以使她的裸体更加令人兴奋；她总是恳求在半明半暗中作爱；她总是轻轻地把情人抚摸的手从腹部拿开，移到胸脯上。当她无计可施时，她便求助于她的羞怯，这是他所赞扬和崇拜的（他曾多次告诉她，她是洁白的象征，他第一次想到她就使他产生灵感，在画布上抹了一个拿调色刀的白色形体）。

但是现在画家要她象一个活雕像那样赤裸着站在画室中间，把自己奉献给他的眼光和画笔。她反抗了。当她告诉他——就象她第一次访问时那样——他的要求是疯狂的，他象那时一样回答，是的，爱情是疯狂的，然后把她的衣服脱掉。

就这样，她站在房子中间，除了她的腹部什么也不能想。她不敢往下看，但她仍然看见它呈现在眼前，因为无数次从镜子里绝望地瞥见它，她太熟悉它了。她觉得自己象是一个巨大的肚子，一个丑陋起皱的皮袋。她感到象是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女人，脑袋里空空如也，听天由命地相信到最后一切都会顺利，手术和疼痛全会过去，而现在除了忍受没有任何办法。

画家拿起画笔，蘸上颜料，触到她的肩膀、肚脐，大腿，往后退了几步，拿起相机；然后他把她引到浴室，让她躺在空空的浴缸里，在她身上放了一根弯曲的金属淋浴软管，一端有个孔，告诉她，这条金属蛇不会吐水，只会吐出致命的毒气，它压在她身上就象战争之手掐住爱情的咽喉，然后他把她带回房间，又照了几张相，她顺从地忍受，不再企图遮掩她的腹部，但在想象中她仍然看见它在眼前，她看见他的眼睛和她的肚子，她的肚子和他的眼睛……

最后，他把浑身涂着颜料的她放倒在地毯上，在那个冷漠的、美丽的古代头像旁边同她作爱。玛曼再也忍受不住了，在他的怀里啜泣起来。他也许没有理解她为什么哭泣，因为他相信，他那充满激情的专注转化为美妙、持续和律动的动作，只会使对方销魂荡魄。

玛曼意识到画家没有理解所发生的事，于是她恢复过来，停止哭泣。但当她走上家里的楼梯时，她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倒在楼梯上，擦破了膝盖。外婆吓坏了，把她扶回房间，摸摸她的前额，在她的胳膊下放了一支温度计。

玛曼在发高烧。玛曼的精神崩溃了。

几天以后，从伦敦派遣的捷克伞兵杀死了波希米亚的德国领主。宣布了戒严令，在大街转角处贴出了布告，上面是一长串被处决人的名单，玛曼躺在床上，医生每天都来给她打针。大夫常常来坐在她的床头，握住她的手，凝视看她的眼睛。玛曼知道，他把她的精神崩溃归于当代事件的恐怖，她羞愧地意识到她在欺骗他，而他却是那样亲切、温存，象一个真正朋友一样想帮助她度过艰难时期。

一天，在别墅里住了多年的女佣玛格达哭着回到家里（关于这位女佣人，外婆喜欢说——带着优良、古老的民主传统风气——她不把她看作是佣人，而看作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因为她得知她的未婚夫被盖世太保逮捕了。果然，几天以后他的名字就以黑体字出现在深红色的布告上那些被处决的人质名字中间，玛格达离开了几天去看望那个年轻人的父母。

玛格达回来后说，她未婚夫的家属甚至没有得到他的骨灰盒，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儿子的遗骸在何处了。她突然哭起来，以后几乎每天都不停地哭，一般她都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哭泣，好让她的呜咽被墙壁挡住，但有时在吃饭的当儿她也会突然迸出眼泪；自从她发生了不幸后，家里人就让她同他们一道吃饭（以前她在厨房里单独用饭），这种不寻常的好意每天都使她重新想起她在服丧，她是人们怜悯的对象，于是她的眼睛就会发红，泪珠滚下面颊，落在场盘里。玛格达企图掩饰她的眼泪和充血的眼睛，她低着头，希望她的悲哀不被人注意，可这只能使他们更加担忧；要是有人决意说几句开心话，她就会失声痛哭起来。

雅罗米尔观察着这一切，就象在看一场精采的戏剧表演；他盼望窥见姑娘眼中的泪珠，然后看到她企图掩盖悲伤时的羞怯，然后瞧着当悲伤占了上风时，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贪婪地盯着她的脸（偷偷地，因为他感到自己在干某件遭禁的事），内心充满激动，渴望轻轻地遮住这张脸，抚摸它，安慰它。夜里，当他独自躺在床上时，他想象自己抚摸着这张脸，一边说，别哭，别哭，别哭，因为他想不出别的话来。

玛曼的精神崩溃渐渐好了（她靠的是行之有效的家庭疗法，即长时期的卧床休息），她又开始在屋里到处走动，去市场购买东西，照料家务，尽管她还是抱怨头痛、心悸。一天，她在书桌前坐下来，开始写信。她还没写下第一句话就意识到，画家准会认为她愚蠢、多愁善感，她害怕他的论断。但接着她镇静下来，对自己说，对这些话她既不要求也不期望回答，这是她跟他讲的最后的话，这想法给了她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怀着一种轻松的感觉（一种奇特的挑战感）她造出句子，在其中重新认出了她的自我——在遇到他之前那些美好日子的真

实的、熟悉的自我。她写道，她爱他，她决不会忘记他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心荡神弛的时刻，然而，是告诉他实话的时候了：她与他所想象的不同，完全不同；实际上，她不过是个普通的旧式女人，她怕有一天不能直视她那天真无邪的儿子的眼睛，那么，她终于对他讲了真话？哦，一点也没有。她甚至没有向他暗示，她曾经所称的爱情幸福实际上只是一场心劳日拙；她一点也没写到她那丑陋的腹部和她的精神崩溃，她碰破的膝盖和一周的卧床休息。她没有写这些事，因为这样的真诚本与她无关。虽然她终于想要恢复自我，可只有在不真诚中她才能恢复自我。毕竟，如果她坦白地把一切都倾诉出来，这就正如坦露着起皱的腹部躺在他的面前。不，她不会再把自己展露给他，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她想把自己安全地藏在庄重之中，因此她不得不虚伪，除了孩子和做母亲的神圣职责，什么也没写。在她写这信时，她自己都深信，造成她精神危机的既不是她的腹部，也不是对画家思想心力交瘁的附和，而是她厌恶一种伟大而邪恶爱情的母性的感觉。

此刻，她不仅把自己看作无限悲伤，而且把自己看作崇高，不幸和坚强；几天前还仅仅是刺痛的悲哀，如今却诉诸尊严的语言，给了她一种欣慰。这是美丽的悲伤，她看见自己被忧郁的光辉所照亮，既悲伤又美丽。

多么奇特的巧合！被玛格达的泪眼搞得神魂颠倒的雅罗米尔，也懂得了悲伤的美，全身心沉溺在悲哀的乐趣之中。他仍在继续翻着画家的书，不断地背诵艾吕雅的诗歌，让自己陶醉在那些迷人的诗行中：在她身躯的静谧中，一粒雪球，一只限睛的色彩；你跟睛里浸润着遥远的大海；或者我所爱的眼睛里印着悲哀。艾吕雅成了描写玛格达娴静身躯和盈盈泪眼的诗人。他发现自己完全被一句诗镇住了：郁郁动人的脸。是的，这就是玛格达：郁郁动人的脸。

一天晚上，全家人都出去看戏了，只有他和她单独留在家中。他早巳熟记她的个人习惯，他知道这是星期六晚上，玛格达总要去洗澡。由于她的父母和外婆一星期前就计划去戏院，因此他有时间把一切都准备好。几天以前，他就把浴缸门上的锁孔盖去掉了，然后用一块捏好的面包把它封起来。为了扩大视野，他拔掉门上的钥匙，把它藏了起来。没有人注意到钥匙不见了，家里人都没有把自己锁在浴室里的习惯。只有玛格达才锁浴室的门。

整幢房子很静谧，似空无一人。雅罗米尔的心在胸膛里怦怦跳动。他待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翻开一本书，以防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不过他并没有在看书，只是在倾听。终于，他听到了管子里流动的水声和水流冲在浴缸里的哗哗声。他关掉过道里的灯，踮着脚走下楼梯；他很走运；锁孔仍然没有遮蔽，他把眼睛凑上去，看见玛格达俯在浴缸上，光着身子，露出乳房，只穿着一条短裤。他的心跳得厉害，他看见了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他知道很快就会看见更多的东西，谁也不能阻拦这事。玛格达直起身，走到镜子跟前（他看见了她的侧面），照了一会镜子，然后转过身来（现在他看见了她的正面）走到浴缸前。她停下来，脱掉内裤，把它们扔到一边（他仍然看得见她的正面），然后爬进浴缸。

即使在浴室里，雅罗米尔仍看得见她，但由于水面一直齐到她的肩部，她又变成了一张脸，还是那张熟悉的，眼睛被泪海浸湿的悲哀的脸——可同时又是一张不同的脸。他不得不在脑子里给她加上（此刻，下次，永远）一对裸体的乳房，肚皮，大腿，屁股。这是一张被裸体照亮的脸。这张脸仍然能激起他的温情，但即使这种温情也不同于过去，因为它现在伴随着急速的心跳。

接着，他突然发现玛格达正直盯着他的眼睛。他担心他已经被发现了。她正带着微笑凝视着锁孔（有点羞涩，有点温柔）。他赶紧离开门。她是不是看见了他？他对这个锁孔试验过多次，从里面肯定不会看到一只窥视的眼睛。但是，如何解释玛格达的表情和微笑呢？她只是偶然望着他这个方向，还是仅仅因为雅罗米尔有可能望里面窥视而微笑呢？但不管怎样，与玛格达的目光相遇使他大为惶惑，以至于他不敢再靠近门边。

过了一会儿，他镇定下来，一个惊人的念头闪过脑海：浴室没有锁上，玛格达并没告诉

他她要洗澡。假若他装做完全不知道，只是碰巧走进浴室呢？他的心又开始跳起来。他想象着这个场面：在开着的门口，他停下来，大吃一惊，然后很不在意地说，我只是想拿我的牙刷。若无其事地从赤裸的、目瞪口呆的玛格达身边走过；她那张美丽的脸蛋看上去窘迫不安，就象在饭桌上突然迸泪时那样。他走过浴缸，到了脸盆架前，拿起牙刷，停在浴缸边，朝玛格达弯下身，朝那浸在浅绿色水下闪烁的裸体弯下去；他凝望着她的险，她那羞怯的脸，抚摩和爱抚它……啊，一想到这点，他头脑里就激动得成了一片空白，不能再往下想。

为了使他的闯入显得很自然，他悄悄地爬回到楼梯上，然后故意把脚步放得很重地下来；他察觉到他在发抖，很担心他完全不需用平静、漠然的口气说，我只是想拿我的牙刷；然而他继续往前走，快到浴室时，他的心怦怦跳得厉害，几乎透不过气来，他听到了："雅罗米尔，我正在洗澡！别进来！"他回答说：噢，不，我是到厨房去。于是他真地穿过门厅去另一边，到了厨房，把门打开，关上，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只是在这时他才意识到，那几句意想不到的话并不能作为他胆小屈服的理由，他本来可以很自然地回答，没关系，玛格达，我只是来拿我的牙刷，然后就直接走进去，玛格达肯定不会告发他；她喜欢他，因为他一直对她很好。他再次想象他会怎样大模大样地走进浴室，躺在浴缸里的玛格达正好暴露在他面前，大声叫道：你干什么，走开！但是她什么也不能做。她无法保护自己，就象她对未婚夫的死无能为力一样，她躺在浴缸里不能动弹，而他则俯向她的脸蛋，俯向她的大眼睛……

但是这幻想不可挽回地消逝了，雅罗米尔听见水从浴缸里徐徐流进远处管道的沉闷声音，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一去不返了，他非常恼怒，因为他知道也许要很长时间他才能有机会跟玛格达单独再在一起，即使有了这样的机会，浴室门的钥匙也早就换了，玛格达会把自己安全地锁在里面。他万分沮丧地靠在沙发上。然而使他更为痛苦的，还不是他错失良机，而是他缺乏勇气——他的软弱，他那颗愚蠢跳动的心，这使他惊慌失措，把一切都给搞糟了。他突然对自己充满了强烈的嫌恶。

对这样的嫌恶该怎么办？这种感觉完全不同于悲伤；事实上，它恰恰是悲伤的反面。每当人们冲雅罗米尔发令，他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泣，但那是快活的，可以说是欢乐的眼泪，爱的眼泪，雅罗米尔可借此感到自怜，也可借此得到安慰。相反，这种突如其来的嫌恶向雅罗米尔显示了他的弱点，使他打心里感到很不愉快。这种嫌恶象侮辱一样清晰明了，象挨了耳光一样明白无误。唯一的解救就是逃之夭夭。

但假如我们蓦然面对自己的渺小，我们能逃往何处？要摆脱卑贱，唯一的出路就是往高处走！于是他坐下来，翻开一本书（正是画家声称除了雅罗米尔他从未借给任何人看的那本珍贵的书），他极力想全神贯注在他所喜爱的诗歌上面。他又读到你眼睛里浸润着遥远的大海，眼前又出现了玛路达。她身躯静谧中的那粒雪珠就在那儿，波浪的激溅象河水流过窗子的声音，在诗歌里回响。雅罗米尔悲伤万分，他把书合上，拿起一只铅笔，开始写起来。他想象着自己就是艾吕雅，内兹瓦尔[10]以及其他诗人，写出短短的一行行诗，既无格律又无韵脚。它们是一连串他刚读过的诗的改头换面，但这种改头换面也有他个人的生活体验。诗中有悲哀，它融化并变成了水，诗中有绿水，水面升得愈来愈高一直齐到我的眼睛，诗中有躯体，悲伤的躯体，水中的躯体，在这后面我跨着大步。跨过无边无际的水域。

----

[10]内兹瓦（1900－1958），捷克当代诗人。

他反复朗诵他的诗，带着唱歌般的忧郁的语调，感到洋洋自得。这首诗的中心是正在洗浴的玛格达，以及他那紧贴在门上的脸。因此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超出他的经验的范围，他正在它的上面升腾；他对自己的嫌恶被留在了下面。在下面，他的手心由于紧张而在出汗，而在上面，在诗的领域，他已远远高出了他的笨拙。锁孔与他的怯懦的这段插曲变成了一个他如今在其上腾跃的弹簧垫。他不再受他的经历的控制；他的经历受到了他写的东西的控制。

第二天，他请求外婆让他使用打字机；他把诗打在专门的纸上，这首诗显得比他朗读它时还要美丽，因为它不再是一组纯粹的词语，而是成为了一个物体；它的独立是无可怀疑的；普通的词语一说出口就无影无踪了，因为它们只是用作片刻的思想交流；它们从属于物体，仅仅是物体的符号。借着诗歌，词语本身变成了物体，不再从属于任何东西。它们不是短暂的符号，不会转瞬即逝，而会亘古长存。

雅罗米尔前一天经历的事如今写进了诗里，可与此同时，它又象果实里垂死的籽在渐渐枯萎。我没入水中，我的心跳在水面上荡起圆圈。这句诗描写了一个站在浴室门前发抖的男孩，而同时这男孩又被这句诗所吞没；它超过了他，比他活得更长久。呀，我水中的爱人，另一句诗写道，雅罗米尔知道这水中的爱人就是玛格达；他还知道没有人能在这句诗里发现她，她失踪了，销声匿迹了，隐匿在这句诗里了；他写的这首诗就象现实本身一样独立存在，深奥难懂。现实不议论，它只是存在。这首诗的独立为雅罗米尔提供了一个隐蔽的奇异世界，提供了一个第二存在的可能性。他非常喜欢它，第二天他又试着写了一些诗，他渐渐沉湎于这种创作活动中。

尽管她已离开了病床，象一个恢复中的病人在住宅里四处走动，但她还是一点也不快乐。她已弃绝了画家的爱，却未相应得到丈夫的爱。雅罗米尔的爸爸简直是很少在家！他们已经习惯了他深夜回来，甚至对他三、四天不见也习以为常，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工作有大量出差，但这一次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晚上没有回家，玛曼一点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雅罗米尔简直很少看见父亲，他甚至没察觉到他不在家。他待在自己的房间，想着诗歌：假如一首诗要成为真正的诗，除了作者还得让别人来读它；只有那时才能证明它不仅仅是一篇改头换面的日记，它可以独立存在，不依赖于那个写它的人。最初，他想把他的诗拿给画家看，但它们对他是那样重要，以至于他不敢让它们遭到一个如此严厉的批评。他渴望找到一个对这些诗的感觉和他一样的人，他随即便省悟到这位命定的读者是谁了；他看见他那位潜在的读者眼睛里含着悲伤，声音里流露出痛苦，在住宅里四处走动，雅罗米尔觉得她好象径直朝他的诗歌走来。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几首用打字机仔细打出的诗交给玛曼，然后跑回他的房间，等待着她读完这些诗就来叫他。

她读着，她哭了。也许连她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要哭，但我们却不难想见。她的眼里流下了四种泪水。

首先，雅罗米尔的诗与画家借给他读的那些诗之间的相似打动了她，她的眼里充满了痛悼失去的爱情的泪水。

然后，她感觉到从儿子的诗行里透出一种普遍的悲伤，她想起丈夫已经离家两天，竟然也不打一声招呼，于是她流下了受到侮辱和伤害的眼泪。

几乎与此同时，她流下了安慰的眼泪，因为她的儿子——他怀着如此羞怯的挚爱把自己的诗交给她——是治愈所有这些创伤的源泉。

把这些诗反复读了几遍后，她最初流下了深深崇拜的眼泪，这些诗对她来说似乎玄之又玄，因而她觉得其中包含着她不能理解的深意，那么，她是一个极有天才的孩子的母亲了。

她叫他进来，但当他一站在她面前，她的感觉就象画家问到关于借给她的书时那样；她不知道对这些诗说什么好；她看着他那急切期待的脸庞，除了搂抱亲吻他，什么也想不出来。雅罗米尔很紧张，能把脸埋在玛曼的肩头使他感到轻松。反过来，感觉到怀中的小躯体，她也摆脱了画家的沉重阴影，鼓起勇气，开始说话。但是，她不能掩饰嗓音的沙哑和眼睛的潮湿，而这些在雅罗米尔看来比她的话更有意义。母亲嗓音和眼睛里流露的感情是他的诗有力量——真正的、有形的力量——的神圣保证。

天渐渐黑了，雅罗米尔的爸爸还没有回家，玛曼突然觉得雅罗米尔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温柔的美，这是画家和丈夫都无法相比的；这个不适当的念头是那样牢固，以致她无法摆脱它；她开始对他讲起在她怀孕期间，她是怎样经常用恳求的眼光望着阿波罗雕像，“你瞧，你果

真和阿波罗一样漂亮，你长得就象他。人们说，母亲怀孕时的想法有时会在孩子身上得到应验，我开始觉得这说法不单是一个迷信。你就继承了他的七弦琴。”

然后她告诉他，文学一直都是她最大的爱好。她进大学主要就是为了攻读文学，只是因为结婚（她没说怀孕）才使她未能献身于这一深深的爱好。要是他现在知道雅罗米尔是一个诗人（是的，她是第一个把这伟大的称号归于他的人），那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但那也是她早就盼望的事。

他们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安慰，这两个不成功的恋人，母亲和儿子，一直长谈到深夜。

第二章　　泽维尔

泽维尔他的耳际还充斥着课间的喧闹声，声音越来越小。一会儿，那位数学老教授就要走进教室，开始用满黑板的数字来折磨他的那些同学们。一只没头苍蝇的嗡嗡声将填满教授提问与学生回答之间那段没完没了的时间……但到那时他早已走得远远的了！

这是大战后一年的春天，阳光明媚。他朝莫尔道河[1]走去。沿着码头闲逛。教室的天地已经离得远远的，只有一个装有几本笔记本和一本课本的棕色小书包把他同教室联系在一起。

----

[1]即伏尔塔瓦河，流贯布拉格城。

他来到查理大桥。那排倾斜在水上的塑像在召唤他通过。几乎每次逃学（他经常逃学，渴望逃学！）查理大桥都要对他产生很大的吸引，把他拉过去。他知道今天他还要通过大桥，停在桥下，那里有一块陆地，旁边是一幢黄色的旧房子，三楼的窗户与大桥石墩齐平，只有一步之遥。他喜欢朝窗子凝望（它总是关着），想知道什么人住在那里。

这一次，百叶窗是开着的（也许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一只鸟笼挂在墙上。他停下来，望着那个白色金属丝编制的复杂纤巧的笼子，接着他注意到房间的暗处衬出一个人的轮廓。即使只看见人体的背部，他也辨出这是一个女人，他盼望她转过身来，好让他能看见她的脸部。

人影果然移动了，但却是朝着相反时方向；渐渐消失在暗处。可窗户是开着的，他深信这就是一个鼓励，一个无言的亲密的暗不。

他情不自禁，跳到桥墩上。窗户和桥梁之间隔着一条壕沟，壕沟底部铺着石头。书包妨碍着他。他把它从打开的窗户扔进昏暗的房间，然后跟着它跳进去，落在窗台上。

这个长方形的窗子的高度刚好同泽维尔一般高，它的宽度则与他伸直的手臂相等。他从后至前地打量着房间（就象那些被远处吸引的人们），因此首先映人他眼帘的是后面的门，然后是靠左墙的一个大腹便便的衣柜，右边是一张有雕花挡头的木床，房子中间有一张针织桌布覆盖的圆桌，桌上有一瓶花。这时他才注意到他的书包，它就躺在脚下饰有流苏的廉价地毯上。

正当他望着书包，打算跳进房间把它取回来时，处于昏暗的房间后部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个女人。她一下就看见了他；房间里很暗，窗户的长方形闪着光，仿佛一边是黑夜，一边是白昼。在那个女人看来，出现在窗口上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就象金色背景上的一个黑色剪影，一个在白昼与黑夜之间保持平衡的男人。

如果说那女人被光线弄花了眼，看不清闯入者的面容，泽维尔的情况则要好一些。他的

眼睛已经适应了半明半暗，能看清那女人柔和的线条，忧郁的脸色，它的苍白即使在最暗处出也是一眼可以看出的。她站在门中间，打量着泽维尔；她既没有大叫大嚷，显出吓得闭气的样子，也没有机敏地向他招呼。

他门互相审视着对方模模糊糊的脸，好一会儿泽维尔才打破沉默："我的书包在这儿。"

"书包？"她问，泽维尔的声音似乎使她消除了顾虑，她把背后的门关上。

泽维尔在窗台上蹲下来，指着地板上的皮包说："这里面都是重要的东西。一本数学笔记簿，一本理科书，一本捷克语作文本。我刚写了一篇作业，题目是：今年春天是怎样到来的。这费了我很多工夫，我不愿绞尽脑汁再来一遍。"

那女人朝房间里走了几步，以便泽维尔能在更亮的光线下看清她。他的第一印象是准确的：柔和而忧郁。在那张模糊的脸上他看见两只大眼睛飘浮不定，他突然想到另一个词：惊吓。不是因他出乎意料的闯进而受惊，而是因一桩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这桩事还留在她那双瞪着的大眼睛里，她的苍白里，她那象是在请求原谅的表情里。

是的，这女人确实在请求原谅！"对不起，"她说。"可我真的不知道你的书包怎么会掉到我们房间里的。刚才我正在打扫房间，没有看见任何不属于这里的东西。"

"没关系，"泽维尔说，仍然蹲在窗台上。他指着地板："看见它还在这儿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你找到了它。"她微笑说。

他俩面对着面，中间只隔着有针织桌布和插满腊纸花的玻璃花瓶的桌子。

"可不，丢了它会是件很讨厌的事！"泽维尔说。"语文教师偏偏不喜欢我，要是我丢了作业，他肯定会给我不及格。"

女人脸上流露出同情。她的眼睛变得那样大，以致泽维尔除了那双大眼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仿佛她脸上的其余部分和身躯都仅仅是眼睛的附属物。他不太清楚那女人的面容或体形什么样——这些都是他注意的范围。那女人给他的最主要印象实际上仅限于那双以褐色光辉沐浴着一切的大眼睛。

泽维尔现在正绕过桌子朝那双眼睛移去。"我是个老留级生。"他说，把手放在她肩上（啊，那肩膀就象胸脯一样柔软！）。"相信我，"他继续说，"再没有比一年后又回到同样的教室，坐在同样的旧课桌前更伤心的事了……"

接着他看见那双褐色的眼睛朝他抬起来，一股幸福的浪潮席卷了他。泽维尔知道，现在他可以把手再往下移动，抚摸她的胸脯，她的腹部，或别的什么，她已惊恐万分了。但他没有移动他的手；他用手掌把她的肩头托起来，一个美丽的山包，看上去真美，真令人满足；他不想再要别的什么了。

有一阵子，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女人好象在仔细聆听，接着她悄声说："你得离开，快点。我丈夫要回来了！"

对泽维尔来说，捡起书包，从窗户跳到桥墩上，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内心充满了幸福，这个女人正处于危险中，他必须同她待在一起："我不能扔下你！"

"我的丈夫！走开！"她恳求道。

"不，我要跟你待在一起！我决不是胆小鬼！"泽维尔宣布道。这当儿，已经能清清楚楚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了。

女人试图把泽维尔推向窗户，但他知道他决不会抛下一个正处于危险中的女人。从寓所的深处他已经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在最后一刻，泽维尔扑在地板上，爬到床下。

床用五块木板托着撕破的褥垫，地板与床之间的空间同一口棺材大小差不离。但与棺材不同的是，这里的气味很好闻（是床垫的稻草味），而且听得清楚（脚步声发出很大的回响），看得分明（灰色褥套的斜上方现出那张他知道他决不会抛弃的女人的脸，一张被三束褥套里伸出的草戳穿的脸）。

他听见那脚步声很重，他转过头去，看见一双皮靴重重地穿过房间。接着他听到一个女

人的声音，一种深切的痛苦感掠过周身：那声音听上去就象几分钟前他听到的那样忧郁，惊恐，和动人。但是，泽维尔是理智的，克制住了他那突发的嫉妒痛苦；他明白那女人正处在危险中，她在用可供她使用的武器保护自己：她的脸和她的忧郁。

他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这声音似乎同他刚才看见的那双大步走过楼板的黑皮靴非常相配。然后他听见女人说，不，不，不。脚步声蹒跚着朝他的藏身处走来，他躺在下面的那低矮的床顶更加往下陷，几乎触着了他的脸。

他又听见女人说，不，不，请不要在现在，泽维尔看到她的脸靠在粗糙的褥套上，那张脸象是在对他诉说它的羞辱。

他很想从他的棺材里站起来，他渴望去拯救那个女人，但是他知道他决不能这样，她的脸看上去那样近，就俯在他上面，哀求他，从她脸上伸出来的三束草就象是三枝箭。泽维尔头上的木板开始有节奏地晃动，象三枝箭刺穿女人脸的稻草有节奏地搔他的鼻子，使得他突然打了个喷嚏。

泽维尔头上的所有动作都停止了；床也不动了。听不到一点声音，泽维尔也屏声静气，接着，“那是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女人的声音回答，沉默了片刻，那男人说，“那是谁的包？”泽维尔听见很响的脚步声，看见皮靴大步朝窗户走去。

“这家伙竟穿着皮靴在作爱！”泽维尔愤怒地想。他很气忿，感到他的时候到了。他双肘着地，从床下往外爬，直到能看见室内发生的事。

“谁在那儿？你把他藏在什么地方了？”男人的声音吼道，泽维尔看到黑皮靴的上方是一条深兰色的马裤和深兰色的警察制服。那男人仔细地审视房间，然后朝那个大腹便便的衣柜奔去，衣柜的形状就象在暗示有一个情人藏在里面。这当儿，泽维尔从藏身处跳起来，轻快如猫，敏捷似豹。穿着制服的男人打开装满衣服的衣柜，把手伸到里面。此时泽维尔已经站在了他身后，当这人准备再次把手伸进去抓隐藏的情人时，泽维尔从后面揪住他的衣领，猛地把他推进衣柜。他关上衣柜门，锁上它，把钥匙放在口袋里，然后朝女人转过身去。

他面对着那双张得大大的褐色眼睛，听见衣柜内吟吟的撞击，响声与叫声被大量衣服捂住，以至于听不清那男人的叫骂。

他在那双大眼睛的注视下坐下，轻抚着女人的肩膀，他的手掌感觉到她裸露的皮肤，这时他才意识到她只穿了一件薄簿的套裙，袒露的酥胸在套裙下面诱人地起伏。

衣柜里的撞击声仍在继续，泽维尔把女人紧紧搂在怀里，恨不得把她的身子吸进去，但她的轮廓似乎在逐渐溶化，最后只剩下那双明亮的眼睛。他告诉她不要害怕，并把钥匙给她看，证明衣柜已安全地锁上了，他提醒她，她丈夫的牢房是由坚固的橡木做的，那位俘虏既不能打开锁，也不能破门而出。然后他开始亲吻她（他的双手仍然搂着她的双肩，他是如此情意绵绵，以致不敢把手移下去触摸她的乳房，不敢拿它们令人眩晕的诱惑冒险），他的嘴唇接触到她的面颊时，他觉得自己象是被一片浩瀚无边的水淹没了。

“我们打算怎么办呢？”他听见她在问。

他抚摸着她的肩膀，回答说，用不着担忧，一切都很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幸福，对衣柜里的噪声他不感兴趣，就象对电唱机里发出的风暴或城市另一头发出的狗吠声一样。

为了证明他对情势的控制，他站起来，镇静自如地视察房间。接着他大笑起来，因为他看见桌上有一根铅头棍捧。他把它检起来，走到衣柜跟前，对着衣柜侧面狠狠敲了几下，以回答从里边传出的撞击声。

“我们打算怎么办呢？”女人又问。泽维尔回答说，“我们离开这儿。”

“那他怎么办？”她问。“一个人两三个星期可以不吃东西，”泽维尔说，“等我们一年后回来，就会发现一具穿着制服和皮靴的骷髅。”他再次走到那件砰砰作响的家具前，用棍棒敲击它，笑着，并望着女人，希望她会同他一起笑。

但是她仍然很严肃，重复道，“我们到哪儿去？”泽维尔试图解释，可她打断他的话说，

这是她的家，而泽维尔要带她去的地方既没有她的衣柜，也没有她的小鸟。泽维尔回答说，家既不是衣柜，也不是笼中的鸟，而是我们所爱的人的存在。接着他又说，他自己就没有家，或更确切地说，他的家是由四处漂泊组成。他说，他只有靠从一个梦到另一个梦，从一处景色到另一处景色才能生存，假如他在一个地方待得太长，他肯定会死去，就象她丈夫在衣柜里如果待上几星期肯定会死去一样。

谈话间，他俩都感觉到衣柜里已经安静下来。这沉寂是那样显著，就象一场风暴后令人神爽的间歇使他们兴奋；那只金丝雀开始唱起来，窗户上洒满夕阳的余辉。这情景就象一次邀人旅行一样美好，象主的恩惠一样美好，象一个警察之死一样美好。

女人抚摸着泽维尔的脸，这是她第一次出于自愿接触他，也是泽维尔第一次看清她真正的、实在的轮廓。她说，“好吧，我们走。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请等一下，我要拿几样东西。”

她再次抚摸他，微笑着，朝门口走去。他望着她，眼光里忽然充满了安宁；他看到她的步态象一个水生动物一样柔软而飘逸。

然后他躺在床上。他感觉很好。衣柜很安静，那男人好象睡着了，或是上吊了。万籁俱寂中传来太空的悄语，莫尔道河的喃呢和城市压抑的声响，这声音是那样遥远，就象森林里的飒飒声。

泽维尔觉得自己又要开始漫游了。没有比旅行前那段时光更美好的了，那时明天的地平线会来看望我们，宣布它的许诺。泽维尔躺在皱巴巴的毯子上，一切都融为了奇妙的一体：柔软的床象一个女人，女人象水，水象柔软而有弹性的床铺。

门开了，那女人回到房间里。她穿着绿色服装，绿得象水，绿得象永远令人神往的地平线，绿得象他正在慢慢而无奈地漂进的睡眠。

是的，泽维尔睡着了。

泽维尔并不是为了恢复精力以对付醒时的生活而睡觉的。不，那个单调的摆——睡眠，醒来——一年来回摆动三百六十五次，在他是一无所知的。

对他来说，睡眠不是生活的反面——睡眠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梦。他从一个梦渡到另一个梦，仿佛从一种生活渡到另一种生活。

天黑了，除了提灯一片漆黑。在刺穿黑夜的圆锥形光束下，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飞旋。

他跑过车站大门，迅速地穿过候车室，到了月台，一列车窗被灯光照得通明的火车正在发出嘶嘶的蒸汽声。一个晃着提灯打他身旁走过的老头，关上了车厢的门。泽维尔迅速跳上火车，老人高擎着提灯在空中划弧线，沉着的汽笛声从月台另一头回应着，火车开了。

一进入车厢，他就停下来，试图歇一口气。他又一次在最后一刻赶到了，赶得巧是他特别引以自豪的事。别人总是按照安排好的时刻表准时到达，因此他们的一生都平淡无奇，仿佛他们在抄写老师指定的测验。他想象着他们坐在车厢里预先就已定好的座位上，进行那些预先就可知道的谈话——他们打算在那里度过一周的山间别墅，他们在学校就已熟知的日常生活次序，因此他们可以总是盲目、机械地生活而不会越雷池一步。

而泽维尔却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在十一点钟出乎意料地到了车站。此刻他站在车厢的过道上，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与那些讨厌的同学及胡子里有跳蚤的秃头教授一块参加了学校的远足。

他开始在车厢里漫步：男孩们站在过道里，在蒙霜的窗子上呵气，透过霜花消融的孔隙朝外窥望；其他人则懒洋洋地靠在车厢座位上，他们的滑雪屐在头上的行李架上交叉着撑住提箱。后面一个地方有人在打牌，另一个车厢里有人在大声唱着一首调子简单的没完没了的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七个字：我的金丝雀死了，我的金丝雀死了，我的金丝雀……

他在这个车厢停下来朝里看。里面有三个年龄较大的男孩和他班上的一个金发女孩。她看见他时，脸上不禁一红，但为了掩饰它便继续唱着歌，她的一双大眼瞅着泽维尔：我的金

丝雀死了，我的金丝雀……

泽维尔走开了，通过其它车厢，这些车厢里回荡着学生们的歌声和嬉闹声。他看到一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男人朝他走来，在每一个车厢门停下来查票。泽维尔没有受制服的愚弄——在列车员的帽子下，他认出了拉丁语教授那张确切无疑的脸，他知道他必须不顾一切躲开他，不仅因为他没有车票，而且因为很长时间（他甚至记不得有多长）他都没去上拉丁语课了。

趁拉丁语教师俯下身去的时候，他迅速地从他身旁挤过，来到车厢前面，那儿有两扇门通向两个小房间：盥洗室和厕所。他打开盥洗室的门，看见一对奇异的男女关在里面搂抱：捷克语教师，一位五十岁左右，严肃正经的女人，一位泽维尔的同学，他总是坐在头一排，泽维尔在自己寥寥可数的上课期间，对他从未予以多少注意。当看见泽维尔时，这对受惊的情人迅速地分开，俯在盥洗台上，在水龙头流出的一股细流下认真地洗着手。

泽维尔不想打扰他们，他回到车厢之间的通道上；那位金发的女同学站在那里，用她那双兰色的大眼睛望着他；她的嘴唇不再动了，她已不再唱那首金丝雀的歌，一首泽维尔觉得会无休无止唱下去的歌。噢，真是发疯，他想，竟相信一首歌会永远唱下去，仿佛世上的一切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怀着这种思想，他盯着金发女孩的眼睛，心里明白他决不会赞同那种短暂被视为永恒、渺小乔装成伟大的虚假游戏，他决不会赞赏那种被称为爱情的虚假游戏。于是他转过身，再次走进盥洗室，看见那位高大的捷克语教师重又偎依在那个矮小的男学生身上，搂着他的腰。

“对不起，请不要又洗你们的手！”。泽维尔对他们说。“我要洗一洗。”他小心地从他们当中挤过去，拧开水龙头，俯在盥洗台上，这样既可让自己独处一隅，又可让站在身后的那对尴尬情人不受干扰。“我们到隔壁去吧，”那位女教师断然地悄声说。接着泽维尔听到门的卡嗒声和四只脚朝隔壁厕所走去的声音。现在他是独自一人了。他心满意足地靠在墙上，沉湎于爱的虚荣的思考，由一双恳求的蓝色大眼睛照亮的甜蜜的思考。

火车停了，响起了阵阵号声，喧闹声，撞击声，跺脚声；泽维尔离开他的藏身处，加入到冲向月台的人群中。他看见了山岗，一轮大月亮，耀目的雪；他们徒步穿过亮如白昼的夜，排成长长的行列，滑雪屐指向上方就象是神圣的象征，就象是双双手臂在发出神圣的誓言。

队伍很长，泽维尔把手放在口袋里行走，因为他是唯一没有带滑雪屐，没有带那立誓象征的人。他一边行军，一边听那些没精打采的同伴的谈话。他转过头去，看见那个虚弱、娇小的金发姑娘始终落在队伍后面，在沉重的滑雪屐下跌跌绊绊，深陷在雪里。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头去，看见数学教师把她的滑雪屐放在他肩上，与他自己的重叠在一起，并用空着的手扶着姑娘。这是一幅苦乐参半的画面，不幸的老年安慰着不幸的青春；泽维尔瞧着，觉得真不赖。

接着他们听见了隐隐约约的舞曲声，当他们来到一个餐馆时，舞曲声变得愈来愈响。餐馆周围是木头房子，泽维尔的同学开始在那里安顿下来。但泽维尔没有预定的房间，没有滑雪屐要放，也没有衣服可换。于是他径直朗大厅走去，那儿有一个舞池，一个爵士乐队，还有几位坐在桌旁的宾客。他立刻注意到一位穿深红色毛衣扣紧身裤的女人被几个喝啤酒的男人围住。他随即看出这女人很高雅，骄傲，她正感到厌烦。他走到她身边，请她跳舞。

他们在舞池中央跳舞，只有他俩。泽维尔注意到女人的脖子憔悴得美，眼睛周围的皮肤皱折得美，脸上的皱纹很深。他很快活，怀中拥着一个历经沧桑的人，他，不过是一个学生，却搂着一个几近完成的生命。与她跳舞他感到骄傲，他希望那位金发姑娘会来，目睹他的高傲，仿佛他舞伴的年龄是一座高山，而那位年轻女孩仅仅是一片在山脚下哀怜仰望的草叶。

他的愿望实现了：男孩们开始涌进大厅，身旁是那些脱掉滑雪裤换上裙子的姑娘；他们占据了所有的空桌子，这样泽维尔便和那位穿深红色毛衣的女人在一大群观众中央跳着舞。他看见金发姑娘在一张桌旁，感到心满意足。她穿着一件漂亮的衣服，与昏暗的大厅相比显

得过于漂亮，这件白色细软的衣服使她看上去更加不胜娇弱。泽维尔明白她是为了他才穿这件衣服的，他决心不让她走，他要完全为了她而度过这一晚上。

他告诉穿深红色毛衣的女人，他不想再跳了：他不能忍受那些愚蠢的脸从啤酒杯上盯着他们。那女人表示赞同，笑了起来。尽管乐队奏的曲子刚到一半，舞池中只有他们俩，他们还是停了下来（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手挽手离开了舞池，经过桌子，到了白雪皑皑的户外。

寒冷的空气向他袭来，泽维尔想，那位娇弱多病、穿白衣服的姑娘很快就会跟在他们后面出来，到冷地里。他挽着深红色女人的胳膊，把她引向更远的旷野。他觉得自己象是一个拐人的流浪艺人，他的舞伴便是他正在吹奏的笛子。

一会儿，餐馆的门开了，金发姑娘走了出来。她显得比以前更虚弱，她的白衣服和雪混在一起，使她看上去就象是在雪地里移动的雪。泽维尔紧紧搂住穿毛衣的女人——一位穿得暖和，雍容华贵的老妇——他吻她，触摸毛衣下面的身体，从眼角瞥见那个小小的白雪姑娘正悲伤地凝视他们。

然后他把那位老女人放倒在雪地里，扑在她的身上。他知道，天愈来愈晚，姑娘的裙子很薄，严寒正在抚摸她的小腿，她的膝盖，正触摸她的大腿，愈来愈朝上摸，一直触到她的股间和腹部。然后他们站了起来，老女人把他带到一幢住所，她在那里有一个房间。

房间在底楼，窗户几乎与雪原齐平。泽维尔看见金发姑娘就在几步远的地方望着他。他不想让那女孩从视野中消失，他全身心都充满她的形象，于是他拧亮灯（那个老女人见他需要灯，淫荡地笑起来），牵着她的手，走到窗户边，他搂抱她，把她那厚厚的粗毛线衣往上拉（一件适合苍老躯体的暖和毛衣），一边想着那个女孩，她也许已冻僵了，冻得已没有了知觉，在冻僵、麻木的肉体里没有一星微弱颤动的火花，这具肉体已经失去了一切触感，对于泽维尔所爱的一颗灵魂——啊，他以这样深的爱崇拜着灵魂——它仅仅是一个僵死的外壳。

谁能承受这样深的爱？泽维尔感到他的胳膊变得虚弱了，虚弱得甚至不能把那沉重的毛衣拉上去，露出老女人的胸脯。他整个身躯都感到一种沉重，于是倒在床上。很难描绘他那极乐的满足感。当一个人感到极度幸福时，睡眠就会作为一种报酬降临。泽维尔微笑着，沉沉睡去。他沉入了一个美丽迷人的夜，那儿辉映着两只冻僵的眼睛，两轮清冷的寒月。

泽维尔的生活决不象一根灰色的长线，只是从生到死单调地皮过。不，他不是在过日子——他是在睡日子，在那种睡眠生活中，从一个梦跳到另一个梦。他做梦，然后在做梦中间入睡，然后又做了一个梦，因而他的睡眠就象一叠盒子，一个套着一个。

瞧！此刻他就同时在查理大桥旁边的一所房子里和山间一幢住宅里睡觉。这两个睡眠就象两个风琴音调一样回荡，现在正有第三个音调加入进来：他正站着四下张望。街道显得空荡荡的，时而掠过一些人影，很快消失在拐角或门洞里。他也不想被人瞧见，蹑手蹑脚地穿过郊区的小巷。城市的另一头传来了炮火声。

最后，他走进一幢房子，下了楼梯。几扇门通到地下室过道。他摸索着右边那扇门，然后敲了三下过了一会儿，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一个穿工装裤的年轻人把他让进去，他们穿过了几个堆满零星杂物的房间，衣架上挂着衣服，而且角落里堆放着枪支。接着他们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他们准已远远越出了这幢房子的界限），来到一个小小的地下室，大约有二十五个人坐在那里。

他在一张空椅上坐下，打量着在场的人，只有几个他认识。会场前端，有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其中一个戴尖顶帽子的人正在发言——有关一个秘密的、很快将来临、并将决定一切的日期。一切都将按照计划进行：传单，报纸，无线电，邮局、电报，武器。然后他询问了每个人所分派的任务。最后他转向泽维尔，问他是否把名单带来了。

这真是个可怕的时刻。为了确信名单是在安全地方，泽维尔早就把它抄在捷克语笔记簿

的最上。这本笔记簿与其它课本一起放在他的书包里。但是，书包哪去了？它没有在他身边！

戴帽子的人再次问他。

天哪，书包哪去了？泽维尔绞尽脑汁地想，接着，从脑海深处，一个模糊而显著的记忆，伴随着一阵甜蜜的狂喜浮到表面。他想要抓住这个记忆，但已来不及了，所有的脸都转向他，等待着。他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名单。

所有人的表情——他所信任的同志们——都变得严厉起来，戴帽子的人用冷冰冰的语气说，如果这份名单落在敌人手里，那么他们寄予全部希望的这次行动将毁于一旦，仍将象以往一样：徒劳和死亡。

泽维尔刚要回答，主席台后面的一道门开了，一个人把头伸进来，尖利地吹了一声口哨。人人都知道这是警报信号。没有等戴帽子的人发出命令，泽维尔叫道："让我第一个走！"因为他意识到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危险的路程，冲在最前面的人将冒生命危险。

泽维尔明白，由于忘了带名单，他必须弥补他的过错。但不仅是出于内疚，他才去冒危险，那种使生命仅仅成为活着，把人变成不完整人的狭隘他嗤之以鼻。他想把他的生命置于天平上，天平的另一端放着死亡。他想使他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天，是的，每时每分都值得与终端——死亡——等量。这就是他为什么想冲在队伍前面，在深渊上面走钢丝，脑袋被子弹的光环照亮，最后在每个人的眼里长大，直到变得象死亡本身一样广大无边……

那位戴帽子的人用冷峻的眼光瞧着他，那里闪出一星理解的火花。"好吧，"他说，"你带头。"

他从一道金属门挤过去，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狭小的院子。天黑了，听得见远处的炮火声，他抬起头，看见探照灯光在房顶上扫来扫去。一架窄窄的铁梯从地面一直搭到五层楼顶。他开始往上爬。其他人跟在后面进入院子，聚集在墙下，等待他爬到房顶，发出道路畅通无阻的信号。

然后他们在房顶上爬行，悄然无声，小心翼翼，由泽维尔在前面带路。他象猫一样地移动，眼睛洞察着黑暗。他在一处停了下来，向戴帽子的人示意，指着下面远处急促奔跑的人影，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出现，手中拿着短枪，"继续前进，"那人对泽维尔说。

泽维尔重新开始艰苦的行进，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爬上金属短梯，躲在烟囱后面，避开不停地扫射房子、屋檐和街谷的令人讨厌的探照灯光。

这是一次美好的旅行，悄然无声的人们变成了一群小鸟，从敌人头上飞过，落在街市另一边的屋顶上，那儿没有危险。这是一次美好、漫长的旅行，但是它变得太漫长了，泽维尔开始感到疲劳，这种疲劳使感觉迟钝，使头脑里充满幻觉。他好象听见了一首送葬曲，那首通常在乡村葬礼上，由铜管乐队吹奏的著名的肖邦葬礼进行曲。

他没有放慢步子，而是尽量打起精神，祛除这个不祥的幻觉。徒劳；哀乐声在他耳边执拗地萦回，仿佛在预兆他的厄运已近，仿佛在试图叫临近的死亡黑纱罩住这场战斗。

为什么他要如此强烈地抵抗这一幻觉？他不是向往一个崇高的死亡使他的房顶历险成为一个难忘的伟绩吗？预言他死亡的挽歌不正是一首赞扬他勇气的颂歌吗？他的战斗是一个葬礼，他的葬礼是一场战斗——生与死如此优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不是完美无缺了吗？

不，泽维尔不是害怕死亡的召唤，而是害怕此刻他无法再依靠他的感官，由于他的耳朵被悲哀的送葬曲所麻醉，他不能再听见敌人正在布下奸诈的圈套（他对同志们的安全作过保证！）

但是，一个幻觉和现实竟如此相似，这可能吗？一首想象中的肖邦进行曲能如此充满令人心醉的节奏和单调的长号音调，这可能吗？

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简陋的衣橱和一张床，他正好躺在床上面。他满意地注意着他一直是穿着衣服在睡觉，所以不必穿衣，只需套上放在床下的鞋子。

可是，这悲伤的哀乐，这听上去那样真实的铜管乐队是从何处来的？

他走到窗前。地面上的雪几乎没有了，一小群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背朝着他，象周围乡村一样悲伤，凄凉。残余的白雪在潮湿的地上就象一条肮脏的破布衫。

他打开窗子，探身出去。顿时他明白了。那些衣着阴郁的人们正聚集在一口棺材周围，棺材旁边是一个深穴。在墓穴的另一边，还有一群穿黑衣服的人持着铜管乐器，乐器上夹着小小的乐谱簿。他们一边吹奏肖邦的进行曲，一边专心地看着音符。

窗户几乎与地面齐平。他跳出去，加入了哀悼的人群。这时，两个魁梧大汉将绳子置于棺材下，把它移到墓穴上方，然后慢慢地往下放。站在送葬者中间的一对老夫妇开始啜泣起来，其余的人挽着他们的胳膊，极力安慰着他们。

棺材到了穴底。穿黑衣服的人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将一把把泥土撒在棺材顶上。泽维尔也排在队伍最后，抓起一把混杂着雪块的泥土，堆起墓穴。

在场的人中，唯有他是陌生人，唯有他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他是唯一知道那个金发姑娘是如何死的，为什么死的。唯有他知道那只摸过她小腿，腹部和胸部的冰冷的手。除了他没人知道是谁造成了她的死亡。唯有他知道她为什么希望埋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她曾备受折磨，在这里她曾渴望死而不愿看见她的爱遭到背叛和遗弃。

他是唯一了解实情的人。其余在场的人仅仅是一无所知的公众，或是一无所知的牺牲品 。他看见他们背后衬着巨大的山影，觉得他们仿佛消失在无边的远方；就象那个死去的姑娘消失在尘世的无垠之中一样。他觉得自己知道一切的人好象比潮湿的乡间还要广阔无边，以至于一切——送葬者，死去的姑娘，手拿铁锹的掘墓人，草地和山岗——都进入了他，消失在他的广大里。

他心里充满了这幅景象，充满了幸存者的悲伤和女孩的死亡，他感觉体内有个东西在延伸，仿佛那里有颗树在生长。他感到自己正在变大，现在他把自己的身躯仅仅看成是一件外套，一个面具，掩饰自己羞怯的面具。这般伪装了自我后，他走到死者的父母身边（父亲的面孔使他想起了死者的容貌，尽管这张脸哭得很红）表示了他的同情。他们毫无感觉地同他握手，他觉得他们的手在他手掌里是那样虚弱无力。

他久久地待在曾经最后看见金发姑娘和睡着了的木头房子里，靠在墙上，望着送葬的来宾三三两两消失在朦胧的远处。突然，他感到什么在抚摸他的脸。是的，他的确感到一只手的触摸。他深信自己懂得这一表示，于是感激地接受了它。他明白这是原谅的手。金发姑娘在告诉他，她还爱着他，这爱的存在是坟墓隔不断的。

他在梦里飘荡。

最美妙的时刻是：当一个梦还很生动，而另一个他意识到的梦已经开始出现。

当他站在高山平地上时，那双抚摸他的手已经属于下一个梦中的女人。可是，泽维尔还不知道这一点，因此这双手是独立存在的；在空荡的空间没有实体、无所归属、神奇的手，在两次冒险之间的手，在两个生命之间的手，不承受躯体和头颅负担的手。

噢，让那双神奇的手永远抚摸下去吧！

接着，他感到不仅一双手，而还有一个柔软的大胸脯紧紧压在他的胸上，于是他看见一个黑发女人的脸，听见她的声音。“醒醒！看在上帝面上，快醒来！”

他正躺在一张蓬乱的床上，昏暗的小房间里还有一个大衣柜。泽维尔回忆起他是在大桥旁边的房子里。

“我知道你还想再睡一会儿，”她说，仿佛在求他原谅，“但是，我不得不叫醒你，因为我害怕。”

“你怕什么？”

“天哪，你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听！”

泽维尔仔细倾听。远处传来枪声。

他跳下床，跑到窗户前，一队队穿蓝色工作服的人，端着自动步枪，正在桥上巡逻。

象是一个记忆穿过几道墙发出回声。泽维尔明白了，这些武装工人正在保卫街道，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好象忘记了什么，这种事能解释他与眼前情景的联系、他知道，他实际上属于这个情景，由于某种错误，他脱离了它，象一个演员在适当的时候忘记了出场，这台受到削弱的戏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演下去。蓦地，他回想起来了。

就在这一瞬间，他扫视了一眼房间，松了一口气，书包还在那里，靠在墙边，没有人拿走它。他扑过去，把它打开。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数学笔记本，捷克语练习簿，理科课本。他取出捷克语练习簿，从后面翻开，再次松了口气。那个黑头发男人问他要的名单就在本子里——字迹虽小，但很清楚。泽维尔再次为自己聪明的念头感到得意，把这份重要文件藏在练习簿里，前面还有一篇作文，题目是“今年春天是怎样到来的。”

“你到底在看什么？”

“没什么，”泽维尔回答。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瞧瞧发生了什么！他们正在挨家挨户搜查，把人拖出去，处死他们。”

“别担心，”他笑道。“不会有谁被处死的！”

“你怎么知道？”她反驳道。

他怎么知道？在革命的第一天将被处死的所有人民敌人的名单还在他的笔记簿里：因此，不会有谁被处死的。不管怎样，他对这位漂亮女人的焦虑并非漠不关心。他听见了枪炮声，看见了人们在保卫桥梁，他一心只想着他与同志们曾热情计划过的那个事件已经突然来临了，而他正好睡过了它。他一直在别处另一个房间，另一个梦里。

他想跑出去，出现在穿工作服的同志们的面前，把那份只有他才有的名单交出去，没有这份名单，革命便是盲目的，不知道该逮捕谁，处死谁。但他随即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他不知道当天的口令，他早已被视为叛徒，没有人会相信他。他在一个不同的生活中，一个不同的故事里，再也无法挽回另一个生活，一个他已抛在后面的生活。

“你怎么啦？”那女人焦急地问。

于是泽维尔突然想到，如果他已不能再挽回失去的生活，他至少可以使此刻正在过的生活变得崇高。他望着那位美丽顺从的女人，知道他必须离开她，因为生活在外面，远在窗户的那边，从窗外传来柔和的枪声，就象鸟儿的咕咕声。

“你要到哪儿去？”她叫道。

泽维尔微笑着指着窗外。

“可你答应带我一道走的！”

“那是从前。”

“你是想背弃我？”

“是的。我要背弃你。”

她跪在他面前，抱着他的腿。

他低头看着她，觉得她是多么可爱，要离开她还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是，窗外的世界更加美丽。如果他为此而离开一个可爱时女人，这个世界会因为他付出了背弃爱情的代价而更加迷人。

“你很美丽，”他说，“但我必须背弃你。”

于是他挣脱她的手臂，大步朝窗户走去。

第三章　　诗人自渎

雅罗米尔把他的诗拿给玛曼看的那天，她徒劳地等待着丈夫归来。以后的日子他也没有回家。

玛曼接到盖世太保的官方通知，她的丈夫被捕了。战争快结束时，又来了一份官方通知，大意是她的丈夫已死在一个集中营。

她的婚姻也许是一个不幸，但她的孀居却庄重而崇高。她有一张丈夫的大照片，是他们定婚时候照的，她把它装上金框架，挂在墙上。

后来战争结束了，布拉格的市民兴高采烈，德国人撤离波希米亚，玛曼开始过着一种节衣缩食的生活，这种生活被简朴的美所照亮；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钱已经用光，她不得不解雇了女佣人。阿里克死后，她不愿再买一条狗，而且她必须找一个工作。

还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姐姐决定把市中心的住房让给刚结婚的儿子；同她丈夫和小儿子搬到父母别墅的底楼。外婆和孀居的玛曼则搬到二楼。

自从玛曼听到姐夫宣称福尔特尔是发明伏特的物理学家后[1]她对他就只有轻视。姐夫一家总是吵吵嚷嚷，成天迷于粗俗的娱乐。底楼的欢快生活与二楼的忧郁王国真有天壤之别。

----

[1]福尔特尔（1694－1778），法国讽刺家、哲学家、剧作家及历史家。

但是，玛曼走路的姿态比过去兴旺时期显得更加高傲了，仿佛她头上顶着（象巴尔干半岛的女人顶着葡萄篮）她丈夫无形的骨灰盒。

浴室架上放满了小香水瓶，油膏管和雪花膏，但玛曼几乎没有再用过它们。不过她还是常常停下来望着它们，叹一口气，这些东西使她想起死去的父亲，他的药店（现在这财产已落到可憎的姐夫手中），以及从前那快乐无忧的岁月。

她往日同父母和丈夫的生活好象笼罩在悲哀的半明之中，这种昏暗的感觉压抑着她。她意识到只有现在，当他们永远消失了，她才懂得了那些年头的美好，她责备自己对婚姻的不忠。毫无疑问，她丈夫一直在冒着生命危险，他的内心一定紧张不安，但为了保持她的安宁，他从来未向她吐露一句他的地下活动，她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捕，他属于哪一个抵抗组织，他的实际使命是什么。对这一切她一无所知，她把自己的无知看作是对她女性的狭隘心理，对她把丈夫的行为仅仅想象成冷酷的令人屈辱的惩罚，一想到她的不忠正是他最后危险的时期，她就对自己无比轻视。

她在镜子里照着自己，惊讶地发现她的脸庞仍然年轻——事实上是没有必要地显得年轻，仿佛时光犯了个大错误，疏忽了这张脸似的。近来她听说，有人看见她和雅罗米尔在街上走，还以为他俩是兄妹哩。她听了觉得很好笑。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受到了恭维，从那时起，她就更加乐意带雅罗米尔去剧院和听音乐会了。

不管怎样，除了雅罗米尔她还有什么呢？

外婆的记忆力和身体愈来愈差。她整天坐在家里给雅罗米尔缝补袜子，为女儿熨烫衣服。沉浸在遗憾、回忆和忧虑之中，散发出一种可爱、忧郁的氛围。雅罗米尔就这样生活在女人的房子里。两个寡妇的房子里。

雅罗米尔孩提时代的妙语已不再用来点缀他房间的墙壁（玛曼遗憾地把它们存放在抽屉里）；取而代之的是他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纸板上的约摸二十张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复制品。一个悬晃着电话线的话筒也挂在墙上（这是一个电话修理工的馈赠，在这个被切断的话筒中，雅罗米尔看出了由于脱离上下画面而获得神奇力量的那种物体，它完全可以称为一种超现实主义物体）。然而，他经常凝目的还是挂在同一墙上镜子中自己的形象。他对自己面孔研究得比任何东西都要仔细，没有什么比他的脸更折磨自己，同时他对自己的脸比

任何东西都更有信心（即使这种信心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获得的）：这张脸长得象他的母亲，但由于他是个男人，它的俊秀就更引人注目：他有一个小巧好看的鼻子，一个微微向后削的小下巴。正是这个下巴使他痛苦不堪。他曾在叔本华一篇著名的论文里读到，一个向后缩的下巴特别令人反感，因为正是下巴的形状把人和猿区别开。但后来雅罗米尔碰巧看到一张里尔克的照片，发现这位诗人也有一个向后缩的下巴，这使他得到了安慰和鼓舞。他常常在很多时间照镜子，在一面靠猿一面靠里尔克的辽阔疆域里绝望地徘徊不定。

实际上，雅罗米尔的下巴只是微微向后缩，玛曼就很公正地认为儿子的脸是迷人的。但正是这张脸比下巴本身更使雅罗米尔苦恼：俊秀的容貌使他看上去小好几岁，由于他的同学都比他大一岁，他脸上的稚气就更引人注目，避免不了，不断被人提到，于是雅罗米尔时时刻刻都想到这一点。

带着这样一张脸是多么沉重！那柔弱秀气的容貌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雅罗米尔有时做恶梦：他梦见他必须举起一些非常轻的物体——茶杯，调羹，羽毛——但他举不动。物体愈轻，他就变得愈虚弱，他沉到它的轻下。他常常颤抖着醒过来，满脸大汗。我们相信，这些梦同他那秀气的脸有关，这张脸象蜘蛛网一样轻飘——他徒劳地想把这张网拭去。）

一般说来，抒情诗人都产生在由女人主持的家庭：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姐妹，勃洛克[2]的姨妈，荷尔德林[3]。和莱蒙托夫的祖母，普希金的保姆，当然，最重要的是母亲——那些高耸于父亲之上的母亲。王尔德的母亲和里尔克的母亲把她们的儿子打扮得象小女孩。男孩子焦虑地频频照镜子，这不是太奇怪吗？是成为男人的时候了，奥登[4]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抒情诗人一生都在自己脸上寻找男子汉的标志。

----

[2]勃洛克（1880－1921），苏联诗人。

[3]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抒情诗人。

[4]伊希·奥登（1919－1941）捷克诗人。

雅罗米尔不断地照镜子，直到看见了他渴望看到的东西：眼睛里严厉的神情，嘴唇边冷酷的线条。为了获得这个，他当然得做出某种特别的微笑，或更确切地说，做出一副鄙夷的神气，上嘴唇痉挛地往后缩。他也试图改变头发的式样来改变脸，把前额上的头发扎成卷，形成厚厚的、蓬乱的卷发。啊！他的头发，玛曼如此喜欢并且还用一个发夹留了一束的头发，最不合雅罗米尔的意：象刚孵出的小鸡绒毛一样黄，象蒲公英的冠毛一样细软。没有办法使它成形。母亲常常抚摸它，说它是天使的头发，但雅罗米尔却憎恨天使，喜欢魔鬼。他想把头发染成黑色，但又不敢这样做，因为染色的头发甚至比天生的金发更加女孩气。他能做的只是尽量让它留长。而从来不要梳头。

他一有机会就审视和调整他的外貌。每次打商店橱窗经过，他都要飞快地瞟一眼自己。他愈是关注自己的容貌，它就变得愈熟悉，而同时它也就变得更令他懊恼和痛苦。瞧：他正从学校回家。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年轻女人从远处朝他走来。他们不可避免地愈走愈近。雅罗米尔发现这位女人很美，于是他想到自己的脸。他企图做出一种训练有素的冷然一笑，但又害怕不会成功。他只想着自己那张愚蠢的脸。那女孩似的稚气使他在女人们眼中显得滑稽可笑。他整个人都是那张愚蠢小脸的体现，那张脸此刻变得很僵硬——多可怕！——羞愧难当。他加快步子，想尽量不让那个女人瞧他，倘若一个美丽的女人看到他红脸，他将永远不能洗刷这一耻辱！

在镜子前面花去的钟点总是把他投入绝望的深渊。然而，幸运的是，还有一面镜子使他升到了星空。这面天上的镜子就是他的诗歌；他渴望还未写旧的诗句和已经创造出来的诗句，他带着男人回忆美丽女人时的那种愉快收集他的诗歌；他不仅是它们的作者，而且是它们的理论家和编年史家；他为他的诗写文章，把他的作品分为各个阶段，给这些时期命名，结果

在两三年之内，他就学会了把他的诗看作一个值得文学史家重视的发展过程。

这给了他安慰：在深渊，他活在一个日常生活的领域里，上学，同母亲和祖母一道吃饭，面对着单调乏味的空虚。而在天上，却是另一个世界，到处都是灯火辉煌的路标，时间分割为一道道灿烂的光谱，他无比兴奋地从一道光跳到另一道光，每次都坚信他将落在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的时代。

另一个使他充满信心的原因是，他坚信他是一笔珍奇财富的继承人，尽管他的容貌（以及他的生活）毫不出众，可他却是一个上帝的选民。

让我们来阐明这个意思：雅罗米尔继续去看画家，但并不常去，因为玛曼经常劝阻他；他早就不再绘画了，有一次他给画家看了一些他写的诗，从那以后，他渐渐把所有的诗都拿给画家看。画家津津有味地读着这些诗，有时候还留下它们给朋友们看，这使雅罗米尔得意非凡，因为对他来说，画家——他曾对雅罗米尔的画十分怀疑——始终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权威。雅罗米尔相信，估量艺术价值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在初学者心中就象保藏在法国一个博物馆的白金米达尺一样神圣），而画家就知道这一标准。

但有件事使雅罗米尔感到困惑：他总是不能事先猜到哪首诗会受到画家的垂青。有时他会对雅罗米尔用左手随意写的一些小诗备加赞赏，有时他又会冲着作者本人认为是自己杰作的一首诗打呵欠。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雅罗米尔不能认出自己作品的价值，这不就表示他是在不经意地、胡诌地、机械地写诗，没有真正的理解，因而也没有真正的才能（正如他曾用一个偶尔创造出来的狗头人世界使画家着迷一样）吗？

“瞧这儿”，有一次谈话涉及到这个问题时，画家说，“你在这首诗里表达的观念并不是你思维的结果，对吧？是的，完全不是：他只是偶然产生的，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地就来到你头脑里。这个观念的真正作者不是你，而是你内心的某个人，你头脑中的一个诗人。这位诗人就是流过每个人身上强有力的潜意识流。这不是你的成就，而是潜意识流——它没有偏爱——碰巧选择你作了它的小提琴的弦。”

画家是想来一番有关谦虚的布道，但雅罗米尔却立刻从这番话里发现了一颗闪光的珠宝来装饰他的自尊。好吧，就算这些诗歌的意象不是他创造的，但一种神奇的力量还是把他选为了它的乐器。因此，他可以以某种比“才能”大得多的东西为荣，他可以以“选择”为荣。

而且，他从来没有忘记温泉疗养地那位女士的预言：这个孩子有远大的前程。他相信这些话，仿佛它们是神的预言。在雅罗米尔的头脑中，未来是地乎线外未知的王国，在那里，革命的模糊观念（画家经常谈到革命的不可避免）和诗人狂放不羁的模糊观念混杂在一起。他知道，这个未来的王国将满载他的荣誉，这种认识给了他一种确信感，这种确信感（分离的，独立的）同他所有痛苦的怀疑相互并存。

呵，每当雅罗米尔下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照着镜子，时而望着这一面，时而望着那一面，日子显得是多么漫长和空虚啊！

这怎么可能？人们不总是在说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吗？那么，为什么他感到如此缺乏生命力？如此空虚？

这个词就象“失败”一词一样令人不愉快。还有一些词没人敢当着他的面讲（至少在家里，在这个空虚的城堡里）。比如，“爱情”或“姑娘”这样的词。他多么讨厌居住在底楼的那三个亲戚！他们经常举办舞会，一直折腾到深更半夜，不时传来喧闹的谈笑声，女人的尖叫声，那声音象在撕裂雅罗米尔的灵魂，他蜷缩在被窝里，无法入睡。他的表兄只比他大两岁，但这两岁却造成很大区别。表兄是一个大学生，常把一些迷人的姑娘带到自己的房间（得到他父母的理解和赞同），对雅罗米尔既和气又冷淡。雅罗米尔的姨父很少在家（他一心忙于继承的行当），但姨母的声音却在整幢房子里响个不休。每当遇见雅罗米尔，她都要问那个千篇一律的问题：你同女孩们的关系处得怎样？雅罗米尔真想在她脸上啐一口，因为她那

居高临下的快活的问题触到了他的痛处。并不是他同女孩子们没有任何来往，而是他与她们的约会非常少，象天上的星辰一样寥寥。“女孩”这个词就象“孤独”和“失败”这些词一样令人沮丧。

尽管他与女孩子们在一起的实际时间很短，但每次约会前，他都要长时间地期待。不仅仅是在做白日梦，而且是在做艰苦的准备。雅罗米尔深信，要使约会成功，最重要的是能说会道，避免令人尴尬的沉默。因此，一次约会主要是对谈话艺术的一次练习。他为此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在上面写下适合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有关别人的轶事，而是有关他自己生活的故事。由于他自己经历的冒险太少，于是他便编造了一些。他很有分寸：在这些杜撰（或读来或听来）的故事中，他都是让自己做主人公，但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英雄。它们只是为了驱使他不引人注意地跨过沉闷不变的领域的界线，进入行动和冒险的领域。

他也从各种诗歌中抄一些诗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诗歌并不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些诗赞扬了女性的美，可以冒充他自己的观察。比如，他草草记下这句诗，“一面骄傲的三色旗是你的面孔：你的嘴唇，你的眼睛，你的头发……”这样的诗句，只需移动一下有韵律的成分，便可以作为一个突发的独到思想讲给女孩听，就象是一句恢谐的恭维：“你知道，我刚刚意识到你的面孔象一面可爱的三色旗！你的眼睛，嘴巴，头发。从现在起，我将决不在别的旗帜下效劳！”

瞧：雅罗米尔正出去赴约。他一心只想着准备好的诗句，他担心他的声音会不自然，他的话听起来会象一个拙劣的业余演员在背诵台词。在最后一刻，他决定不讲这些话了，但由于他根本没考虑过别的话，所以他无话可讲。这天晚上的约会结果变得痛苦、尴尬，雅罗米尔感觉到女孩子在暗暗嘲笑他，于是他怀着彻底失败的心情向她告别。

他一回到家就坐在桌前，愤怒地在纸上乱划：你的眼光就象温热的尿，我的燧发枪瞄准你有如脆弱麻雀的愚蠢思想开火，肥胖的青蛙扑通一声跃进你大腿之间混浊的池塘……

他写了又写，然后心满意足地读着他的诗句，对他那奔放不羁的幻想得意洋洋。

我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对自己说，然后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个伟大的诗人，我有非凡的敏感，我有恶魔的幻想，我敢于感觉……”

玛曼回到家，径直走进她的房间。

雅罗米尔伫立在镜子前，研究着他那张可厌的孩子脸。他久久地凝视着它，直到终于辨出一点不寻常的、精选的东西。

在隔壁房间，玛曼踮着脚把丈夫那张装金框的照片从墙上取了下来。

那天她得知，她的丈夫曾长期与一位犹太姑娘有暖昧关系，甚至在战前他们的关系就开始了。德国人占领了波希米亚后，犹太人不得不在衣袖上戴上屈辱的黄星，可他没有弃绝她，照样去看她，并且尽量帮助她。

后来他们把她赶到特里森犹太人区，于是他采取了一个疯狂的计划：在几个捷克看守的帮助下，他成功地溜进了严密看守的集中营，和他的情人见了几分钟面，被第一次的成功冲昏了头，他企图重建伟绩，结果却被逮住，他和那姑娘都没有再回来。

顶在玛曼头上无形的骨灰盒随着丈夫的照片一道被丢弃了。她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高傲地挺直走路，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她高昂着头。所有精神上的悲伤现在都是别人的遗产。

一个犹太老妇的声音在她耳边回响。这位老妇是她丈夫情人的一个亲戚，她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了她：“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接着又说：“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我全家都死在集中营了。”

坐在她面前的这位犹太女人充满了庄严的悲哀，而玛曼感受的痛苦却毫无光彩。那是一种卑下的痛苦，可怜地在她内心扯动。

你的干草堆在雾中冒烟把她的一瓣心香点燃他写道，想象着一个姑娘的尸体埋葬在田野里。

死亡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诗里。玛曼（她仍是他全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把这个意念错误地解释为由于过早地经历了生活的不幸，使儿子的感觉变得早熟的缘故。

实际上，雅罗米尔描写的死亡与真正的死亡没有多少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死亡只有在它穿透了老年的罅隙时才会降临。对雅罗米尔来说，死亡无限遥远；它是抽象的；它不是现实，而是一个梦。

他在这个梦里寻找什么呢？

他在寻找无限。他的生命毫无希望地渺小，周围的一切平淡而灰暗。死亡是绝对的。它既不能被分离，也不能被冲淡。

他同姑娘们在一起的真实经验是微不足道的（几次抚摸和许多毫无意义的话），她们的销声匿迹才是壮丽的。当他想象一个姑娘埋在田野里时，他突然发现了悲伤的崇高和爱情的伟大。

在他的死亡之梦中，他不仅在寻求绝对，而且也在寻求快乐。

他梦想着一具尸体在土壤里慢慢消融，他觉得这是一种很美的爱的行为，一种躯体融入大地的甜蜜的转化。

尘世继续伤害他。一见到女人他就脸红心跳，羞愧难当，到处都碰上嘲笑的眼光。在他死亡的幻想中，万籁俱寂，可以不受干扰。静静地、幸福地生活。是的，雅罗米尔的死亡就是活着。它同一个人无需进入世界的那段时期极其相似，因为在母亲腹部的拱顶下，他自身就是一个世界。

他渴望在这样的死亡中，一种近似于永恒的幸福的死亡中跟一个女人结合。在他的一首诗里，一对情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直到他们融为一体，变成一个不能移动的人，然后渐渐变成一块坚实的化石，永世长存。

还有一次，他想象一对情人职守在一起，日久天长，以至于他们身上长满了苔藓，最后他们自己也变成了苔藓。后来有人偶然踩在他们身上，（因为苔藓碰巧在这时开花），他们象花粉一样飞过空中，感到不可名状的幸福，只有一对飞翔的情人才能这样幸福。

你认为事情既已发生，往日便已结束，不可改变了吗？噢，不，往日裹在五颜六色的波纹绸里，每次我们瞧它，都会看到不同的色彩。不久前，玛曼还在指责自己同画家一起背叛了她的丈夫而现在她却陷入绝望之中，正是出于对丈夫的忠实，她背弃了她那唯一真正的爱。

她多么怯懦！他那工程师丈夫一直过着非常浪漫的冒险生活，而她却不得不满足于乏味的残汤剩饭，象一个家庭佣人一样。想到她一直备受焦虑折磨和良心的痛苦，以致她还来不及抓住她与画家的冒险的意义，它已从她身边消逝了。现在她看得一清二楚：她已错过了生活赋予她的唯一良机。

画家的形象开始狂热地、固执地盘据在她心头。应当指出，她的回忆并没有投映在城里他那间画室的背景上，在那间画室里她曾体验了肉体之爱的时刻，而是投映在一个田园诗景致的背景上，一个小小度假疗养地的河流，小船，文艺复兴时期的拱廊。她把心中这个天堂般的景致放在那段宁静、轻松的日子里，那时爱情还没有诞生，而只是在孕育中，她渴望再见到画家，请求他同她一道重返他俩初次见面的那个色彩轻淡的地方，以便使他们的爱情故事自由地、欢乐地、毫无阻碍地得到更生。

一天，她爬上他顶楼画室的楼梯，但没有揿门铃，因为她听到门后有一个滔滔不绝的女人声音。

以后的几天，她都在他的房前走来走去，直到看见了他。他象过去一样穿着那件皮大衣；他正挽着一位年轻姑娘的手臂，送她去电车站。当他往回走时，她设法上前和他相遇。他认出了她，吃惊地向她打招呼。她也装出对这次邂逅很吃惊的样子。他请她到楼上的画室。她的心开始怦怦跳动，她知道，只要他一接触她，她就会融化在他的怀里。

他给她倒了一些酒，把他的新画给她看，用一种亲切的方式对她微笑——就象我们对着

往事微笑一样。他根本没有碰她一下，便把她送回了车站。

一天，下课后，同学们都聚在教室前面，雅罗米尔觉得他的时刻到了；他不引人注意地朝那个独自坐在桌前的姑娘走去；他早就喜欢上她了，他俩经常眉目传情；此刻他在她身旁坐下。那些喧闹的同学看见他俩挤在一起，便成心搞一个恶作剧；他们低声耳语，略略傻笑，悄悄地走出教室，把门锁上。

只要周围有其他同学，雅罗米尔便感到不引人注目，从容自在，但一当发现他和那女孩单独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他就觉得自己象是坐在了灯光明亮的舞台上。他企图用诙谐的谈话来掩饰他的慌乱不安（现在他已学会了不完全依靠准备好的轶事来谈话），他说，同学们的举动恰恰证明了他们的计划是失败的：对搞恶作剧的人来说，这是不利的，他们被关在外面，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而对假想的受害者来说，却是很有利的，他俩得其所愿地单独在一起了。姑娘表示同意，并说他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情形。一个吻悬浮在空气中。他只需靠得更近一点。可他好象觉得到她嘴唇的这段路程漫长而艰难。他不停地说呀说，没有吻她。

铃响了，这就是说老师就要回来，并命令聚在外面的那伙同学打开门。铃声唤醒了里面的那一对。雅罗米尔说，向班上同学报复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忌妒。他用手指尖摸了一下姑娘的嘴唇（他哪来的勇气？）带着微笑说，被涂得这样好看的嘴唇吻一下，肯定会在他脸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她同意地说，他们没有互相接吻；这是一个遗憾。走廊里老师愤怒的声音已经听得见了。

雅罗米尔说，如果老师和同学们都看不到他脸上接吻的痕迹，那就太糟了。他再次想靠近一点，但她的嘴唇再次显得象埃非尔士峰[5]一样遥远。

----

[5]即珠穆朗玛峰。

“来，让我们真地叫他们忌妒”。姑娘说。她从书包里掏出唇膏和手绢，在雅罗米尔脸上抹了一点鲜红色。

门打开了，班上的同学冲了进来，最前面是怒冲冲的老师。雅罗米尔和姑娘蓦地站起来，就象行为规矩的学生在老师进来时应当起立一样。他俩独自站在一排排空坐位中间，面对着一大群观众，他们的眼睛盯在雅罗米尔脸部那块美丽的红色斑点上。他感到幸福和自豪。

玛曼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向她求爱，这位同事已经结了婚，他企图说服玛曼邀请他去她家。

她急于想知道，对于她的性自由雅罗米尔会采取何种态度。她小心翼翼，拐弯抹角地对他讲起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男人的寡妇，她们开始过新生活所遇到的重重困难。

“你是什么意思，‘新生活’？”他念念地说，“你是说同另一个男人生活吗？”

“噢，当然，那也是一个方面。生活得继续下去，雅罗米尔，生活有它自己的需要……”

一个女人对死去的英雄忠贞不渝，这是雅罗米尔心目中最神圣的话语之一。它可以证明爱的绝对力量不仅是诗人的想象，而且具有值得为之而活着的真正价值。

“体验过一个伟大爱情的女人怎么还能同另一个男人沉溺于床笫之欢？”他痛责不贞的寡妇们。“当她们还记得被拷打被杀害的丈夫时，她们怎么能容忍自己去接触别的男人？她们怎么能折磨坟墓里头的丈夫，又一次杀害他？”

往日裹在五颜六色的波纹绸里。玛曼婉言拒绝了那位讨人喜欢的同事，她的整个过去再一次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调。

事实上她背弃画家并不是为了丈夫；而是为了雅罗米尔。她一直想为了儿子维持一个体面的家！如果直到今天她的裸体都使她感到不安，那是因为雅罗米尔已经永远损毁了她的腹部。由于她执意要把雅罗米尔带到这个世界来，她甚至失去了丈夫的爱。

正是从一开始，他就带走了她的一切！

一次（此时他已体验了多次接吻），他同一个在舞蹈班认识的姑娘沿着斯特姆维克公园空寂无人的小路散步。他们谈话中的停顿变得愈来愈长，到最后他们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他

们自己的脚步声，他们共同的脚步声，这声音使他们意识到某种他们以前不敢正视的东西：他们不断地在约会。而如果他们在约会，那他们一定彼此喜欢。他们的脚步声证实了这种想法，他们的步子越来越慢，最后姑娘突然把头靠在雅罗米尔的肩上。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但雅罗米尔还没来得及尽情品尝它的魅力，就感到自己变得兴奋起来，那种方式任何人都容易明了。他试图控制他的身躯，以便立即结束这种可耻的表现，但是他愈是努力就愈不成功。一想到姑娘的目光也许会移到他的下身，发现他身躯泄露的表示，他就恐惧万分。他极力谈起云彩和树梢的小鸟，企图把她的视线转移上来。

这次散步充满了幸福（以前还没有任何女人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把这个姿势看作是一个今生今世以身相许的誓约）但同时，这次出游又使他羞愧万分。他害怕他的身躯会重犯这种痛苦的失检行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从玛曼的内衣橱里取出一条又长又宽的带子，在下一次约会前，在他的裤子下面做了妥当的安排，直到确信他那兴奋的信号机制会一直拴在他的大腿上。

我们从许多插曲中选出这一段，目的是为了说明，到目前为止，雅罗米尔所体验过的幸福顶点，不过是使一个姑娘的头靠在他的肩上。

姑娘的头对他来说比姑娘的身子更有意义。他不太了解女人的身躯，（漂亮的大腿到底象什么样？你怎么判断一个臀部？），而判断一张脸他就很有自信，在他眼里，一张脸庞就可以判断一个女人可爱与否。

我们并不想说雅罗米尔对身躯的美不感兴趣。不过一想到姑娘的裸体，他就会感到头晕目眩。还是让我们来指出这一细微的区别吧：他并不向往姑娘的裸体；他向往的是被这裸体照亮的姑娘的脸庞。

他并不想占有姑娘的身子；他想占有的是愿意委身于他、以证明她爱情的姑娘的脸庞。

身躯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成了无数诗歌的主题。“子宫”这个词在他那段时期的诗歌中出现了多少次？但是，通过诗歌的魔力（没有经验的魔力），雅罗米尔把交配和生育的器官变成了一个梦幻中乌有的意念。

在一首诗里，他写道，姑娘的身躯中央有一个滴答滴答的小钟。

在另一句诗里，他想象姑娘的生殖器是看不见的人家。

接着他又迷恋于一个环的意象，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小孩的弹子，穿过一个孔穴不停地往下落，直到最后完全变成他穿过她的身躯不停地往下落。

在另一首诗里，姑娘的双腿变成了两条汇流的河；在它们的交汇处，他想象有一座神秘的山，他用听起来象圣经中的名字的哈拉布山称呼它。

另一首诗写了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的长途漫游（“脚踏车”这个词在他看来就象落日一样美丽），他疲倦不堪地蹬车穿过一片风景。这片风景就是一个姑娘的身躯，他渴望在上面憩息的两堆干草就是她的乳房。

一切都是那样令人心醉神迷，在一个女人身上的这种旅行，这是一个看不见，无法辨认，不真实的躯体，没有瑕疵，没有缺陷或疾病，一个完全奇异的躯体——一个田园诗般的游乐场！

采用给孩子们讲童话故事的语气来描写子宫和乳房，真是绝妙极了。是的，雅罗米尔生活在柔弱之乡，人造童年之乡。我们说“人造"，因为真正的童年决非天堂，它也并不特别柔弱。

当生活突然踢了一个人一脚，把他推向成年的门槛时，他就会产生柔弱的感觉。他不安地领悟到了童年的一切好处。而作为一个儿童，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柔弱惧怕成熟。

它企图创造一个小小的人造空间，在那里大家公认，我们应把别人当作小孩。

柔弱也惧怕肉体的爱，它企图从成人的领域里把爱取出来（在那里爱是附有义务的，不

可靠的。充满了责任和肉欲），把女人看作是一个小孩。

她的舌头是一个欢快跳动的心脏，他的一句诗中写道。在他看来，她的舌头，她的小指，胸脯，肚脐都是用听不见的声音在说话的独立的生命。在他看来，姑娘的身躯包含着千百个这样的生命，爱这个躯体就是意味着聆听众多的生命，听见她的一对乳房用暗号在悄声低语。

她用回忆来折磨自己。但最后，当她沉思过去时，她瞥见了她曾与婴儿雅罗米尔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天堂，她改变了看法。不，事实上雅罗米尔并没有夺走她的一切；相反，他给予她的比任何人都。多。他给了她一份没有被谎言玷污的生活。任何一个来自集中营的犹太人都不能把这份幸福贬斥为虚伪和空虚。是的。这块天堂是她唯一的真实。

于是，过去（象变化万千的万花筒图案）又显得不同了：雅罗米尔从未夺走她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只是把金色的帷幕拉开，揭示出谎言和虚伪。甚至在他出生前，他就帮助她发现了丈夫并不爱她。十三年后，他又把她从一场疯狂的只会给她带来新的悲伤的冒险中救了出来。

她常对自己说，与雅罗米尔童年时代的相依为命对他俩来说是一份保证和神圣契约。但是，她愈来愈感到儿子正在违背这个契约。她跟他谈话时，发现他几乎没有在听，他的头脑中装满了不愿意同她分享的思想。她获知他耻于将他的小秘密，那些身心的秘密告诉她，他正在把自己掩藏在她无法穿透的面罩后面。

她痛苦，她恼怒。他们在他幼年时签订的那个神圣的契约——它不是保证他要始终信任她，毫不羞耻地向她吐露心事吗？

她渴望恢复在他俩相依为命中曾经享有的那种真实。正如她在他小时所做的那样，每天早晨她都要告诉他穿什么衣服，通过为他选择短裤和汗衫，她可以象征性地整天伴随在他身边。当她觉察雅罗米尔对此感到不快时，她便为他的内衣上有一点脏而责备他，以此作为报复。在他穿衣和脱衣时，她喜欢呆在他的房间，以此惩罚他那令人气恼的羞怯感。

“雅罗米尔，过来，让我看看你象什么样子！”一次当客人们在场时，她对他叫道。当她注意到儿子精心弄乱的头发时，她大声说：“我的天哪，你这个样子真怪！”她取来一把梳子，一边继续与客人谈话，一边给他梳头。这位伟大的诗人，有恶魔的幻想和一张象里尔克静坐时的脸——气得通红——听从了玛曼的摆布。唯一的反抗迹象是脸上的僵化和一丝残酷的冷笑（这种冷笑他已经练习了几年）。

玛曼后退几步，打量她那理发手艺的效果，然后转向她的客人。“有谁愿意告诉我，我这个孩子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怪相？”

雅罗米尔发誓要永远效忠于对这个世界的根本改变。

他到达时，辩论已经在热烈地进行。他们正在争论进步的定义，以及象进步之类的东西是否真的存在。他环视周围，发现这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圈子全是由一些典型的布拉格中学学生组成，是他的一位同学邀请他参加了他们的集会。这里的气氛似乎比那位捷克语教师在学校主持的辩论更加严肃，但即使这样的集会也还是有时常捣乱的人。其中一个人拿看一朵枯萎的百合花，不时地嗅上一嗅，招来一阵阵咯咯的笑声，以至于那个留着短短黑发的人——他们就在这个人的房间集会——最后不得不把花从他的手中拿走。

接着，雅罗米尔竖起了耳朵，因为这时有人宣称，人们不能说艺术的进步，没有人可以称莎士比亚不如当代剧作家。雅罗米尔很想加入这个辩论，但他发觉对不熟悉的人讲话很困难。他害怕人人都会盯着他的脸，脸会变红，盯着他的手，手会做出笨拙的手势。可他又极想加入这个小圈子，他明白他必须讲话才能加入进去。

为了鼓起勇气，他想到了画家，那位他从来没怀疑过的权威，于是提醒自己，他是他的朋友和弟子。这使他振作起来，终于大起胆子加入了讨论，把他从画家那里听来的观点重复了一遍。这一次值得注意的还不是他没有讲自己的观点，而是他甚至没有用自己的声音。听到从他嘴里发出的声音就象画家的声音，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而且这个声音还影响了他的

手，那双手也开始模仿起画家特有的姿势。

雅罗米尔争论说，在艺术中也不容置辩地产生了进步：现代潮流体现了千百年来艺术发展中的一切彻底的革命。艺术已经最终从宣传政治和哲学观点以及模仿现实的责任中解放出来，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说，艺术的真正历史只是从现在才开始的。

这当儿有几个人想要插话，但雅罗米尔决不愿放弃发言。最初，听到从自己嘴里发出画家的言词和声调，他觉得很不愉快，但过了一会儿，他就感到这另一个我是安全与保险的源泉；它象一面盾把他掩蔽起来。他不再紧张和羞怯。他喜欢他说话的声调，于是他继续说下去：他援引马克思的观点，迄今为止，人类一直生活在史前时期，它的真正历史仅仅始于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艺术史上，一个类似的决定性转折点是安德列·布勒东[6]及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发现了无意识写作，揭示了人的潜意识这一隐藏的珍宝的那个时刻。它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大约同一时期，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人类想象力的解放有如从经济奴役中的解放一样。同样需要向自由王国飞跃。

----

[6]安德列·布勒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创始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

这时，那个黑头发男人加人了辩论。他表扬雅罗米尔捍卫了进步的原则，但对是否可以把超现实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如此紧密联系起来表示怀疑。他陈述了他的观点，现代艺术是颓废的，最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艺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安德列·布勒东，而是伊希·沃尔克[7]——捷克社会主义诗歌的创始人——必须成为我们的典范！

----

[7]伊希·沃尔克（1900－1924）捷克诗人。

雅罗米尔以前曾听到过这样的观点。事实上，画家曾用嘲讽的口吻把这些观点描述给他听过。雅罗米尔现在也试图带着嘲笑的口气回答，从艺术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只是旧的资产阶级“拙劣艺术”的复制品。黑头发男人反驳道，唯一的现代艺术是有助于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斗争的艺术。这决不可能是超现实主义，因为超现实主义是群众不能理解的。

这场讨论很有趣。黑头发男人很有说服力地发表了他的反对意见，不带丝毫教条主义，因此辩论没有变成一场争吵——尽管雅罗米尔因成为注意的中心而有点飘飘然，偶尔采取了过分辛辣嘲讽的态度。结果没有得出定论。其他人发言了。雅罗米尔讨论的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其它问题所掩盖。

但是，弄清楚进步是不是存在，超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运动还是革命运动，这的确很重要吗？谁是对的，他还是他们，这真的要紧吗？对雅罗米尔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现在同他们连在一起。他虽与他们争论，但他却非常同情这群人。他甚至没有再听下去，他的内心充满了幸福，他已找到了一群人，在他们中间，他不再作为母亲的儿子，或班上的学生，而是作为他自己而存在。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只有当他完全处在别人中间，他才能成为他自己。

黑头发男人站起来，他们全都意识到该离开了，因为他们的领导故意含糊地提到他还有工作要做，这给了他一种表示他很重要的意味。当他们聚集在过道门口，准备离开时，一个戴眼镜的姑娘走到雅罗米尔身边。我们应当指出，在整个会上，雅罗米尔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姑娘。不管怎样，她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但却难以形容——不丑，只是有点矮胖。她的头发很光滑地盖住前额，式样并不特别，没有化妆，穿了一件破旧的仅仅可以蔽体的衣服。

“你刚才讲的真有趣，”她对他说，“我很想跟你再探讨一下。”

离黑头发男人的公寓不远处有一个公园。他俩朝那里走去，热烈地交谈。雅罗米尔得知这个姑娘是一个大学生，比他整整大两岁（这使他洋洋自得）。他们沿着环形小路散步，姑娘的言谈很有教养，雅罗米尔也有一种有分量的方式讲话。他们都渴望让对方知道他们想什么，信仰什么，是怎样的人（姑娘注重科学。雅罗米尔注重艺术）。他们列举了他们崇拜的

所有伟大的名字，姑娘重又说她被雅罗米尔不落陈套的观点吸引住了。她沉默了片刻，然后称他是一个伊菲贝斯[8]；是的，当他一走进房间，她就觉得他象一个迷人的伊菲贝斯。

----

[8]古希腊刚成公民的男青年。

雅罗米尔虽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意思，但得到一个特殊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希腊名称，这似乎很不错，他感到这个词与青春有关系；这不是他从个人经历中了解的那种笨拙、卑微的青春，而是强健的令人欣羡的青春。因此这位女大学生虽然暗指他不成熟，但同时又使这种不成熟失去了痛苦的性质，而使它成了一个优点。当他们第六次围着公园散步时，雅罗米尔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打算这样做，但为此他必须鼓足勇气；他挽住了姑娘的胳膊。

“挽住姑娘的胳膊”还不完全确切，更正确地说，应该是他“把手小心地放在她的臀部和上臂之间。”他这样做时毫不引人注意，仿佛他希望连姑娘也不会注意到，的确，她对他的动作毫无反应，以致他的手就象一个不相干的东西，一个她已经忘记并快要掉下来的手提包或包裹一样不稳定地贴在她的身上。但接着这只手突然感觉到它紧贴着的那只胳膊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他的腿开始感觉到姑娘的步子逐渐慢了下来。过去他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知道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已悬在空气中。象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当某种不可避免的事临近时，人们总会加速这个必然，至少加速一两秒钟（也许是为了证明他们至少有某些自由意志）。不管怎样，雅罗米尔的手刚才一直软弱无力，此刻却有了生气，紧紧地压住姑娘的胳膊。就在这时，姑娘突然停了下来，朝他抬起戴着眼镜的脸，把书包扔在地上。

这个动作使雅罗米尔大为惊异。首先，由于他处在心醉神迷的状态，他根本没意识到姑娘带了什么东西。因此书包就象天上的启示掉在这个场景里。其次，雅罗米尔意识到姑娘是直接从大学来参加马克思主义讨论的，那么书包里很有可能装有高等学术材料和学者的小册子，他完全陶醉了。在他看来，她让所有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掉在地上，只是为了能用空着的手臂抱住他。

书包的掉落的确富有戏剧性，他们开始狂吻起来，接吻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当他们精疲力竭时，他们一下子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她朝他倾着那张戴眼镜的面孔，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安的激动：“我敢肯定你认为我和其他女人一样！但我要告诉你，我不象她们！我和她们不一样。”

这些话似乎比书包的掉落更包含着动人的力量，雅罗米尔惊异地意识到，他同一个爱他的女人在一起，一个奇迹般地对他一见钟情，不需要他付出任何努力的女人。他很快注意到（在他意识的边缘，以后还会不断地仔细回味）这个事实，她认为他阅历丰富，可以给任何爱他的女人带来痛苦。

他向她保证，他并不把她看作象其他女人。她拾起书包（现在雅罗米尔终于能够仔细瞧它了：它的确很重，外表令人难忘，装满了书），他们开始第七次围着公园散步。当他们再次停下来接吻时，突然发现一道强光射着他们。两个警察面对着他们，向他们要身份证。

两个窘迫的情人在口袋里摸索着身份证。他们用颤抖的手指把身份证递给警察，这两个警察不是想追踪妓女，就是仅仅想在令人厌烦的巡逻中寻点开心。不管怎样，对这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事：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雅罗米尔送姑娘回家），他们讨论了受到偏见、狭隘的世俗道德、愚蠢的警察、老一代人、过时的法律；以及整个世界的腐败状况威胁的真正爱情的困境。

这是一个美好的白昼，一个美好的夜晚，但当雅罗米尔终于回到家时，已经快半夜了，玛曼正焦急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我都急病了！你到哪儿去了？你一点不为我着想！”

雅罗米尔仍然沉浸在他那不平凡的经历中，他回答玛曼的方式就象他在马克思主义者圈

子里那样，模仿画家那自信的声音。

玛曼立刻就认出了它。她听见儿子用她过去情人的声音对她讲话。她看见一张不属于她的脸，听见一个不属于她的声音。她的儿子象一个双重否定的象征站在她的面前。她觉得这无法忍受。

“你要气死我！你要气死我！”她歇斯底里地叫道，跑进了隔壁房间。

雅罗米尔还站在原地，他吓坏了，一种深深的罪恶感传遍全身。

（噢，亲爱的雅罗米尔，你将永远不能摆脱这种感觉！你有罪，你有罪！每当你离开这幢房子，你都将带着一道指责的眼光，命令你回来：你将象一条系着长皮带的狗在这个世上行走！甚至当你走得很远很远；你也还会感到脖子上的项圈！甚至当你同女人们在一起，甚至当你同她们躺在床上，一根长长的皮带也将系住你的脖子，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玛曼的手里将抓住皮带的一端，从它的摇动感觉到你身躯可耻的运动！）

“玛曼，请别生气。请原谅我！”他焦急地跪在她的床边，抚摸着她湿润的脸颊。

（夏尔·波德莱尔，你四十岁上还会害怕她，你的母亲！）

玛曼为了尽可能久地感到他手指在她脸上触摸，隔了很长时间才原谅了他。

（对泽维尔来说，这种事决不会发生，因为泽维尔既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而没有双亲是自由的首要前提。

但是要知道，这不是失去一个人的双亲的问题。杰拉德·奈瓦尔[9]还是婴儿时，她母亲就去世了，可他却在她那美丽眼睛的催眠般的注视下，度过了他的一生。

----

[9]奈瓦尔（1808－1855），法国最早的象征派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之一。

自由并不是始于父母被背弃或被埋葬的时候；父母一出生，自由就死了。

不会意识到自己出身的人是自由的。

从掉在树林中的鸡蛋里生出来的人是自由的。

从天空落下来，没有一点感恩的剧痛而接触到地面的人是自由的。）

在他与那个女大学生恋爱的第一个星期，雅罗米尔感到自己得到了新生。他听到自己被形容成一个伊菲贝斯，他被告知他很英俊，聪明伶俐，富于幻想。他发现这个戴眼镜的姑娘爱他，生怕他离开她（她告诉他，那天晚上他们告别后，她望着他迈着轻快的步子离去，她看到了他真正的样子：一个正在离去，走远，消失的男人……）。他终于发现了他真正的肖像，他在他的那面镜子里，寻找了很久的肖像。

第一个星期，他们每天见面。他们花了三个晚上在全城久久地散步，一个晚上他们去了剧院（他们坐在一个包厢里，接吻，对演出毫不注意），两个晚上他们去了电影院。第七天他们又出去散步。外面刺骨的寒冷，他穿着一件轻便大衣，外套下面没穿毛衣（玛曼督促他穿的那件针织灰背心似乎只适合那些乡巴佬）他也没有戴帽子（姑娘曾夸赞他蓬乱的头发，说他的头发就象他本人一样不驯服）。由于那双长统袜的松紧带松了，袜子老是滑到他的小腿上，他便穿了一双灰色短袜（他忽略了袜子与裤子的不协调，因为他还不懂得雅致）。

他们在七点左右见面，开始朝城郊慢慢走去。通过郊区空地，雪在他们脚下嘎吱嘎吱地响；他们不时地停下来接吻。她身躯的顺从给他留下相当深的印象。到那时为止，他与女孩子们的关系就象一次沉闷的攀登，他缓慢地从一个台阶爬到另一个台阶：要等很久，姑娘才会让他吻她，又要等很久，才会让他把手放在她的胸脯上，当最后他设法摸到她的屁股时，他自己认为已走了很长的路——毕竟，他从没有再继续走下去。然而，这次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同一般。这个女孩软绵绵地倒在他怀里，毫不防御，百依百顺，他想摸她什么地方就可以摸她什么地方。他把这看作是爱的示意，但同时他又感到窘迫，因为他不很知道怎样使用这一未曾料到的特权。

那天（第七天），姑娘告诉他，她的父母经常不在家，她很想邀请雅罗米尔到她家去。

这些眩惑的话一下子说出来以后，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俩都意识到在一幢无人的房子里幽会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回想，这位年轻姑娘在雅罗米尔的怀里是毫不设防的）。他们一动不动，沉默了好一会儿，姑娘才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说："我相信，就心而论，是没有什么折中的。爱就是你把一切都献给对方。"

雅罗米尔非常赞同，因为他也相信爱就是一切。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他停下来，带着悲悯的神情凝视着姑娘（忘记了这是夜里，悲悯的神情在黑暗中很难看出来），然后开始狂热地抱她，吻她。

沉默了一刻钟，姑娘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她告诉他，他是她邀请去她家的第一个男人。她说，她有许多男朋友，但他们不过是朋友而已。他们已习惯了这一点，开玩笑地称她是石头姑娘。

雅罗米尔非常高兴地得知，他是石头姑娘的第一个情人，但同时他又有一种怯场的感觉。他听说过各种有关爱情行为的故事，知道使一个姑娘失去贞洁通常被认为是相当困难的事。他发现他的思想在开小差，很难加入姑娘的谈话。他沉浸在对那个许诺的事件的欢乐和不安之中，这个事件将标志着他生活史上的真正端（他突然想起这个想法与马克思关于人类从史前史向历史飞的著名论断十分相似）。

尽管他们谈话不多，他们还是在全城散步了很长时间。夜深了，天气愈来愈冷，雅罗米尔感到寒气透过了他穿得单薄的身子。他提议找一个地方暖和一下，但是他们离市中心太远了，四下里看不见一个旅馆和其它公共场所。当他最后回到家里时，他周身都冻僵了（散步快结束时，他不得不拼命不让牙齿打战）。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的喉咙痛得厉害。玛曼拿来一支温度计，诊断出他在发烧。

雅罗米尔的身子卧病躺在床上，他的头脑却在思考着那个即将来临的大事件。对那个日子的期待包含着抽象的快乐和具体的焦虑。因为雅罗米尔一点也不知道，在各种有关的具体细节上，同一个女人作爱是怎么一回事。他只知道这样的行为需要准备，技巧，知识。他知道在性爱后面，怀孕将斜眼做着威胁的怪脸，他感到（这问题已与同学们讨论过无数次）有办法防止它。在那个野蛮的时代，男人们（象骑士在战前披上盔甲一样）在性高潮时戴上一种透明的小短袜。从理论的角度讲，雅罗米尔精通此类事。但是，怎样才能搞到这样一种小短袜呢？雅罗米尔根本不好意思在药房要一个！而他又怎样趁姑娘不注意时戴上它呢？这个小短袜似乎使他很窘迫，一想到姑娘也许会发现它，他就忍受不了。在家里事先戴上它行不行？或者是不是必须等着他光着身子站在姑娘面前才戴上它？

他回答不出这些问题。而且，他根本没有这些透明的短袜，不过他对自己说，他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一个，试着把它戴上。他猜想在这件事上的成功主要在于速度和技巧，而这些要靠实践才能达到。

他还为别的事焦虑。作爱到底是什么样？人的感觉会怎样？他的体内会发生什么？要是这种快乐太强烈，使得人大声叫起来，不能控制自己怎么办？这会不会使他显得很可笑？整个事情会持续多久？噢，天哪，搞这种事毫无准备到底可不可能？

到那时为止，雅罗米尔还没有体验过手淫。他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值的，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避免它。他觉得自己注定是为了伟大的爱情，而不是为了自渎。但是，没有一定的准备，伟大的爱情又怎样实现？雅罗米尔渐渐相信手淫是这样一个开端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他缓和了对手淫的根本反对。他不再把它看作是性爱的可怜的代替物，而看作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必要步骤；它不是贫困的供认，而是富裕的基础。

于是他开始进行他的第一次爱情动作排练（在一次体温高于 2.2 度[10]的发烧期间）。他惊异地发现手淫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并没有刺激他狂喜地叫起来。这既叫人失望又叫人放心。以后几天，他又重复了几次这种实验，但却没能增加任何新的知识。然而，他感到，靠了这种方法，他愈来愈能够控制自己，现在他可以充满信心地面对他的心上人了。

----

[10]2.2 度即 39.2 摄氏度。

他脖子上缠了一条法兰绒绷带，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早饭后不久，外婆冲进他的房间，激动地说："雅罗米尔！全城都发狂了！"他坐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外婆解释说，楼下的收音机里宣布，一场革命爆发了。雅罗米尔从床上跳下来，跑到隔壁房间，打开收音机，于是听见了哥特瓦尔德[11]的声音。

----

[11]哥特瓦尔德（1896－1953），捷克政治家和新闻记者，1946－1948 年曾任联合内阁总理，1948 年 2 月革命后任总统。

他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形势。最近几天，他听到了许多有关它的谈话（他对此不太感兴趣，正如我们所知，他头脑中有更重要的事）：三个非共产党的部长以辞职来威胁共产党人总理哥特瓦尔德。现在他听见哥特瓦尔德在旧城广场上对一大群人发表讲话。他痛斥叛徒们企图削弱共产党，阻止国家朝社会主义前进。他敦促人们坚持要那几个部长辞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建立起新的革命权力机构。

随着哥特瓦尔德的讲演被大群雷鸣般的欢呼所淹没，那台旧收音机劈劈啪地响起来。这一切都使雅罗米尔激动万分，他穿着睡衣裤站在外婆房间，脖子上严严实实缠着绷带，嘶哑地叫喊："终于！它终于发生了！"

外婆不太弄得清雅罗米尔的热情是否有道理。"你真的认为这是件好事吗？"她用担忧的语气问。"当然，外婆，这是好事。太好了！"他拥抱她，在房间里激动地走来走去。他对自己说，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已经把今天这个日子掷到了天空，它将象星星一样在天上照耀若干个世纪。他突然想到，在这样一个光荣的日子，他却与外婆留在家里，而不是到大街上去同人们在一起，这真是羞愧。但他还没来得及仔细想想这个念头，门突然打开了，他的姨父出现在门口，红着脸激动地大叫：你们听见了发生的事吗？那些混账！那些卑鄙下流的混账！象这样发动一场暴乱！"

雅罗米尔瞥了一眼姨父，他一直讨厌姨父，姨母和他们那个自高自大的儿子。他觉得他那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姨父的身后是门，雅罗米尔的身后是收音机，这使他感到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支持他，当他对姨父讲话时，就象成千上万的人在对一个人讲话。"这不是暴乱。这是一场革命。"他说。

"让你的革命滚蛋去吧，"姨父回答，"当你身后有军队，还有警察和一个大国在旁边，发动一场革命当然很容易。"

当他听到姨父自负的声音，对他讲话就好象他是一个流鼻涕的小孩，雅罗米尔的仇恨涌上心头，"为了防止一小撮杂种把其余的人再次变成一群奴隶，我们需要军队和警察。"

"你这个小蠢蛋，"姨父回答，"赤色分子手里已经有大部分权力。他们发动这场暴乱，不过是为了把所有权力都抓到手。天哪，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蠢货。"

"我也早就知道工人阶级会把象你这样的资产阶级寄生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雅罗米尔几乎不假思索就愤怒地说出了最后这句话。但是，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词在共产党报纸上以及共产党演说者的讲演里不断地反复出现过，雅罗米尔一直不喜欢它们，正如他不喜欢所有的行话。他认为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即使他抱有革命观点，他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语言。然而他刚才却说到了资产阶级寄生虫和历史的垃圾箱。

是的，这是奇怪的！在激动的当儿（因而是在真实的自我讲话的自然时刻），雅罗米尔抛弃了他自己的语气，充当了别人的宣传工具。而且，他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欣悦感这样做的；他觉得他已成了一个千头群众的部分，一条多头龙的喉舌，看上去非常壮观。现在他感到很有力量，可以俯视那些仅仅昨天还使他脸红和结巴的人。这句话（把资产阶级寄生虫扫进垃圾箱）的不加修饰，简单明了使他愉快。因为它把置于那些直率朴素的人的队伍中，这些人

漠视细微差别，他们的智慧在于他们理解那些简单得可笑的生活本质。

雅罗米尔（穿着睡衣裤，脖子上缠着法兰绒）双手叉腰，两腿叉开，坚定地站在正发出巨大欢呼的收音机前面。他觉得这喧声正流进他的体内，使他的身躯充满力量，直到他象一棵大树，或象发出狂笑的岩石，赫然耸立在姨父之上。

他的姨父，这位认为福尔特尔是伏特之父的人，走上前来，给了雅罗米尔一记响亮的耳光。

雅罗米尔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痛。他蒙受了耻辱，由于他感到象一棵树或岩石一样巨大有力（那条多头龙仍在他身后吼叫），他想要扑向姨父，为自己报仇。但过了一会儿他才下了决心，在此期间，姨父已经转过身去，离开了房间。

雅罗米尔在他身后大叫，“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你这个猪猡！”然后朝门口跑去。但是外婆抓住了他的睡衣袖子，终于使他平静下来。雅罗米尔不停地嘀咕道这个猪猡，这个肮脏的猪猡。然后回到不到一小时前离开的——带着他对那位姑娘的梦——那张床上，他再也不能想她。他的姨父还在他眼前，他的脸还感到火辣辣。他指责自己的行为不太象一个男子汉。事实上，他是那样苦苦责备自己，以至于他开始哭泣起来，愤怒的泪水打湿了枕头。

玛曼那天下午回来很晚，不安地叙述着白天的事件。他们马上就把她局里的局长撤职了；她对这位局长非常尊敬，局里所有的非党员都担心自己很快就会被捕。

雅罗米尔支着手肘坐起来，热情洋溢加入了谈话。他对母亲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是一场革命，革命是需要一定暴力的短暂插曲。以便通过建立起一个正义的社会，暴力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废除。母亲必须理解它。

玛曼激烈地反驳，但雅罗米尔对她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有准备。他攻击富人统治的愚蠢，攻击企业家和商人社会的统治，他机智地提醒玛曼，在她自己的家庭中就有这种类型的人，他们使她受苦。他指出她姐姐的自负和她姐夫的粗俗。

玛曼开始动摇了，雅罗米尔对自己这番话的成功很满意。他感到为刚才那一耳光复了仇。一想到刚才的事他就怒火中烧。“母亲，今天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宣布道“我要加入共产党。”

他从母亲眼里察觉到她不赞同，于是他详细地阐述他的声明。他说，他为没有在很早以前加入而感到羞愧；正是他家庭背景的负担使他同他真正的同志们分开了。

“你是说你为生在这个家而感到遗憾？你为你的母亲感到羞愧？”

玛曼象是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雅罗米尔赶紧又说，她误解了他的意思：在他看来，他的母亲——她潜在的真正自我——与她的姐姐或富人的社会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玛曼说，“假如你真的关心我，就不要干那事。你知道，跟你姨父在一起过日子是多么难。要是他发现你加入了共产党，那就会闹得不可开交。明智一点，求求你！”

一阵自哀自悯涌上雅罗米尔的喉头。他不仅没能回击他姨父的那一巴掌，反而又挨了一巴掌。他把脸转过去，当玛曼一离开房间，他禁不住又哭起来。

晚上六点。姑娘围着白色的围裙在门口迎接他，然后把他引到一个小巧舒适的厨房。晚餐结果很平常——炒鸡蛋和色拉米香肠——但这是第一次有位女人（不包括玛曼和外婆）为他煮饭，因此，他怀着一个男人受到心上人照料的自得，吃得津津有味。

后来他们走进隔壁房间。房间里有一张覆着针织桌布的赤褐色圆桌，上面压着一个粗大的玻璃花瓶：器壁上装饰着令人畏惧的画。一张长沙发占据了房子的一边，沙发上摆着华美的小枕头。为了这个晚上一切都安排妥了，他们只需倒在这个舒适的室内装潢里。但奇怪的是姑娘在圆桌旁边的一把硬椅上坐了下来，于是：他也这样做了。他们就这样坐在硬椅子上天南海北地谈了很久很久，直到雅罗米尔的嗓音因焦虑而显得紧张起来。

他必须在十一点钟回家。他曾恳求母亲允许他通宵待在外面（他告诉她，他的同学打算举行一个舞会），但母亲坚决不同意，他就不敢再坚持此事。此刻，他只希望还剩下的四小

时会足够完成他的第一次性交。

但是，姑娘却说个不停，规定的时间迅速地在缩短。她谈到她的家庭，谈到她的哥哥曾因单恋而企图自杀。“这件事给我一生都留下了印象。我不可能象别的女孩。我不会轻率地对待爱情。”她说。雅罗米尔明白这番话是为了给已经许诺的性爱享受增加一点严肃的色彩。他从椅子里站起来，朝她俯下身，用一种很严肃的声调说，“我理解你，是的，我理解。”然后他扶着她从椅子里站起来，把她带到长沙发那里，让她舒适地坐下。

他们接吻，拥抱，爱抚。持续了很长时间。雅罗米尔一直在想，该给姑娘脱衣服了，但是，因为他以前从来没做过这种事，他不知道怎样开始。首先，他不知道是把灯关掉还是让它开着。按照他听来的有关这类情形的所有谈话，他觉得应该把灯关掉。不管怎样，在他上衣里有一包透明的小袜，如果在关键时刻他打算谨慎地、悄悄地戴上一只，那么黑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紧紧拥抱之中，他似乎不可能站起来，走到开关那里，撇开这一问题不谈，这个行为对他来说也显得太不礼貌（我们不要忘记，他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在别人的房间里，毕竟应由女主人来决定是开灯还是关灯。终于，他怯怯地问，“我们把灯关掉好吗？”

姑娘回答：“不，不，请不要。”雅罗米尔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姑娘拒绝进一步的亲昵行为呢，还是她仅仅不愿在黑暗中作爱。当然，他完全可以问她，但他害怕用实际的语言把这样的思想表达出来。

他再次想起他必须在十一点钟回家，于是他强迫自己克服羞怯。一生中他第一次解开了女人的钮扣。这是她白色罩衫上的领扣，他不安地等待她的反应。她一声不响。于是他继续解开她的钮扣，把她的罩衫从裙带里往外拉，终于设法把罩衫完全脱了下来。

现在她躺在枕头上，穿着裙子和乳罩。奇怪的是，尽管刚才她还热烈地吻雅罗米尔，此刻脱掉部分衣服，她却显得僵硬了。她一动不动，紧紧抱住胸部，就象一个被判处死刑子囚犯向行刑队挑战一样。

雅罗米尔除了继续给她脱衣服外别无选择。他摸到她裙子边上的拉链，把它拉开。这可怜的家伙对裙子的挂钩一无所知，有好几分钟他徒劳地想把裙子拉到姑娘的臀部，姑娘仍然抱住她的胸部，反抗着看不见的行刑队，对他一点不予帮助，也许甚至没有意识到他的困境。

噢，让我们仁慈地略过雅罗米尔痛苦的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吧。他终于成功地把姑娘的衣服全部脱下来了。当他看到她如此忠实地躺在枕头上，等待着他们已经计划了很久的那个时刻，他意识到自己是无法避免脱掉衣服的了。但是，那盏枝形吊灯明晃晃地照着，雅罗米尔不好意思脱掉衣服。他想到一个主意：他瞥见了起居室旁边的卧室（一间旧式的有两张大婚床的卧室）；那儿的灯是关着的；他可以在那儿，在黑暗中脱衣服，甚至可以用一床被子盖住自己。

“我们到卧室里去好吗？”他辞不达意地建议。

“为什么？我们干吗需要卧室？”姑娘大笑起来。

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发笑。她的笑声毫无必要，突如其来，令人不安。不过，它伤害了雅罗米尔。他担心他说了什么蠢话，他要去卧室的念头暴露了他可笑的缺乏经验。顿时，他感到垂头丧气，遭到据弃，在枝形吊灯刺探灯光下的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同一个正在取笑他的陌生女人在一起。

那一瞬间，他意识到这个晚上他俩之间不可能有什么了。他绷着脸坐在沙发上；他对发生的事感到悲伤，但同时又感到解脱。再没有必要为开灯还是关灯，或者脱衣服而痛苦万分了。他很高兴这不是他的错。她不应该笑得那样愚蠢了。

“怎么啦？”她问。

“没什么。”雅罗米尔说。他知道，要是他说出情绪不好的原因，只会使自己显得更可笑。因此他克制住自己，把她从沙发上扶起来，装得若无其事地打量她（他想成为情势的主人，他觉得审视的人是被审视的人的主人）。最后他说：“你很漂亮，你知道。”

姑娘一旦从她僵硬地躺着等待的沙发上坐起来，他便感到自己彻底解脱了。她又恢复到健谈、自信的自我。她一点不在乎被打量（也许她觉得被审视的人是审视的人的主人）她问，“我穿着衣服好看，还是什么也不穿好看？”

有一些典型的女人问题，每一个男人在他一生中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应当作为年轻男人受教育的一部分。但是，象我们其余的人一样，雅罗米尔进错了学校，因此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极力猜测姑娘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但是他已经搞糊涂了，一个姑娘通常都是穿着衣服出现在人们面前，因此，说她穿着衣服漂亮，她一定会满意的。另一方面，裸体可以看作是肉体的真实状态，从这个观点看，对她说她的裸体更迷人，会使她更加高兴。

“你穿衣服和不穿衣服都很漂亮。”他说，但姑娘一点也不满意他的含糊其词。她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在雅罗米尔面前摆弄姿态，催促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想知道，你更喜欢我哪种样子。”

当这个问题以更加涉及个人的方式提出，回答就容易多了。如果别人只是以她穿着衣服时的样子了解她，那么在他看来，说她穿着衣服不怎么迷人就太不得体了。但是，如果她现在问他自己的主观看法，他便可以有把握地声称，就他个人而言，他更喜欢她的裸体，因为这个回答意味着他喜欢她本来的样子——他欣赏她真实的、不加掩饰的自我，不需要人为的漂亮服饰。

他的判断显然是对的，因为当姑娘听到他的意见时，作出了十分赞许的反应。一直到他告别时她才重新穿上衣服，她吻了他许多次，当他要离开时（差一刻到十一点，玛曼会满意的），她在他耳边悄声说，“今天晚上我发现你，是爱我的。你真好，你真正地为我着想。是的，你是对的，这样子更好。我们暂且保全它，这样我们就有所期待。”

在那段时期，他开始写一首长诗。这是一首叙事诗，叙述一个男人突然感到自己老了，发现自己被抛弃被遗忘。在命运的最后一站：他们在粉刷他的墙壁，搬出他的东西；往日的模样没留下一点痕迹。

他从房子里逃出来，被无情的时间紧紧追逐，奔回到他曾度过一生中最热烈的时间的地方：后楼梯，三楼，第二道后门，门牌上退色的名字模糊得不能辨认。

“二十年过去了，请让我进去！”

一位老妇人开了门，从多年孤独之后的漠然中惊醒。她咬了咬早已没有血色的嘴唇：用一种遗忘了许多的姿势试图整理一下稀疏的未洗过的头发；窘迫地伸出手臂想挡住挂在墙上的那对旧情人的照片。接着她突然意识到，一切都很好，外表已无关紧要。

二十年了，你回来了我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会面……

是的，一切都很好。再没有什么要紧的了，皱纹，褴褛的衣衫，黄黄的牙齿，稀疏的头发，松垂的皮肤，没有血色的嘴唇，都没有关系。有比美丽或青春更美好的东西：必然。

生活最后和最仁慈的礼物。

于是他穿过房间，疲倦地在桌面上拖着他的手。

他柔软的手套抹掉从前恋人们的指迹。

他看出她曾认识许多男人，一大群情人，他们滥用了她皮肤的全部光彩。

一首久已忘却的歌萦绕在他的心头。上帝，那首歌是什么样的？

在沙床上漂着，漂着，……

你在漂流，漂流，直到一无所剩，只有你的核，你自己心脏的核。

她意识到他也没有什么可给予他的了，没有力气，没有青春。但是这些疲劳的时刻现在我感觉到了这些对自然的纯洁平静和必然过程的确证我只遗赠给你……

他们深深地感动了，互相抚摸着对方布满皱纹的脸。他称她“我的小女孩，”她称他“我最亲爱的小男孩”，然后他们哭了。

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没有交流的眼光或话语来掩藏他的不幸——或她的不幸。

他们用焦干的舌头渴望得到的正是他们相互的不幸。他们贪婪地互相吮吸它。他们抚摸对方可怜的身躯，听见死亡的引擎在对方的皮肤下面轻轻地轰鸣。他们知道他们完全属于对方，永远属于对方，这是他们最后也是最伟大的爱情，因为最后的爱情总是最伟大的。

男人想：这个爱情没有通向外面的门这个爱情就象一堵墙……

女人想：死亡也许还离得很远但它的阴影此刻已靠近我俩。

倒在椅子里，工作已完成。

我们的脚找到了安宁我们的手再不需要触摸……

再也没有什么可做只需等待嘴上的唾液变成露水。

当玛曼读到这首古怪的作品时，她象往常一样，对儿子不同凡响的成熟大为惊异——这种成熟使他能够理解还远离他自己的一个生命阶段。她没有看出，诗中的人物根本没有表现出真正的老年心理。当雅罗米尔最后把诗给女友看时，她也没有理解它的真正性质，她把它说成是恋尸癖。

不，这首诗与一个老头或者太婆毫无关系。倘若我们问雅罗米尔，这两个人物有多大，他会窘迫地讷讷说，他们大约在四十岁到八十岁之间。他所知道的老年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当一个人度过了他的成熟阶段；当命运已经结束；当不再需要害怕恐怖、神秘的未来；当所有发生的爱情都成了必然和结局的时刻。

实际上，雅罗米尔忧心忡忡；他接近女人的裸体时就象踩在荆棘上一样。他渴望一个躯体，但又害怕它。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情诗中，他从具体的躯体中逃进儿童游乐的世界。他剥夺了现实的躯体，把女性的生殖器想象成一个发出嗡嗡声的玩具。在这首诗里，他逃向相反的方向：逃进老年，在那里躯体不再危险和崇高，而是悲惨和可怜；一个衰老身躯的不幸多少使他与一个年轻女性身躯的傲慢重新和解，后者总有一天也会变得苍老。

这首诗充满自然主义的丑陋。雅罗米尔没有忽略黄黄的牙齿，眼角的眵垢和松垂的肚皮。但在这些细节的严酷后面是一个深沉的愿望，渴望把爱情限制在它永恒不变的成分中，限制在可以取代母亲拥抱的那部分爱中，这种爱不受时间的支配，这种爱代表了“一颗真正的心”，能够战胜躯体的力量，战胜展开在他面前、象猛兽猖獗的未知地带一样暗藏着危险的肉体。

他写了许多诗，关于一个非真实的天真无邪的爱情，关于一个非真实的死亡，关于一个非真实的老年。在这三面淡蓝色旗帜下，他紧张不安地朝着一个成年妇女真实的身躯前进。

当她到达时（玛曼和外婆已经到乡下住几天去了），尽管天色已黑。他一盏灯也没打开。他们吃了晚饭，然后坐在雅罗米尔的房间里。大约十点钟（这是玛曼通常打发他上床的时间），他说出了一句已练习了一整天，以便听上去显得很随便平常的话：“我们去睡觉好吗？”

她点了点头，于是雅罗米尔把床铺好。是的，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没有任何意外障碍。姑娘在一个角落里脱衣服，雅罗米尔在另一个角落里脱衣服（显得比姑娘笨拙得多）。他很快地穿上睡衣（那包避孕套早已仔细地放进了睡衣口袋），然后匆忙溜进被窝（他知道这种睡衣不合他的身，它太大了，因而使他显得很小）。他瞧着姑娘脱衣服（呵，在微弱的光里，她看去比上次还要美丽）。

她溜上床，偎依在他旁边，开始狂热地吻他。过了一会儿，雅罗米尔想到，该是打开小包的时候了。他把手伸进口袋，尽量想不让她察觉地把小包掏出来。“你在找什么？”姑娘问。“没什么”，他回答，立即把那只刚要抓住小包的手放在姑娘的胸脯上。后来他决定，最好还是说声对不起，离开一会儿，到浴室里去，准备得更妥当。但是，当他正在这样思考时（姑娘不停地在吻他）。他注意到他最初在肉体上面感到的所有明显的激情正在消失。这使他陷入新的慌乱之中，因为他意识到现在打开小包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一边极力热情地爱抚姑娘，一边焦急地在观察着失去的兴奋是不是在回来。它没有回来，在他不安的观察下，他的身躯象是被恐惧攫住了。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它正在缩小，而不是涨大。

这个爱的游戏已不再给予他任何快乐；它仅仅是一道屏幕，在它后面他正在折磨自己，

绝望地命令他的身躯服从。不断地抚摸，爱抚，亲吻，这是一个痛苦的挣扎，一个完全沉默的痛苦挣扎，雅罗米尔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觉得任何话都只会引起对他的羞耻的注意。姑娘也沉默不语，因为她可能也开始感觉到，某种丢脸的事正在发生，不知道这过错到底是他的还是她的。不管怎样，某种她毫无准备，害怕说出的事正在发生。

这场可怕的哑剧终于精疲力竭了，他们倒在枕头，试图入睡。很难说他们睡了多久，或者他们是否真地睡着了，还是仅仅装作睡着了，以便可以不看对方。

早晨他们起床时，雅罗米尔不敢看她；她看上去令人痛苦的美丽，由于他未能占有她而使她显得越发美丽。他们走进厨房，做了早饭，极力想进行一场漫不经心的谈话。

最后她说，“你不爱我。”

雅罗米尔开始向她保证，这不是事实，但是她打断他：“不，没有用，我不想听你的辩解。事实胜于雄辩，昨天晚上一切都清楚了。你并不很爱我。你自己也看出来了。”

雅罗米尔想让她相信，他的失败同他的爱情程度毫无关系，但接着他改变了主意。姑娘的话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掩饰他的丢脸的机会。忍受他不爱她的指责比接受他的身子出了毛病的看法容易一千倍。因此，他盯着地板，一言不发，当姑娘重复这个谴责时，他故意用一种不确定的、无说服力的语调说：“别傻了，我的确爱你。”

“你在撒谎”，她说，”你爱的是另一个人。”

这样甚至更好。雅罗米尔低下头，悲哀地耸耸肩，仿佛在承认她的断言是事实。

“如果它是虚假的东西，那它就毫无意义，”她忧郁地说。“我对你说过，我不知道怎样轻率地对待这类事。我不能容忍仅仅当别人替身的想法。”

虽然他刚度过的夜晚充满了痛苦，雅罗米尔仍然有机会成功地重新度过一个晚上。所以他说，”不，你不公平。我的确爱你。我非常爱你。但有件事我应该告诉你。这是事实，我生活中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爱我，可我却做了件对不起她的事。这件事现在就象一个黑色幽灵压迫着我。我无能为力。请理解我。你不再来看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除了你谁也不爱。”

“我没有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但是我不能忍受任何其他女人，哪怕是一个幽灵。请理解我！对我来说，爱情就是一切，它是绝对的。在爱情方面，我不知道有什么折中的东西。”

雅罗米尔望着姑娘戴眼镜的脸，他一想到可能会失去她，心里就作痛；她仿佛离他很近，仿佛能理解他。然而，他不能冒失告诉她真话的风险。他不得不装成一个头上有一个命定幽灵的人，一个撕成两半、值得怜悯的人。

“你谈到绝对的爱情，”他说，“但这不正是意味着首先要理解对方，爱他身上的一切——甚至他的幽灵吗？”

这个论证很有力，姑娘不再说什么了。雅罗米尔觉得可能一切都还没有失去。

他还没有给她看他的诗歌。他一直在等待画家兑现他的诺言，把他的诗发表在一些先锋派杂志上，这样他就可以用铅字带来的荣誉使她眼花缭乱。但他现在急需他的诗歌来助他一把。他深信，只要姑娘一读到他的诗（尤其是写那对老夫妻的诗），她就会理解，就会感动。他错了。也许她觉得，她应该向她的年轻朋友提一点如实的批评建议。但不管怎样，她那随意而实际的评论却摧毁了他。

他在她的热情赞美中发现过他的不平凡的那面奇异的镜子怎么啦？在所有的镜子中，他现在看到的只是他的不成熟在斜着眼做怪相，这是难以忍受的。就在那时，他想起了一位著名诗人的名字，这位诗人被欧洲先锋派成员的光辉所照亮，参与了本地的一些古怪活动。虽然他不认识他，而且从来没有见过他，雅罗米尔还是被一种盲目的信仰抓住了，就象头脑简单的信徒信仰他们教会里的高级牧师一样。他把他的诗寄给这位诗人，并附了一封谦卑、恳切的信。他幻想着他会得到一封友好、赞扬的回信，这个幻想就象一个安慰物降落在他和姑娘的约会上，他们的约会正变得越来越少（她声称她正在考试期间，很少有时间），越来越

不愉快。

他被抛回到了过去的一段时期（实际上并不太遥远），同任何女人谈话都似乎很难，需要事先准备好。现在，他每赴一次约会又要提前几天做准备，有时整夜都在进行想象中的谈话。在这些内心的对话中，“另一个女人”的形象（对她的存在，姑娘曾表示过疑虑），显现得更加神秘，也更加清晰。她用阅历丰富的光辉鼓舞雅罗米尔，她激起了忌妒的兴味，她解释了他身躯没有成功的原因。

不幸的是，她只出现在想象的对话中，当雅罗米尔和姑娘一开始进行实际的谈话，她就悄悄地迅速地消失了，姑娘对这位假设的情敌已失去了兴趣，出乎意料得就象他最初提到她时一样。这使雅罗米尔局促不安。她不理睬雅罗米尔所有的小暗示，排练好的口误，企图表示他沉浸在对另一个女人的回忆中的突然的沉默。

相反，她跟他大谈大学里的事（噢，都是非常愉快的事），她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好几个同学，以致雅罗米尔觉得他们比他自己的人物还要真实。他俩重新回到了初次见面时的处境：他又变成了一个羞怯的青年，她又变成了一个大谈学问的石头姑娘。只是有时（雅罗米尔喜欢并渴望这样的时刻）她会突然变得忧郁起来，或者说出一些悲伤的、怀旧的话。雅罗米尔徒劳地想把它们同自己的话联系起来，因为姑娘的悲哀仅仅是对着她的内心发的，她一点也不想同雅罗米尔的感情交流。

她悲哀的原因是什么呢？谁知道；也许她痛惜眼前正在消逝的爱情；也许她在想念另一个人。谁知道；一次，悲哀的时刻是那样强烈（他们刚看完电影，沿着一条宁静、漆黑的街道往回走），以致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天哪！这样的事过去曾发生过一次！当时他正与在舞蹈班认识的一个女孩在公园里散步。那个头的姿势，曾经如此强烈地唤醒过他，现在又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他兴奋起来了！完完全全，千真万确的兴奋！只是这次他并不感到羞耻——相反，恰恰相反！这一次，他非常希望姑娘会注意到他的兴奋！

但是，她的头悲哀地搁在他的肩上，呆呆地透过眼镜注视着远处。

雅罗米尔被唤醒的状态胜利地、骄傲地、明显地持续着，他渴望它被察觉，被欣赏。他很想抓住姑娘的手，把它放在她能感觉到他是男人的地方，但这仅仅是一个冲动，他明白这个念头是疯狂的，也无济于事。接着他想到，如果他停下来，把她紧紧搂住，她的身子就会感觉到他那男性生殖力的苏醒。

但是，当她从他放慢的脚步感觉到他想停下来拥抱她时，她说：“不，不，我们别……”她说得那样悲伤，雅罗米尔一声不响地顺从了。他大腿之间的那个玩意儿——那个木偶，那个小丑——就象一个在折磨和嘲弄他的敌人。就这样，雅罗米尔肩上搁着一个奇怪的悲哀的头，大腿间夹着一个奇怪的嘲笑的小丑，继续朝前走着。

也许他相信了这种看法，深切的悲哀和对安慰的渴求（那位著名诗人还没有回信）证明异乎寻常的措施是正确的。总之，雅罗米尔决定对画家来一次突然访问。他一走进过道，就从嘈杂的声音中知道，画家正在接待许多客人，他想说声对不起，然后离开。但画家热情地邀请他进入画室，把他介绍给客人们——三个男人和两个妇女。

雅罗米尔在五位陌生人的注视下感到脸颊发红了，但同时他又感到很荣幸，因为画家在介绍他时，说他写了一些很出色的诗，他的语气表明这些客人已经听说过他的事。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感觉。当他坐在扶手椅里四下打量画室时，他满意地注意到，在场的两位女人都要比他那戴眼镜的女友漂亮得多。她们架着腿时的那副自信的神态，她们弹烟灰时的那种优雅的举止，她们把博学的术语同通俗的表达结合成奇异句子的那种漂亮的方式——雅罗米尔感到自己象是在带着他陡直上升的电梯里，一直到了灿烂的高处，远离了他那石头姑娘令人痛苦的声音。

其中一个女人转向他，用温和的声音问他写的什么样的诗。“就是……诗，”他窘迫地说，

耸了耸肩。“出色的诗，”画家插嘴说，雅罗米尔低下头。另一个女人看着他，用一种女低音说：“他坐在那里的样子使我想起拉图尔的那幅画，兰波被魏尔兰[12]和他那帮人围着。一个孩子在男人中间。兰波十八岁时看上去还象十三岁。而你，”她指着雅罗米尔，“看上去也象一个孩子。”

----

[12]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好友。

（我们不禁要指出，这女人用一种残酷的温柔俯向雅罗米尔，就象兰波的老师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那些著名的捉虱女人——俯向这位法国诗人，当他长时间地漫游之后便去她们那里寻求避难，她们给他洗澡，去掉他身上的污垢，除去他身上的虱子。）

“我们的朋友有这个好运——相当短暂的好运——不再是一个孩子，但还没有成为一个男人。”画家说。

“青春期是最有诗意的年龄。”第一个女人说。

“你会吃惊的，”画家带着微笑反驳，“看到这个尚未成熟，纯洁无理的小伙子写出这样非常完美和成熟的诗歌。”

“的确。”其中一个男人点点头，表示他熟悉雅罗米尔的诗，赞同画家的夸奖。

“你打算发表它们呢？”那位有着低音嗓子的女人问。

“在这个正面英雄和斯大林大逮捕的时代，是不太利于这样的东西。”画家回答。

这句关于正面英雄的话把谈话重新转到雅罗米尔来之前一直在进行的话题。雅罗米尔熟悉这一话题，可以毫不费力地加入到谈话中，但他根本没有听他们讲什么；他看上去象十三岁，他是一个孩子，一个童男。这些话不断地在他头脑里回响。当然，他知道，没有人想羞辱他，画家尤其是真诚地喜欢他的诗——但这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在这种时候，他还关心什么诗歌？如果能给予他自身的成熟，他愿意一千次地牺牲他那些成熟的诗节。他愿意用他所有的诗来换取同一个女人的一夜。

辩论变得激烈起来。雅罗米尔本想离开，但他是那样沮丧，以至于觉得很难想出适合的话来道别。他怕听见自己的声音；他怕它会颤抖或发嘶，再次暴露他的不成熟和十三岁。他很想变得看不见，踮着脚走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可以在那里入睡，等十年以后，他的脸已变得成熟，有了男子汉的皱折再醒过来。

那个有女低音嗓子的女人再次转向他：“我的上帝，孩子，你干嘛那样安静？”

他咕哝着说，他宁愿听别人谈话而不愿自己说话（尽管他根本没有在听）。他觉得他最近与女友的经历对他宣布的判决是无法逃避的，这个他带在身上象耻辱标记一样的童贞（大家想必都看见了，他从来没占有过一个女人）判决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由于他发现自己再次成为注意的对象，他开始痛苦地意识到他的面孔，恐惧感渐渐上涌，他感到他的面部表情正是他母亲的微笑！他清楚地认出了它，那种病弱，辛酸的微笑；他感觉到它紧紧粘在他的嘴唇上。无法摆脱它。他感觉到他的母亲附在他的头上，她围着他吐丝就象一个裹住幼虫的蚕茧，剥夺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正坐在一群成年人中间，被妈妈的面容所掩盖，被妈妈的手臂从一个他所追求的世界中拉出来，这个世界使他感觉到——渐渐地但又明确地——他那可恨的幼稚。这个感觉是那样痛苦，雅罗米尔拼命想摔掉母亲的面孔，挣脱出来。他极力想加入讨论。

他们正在争论当时所有艺术家都在激烈辩论的问题。捷克现代艺术一直声称忠实于共产主义革命；但当革命到来时，它却宣布自己完全遵从一个通俗易懂的现实主义纲领，现代艺术被作为资产阶级颓废的畸形产物遭到唾弃。“这就是我们的困境，”其中一个客人说，“我们应该背弃和我们一起成长的艺术，还是应该背弃我们所赞扬的革命？”

“这问题提得很不好，”画家说，“想挖掘僵死的学院派艺术，在装配线上制造政治家们逮捕的革命，不仅背叛了现代艺术。而且背叛了革命本身。这样的革命并不想改变世界。恰

恰相反：是想保留历史上最反动的精神——偏执、惩诫、教条、正统和因袭的精神。没有什么困境。作为真正的革命者，我们不能赞同这种对革命的背叛。”

雅罗米尔可以很容易地阐述画家的观点，他完全熟悉它的逻辑，但是他讨厌扮演老师宠儿的角色，一个渴望博取赞同的男孩的角色。他充满了反抗的渴望。他转向画家，说：“你喜欢引用兰波的格言：绝对的现代是必要的。我完全赞成。但是，绝对的现代并不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见到的东西，而是使我们震惊和诧异的某种东西。超现实主义根本不是绝对的现代——它已经出现了大约二十五年。不，现代事件是正在进行的革命。你未能理解它，这正证明了它才是真正的新生事物。”

他们打断他的话。“现代艺术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的运动。”

“不错，”雅罗米尔说，“但是，如果现代艺术果真坚持反对当代世界，它就会迎来它自身的毁灭。现代艺术必须预料到，这场革命会创造出它自己的文化——事实上，现代艺术本来也想要这样做的。”

“我是这样理解你的，”有着女低音嗓子的女人说，“波德莱尔的诗登在二流的报纸上，所有的现代派文学遭到禁止，国家美术馆里立体派的画被运到地窖里，对此你并不感到不安？”

“革命就是暴力，”雅罗米尔反驳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高于所有其它运动的超现实主义意识到，旧的小丑必须被无情地踢下舞台，但它没有感觉到，它自身也已变得陈旧，无用了。”

雅罗米尔的羞辱和气愤使他用凶狠的语气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刚从嘴里发出头几个字，有样东西就使他感到困惑：他在自己的声音里又听见了画家那特有的、权威的语调，他无法阻止他的右臂象画家特有的在空中打手势的姿态。实际上，这是画家与自己，成年的画家与儿时的画家，画家与他反叛的影子之间的一场奇异的辩论。雅罗米尔意识到这一点，感到受了更大的耻辱；于是，他说话愈来愈尖刻。以便为使他成为一个俘虏的手势和声调，向他的私人教师报仇。

画家两次用冗长的答辩来回击雅罗米尔的爆发，但第三次他仅仅用严厉冷峻的眼光来回答。雅罗米尔明白，他再也不会成为画家画室里的客人了。那个有女低音嗓子的女人终于打破了痛苦的沉默(但现在她说话的口气不再有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俯在兰波长满虱子的头上的那种感情，而是悲哀和失望)：“我没读过你的诗，但从我所听到的来看，你的诗不可能得到这个政权，一个你如此激烈捍卫的政权的赞赏。”

雅罗米尔想起了他最近的那首诗，两个老人和他们的最后的爱情。他开始明白了，这首他特别喜爱的诗，永远也不会在欢乐之歌和宣传鼓动诗盛行的时代得到发表。现在抛弃它，就等于牺牲了他最珍贵的财产，他唯一的财富。

然而，还有比他的诗更珍贵的东西，这个东西他从来没有占有过，他一心一意想得到它：他的成年。他知道，只有通过勇敢的行为才能赢得它；如果这种勇敢意味着他将孑然一身，他将抛弃他的女友，他的画家朋友，甚至他的诗歌——那好吧；他决心大起胆子。他说：“是的，我知道我的诗对这场革命毫无用处。我很难过，因为我喜爱它们。但不幸的是，我的感情却不能说明它们是有用的。”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一个男人说：“太可怕了。”他真的发起抖来，仿佛寒气彻骨。雅罗米尔感到他的话引起了在场的人恐怖，他们全都望着他，仿佛他象征着毁灭他们所热爱的一切，毁灭使生命有价值的一切东西。

这是悲哀的，但也是美好的：这一时刻，雅罗米尔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孩子。

玛曼读了雅罗米尔悄悄放在她桌上的诗歌，她试图通过这些诗洞悉儿子的生活。但是，呵，这些诗表达得毫不清晰毫不直率！它的真实性是靠不住的、充满了谜语和暗示；玛曼猜测，儿子的头脑里全是女人，但是她无法知道他同她们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一天，她打开他写字台的抽屉，四处搜查，终于找到了他的日记。她跪在地板上，激动地把它翻了一遍。记载大抵都很简洁，隐晦，但对她来说已很清楚，儿子正在恋爱。他只用一个大写字母称呼他的恋人，因此玛曼无法辨出她是谁。另一方面，他又带着一种激情描写了某些事件的细节。以致玛曼觉得厌恶：他们初次接吻的日期，他们围着公园走了多少圈，他第一次摸她乳房的日期，他第一次摸她屁股的日期。

接着，玛曼翻开一个用红字记下并用许多感叹号装饰起来的日期，日期下面的记载是：明天！明天！啊，雅罗米尔，你这个老家伙，你这个秃头的老保守，从现在起许多年后当你读到这里时，记住在这一天开始了你生活中真正的历史！

玛曼急躁地在记忆中搜寻与这一天有联系的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她终于回忆起，这正是她与外婆到乡下旅行的那一个星期。她还想起，当她回来时，发现放在浴室架上她最好的一瓶香水被打开了。她曾问过雅罗米尔，他十分窘迫地说："我只是弄着玩玩。"她当时是多么愚蠢！她回忆起雅罗米尔还是一个小孩时就想当一个香水发明家，她感动了。于是他只是轻轻地责备他："你已过了玩这类东西的年龄了！"但现在一切都非常清楚了：那瓶香水是那夜同雅罗米尔睡觉的一个女人用的，就在那个夜里，他失去了童贞。

她想象他的裸体；她想象着躺在他旁边的那个女人的裸体，那个女人的躯体洒过她的香水，因而散发出象她一样的气味。一阵恶心的感觉掠过全身。她再次瞥了一眼那本日记，看到那些记载在标有感叹号的那个日子中断了。多么有代表性——对一个男人来说，一旦他同一个女人睡过觉，一切就结束了，她厌恶地想，儿子似乎令她作呕。

有好几天她故意回避他。后来她注意到他的脸色疲倦，苍白；她确信这是由于过度的作爱造成的。

又过了几天她才开始注意到。雅罗米尔的脸色不仅显得疲劳，而且还显得悲伤。这一发现把她拉向他身边，给了她希望：她对自己说，姑娘们造成了创伤，但由母亲们来安慰；她对自己说，有许多姑娘，但只有一个母亲。我必须为他战斗，我必须为他战斗，她低声地重复道，从那时起，她开始象一只高度警惕的、慈爱的母老虎守护在他身边。

他通过了毕业考试，带着怀旧的心情告别了同窗八年的同学们。官方确定的成熟仿佛象一片沙漠呈现在他前面。一天，他发现（完全是偶然的，从他在那个黑头发男人公寓的集会上认识的一个人那里）那个石头姑娘爱上了他的一个同事。

他与姑娘约会了一次；她告诉他，她过几天就要动身去度假；他记下了她的地址。对他所听见的事一字不提，因为他怕用话明说出来；他担心这只会加速他们的破裂；他很高兴她还没有完全拒绝他，尽管她已有了别人，她还是让他不时地吻吻她，至少她还继续把他看作是一位朋友；他不顾一切地缠着她，愿意抛弃所有的自尊；她是包围着他的那片孤寂沙漠里的唯一的活人；他一心希望他们那即将完结的爱也许还会重新燃起。

姑娘离开了这座城市，雅罗米尔却面对着一个灼热的夏天，这个夏天就象一条长长的，令人窒息的隧道伸展在他前面。一封写给姑娘的信（悲哀的，恳求的信）漂进了这条隧道，毫无痕迹地消失了。雅罗米尔想起了挂在他房间墙壁上的电话筒。啊，这个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物体如今具有了真正的意义：一个没有连接的话筒，一封没有回音的信，一次没有人听的谈话……

整个夏天，女人们穿着凉爽的衣裙在人行道上漂浮，流行歌曲从开着的窗户涌到热烘烘的大街，有轨电车挤满了带着毛巾和游泳衣的人们，游船翻着波浪驶向莫尔道河，驶向南边，驶向群山和森林……

雅罗米尔被抛弃了，只有他母亲的眼睛跟随着他，对他一直守信。但这也很痛苦——一双眼睛不断地刺探他的孤独，剥去他的遮蔽物。他受不了母亲的眼光，也受不了她的问话。他不断地逃离家。夜里很晚才回来，然后立即上床睡觉。

我们已经提到过，雅罗米尔不是为手淫而生，而是为伟大的爱情而生。然而，在这些日

子里，他疯狂绝望地自渎，仿佛他想用这种卑劣可耻的行为来惩罚自己。自渎的夜晚后接着是脑袋抽痛的白昼，但雅罗米尔却差不多感到轻松了，因为头疼使他不去想到穿着夏天衣裙的女人的美，减轻了街道上歌声的色情诱惑，他那昏昏沉沉，没有感觉的状态帮助他度过了漫长的白昼。

没有收到姑娘的回信。要是至少有一封别人的信该多好啊，要是有什么东西能冲破空虚该多好啊！要是雅罗米尔曾把自己的诗寄给他的那位著名诗人至少给他写几行字该多好啊！只要几句赞扬的话！（是的，我们的确说过。雅罗米尔愿意用他所有的诗去换取他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自信。但是，让我们作进一步阐述：如果人们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男人，那么只有一件事能给他一点安慰——至少应把他看作是一个诗人。）

他再次希望同那位著名诗人取得联系。不是靠一封普通信的方式，而是用残暴的诗意的方式。一天，他带着一把锋利的刀离开了家。他在一个公用电话间前面来回踱了很久，当他确信没有人在看他时，他走进电话间，割下了听筒，以后每天，他都要设法盗走一个，直到搞到了二十个听筒（在这段时间，姑娘和诗人都没有音信）。他把这些听筒放进一个箱子，把它包扎起来，在上面写上那位著名诗人的姓名地址，在角上写上他自己的名字。他激动万分地带着包裹到邮局去。

当他从邮局返回来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回过头去，原来是他在学校的老朋友，看门人的儿子。雅罗米尔见到他很高兴（在他那单调乏味的沙漠上，任何事件都是受欢迎的）；他怀着感激的心情交谈，当他了解到这位老同学就住在附近时，他便设法让他邀请自己去顺便访问一下。

看门人的儿子不再与父母一起住在学校的楼舍里，而是有他自己的一间公寓房子。“我妻子现在不在家，”当他们走进过道时，他对雅罗米尔解释。听到老朋友已经结婚，雅罗米尔表现得很惊异。“噢，真的，我已结婚一年多了。”他用一种自负、得意的口吻说。雅罗米尔感到一阵强烈的嫉妒。

他们坐了下来，雅罗米尔看见房间的那一头有一张儿童床，床上有一个婴儿。他意识到老朋友已经是一家之父，而他还是一个手淫者。

他的朋友从橱柜里取出一瓶威士忌。满满地倒了两杯。雅罗米尔突然想到，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根本没有这种提神的食物，因为母亲会对此皱眉头的。

“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雅罗米尔问。

“我跟警察在一起。”看门人的儿子说，于是雅罗米尔想起他生病在家的那一天，聆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人群激动的喧声。警察是共产党员有力的手臂，他的老朋友当时也许就与革命群众在一起，而他——雅罗米尔——却和外婆在家里。

是的，原来那些日子他的朋友的确一直都在大街执行重要任务。他谨慎但又自豪地谈到这件事。雅罗米尔感到有必要使他朋友明白，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信念。他对他讲了在黑头发男人公寓里的集会。

“那个犹太人？”看门人的儿子毫无热情地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会保持警惕！那是个真正的怪人！”

看门人的儿子不断使他困惑不解，他似乎总是走在前面一步，雅罗米尔急欲找到共同之处。他用悲伤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道。我的爸爸死在一个集中营了。这件事的确使我震动，现在我明白了，这个世界必须改变，彻底地改变。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

看门人的儿子终于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谈了很久，当讨论到他们的未来时，雅罗米尔忽然宣称，“我想要从政。”他对自己的话感到惊异；它们象是不假思索就冲出来了，象是武断地就决定了雅罗米尔的全部生活道路。“自然，”他继续说，“我母亲想让我学美学，或法语，或天知道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不可能喜欢这些。这些东西同生活毫无关系。真正的生活——是你所投入的那种！”

当他准备离开朋友的房间时，他感到这一天充满了决定性的顿悟。就在几小时前，他才寄走了一个装有二十个电话筒的包裹，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奇特的行为，是对一个著名艺术家的挑战，是一个徒劳而无结果的等待的象征信息，是对诗人声音的恳求。

但是，紧接着与老同学的谈话（他断定这个时间的选择决不仅仅是偶然）给他富有诗意的行为赋予了相反的意义。它不是一个礼物，也不是一个恳切的请求；不，他骄傲地把他对回信的一切徒劳的等待归还给了诗人。那些被割断的听筒是他忠诚的被破掉的头，雅罗米尔嘲弄地把它们送回去，就象一个土耳其苏丹把十字军俘虏的头送还给基督徒指挥官。

终于一切都清楚了。他整个一生都是在一个被遗弃的电话间里的一段等待，倾听着一个失灵的听筒，只有一个解救办法：尽快地走出这个被遗弃的电话间！

“雅罗米尔，你怎么啦？”这个熟悉亲切的问话使他渗出了眼泪；他无地自容，玛曼继续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你是我的孩子！我了解你的一切，尽管你不再信任我。”

雅罗米尔羞愧地望着别处。她继续说，“不要把我看成是你的母亲，把我看成是一位比你年龄大的朋友。如果你告诉我什么使你烦恼，也许你会感到好得多。我看得出什么事在使你烦恼。”她轻轻地补充说，“我知道，它同某个姑娘有关。”

“是的，妈妈，我感到悲伤，”他承认，因为这个相互理解的亲切、泪湿的气氛包围着他，无路可走。“但是，我不愿意谈起它“我明白。我并不要你此刻把一切都告诉我。我只是要你在愿意的时候对我畅所欲言。瞧，今天天气真好。我和几位朋友约好了去划船。同我们一道去，跟我们作伴！出去玩一玩对你会有很大好处！”

雅罗米尔不想去，但又想不出任何借口。此外，他还感到非常疲倦、沮丧，没有足够的精力拒绝，因此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自己与四位女士在一艘游船的甲板上了。

这几个女士的年龄全都与玛曼相仿，雅罗米尔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话题；她们对他已经读完中学表示惊异；她们宣称他长得象他母亲；当听到他决定学习政治学时她们全都摇头（她们同意玛曼的看法，对一位这样敏感的年轻人来说，这不是适合的职业），当然，她们也戏谑地问他，他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女朋友。雅罗米尔渐渐对她们产生了暗暗的憎厌，但他看到玛曼玩得很愉快，看在她的面上，他一直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船在一个码头旁边停靠了下来，这几个女人和她们的年轻陪同上到一处挤满了半裸体人们的岸上，寻找一个可以晒日光的地点。她们中只有两个人带了游泳衣；第三个女人把衣服脱得只剩下粉红色的衬裤和乳罩，露出白生生的身子（一点也不害臊的炫耀她的内衣——也许她觉得被她的矮胖纯洁地掩盖了）。玛曼声称她只想把她的脸晒黑，她眯着眼，把头斜朝着天空。四个女人都一致认为。她们的年轻小伙子现在该脱掉衣服，晒太阳，去游泳。玛曼甚至记住把雅罗米尔的游泳裤也带来了。

流行音乐的歌声从附近一家餐馆飘来，使雅罗米尔感到浑身不安；晒黑的男孩们和女孩们只穿着游泳衣，快步打身边走过，雅罗米尔觉得他们好象都在盯他；他们的目光象一团火焰烧着他的周身；他拼命想不让人们知道，他与四个中年妇女是一伙的。但是，这几个女人却急欲认领他，表现得就象一个有四颗唠叨脑袋的大母亲。她们坚持要他去游泳。

“但是，没有换衣服的地方，”他反对道。

“没人会看你，傻瓜。只要用毛巾把你裹起来就行了。”那个穿粉红色内裤的胖女人哄他。

“他害臊。”“玛曼笑道，其他女人也笑起来。

“我们得尊重他的感情，”玛曼说，“来吧，你可以在这后面换衣服，没人会看见你。”她展开一条白色的大毛巾，它可以挡住其他游泳者的好奇，不让他们看见雅罗米尔。

他往后退，玛曼跟着他。他不断后退，她继续展着毛巾追赶他，以致她看上去象一只展开白翅膀的大鸟潜步追踪它的食物。

雅罗米尔继续往后退，接着他突然转过身来，拔腿就跑。

那几个女人吃惊地瞧着。当雅罗米尔绕过那些赤裸的年轻躯体，渐渐从视野中消失时，玛曼仍然伸展着手臂，举着那条白色的大浴巾。

第四章　　诗人在逃跑

在每个诗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挣脱了他的母亲，开始逃跑。

不久前，他还在顺从地朝前走，他的姐姐伊莎贝尔的维塔利走在前面，他和弟弟弗雷德里克排在后面，他的母亲象一个军事指挥官走在最后。年复一年，她就是这样使她的孩子们在沙勒维尔[1]的大街上列队行进。

----

[1]法国阿登省城市，兰波的家乡。

当他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挣脱了她的控制。警察在巴黎抓住了他。他的老师伊泽蒙巴德和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是的，就是在他头发里捉虱子的那几个女人）收容了他几个星期。然后他的母亲来领他回去，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在他们冷冷的拥抱中，她的双臂再次搂住他。

但阿瑟·兰波继续逃走，一次又一次，一个颈圈牢牢地拴住他的脖子，一边逃跑一边写诗。

这一年是 1870 年，普法战争的炮声在沙勒维尔回响，这样的形势特别有利于逃跑；抒情诗人们怀旧似的被战斗的枪声吸引住了。

他那有着畸形大腿的矮小身躯穿上了轻骑兵的服装。十八岁的莱蒙托夫成了一个士兵，逃离了他的祖母和她那令人厌烦的爱。他用揭示人们灵魂的笔来交换打开世界之门的手枪。因为如果我们把一颗子弹送进另一个人的胸膛，就好象我们自己进入了这个胸膛，而另一个人的心脏——就是世界。

自从他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后，雅罗米尔就一直在跑，他的逃跑后面同样跟着战斗的回响。它不是隆隆的枪炮声，而是政治大动荡的吼声。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士兵仅仅是装饰品，真正的战斗在别处。雅罗米尔一直在勤奋地参加政治学系的学习。他已经停止了写诗。

革命和青年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一场革命能给成年人什么允诺呢？对一些人来说，它带来耻辱，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带来好处。但即使这一好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仅仅对生活中糟糕的那一半有影响，除了它的有利外，它也需要变化无常，令人精疲力尽的活动，以及固定习惯的大变动。

青年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没有罪恶的负担，革命可以接受所有的年轻人。革命时期的变化无常对青年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受到挑战的正是父辈的世界。刚刚进入成熟的年龄，成人世界的壁垒就哗啦啦倾塌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1948 年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在捷克大学里，共产党员教授只占少数。因此，如果革命要保证它对学术界的影响，就不得不把权力交给学生。雅罗米尔积极参加了青年委员会的活动，在大学考试期间，他担任了这个组织的监考人员。他向政治委员会提交有关教授们考试方法和他们政治观点的报告，结果受到考查的实际上是教授而不是学生。

但是，当雅罗米尔向委员会汇报时，他同样受到了严厉的考查。他不得不回答那些严肃热情的年轻党员提出的问题，他希望找到能使他们满意的言词：当年轻人的教育处在利害攸关的时候，妥协就是犯罪，具有陈腐观点的教师是过时的，未来将完全是崭新的，否则就根本不是未来。那些一夜间就改变了观点的教师是不可信任的；未来将是纯洁的，否则它将是

可耻的。

如果雅罗米尔已成了一名可以影响成年人命运的热情的工作人员，我们还能坚持说他在逃跑吗？他不是仿佛已经跑到终点了吗？

一点也不。

当他只有六岁时，他的母亲就已经把他放在比他同学小一岁的位置上了。他现在还是小一岁。当他正在汇报一个教授的资产阶级态度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在这个题目上面。确切地说，他急切地在审视那些正在听他讲话的年轻人的眼光，观看他自己的形象。正如他从浴室的镜子里审查他的微笑和头发一样，他从听者的眼光中检查他的话是否坚定有力，是否具有男子气概。

他总是被一堵镜子的墙围住，看不到那一边。

成熟是不可分割的；它要么是完整的，要么就根本不存在。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只要雅罗米尔仍旧是一个孩子，他对考试的监考和对教授情况的汇报将仍然是一种逃跑的方式而已。

他继续在逃跑，可他不能甩脱她，他同她一道用早餐和晚餐，对道晚安和早安。每天早晨，她都要给他一个购物袋。玛曼并不在乎这个平凡的家庭象征物很不适合这位教授思想的监督者，她派他每天去市场购买东西。

瞧：他走了，沿着我们在前一章开头看到他行走的那同一条街道，当时他看见一个迷人的女人朝他走来，他的脸就红了。几年过去了，雅罗米尔仍然爱脸红，母亲打发他去的那个商店有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姑娘，他害怕遇到她的眼光。

他非常喜欢这个姑娘，这个可怜的姑娘必须每天在笼子般的出纳员小间里坐八小时。她那温柔的面容，那那缓慢的动作，她的监禁——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样神秘的熟悉，恰如其分，预先注定。实际上，他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姑娘长得象那个未婚夫被德国人枪杀了的女佣人玛格达。玛格达——“郁郁动人的脸。”而这个出纳员的小间就象他看见她洗澡的那个浴缸。

他弯身坐在写字台前，担心着他的期末考试。现在他害怕大学里的考试就象当初在中学里一样，因为他已经习惯于把优秀的成绩单给母亲看，他不愿让她失望。

户外的空气中充满了革命歌曲的回声，手拿锤子的巨大身影浮现在窗外，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小房间里显得令人难以忍受的狭窄和闷热。

伟大的俄国式革命已经过去了五年，而他却被判处眼盯着一个课本，因考试而怕得发抖。这是什么命运！

最后他把课本推到一边（已经夜深了），沉思着他那写了一半的诗。他正在写一个叫简的无产者，他想靠使梦实现来扼杀他那美好生活的梦。他一只手拿着锤子，另一只手挽着他的恋人，由大批同志簇拥着，大踏步走进革命。

那个胆怯的法律学生（是的，当然，这是伊希·沃尔克）看见桌上覆盖着鲜血，许多鲜血，因为一个被扼杀之梦的伤口是恐怖的。

但是，他不害怕；他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决不会害怕鲜血。

商店六点打烊，他在对面的拐角觑视，他知道那位女出纳员总是在六点过几分离开，不过他也知道，她总是由同一个商店的一个年轻的女售货员陪伴。

出纳员的这个朋友一点也不漂亮；事实上，雅罗米尔还认为她几乎很丑。这两个姑娘截然相反：出纳员是黑发，另一个却是红发；出纳员体态丰满，另一个却瘦骨伶仃；出纳员少言寡语，另一个却喋喋不休；出纳员令人感到神秘的熟悉，另一个却使人反感。

他监视了好几次，希望有一个晚上这两个姑娘会分别离开，这样他就可以对那位黑头发姑娘说话。但是，这种情形从来没发生。一次，他跟踪她们；她们穿过了几条街，走进了一幢公寓房子；他在这幢楼房前来回踱了大约一小时，然而，她们俩没有一个出来。

沃尔克太太从家乡来看望他，听着她的她朗诵诗歌。她感到心满意足：儿子仍然是属于她的。不管是别的女人还是这个疯狂的世界都没能把他从她的身边夺走。相反，倒是女人和世界被圈在这个有魔力的诗歌中心，她自己招来围着她儿子的一个圈子，她秘密地君临其上的一个领域。

他正在朗诵一首他写的怀念她母亲，即他亲爱的外祖母的诗：我将奔赴战场我亲爱的外婆为了这个光辉世界的荣耀……

沃尔克太大的内心处在安宁之中。让她的儿子奔赴战场，让他一只手拿着锤子，一只手挽着恋人吧。这没有什么损害。毕竟，他的这个世界包括她，外婆，家庭厨房，以及她反复给他灌输的一切美德，让这个世界看见他手里拿着锤子吧。她非常清楚，在世界面前游行与进人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事。

这位诗人也意识到了这个区别。只有他知道在诗歌的房子里当一名囚犯是多么抑郁。

只有真正的诗人才知道他多么渴望不当一名诗人，渴望离开笼罩着令人耳聋的沉默、装满镜子的房子。

一个梦的领域的逃亡者我将在人群中找到我的安宁把我的歌变成诅咒。

但是当弗朗季谢克·哈拉斯[2]写下这些诗句时，他并没有同街道上的人群在一起；他正在里面工作的那个房间是安静的。

----

[2]弗朗季谢克·哈拉斯（1901－1949）捷克当代诗人。

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个梦的领域的逃亡者。相反，那些他正在描写的人群倒是他那梦的领域。

他也没能把他的歌变成诅咒，确切地说，他的诅咒却在不断地变成歌。

难道就没有逃离这所装满镜子的房子的路吗？

然而我克制自己把我的脚后跟踩在我自己的歌喉上维尔迪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写道。雅罗米尔懂得他。诗的语言如今在他看来就象母亲内衣柜里的精细网织品。他好几个月没有写诗了。他一点儿不想写。他在逃跑。母亲要他去市场买东西他就去，但他一直锁上他的写字台抽屉。他已经把现代画的复制品从他房间的墙上取下来了。

他又贴上了什么呢？卡尔·马克思的像片？

不。他贴上了他父亲的像片。这是一张 1938 年的照片，正是不幸的大动员时期，他父亲穿着一件军官制服。

雅罗米尔喜爱这张照片，他对这个男人几乎不了解，而且这个男人正在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怀念这个足球队员，士兵，囚犯。他非常怀念这个男人。

哲学讲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几个诗人坐在讲台上。一位满头浓发的青年，穿着青年协会成员那些日子正流行的蓝色衬衫，正在讲话：“诗歌在革命时期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诗歌充当了革命的代言人，反过来革命又把诗歌从孤独中解放了出来；诗人现在知道，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正在倾听他；对青年人来说，诗歌和革命完全是一回事。”

然后第一个诗人站起来，朗诵了一首诗，描写一个姑娘和她的恋人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个在她旁边车床工作的年轻人很懒惰，没有完成他的生产定额。年轻人不愿失去他的姑娘，于是开始满腔热情地工作，很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红星就钉在了他的车床上。其余的诗人接踵发言，朗诵诗歌，歌颂和平，列宁，斯大林，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烈士，以及超额完成任务的工人。

青年人对青春所有的巨大力量一无所知。但是，现在这个站起来朗诵的白发如银的诗人却知道它。

他用悦耳的嗓音宣称，那些与年轻的社会步伐一致的人是年轻的，这个年轻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那些与未来一道前进的人是年轻的，他决不朝后看。

按照这位白发如银的诗人的观点，青春不是人生一个特定时期的名称，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年龄的一种价值。这个思想用恰当的诗表达出来，成功地达到了一个双重目的：既恭维了年轻的听众，又神奇地抹掉了诗人皱纹，使他成了一个与青年男女同等的人，（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他是与未来手挽手前进的一个先锋）。

雅罗米尔坐在听众中，很有兴趣地望着这些诗人，尽管他觉得自己象是另一个岸上的人，也就是说，他不再属于他们中的一个。他冷漠超然地听着他们的作品，就象他准备向委员会作汇报时冷漠超然地听教授们的言词一样。雅罗米尔特别注意此刻正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那个著名诗人（对那个白发如银的诗人的赞美诗报以的掌声已经平下去）。是的，此刻正大步走向讲台的这个人就是曾经收到装有二十个电话听筒的箱子的那个诗人。

我亲爱的大师，我们现在正处在热恋之中；我十七岁：正如人们所说，希望和幻想的年龄……如果我寄给这些诗……那是因为我热爱所有的诗人，所有优秀的高蹈派[3]诗人。当你读这些诗时，请不要过分讥笑。亲爱的大师，如果你如此心好，使我的诗得以发表，我将欣喜若狂！我不为人所知；那有什么关系？诗人们是兄弟。这些诗句坚信。爱情，希望。这就是一切。亲爱的大师。朝我伸下手，把我举起来；我很年轻。帮我一把……

----

[3]19 世纪下半叶法国的一个诗派，代表人物有勒贡特・德・列尔，邦维勒・苏里・普吕多姆等。

他在撒谎；他当时只有十五岁零七个月。甚至这还在他第一次逃离母亲，逃离沙勒维尔之前。但这封信将象羞耻的祈祷文，象一份记载他软弱的依赖的文献，久久地在他头脑中回响着。他要报复他亲爱的大师，报复那个秃头老傻瓜邦维勒[4]！仅仅一年后，他就将嘲笑他所有的诗，所有那些充满他诗歌中的珍贵的风信子和百合花；他将寄去一封嘲弄的信，就象是寄去一记耳光。

----

[4]邦维勒（1823－1891），法国诗人，戏剧家与批评家。高蹈派的先驱。

但此刻，这位正在讲台上朗诵诗歌的亲爱的大师却对潜伏着等待他的仇恨一无所知。他朗诵的那首诗描写了一个俄国城镇被法西斯毁灭，并且正在从废墟中站立起来。这首诗充满了奇异的、超现实主义的场面；苏联姑娘的胸脯象五彩缤纷的气球飘过街道；一盏石油灯从天空掉下来，照亮了白色的城镇，直升飞机象许多下降的天使降落在屋顶上。

听众们被这位著名诗人的个人魅力迷住了，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在这群没有头脑的听众中，还有少数有思想的人，他们知道，革命的听众决不能象恭顺的乞求者那样等待讲台上的礼物。相反，如今正是诗歌的乞求者，乞求被允许进入社会主义天堂。但是，守卫着这个天堂之门的年轻革命者必须提高警惕：未来必须是完全崭新的，否则它将根本不是一个未来；未来必须是纯洁无限的，否则它将是完全可耻的。

“他在企图向我们兜售什么样的胡说八道？”雅罗米尔嚷道，其他人很快加入了进来。“他是不是想把社会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连在一起？他是不是想把马和猫相配，把昨天和明天相配？”

这位著名诗人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但他很骄傲，根本不想屈服。从早年起，他就习惯了使资产阶级感到震惊，面对一个反对他的听众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脸发红了。作为最后一首诗，他选择了一首与他原先的计划不同的诗。这首诗充满了疯狂的意象和放纵的性欲幻想。他朗诵完后，口哨声和叫喊声顿时四起。

学生们对着这位老学者嘲弄地吹口哨。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喜欢他们；从他们愤怒的反抗中，他依稀看到了他自己的青春。他觉得，他的爱使他有权把他内心的想法告诉他们。这是 1968 年的春天，在巴黎。啊！学生们根本看不出在他布满皱纹的脸后还有青春的面容，这位老学者吃惊地望着那些他热爱的人在讥笑他。

这位著名诗人抬起手来让喧声平息下去。然后他开始朝学生们叫喊道，他们是一帮清教徒女教师，教条的牧师，愚蠢的警察，他们抗议他的诗是因为他们从心底仇恨自由。

老学者沉默地听着口哨和嘘声。他回忆起，年轻时他也喜欢起哄和吹口哨，周围是一伙他的同伴。但这伙人很早以前就分裂了，现在只有他独自一人站在这里。

这位著名诗人叫道，捍卫自由是诗歌的职责，即使一个隐喻也值得为之而斗争。他宣称他将坚持把马和猫相配，把现代艺术和社会主义想配，假若这是一项堂吉诃德式的事业，那么他很愿意作堂吉诃德，因为它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幸福和自由的时代，他拒绝承认任何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

老学者望着周围哄闹的年轻人，他突然想到，在所有听众中，他是唯一有自由特权的人，因为他已经老了。只有当一个人到了老年时，他才能不再在乎同伴、大众或未来的看法。他独自与临近的死亡在一起，死亡是没有耳朵的，不需要别人奉承。面临死亡时，一个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做事。

他们吹口哨，要求发言反驳他。过了一会儿，雅罗米尔也站起来。他眼睛里充满愤怒，人群就在他的背后。他说，只有革命才是现代的，而超现实主义艺术颓废的色情和晦涩的意象则是与人民毫无关系的破烂货。“真正的现代是什么？”他向这位著名诗人挑战，“是你那晦涩的诗句，还是正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我们？”他自问自答：“除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现代的东西。”他的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当这位老人离开讲台，沿着巴黎大学的回廊走去时，掌声仍在他的耳边回响。墙上的题词写着：做现实主义者——没有不可能的事。接着又是一幅：人的解放必须是彻底的，否则毫无意义。还有一幅：决不后悔。

大教室的凳子堆在墙边；地板上到处散乱着刷子和颜料。几位政治学系的学生正忙着在纸旗上刷写五一节标语。雅罗米尔，标语的作者兼编辑，正在监督这项工作，不时地查看他的笔记本。

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日期给弄错了吗？他正在口述的标语，与刚才那位老学者在反抗的巴黎大学墙上读到的完全一样。不，我们没有搞错。雅罗米尔正在向他的同事口述的标语，恰恰是约二十年后法国学生在巴黎大学的楠泰尔大学[5]墙上到处乱涂的那些标语。

----

[5]楠泰尔大学，巴黎大学分校，位于巴黎西部，塞纳河东岸的工业区。

梦想就是现实，其中一面旗帜上宣称。另一面旗帜写着：做现实主义者——没有不可能的事。另一面：我们决定永久的幸福。另一面：取消教会。（雅罗米尔对这幅标语特别感到自豪。几个简捷的词否定了两千年的历史。）又一面：不给自由的敌人自由！以及：给想象以权力！以及：让半心半意的人灭亡！以及在政治，家庭、爱情中进行革命！

他的同事正在描画这些字母，雅罗米尔象一个语词的大元帅，高傲地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他很高兴人们需要他，他的语词才能终于找到了一个用途。他知道，诗歌已经死亡（艺术已经死亡，巴黎大学的一堵墙上写着），但是，它的死亡是为了作为旗帜上宣传鼓动的口号，作为城市墙上的标语从坟墓里重新站起来（诗歌在大街上，奥德翁[6]的一堵墙上写着）。

----

[6]奥德翁为巴黎一剧院名。

“你看了报纸吗？第一版列出了一百条供五一节使用的口号，这是中央委员会宣传机关提出来的。难道没有一条合你的意吗？”

一个区委会的矮胖年轻人正面对雅罗米尔。他自我介绍是高教五一委员会的主席。

“梦想就是现实——呃，这是最粗糙的一种理想主义！取消教会——我十分赞同你，同志，但这目前与党的宗教政策相抵触。让半心半意的人灭亡——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有了这样的权力，用死亡来威胁人民？给想象以权力——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爱情中进行革命

——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好吗？你想要的是与资产阶级婚姻对立的自由恋爱，还是与资产阶级淫乱对立的一夫一妻制？”

雅罗米尔声明，革命必须改变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爱情的家庭，否则它就不会是一场革命。

“不错，”矮胖的年轻人承认，“但这样写可能好得多：‘社会主义万岁！社会主义家庭万岁！’你瞧，这个口号就是直接从报纸上来的。你本来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生活在别处，法国学生在巴黎大学的墙上写道。是的，他非常了解这一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开伦敦去爱尔兰的原因，在那里人民正在造反。他的名字是帕西·雪莱，二十岁，带着成百的传单和宣言，作为将保证他进入真正生活的护照。

因为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学生们正在搬起大鹅卵石，推翻汽车，筑起街垒；他们的进入世界是喧闹和壮观的，被火焰所照亮，被催泪弹的爆炸所辉耀，生活对兰波来说艰难得多，他梦想着巴黎公社的街垒，却不能离开沙勒维尔。但在一九六八年，成千上万的兰波筑起了他们自己的街垒。他们站在街垒后面，拒绝与这个世界的临时主人作任何妥协。人的解放必须是彻底的，否则毫无意义。

一里路外，在塞纳河的对岸，这个世界目前的主人继续过着他们正常的生活，把拉丁区[7]的骚动看成是发生在很远的事。梦想就是现实，学生们在墙上写道，但似乎反过来才是真实的：他们的现实（街垒，推翻的汽车，红旗）是一场梦。

----

[7]拉丁区位于巴黎塞纳河南西，是大学生和艺术家群集之处。

但是这在任何时候都决不是清楚的——现实是一场梦，还是梦是一个现实。那些聚集在大学，头上飘扬着红旗的学生们兴高彩烈地来到这里，但同时他们心里明白，如果他们留在家里，会遇上什么样的麻烦。1949 年的捷克学生标志着梦不再仅仅是梦这样一个有趣的过渡时期。他们的欢欣仍然是自愿的，但同时也已经是强迫的了。

学生们沿着街道前进，雅罗米尔走在他们旁边；他负责旗帜上的口号和同伴们的演说；这次他不再发明引起争议的警句，而仅仅抄下几条中央宣传机关提出的口号。他领着大家呼口号，就象军队里的下士喊步伐一样，他的同伴们跟在他后面有节奏地吼叫。

游行队伍已经通过了文策斯劳斯[8]广场的检阅台，身穿蓝色衬衫的青年们伴随着临时凑成的乐队载歌载舞。一切都是欢快和自由的，刚才还是陌生的人们，也带着真诚的同志之谊加入了进来。但是，帕西·雪莱不快乐，帕西是孤独的。

----

[8]文策斯劳斯（1361－1419），德意志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

他在都柏林已经几个星期了，散发了许多传单，警察对他了如指掌，但他却没有交上一个爱尔兰朋友。生活仿佛总是在别处。

要是至少有一个街垒可爬，有枪炮声多好！雅罗米尔觉得，节日游行似乎仅仅是对伟大革命示威的苍白的模仿，它们没的真义，很快就烟消云散。

他想起了那个囚禁在出纳员笼子里的姑娘，凄然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幻想着一个勇敢的功绩：用铁锤砸破商店橱窗，把受惊的顾客推在一边，打开出纳员的笼子，当着旁观者惊呆的目光，把这位被解放了的褐发姑娘带走。

他幻想他们手挽手穿过拥挤的街道，沉浸在爱情之中，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他们周围旋转着的舞蹈不仅仅是舞蹈，而是朝着街垒的行进，这一年是 1848 年，1870 年和 1945 年，场景是巴黎，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和维也纳，参加者是同一群人，永远从一个街垒跳到另一个街垒，他拉着恋人的手和他们一起跳……

当他看见他时，他手上还能感觉到她手的温暖。他正在朝他走来。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一个年轻女人在他身边轻快地走着。她没有象在街上跳舞的大多数姑娘那样穿着蓝色衬衫。

她象一个流行时装模特儿一样优雅。

这位魁伟的男人心不在焉地扫视人群，向四下里点头致意。当他离雅罗米尔只有几步远时，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一会，雅罗米尔一时慌乱，象所有认出并注目著名人物的人一样，也低下了头。这个人以漫不经心的一瞥回敬他的动作（就像我们向不认识的人致意一样），他同伴的头微微地、含糊地动了一下。

啊，这个女人真美丽！她决不是幻想，她是那样真实，在她真实的躯体的光辉下，那位出纳员小间（浴缸）的姑娘渐渐变成影子，从雅罗米尔的身边消失了。

雅罗米尔站在人行道上，屈辱孤单，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渐渐远去那一对。是的，正是他，他那亲爱的大师，收到装有二十个电话听筒包裹的人。

夜幕渐渐降临城市，雅罗米尔渴望遇见她，有几次，他跟踪一个女人，这女人的背影使他想到她的背影。假装在追逐一位消失在人群中的女人是令人激动的。于是他决定在他曾看见她进去的那幢公寓房子前散步。他似乎不大可能在那里再次遇见她，但只要他母亲还没睡觉，他就不想回家（只有在夜里，当母亲睡着了，父亲的照片复活时，他才能忍受他的家。）

他在这条孤寂、偏僻的街上走来走去，五一节喜庆的旗帜和丁香花似乎没有在这条街上留下任何痕迹。公寓窗户里的灯一盏盏亮了。底楼的窗子也照亮了，雅罗米尔看见了一张熟悉的姑娘面孔。

不，不是他的黑头发出纳员，是她的朋友，那个瘦削的红头发姑娘。她正走到窗子跟前，准备放下窗帘。

雅罗米尔几乎压抑不住他的失望。他意识到姑娘已经看见了他。他的脸红了，就象当那位悲伤、漂亮的女佣人从浴缸里抬起头来望着浴室门时他所做的那样：他跑开了。

五月二日，晚上六点钟。女售货员们拥到了大街上，一件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红头发姑娘独自走了出来。

他试图藏在一个拐角后面，但已经太晚了。她看见了他，朝他奔来。“先生，你知道，在夜里朝别人窗户里窥望是很不礼貌的！”

他的脸红了，试图用说话来摆脱昨夜那件叫人尴尬的事。他担心这个红头发姑娘在场会毁掉他遇到褐发姑娘的机会。但这位红头发姑娘非常多舌，没有打算放雅罗米尔走。她甚至邀请他送她回公寓房子（她说，送一位年轻女士回家，比透过窗子窥视她要有礼貌得多）。

雅罗米尔绝望地一直把眼睛盯着商店的门。“你的女朋友在哪里？”他终于问道。

“你来迟了。她已经走了。”

他们一道朝姑娘的住处走去，雅罗米尔得知，这两个姑娘都来自农村，在商店里找到了工作，同住在一间房子里。但那个褐发姑娘已经离开了布拉格，因为她就要结婚了。

当他们停在公寓前面时，姑娘说：“你不想进来坐一会儿吗？”

雅罗米尔惊异、慌乱地走进她的房间。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开始了拥抱、接吻，一眨眼他们已经坐在一张铺着毛绒床罩的床上。

这一切全是那样迅速，简单！他还来不及想想摆在他面前的那个艰难的、决定性的实在任务，她已经把手放到了他的大腿之间。他欣喜若狂，因为他身躯的反应正是一个年轻人应该做出的那样。

“你真行，你真行。”她不断地在他耳边悄声说，他躺在她的身旁，深陷在枕头里，快活极了。

“在我之前你有过多少女人？”

他耸了耸肩，神秘地微笑着。

“你不愿说？”

“猜吧。”

“我想大概在五个到十个之间，”她大胆地估计。

他心里充满了快活的骄傲；他仿佛觉得他刚才不仅是在同她作爱，而且也是在同五个或十个别的姑娘作爱。她不仅使他摆脱了童贞，而且还使他感到像一个“很有本事和经验”的男人。

他感激地朝她微笑，她的裸体使他充满了激情。他过去怎么会如此盲目，竟然认为她长得难看？她的胸脯有一对真正的、无可指责的乳房，她的下腹有一簇真正的、无可指责的毛发！

“你光着身子比穿着衣服还要漂亮。”他说，继续赞扬她的诱人之处。

“你喜欢我很久了吗？”她问。

“噢，是的，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我注意到你常常来商店。然后你总是在外面街道上等我。”

“说得对。”

“你害怕向我发起任何攻势，因为我从来不是单独一人。但我知道我们总有一天会在一起。因为我也喜欢你。”

他望着她，让她最后的话在他心里回荡。是的，事情正是如此。当他备受孤独折磨，当他不断拼命投身到会议和游行中，当他不停地跑了又跑时，整个期间，他的成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这个墙皮已经剥落的朴素的小房间一直在默默地等待他，这个房间和这个平凡的女人，她的身躯终于在他和人群之间创造了一种肉体联结。

我愈是作爱，我就愈想干革命——我愈是干革命，我就愈想作爱，巴黎大学的一条标语宣称。雅罗米尔第二次刺入了红头发姑娘的身躯。成熟必须是彻底的，否则就根本不存在成熟。他久久地、愉快地跟她作爱。

帕西·雪莱象雅罗米尔一样有一张女孩般的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他跑过都柏林的街道，不停地继续往前跑，因为他知道，生活在别处。兰波也不停地跑——到斯图加特[9]到米兰，到马赛，到亚丁[10]，到哈拉尔[11]，然后回到马赛，但到这时，他只有一条腿了。很难用一条腿奔跑。

----

[9]西德城市。

[10]南也门首都。

[11]埃塞俄比亚省城。

他从她身上滑下来。当他伸开四肢躺在她身旁，疲倦不堪，心满意足时，他想到他不是在两番爱的较量后休息，而是在一次长途奔跑后休息。

第五章　　诗人是忌妒的

雅罗米尔继续在跑，而世界继续在变：他的姨父，那个认为福尔特尔是伏特发明者的人，被巫告犯了诈骗罪（和成百的商人一道）。他们不但把他的商店收归国有，而且还判了他几年刑。他的妻子和儿子作为工人阶级的敌人被驱逐出布拉格。他们带着冷冷的沉默离开了这幢房子，由于雅罗米尔投靠了这个家庭的敌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玛曼。

政府把这幢别墅空出来的底层楼分配给另一家人，这家人很快就采取了粗暴、挑衅的态度，新来的房客是从一间阴暗的地下室搬来的，因此认为任何人拥有这样宽敞、舒适的别墅都是极大的不公平。他们觉得他们不只是到这幢别墅来住的，而是来清算一个过去的历史错

误。没有请求任何人的许可，他们在花园里为所欲为，并要玛曼把房子的墙壁修理一下，因为他们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时，剥落的墙灰可能会危及到孩子。

外婆愈来愈老了，她已经丧失了记忆，于是有一天（几乎没有感觉到）她化成了火葬场的青烟。

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玛曼对儿子的逐渐疏远感到特别难以忍受。他正在学习的学科她很反感，他不再把他的诗歌给她看。当她想打开他的抽屉时，她发现它已上了锁。就象脸上挨了一耳光。想到雅罗米尔在怀疑她窥探他的私事！她求助于一把雅罗米尔不知道的多余的钥匙，但当她检查他的日记时，她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记载或新的诗歌。然后她注意到墙上已故丈夫的照片，她回想起她曾经怎样恳求阿波罗的塑像从正在她子宫里生长的婴儿身上抹去象他丈夫的一切痕迹。哎，莫非她丈夫在坟墓里都要与她争夺对雅罗米尔的所有权吗？

在前一章结尾时，我们把雅罗米尔留在了红头发姑娘的床上。大约一周后，玛曼再次打开他书桌的抽屉。在他的日记里，她读到几句她不理解的简洁的话，但是她也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新的诗歌。她觉得阿波罗的七弦琴再一次战胜了她丈夫的军服，她暗暗地高兴起来。

读完这些诗后，这个好的印象得到了增强，因为她真心喜欢它们（实际上，这是她第一次真诚地欣赏雅罗米尔的诗！）。它们是押韵的（在内心深处，玛曼始终觉得不押韵的诗决不是真正的诗），完全明白易懂，充满美丽的诗句，没有衰弱的老人，没有土里腐烂的尸体，没有松垂的腹部，没有眵垢的眼睛。相反，这些诗提到鲜花，天空，云彩，有几处，（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甚至还出现了“母亲”这个词。

雅罗米尔回家了；当她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所有这些年的辛酸苦辣忽然都涌上眼睛，她禁不住热泪纵横。

“什么事，母亲？怎么啦？“他轻轻地问，他的声音里很久都没有这种温柔了，玛曼尽情地把它吸收了进去。

“没什么，雅罗米尔，没什么。”她回答，看见儿子对她关心，好哭得更加厉害。再一次，她流下了多种眼泪：为她的孤独的悲伤的眼泪，为儿子抛弃她的指责的眼泪；为他有可能回到她身边的希望的眼泪（受到他那新的旋律诗行的刺激）；为他站在她面前那笨拙样子的气愤的眼泪（难道他就不能至少抚摸一下她的头发吗？）；还有企图软化和俘虏他的虚假的眼泪。

终于，尴尬的犹豫之后，他拉住了她的手。太好了，玛曼停止了哭泣，她的话就象刚才的眼泪一样滔滔地涌出来。她谈到她一生中的所有委屈：她的守寡，她的孤独，企图把她赶出她自己房间的住户，不再理悉她的姐姐（“都是因为你，雅罗米尔！”），最后，最重要的是——她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密朋友正在摒弃她。

“可那不是事实。我没有在摒弃你！”

她不会为这样轻易的回答平静下来。她苦笑了；他怎么能这样说？他总是很晚才回家，有时连续几天他俩都不交换一句话，甚至当他俩偶尔谈点话时，她也非常清楚，他根本没有在听，他的心在别的地方。是的，他正在变成一个陌生人。

“可是，母亲，那不是事实。”

她又苦笑了。噢，不是？难道她必得向他证明这点吗？难道他想知道真正最伤害她的是什么吗？他有兴趣吗？那么好吧。她一直尊重他的秘密，甚至当他还是一个小孩时。为了让他有自己的房间，她曾与家庭中其他成员进行了多么艰难的斗争！而现在——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侮辱！一天打扫他房间时，完全出于偶然，她发现他因为她而锁上了书桌抽屉，他怎么想她当时的感觉！为什么要锁它？谁可能会愿意干涉他的私事？难道他认为，她除了打探他的事就没有别的更要紧的事可干了吗？’

“哎，母亲，这是一个误会！我几乎没有使用那个抽屉！如果它被锁上，那只是出于偶然！”

玛曼知道儿子在撒谎，但这无关紧要。比他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话音里的顺从，它象是一个和好的礼物。

“我愿意相信你，雅罗米尔。”她说，紧紧握住他的手。

当他瞅着她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淌满眼泪的脸。她冲到浴室里去照镜子，她感到恐怖；她那泪湿的脸看上去很丑，身上穿的那件过时的灰衣服只是使情况更糟。她轻快地用冷水洗了脸，换上一件粉红色的睡衣，从橱柜里取出一瓶红酒。她开始再次对雅罗米尔讲，他们俩应该更加相互理解，因为在这个世上，他们除了对方再没有别的亲人了。这个话题她谈了很久，她觉得雅罗米尔的眼里好象流露出激动和赞同。因此她鼓起勇气说，她毫不怀疑他——一位正在成人的大学生——有他个人的秘密，她尊重他的秘密，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雅罗米尔生活中的这个女人不会损害他俩之间的良好关系。

雅罗米尔耐心、理解地听着。过去一年他之所以回避他的母亲，是因为他的不幸需要孤独和黑暗。但自从他在阳光灿烂的海岸——红头发姑娘身上幸福地登陆以后，他就一直渴望和平与灯光；他对母亲的疏远破坏了生活的和谐。除了感情方面的考虑，还有一个与玛曼保持良好关系的更实际的需要：红头发姑娘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而他——一个成年男人——却仍然同母亲住在一起，只有通过女主人的独立才能实现一个独立的生存。这种不同使他痛苦不堪，因此他很高兴玛曼此刻同他坐在一起，穿着一件粉红色睡衣，啜着酒，象一位悦人的年轻女人，他可以跟她友好地讨论他的权力和特权。

他声称他没有什么可隐藏的（玛曼由于焦急的期待，喉头都绷紧了），他开始对她讲起红头发姑娘。当然，他没有提玛曼在她买东西的那个商店里已经见过这位姑娘，不过他说明了这个年轻姑娘是十八岁，她不是大学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姑娘（他几乎好斗地说出这句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玛曼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觉得事情似乎在朝好的方面转变。雅罗米尔描述的这位姑娘的形象消除了她的忧虑。姑娘很年轻（以为是一个久经情场、堕落的女人的恐惧想法愉快地消失了），她几乎没受什么教育（因此玛曼不必担心她的影响力量），雅罗米尔这样热烈地强调她的朴实和善良，她不仅猜想这姑娘不是太漂亮（因此可以设想，儿子的迷恋不会持续很长）。

雅罗米尔感觉到，母亲并没有不赞成他对红头发姑娘的描绘，他很高兴，懒懒地幻想着他很快就可以同他的母亲和他的红头发姑娘坐在同一张桌旁；同他童年的守护神和他成年的守护神。这一切似乎象和平一样的美好；在他自己的家与外面世界之间的和平，在他两个守护神翅膀下的和平。

于是，在长时间的疏远之后，母亲和儿子，正在品尝他们的亲密。他们愉快地聊天，但雅罗米尔仍然一直在想着他那不过分的，实际的目的：给自己的房间争得权利，在那里他愿意什么时候带姑娘来就可以带她来，在那里他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因为他正确地领悟到，一个人只有当他是一块明确规定的场地的主人，一个完全的个人小天地的主人时，他才是真正的成年人。他用一种拐弯抹角、小心翼翼的方式对母亲表达了这一看法。他说，如果他能认为自己在这里是自己的主人，他会更加乐意待在家里。

玛曼从微醺的飘飘然中醒过来。警觉得象一只雌老虎。她顿时意识到儿子想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雅罗米尔，难道你在家里感到不自在吗？”

他回答说他非常喜欢他的家，但是他希望有权邀请他愿意邀请的人，象他的女友一样不受约束地生活。

玛曼开始意识到，雅罗米尔无意间给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毕竟，她也有几位爱慕者，由于害怕雅罗米尔的遣责，她不能邀请他们到她的家来。用雅罗米尔的自由来换取她自己的一点自由，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吗？

但是，当她想象一个陌生女人在雅罗米尔童年时代的房间里，一阵难以克制的厌恶就涌

上心头。“你得承认，在一个母亲和一个女房东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她激烈地说，她知道，她将毁掉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过充实生活的机会。她对儿子肉欲的厌恶强于她自己身躯对肉体满足的渴求，这一发现使她感到恐惧。

还在固执追求目标的雅罗米尔，不了解母亲内心的骚乱，他继续强调他那失去的理由，进一步提出无用的论据。过了一会儿，他才注意到母亲在啜泣。一想到他伤害了童年时代的守护神他就非常惊恐，于是他陷入了沉默。从母亲的眼泪里，他突然看到他对独立的要求是无礼的，傲慢的，甚至是下流无耻的。

玛曼绝望了：她看见他俩之间的鸿沟再一次张开。她一无所获。却失去了一切！她随即试图想办法保持住儿子与她之间那根珍贵的理解之线。她拉住他的手，透过泪水说：“请别生气，雅罗米尔！我只是因为你的变化而感到不安。最近你变得非常厉害！”

“变化？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母亲。”

“是的，你变了，你和过去不同了，最使我伤心的是你不再写诗。你过去常写一些多美的诗！现在你把它完全放弃了。这使我伤心。”

雅罗米尔想要说点什么，但她不让他说。“相信你的母亲，”她继续说，“我对这些事有一种感觉；你有非凡的才能！这是你的天赋。低估它就太可惜了。你是一个诗人，雅罗米尔，一个天生的诗人。我很难过，你并不重视它。”

雅罗米尔沉醉在母亲的话里，高兴极了。千真万确。他孩提时代的守护神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他！由于他不再写诗，他曾经是多么沮丧！

“但是，我现在又在写诗了，母亲！真的！我拿给你看！”

“没有用，雅罗米尔，”玛曼悲哀地摇摇头。“不要哄骗我。我知道你已经不再写诗了。”

“你错了！请等一下！”他叫道。他跑到他的房间，打开抽屉锁，带着一札诗走回来。

玛曼瞧着几小时前在雅罗米尔房间看过的那些诗。

“噢，雅罗米尔，这些诗真是太美了！你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很大的进步！你是一个诗人，我为你感到非常高兴……”

仿佛一切都在表明，雅罗米尔对新事物的强烈渴求（对新事物的信仰）不过是掩饰一个童贞青年对不能想象的性经验的渴求。当他第一次到达红头发姑娘身躯的极乐海岸时，他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念头：现在他终于知道绝对现代的含义是什么了；它就是躺在红头发姑娘身躯的岸上。

在这样的时刻，他活跃之极，充满热情，真想给她朗诵诗歌。他在脑子里迅速回忆了一下所有熟记的诗（他自己的和其他诗人的），但他断定（大为惊异地）红头发姑娘也许对这些诗根本不会关心。这使他头脑一阵混乱。接着他明白了，唯一的绝对现代的诗是红头发姑娘，一个普通姑娘，能够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诗。

这是一个突然的启迪；他为什么那样愚蠢，竟想要踩在自己的歌喉上？为了革命而放弃诗歌有什么道理？毕竟，他终于到达了真正的生活领域（雅罗米尔理解的“真正的生活”是一个游行人群，肉体之爱，革命口号的旋转的边界），现在他只需完全投入到这个新生活中，成为它的小提琴弦。

他感到充满了诗情，极想写出一首红头发姑娘会喜欢的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在此之前，他只写过自由诗，没有那种更有结构的诗歌形式的技巧。他确信，姑娘会认为无韵的作品不是真正的诗。甚至获胜的革命也持同样的观点。让我们回忆一下，在那些日子，无韵诗甚至被认为不值得发表。所有现代派诗都被宣布为腐朽资产阶级的作品，自由诗是文学颓废最确信无疑的特征。

革命对韵律的喜好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偏爱吗？大概不是。在韵律和节奏中，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一旦挤进有规律的音步，混乱的世界随即变得井然有序，清楚明了，美丽迷人。如果一个女人厌倦人生走向死神，死亡便与宇宙的秩序和谐地融为一体了。即使这首诗是为

了对人的必死进行强烈的抗议，死亡作为美好抗议的诱因也是正当的，骸骨，送葬，花圈，墓碑，棺材——这一切在一首诗里都变成了一出芭蕾，读者和诗人都在其中表演着他们的舞蹈。跳舞者当然不可能不赞成舞蹈。通过诗歌，人类达到了它与存在的一致，而韵律和节奏便是获得一致的最天然的方式。难道革命可以无需对新秩序反复证实吗？难道革命可以无需韵律吗？

同我一道狂吼！内兹瓦尔激励他的读者，波德莱尔写道，人生须常醉……酒中，诗中，道德中，各循其志……诗歌即酣醉，人们饮酒是为了更加容易与世界融合在一起。革命不希望被审视或被分析，革命只渴望同群众融合在一起。因此，革命是抒情的，需要抒情风格。

当然，革命所追求的抒情风格与雅罗米尔早期创作的那种诗截然不同。一段时期，他曾急欲追求内在自我的平静冒险和迷人暗示。然而，现在他清除了他的灵魂，把它变成了一个表演真正世界喧闹马戏的宽阔场地。他用只有他才理解的独特的美去交换人人所理解的一般的美。

他迫不及待地想起旧式的奇迹，艺术（怀着背叛者的骄傲）已经嗤之以鼻的奇迹大众化；落日，玫瑰，晨露，星辰，对故土的怀旧之情，母爱。多么美好，熟悉，清晰的世界！雅罗米尔惊喜交加地回到它那里，象一个浪子多年漫游后又回到家中。

啊，要简单，绝对简单，简单得象一首民歌，一个孩子的游戏，一道潺潺的溪水，一位红头发的姑娘！

啊，要回到永恒之美的源泉，热爱简单的词语，例如星星，歌曲和云雀——甚至“啊”这个词，这个被蔑视被嘲笑的单词！

雅罗米尔也受到某些动词的诱惑，尤其是那些描写简单动作的词；走，跑，特别是漂和飞，在一首庆祝列宁周年纪念的诗中，他写道，一根苹果树枝被投到小溪里，树枝一直漂流到列宁的家乡。没有一条捷克的河流到俄国，但诗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那里河水可以改道。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世界很快就会自由得象松树的芳香漂浮在山顶上。在另一首诗中他唤起茉莉的芳香，这香味变得如此强烈，以致变成了一艘看不见的帆船，在空中航行。他想象自己在这艘芳香四溢的船上，向远方飘去，一直漂到马赛，根据一篇报纸上的文章，马赛的码头工人正在罢工，雅罗米尔希望作为一个同志和兄弟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他的诗歌也充满了所有运动方式中最有诗意的东西，翅膀，夜晚随着翅膀，轻轻地拍打而搏动。渴求，悲伤，甚至仇恨都有翅膀。当然，时间在不变地沿着它那带翅膀的路行进。

所有这些诗句都暗示了一个对广大无边的拥抱的希望，使人联想到席勒的著名诗句：Seid，umschlungen，Mi-llionen！Diesenkussderganzenwelt！[1]（德语：大家拥抱吧，千万生民！把这亲吻送给全世界！——译注）这种对宇宙的拥抱不仅包括空间，而且还包括时间，不仅包括马赛的码头，而且还包括那个神奇、遥远的岛屿——未来。

----

[1]《欢乐颂》中的诗句。

雅罗米尔一直把未来看成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神秘事物。它包含着一切未知的东西，因此，它既诱人又令人恐惧。它是确定的反义词，是家的反义词，（这就是为什么在焦虑不安期间，他要梦想着老人的爱情，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不再有未来）。然而，革命赋予了未来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不再是一个神秘事物；革命者熟悉未来。他从小册子，书籍，报告，宣传演说中知道了它的一切。它不令人恐惧；相反，在一个不确定的现在，它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安息所，革命者朝它伸出手臂，就象一个孩子朝母亲伸出手臂一样。

雅罗米尔写了一首描写一个共产党工作者的诗。一个深夜，当喧哗的会议被晨露代替（在那些日子，一名战斗的共产党人总是被表现为一名喜欢争论的共产党人），他在书记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窗下的电车铃声在这位党的工作者的梦里，变成了世界上所有钟摆的欢乐洪亮的声音，宣告将不再有战争，全球属于工人阶级。这位党的工作者意识到，靠神奇的一

跃，他不知怎么已来到了遥远的未来。他站在一块田地之间，一位女人驾驶着拖拉机朝他驶来（未来的妇女通常被描写成拖拉机手），她惊讶地认出这位工作者就是从前的社会主义英雄——往昔的劳动者，为了她现在能自由而幸福地耕地，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从机器上跳下来迎接他。“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世界。”她说，并想要报答他。（看在上帝面上，这位漂亮的年轻女人怎么能报答一个疲倦不堪的老工作者？）这时，窗上的电车发出特别有力的鸣声，这位睡在党的办公室角落的狭窄沙发上的男人醒了过来……

雅罗米尔写了好几首类似的新诗，但他还是不满意。除了雅罗米尔和他的母亲，没有人读过这些诗。他把它们全都寄给日报的文学编辑，每天早晨都要细心地翻阅报纸。一天，他终于发现三版上方有一首五节四行诗，他的名字用粗体字印在诗题下面。这一天，他骄傲地把这期报纸递给红头发姑娘，要她仔细地看一遍。姑娘未能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她通常忽略诗歌，因此根本不注意作者的名字），雅罗米尔最后不得不用手指着这首诗。

“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是一个诗人！”她钦佩地凝视着他的眼睛。

雅罗米尔告诉她，他写诗写了很久了，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札手抄的诗。

红头发姑娘开始读这些诗，雅罗米尔告诉她，有一段时期他曾放弃了诗歌，是她鼓舞了他回到它身边。遇见她就象遇见了诗歌本身。

“真的吗？”她问，雅罗米尔点了点头，她拥抱他，吻他。

“奇妙的是，”雅罗米尔继续说，“你不仅是我最近写的诗歌的女王，甚至也是我认识你之前写的诗歌的女王。当我第一看见你时，我就觉得我过去的诗变得栩栩如生，成了一个象你这样女人的化身。”

受到她脸上显露的好奇、不理解的神情鼓励，他继续对她说，他曾经写了一首长长的散文诗，一个幻想故事，描写了一个名叫泽维尔的男孩。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写这首诗，只是梦到过它，希望有一天把它写出来。

泽维尔的生活与别人完全不同；他的生活是一个梦。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睡着了，又做了一个梦，从这个梦中醒来，他发现自己在前一个梦里。就这样，他从一个梦渡到另一个梦，同时过着几种不同的生活。他从一种生活渡到另一种生活——这不是一种很美妙的生存吗？没有拴在一个单一的生活上，虽然是一个人却又过着多种的生活。

“是的，我想这会是很好的……。”红头发姑娘说。

雅罗米尔继续说：当他第一次在商店里看见她时，他就大吃了一惊，因为她长得与他想象中泽维尔最亲爱的人一模一样：虚弱，红发，淡淡的雀斑……

“可是我很丑。”红头发姑娘声明。

“不！我爱你的雀斑和火红的头发！我爱这一切，因为它是我的家，是我从前的梦！”

姑娘又吻他，他继续说下去。“请想象一下，整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泽维尔喜欢穿过煤烟熏黑的市郊街道漫步。他常常打一个底楼窗户经过。他总是停留在窗前，幻想着那里也许住着一个漂亮的姑娘。一天，窗户里的灯亮了，他看见了一个温柔娇弱的红头发姑娘。他情不自禁了。他推开窗户，跳进了房间。”

“可你却从我的窗户边跑掉了！”姑娘笑起来。

“是的，不错，”雅罗米尔回答，“我跑掉了，因为我害怕我在从现实跨进幻想。你知道吗，当你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曾在梦中见过的情境时，会是什么感觉？你会惊恐得想拔腿就跑！”

“可不。”红头发姑娘愉快地赞同。

“就这样，在故事里，泽维尔从窗户跳进去追求姑娘，但这时她丈夫回来了，泽维尔把他锁在了一个沉重的橡木衣柜里。那位丈夫直到今天还在那里，成了一具骷髅。泽维尔把他的恋人带走去了远方，就象我将把你带走一样！”

“你就是我的泽维尔。”红头发姑娘感激地在雅罗米尔耳边悄声说。她顽皮地用泽维和

泽维克的呢称称呼他。然后紧紧地拥抱他，吻了他很久，直到深夜。

雅罗米尔到红头发姑娘的住处去过许多次，我们想回忆其中的一次，那次姑娘穿着一件前面有一排白色大钮扣的衣服。雅罗米尔试图把这些钮扣解开；姑娘大笑起来，因为它们不过是用来作装饰的。

“等一等，我自己来脱，”她说，然后伸手去拉脖子后面的拉链。

雅罗米尔为自己的笨拙而感到窘迫，当他终于弄清楚衣服的原理时，他急欲想弥补自己的失态。

“不，不，我自己来脱。别管我：”她一边笑着，一边从他身边往后退。

他如果再要坚持就显得可笑了，但他却被姑娘的行动搞得心烦意乱。他相信，一个男人应该为他的情妇宽衣解带——否则这整个动作就与普通的、日常的穿衣脱衣毫无区别了。这个观点不是基于经验，而是基于文学，以及文学中引起联想的句子：他是一个给女人脱衣服的行家；或者，他用熟练的手指解开她罩衫的钮扣。他不能想象性交之前会没有一阵迫不及待的、兴奋慌张的解钮扣，解拉链和解钩子。

“干嘛要自己脱衣服？你又不是在看病！”姑娘已经匆匆脱掉了衣服，只穿着内衣裤。

“看病？你是什么意思？”

“是的，我觉得整桩事就是这样的。象一个医生在检查病人。”

“我明白了！”姑娘笑起来。“也许你是对的。”

她解下胸罩，站在雅罗米尔面前，挺着她的小乳房。“我有点疼，医生，就在我的心脏下面。”

雅罗米尔似乎没有懂这个玩笑。“请原谅，”她抱歉地说，“你也许习惯让你的病人躺下检查。”然后她伸直身子躺在沙发上。“请仔细瞧瞧我的心脏。”

雅罗米尔别无选择，只好照办。他俯在姑娘的胸脯上面，把耳朵放在她的心脏上。他的耳垂贴着她胸部的柔软垫子，从她躯体的深处，他听见了有节奏的怦怦声。他突然想到，当一个医生在神秘、紧闭的诊室门后检查红头发姑娘的身子时，他感到的也正是这个声音。他抬起头，瞥了一眼赤裸的姑娘，感觉到一阵强烈、痛苦的忌妒。他在用一个陌生男人的眼光，一个医生的眼光看她。他匆匆把双手放在她的乳房上（这决不是医生的方式），以便结束这场令人痛苦的游戏。

“医生，你真调皮！你在干什么？那可不是检查的部位！”姑娘抗议道。

雅罗米尔怒火填膺。他看到女友脸上的神情，就和一个陌生人的手抚摸她时会出现的那样。看见她轻浮的抗议，他真想打她。但同时他意识到他已变很多么兴奋，于是扯掉姑娘的衬裤，进入了她的身体里。

他是那样兴奋，妒火很快地熄灭了，尤其，是当他听到姑娘的呻吟和叹息（这个绝妙的效忠），以及“泽维！泽维克！”的爱抚之词，这些词已经成为他俩亲密仪式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

然后，他平静地躺在她旁边，轻轻地吻着她的肩膀，感到非常愉快。但是，从不满足于一个美好的片刻乃是雅罗米尔的不聪明之处。对他来说，美好片刻只有作为美好永恒的象征才是有意义的。从一个玷污了的永恒中掉下来的美好片刻是骗人的谎言。因此他想确信他俩的永恒是完全纯洁无理的。他用恳求多于寻衅的口气问，“告诉我，这只是一个愚蠢的玩笑，那桩与医生的事。”

“是的，当然，”姑娘回答。对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能说什么呢？然而这并没有使雅罗米尔满意，他继续说：“如果别人抚摸你，我是不能忍受的。我实在不能忍受！”他把手拳成杯状放在姑娘发育不全的、可怜的乳房上，仿佛他未来的幸福就全在它们的不受侵犯了。

姑娘笑起来（十分天真地）。“但是，如果我生病了该怎么办呢？”

雅罗米尔意识到他不可能排除一切医疗检查，他的阵地是守不住的。但他也知道，如果

一个陌生人的手打算触摸姑娘的乳房，他的整个世界就将坍成碎片。他重复说。

“我不能忍受！你明白吗？我实在不能忍受！”

“那么当我需要医生时，你要我怎么办呢？”

他用平静而带责备的口气说，“你可以找一个女医生。”

“我有什么选择？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她忿忿地叫起来。“我们全都被指定给某一个医生，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你知道社会主义的医疗是怎么回事。他们命令你，你就得照办。比如，妇科检查……”

雅罗米尔心头一沉，但他镇静地说，“喔，你有什么毛病？”

“噢，没有，只是为了预防。为了防治癌症。这是法律。”

“闭嘴，我不想听这个！”雅罗米尔说，把手搁在她的嘴上。这个动作是那样猛烈粗鲁，他担心姑娘会误以为是一个耳光，生起气来；但她的眼睛非常谦卑地望着他，以致他觉得没有必要为他无意的粗鲁动作道歉。事实上，他开始欣赏这个动作，于是继续把手搁在姑娘的嘴上。

“我告诉你，”他说，“如果别人用手指摸你一下，我将永远不再摸你。”

他仍然把手掌按在姑娘的嘴唇上。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女人的肉体使用暴力，他觉得这令人陶醉；他用双手箍住她的脖子，仿佛要把她掐死。他感觉到她的喉咙在他的手指下已变得虚弱，他突然想到，只要把两个拇指往下压，他就可以轻易地扼死她。

“要是别人触摸你，我就要把你扼死。”他说，继续扼她的喉咙；一想到姑娘的生死掌握在他手中，他就感到高兴。他觉得到至少在此刻，姑娘是完全属于她的，这使他充满了一种令人愉快的权力感，这种感觉是那样销魂，他又一次进入了她的身子。

在作爱过程中，他几次狂暴地压她，把手搁在她的喉头上（在性交中扼死情人，那该多么令人兴奋!)，并咬了她几次。

然后，他们紧挨着躺下休息，但这次性交持续得并不太长，也于是是因为它没能平息雅罗米尔的愤怒；姑娘躺在他身旁，没有被扼死，仍然活着，她的裸体使雅罗米尔想到了医生的手和妇科检查。

“别生气，”她说，抚摸着他的手。

“我没有法子。一个被许多陌生人摸过的身子使我恶心。”

姑娘终于明白了他是当真的。她哀求道，“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只是在开玩笑！”

“这决不是玩笑。这是事实。”

“不，不是事实。”

“别说了！这是事实，我知道我对这也无能为力。妇科检查是强迫性的，你不得不去。我不责备你。但是，被别人摸过的身子使我恶心。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的。”

“我发誓，这全是我编造的！我从小就没生过病。我从不看病。我的确收到过一张妇科检查的通知，但我把它扔掉了。我从没去过那里。”

“我不相信你的话。”

她极力向他保证。

“那好吧。但假如他们又叫你去呢？”

“别担心，他们太缺乏组织，不会注意到我没去。”

他相信了她的话，但他的痛苦不会被理智所平息。毕竟，他的痛苦并不是真正由医疗检查引起的。她在迷惑他，她并不完全属于他，这个感觉使他非常痛苦。

“我爱你，”她反复说。但这个短暂的片刻不能使他满足。他想要占有永恒，至少占有这姑娘生活中的永恒。而他没有占有它。甚至她从处女跨入妇人的那一小段生活都是属于别人的。

“我无法忍受别人将会抚摸你。而且有人已经抚摸过你。”

“没有人将会抚摸我。”

“但有人已经进入过你的身子。真叫人恶心。”

她搂抱他。

他把她推开。

“多少个？”

“一个”

“你在说谎！”

“我发誓！”

“你爱他吗？”

她摇了摇头。

“你怎么能同一个你不爱的人睡觉？”

“别再折磨我！”她说。

“回答我！你怎么能干这种事？”

“别再折磨我！我不爱他，那真可怕。”

“可怕什么？”

“别问。”

“有什么可隐瞒的？”

她突然流出眼泪，向他坦白，那人是她村里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他令人厌恶，他曾摆布她（“不要问我，你不会想了解这件事！”），现在她已竭力忘掉了他的一切（“如果你爱我，永远不要使我再想起那个男人”）。

她哭得那样可怜，雅罗米尔的愤怒终于平息了。眼泪是最好的溶剂。

他抚摸她的面颊。“别哭了！”

“你是我亲爱的泽维，”她吸泣着说。“你从窗户进来，把那个坏男人锁在一个柜子里，他将变成一具骷髅，你将把我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他们拥抱，接吻。姑娘发誓，她决不能忍受别人的手放在她身上，他发誓，他爱她。他们再一次作爱，这次他们互相爱得很温存，他们的肉体充满了温柔的灵魂。

“你是我的泽维。”作爱后她不停地说，抚摸着他的头发。

“是的，我要带你去很远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感到安全的。”他说，他确切地知道这个地方，他有一个楼阁在等待着她，在安宁的天空下，头顶的鸟儿飞向光明的未来，芬芳四溢的小船滑过天空朝马赛驶去；他有一个安息所在等待着她，他童年的保护神守护在那里。

“你知道吗？我要把你介绍给我母亲。”他说，他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居住在别墅底楼那家人的母亲显露出日益膨胀的肚子，她快要生第三个孩子了。一天，那家人的父亲拦住玛曼对她说，如果两个人占的空间与五个人占的空间一样，这是完全不公平的；他建议她让出二楼三间房子中的一间。玛曼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位房客说，他打算把这件事转交有关当局，他们会决定别墅的住房是不是分配得很公平。玛曼反对说，她的儿子快要结婚了，二楼很快就会有三个人，也许甚至四个人。

因此，当雅罗米尔几天后告诉她，他想把他的女友介绍给她时，玛曼没有表示不高兴。至少那位房客会相信，当她说儿子快结婚时，她是诚实的。

然而，当雅罗米尔向玛曼承认，她已经认识这位姑娘，她就是玛曼常去买东西的那个商店里的红头发女售货员时，玛曼掩饰不住一脸的惊讶和不快。

“我相信你不会介意她只是一个售货员，”雅罗米尔好斗地说。“我以前告诉过你，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

好一会儿，玛曼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商店里那个笨拙。粗暴，毫无吸引力的姑娘竟然是他儿子生活中最亲爱的人，但她终于极力克制了自己。“如果我显得很吃惊，请原谅我。”

她说。她决心忍受儿子为她准备的一切。

一个令人痛苦的三小时访问按时到来和结束了。每个人都很紧张，但都竭力经受住了这场痛苦的考验。

“你觉得她怎么样？”红头发姑娘一离开，雅罗米尔就急迫地问他母亲。

“噢，是的，她看来很不错。我干嘛不应该喜欢她呢？”她回答，非常清楚她的语气同她的话语不一致。

“你是说你不喜欢她？”

“我刚对你说过我喜欢她。”

“不，从你讲话的样子我能辨别出，你没有对我说实话。”

在红头发姑娘的来访过程中，她做了几件蠢事（她首先把手伸向玛曼，她首先坐下来，首先呷了一口咖啡），她还有许多失礼行为（当玛曼说话时，她不断地插嘴），说了许多不得体的话（她问玛曼有多大年纪），玛曼正在列举这些缺点时，她突然意识到，雅罗米尔也许会觉得她心胸狭窄（他认为过分注意举止优雅是资产阶级琐碎不器的标志），于是她很快补充说：“不要误会，我并没有认为那些事很可怕。继续邀请她到家里来吧。接触一下我们这样的环境对她会有好处的。”

但是，一想到她也许不得不经常面对那个红头发的、不漂亮的、怀着敌意的躯体，玛曼心里就再次产生出一阵厌恶感。她用安慰的口气说，“毕竟，你不能对她求全责备。你得想象一下她成长的那种环境，考虑她现在工作的那个地方。在那样一个地方，你不得不忍受一切，不得不取悦于每个人。如果老板想开开心，要拒绝他是很难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小小的调戏是不会太当真的。”

她望着雅罗米尔的脸，看见它发红了。他一阵妒火中烧，玛曼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个妒火。（为什么不呢？当雅罗米尔第一次把这位姑娘介绍给她时，她也同样感到妒火中烧，因此他俩就象两个连在一起的管子，里面流着同样的苛性汁液。）雅罗米尔的脸又变得率真、顺从。玛曼面对的不再是一个陌生、独立的男人，而是她亲爱的孩子，一个痛苦的孩子，一个过去常跑到她身边寻求安慰的孩子。玛曼舍不得离开这个美好的情景。

雅罗米尔离开了房间，一阵孤寂后，玛曼察觉自己在用拳头打自己的头。她不断地悄声自语，“克制它，克制它，克制这种愚蠢的忌妒，克制它！”

尽管如此，损害还是已经造成了。他们华丽的楼阁，他们由童年保护神守护的和谐住处，已经被撕成了碎片。在母亲和儿子眼前展现了一个忌妒的时期。

母亲关于调戏不会当真的话一直索绕在他脑际。他想象红头发姑娘商店里的伙计们开着下流的玩笑；他想象当妙语将要说出时，叙述者和听者之间的接触达到了淫猥的顶点；他痛苦万分。他想象老板从她身边擦过，偷偷地摸一下她的乳房，或拍一下她的屁股，他狂怒不已。这样的动作居然不必当真，对他来说，这些动作就意味着一切。一次，他去看望她，注意到她忘记了随手关浴室门。他对此大发脾气，因为他顿时就想象出这样的场面：姑娘在她的工作地点同样粗心大意，当她正坐在马桶上时，一个陌生男人无意中闯进来，使她吃了一惊。

当他把这些忌妒的想象讲给姑娘听时，她能够用温柔和保证使他平静下来。但一当他发现自己独自待在房间里时，那些折磨人的想法就又产生了。他不能担保姑娘对他讲的都是实话。毕竟，不正是他自己引诱她说谎话的吗？不正是他对一次普通医疗检查的念头如此狂怒，以致吓得她永远不敢再对他讲心里话了吗？

早期的幸福时光一去不复返了，那时作爱是快乐无比的。为了她如此轻易和无误地把他带出童贞的迷宫，他对她充满感激之情。但是，正是过去感激的原因如今受到了他焦虑的分析。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她那手的淫荡的触摸，第一次同她在一起时，那手曾是那样极度地使他兴奋。现在他用怀疑的眼光细细地检查它；他对自己说，她以前从没有象那样去抚摸别

人，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在认识他半小时之内，她就敢对他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采取这种下流的动作，那么这种动作对她来说肯定是一种机械的，习以为常的事了。

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的确，他已经接受了这个想法，即他不是她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但他之所以接受这个想法，仅仅是因为姑娘的话使人联想到某种痛苦难堪的事，在其中她只是一个被虐待的受害者。这唤起了他心中的怜悯，怜悯多少消融了他的忌妒。但是，如果姑娘在同那个男人的关系中学会了如此淫猥的动作，那这种关系决不可能完全是单方面的。毕竟，那个动作太叫人快乐了。它包含了整整一小段欢乐的性爱史！

这是一个太令人痛苦的题目，使人不愿谈及。一听到她情人的名字，他就会产生极大的苦恼。然而，他还是试图用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追查出使他痛苦的那个动作的由来（他继续在用他的身躯体验那个动作，因为姑娘似乎对那种独特的抚摸非常喜爱），最后，他用这种想法来宽慰自己，一个伟大的爱情突然暴发就象一道闪电，一下子使这个女人摆脱了所有的羞耻和禁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正是因为她天真无邪，她象一个妓女一样，欣然把自己献给她的情人；不仅于此；爱情突然开启了她那如此珍贵的灵感，以致她本能的嬉戏就象一个无耻荡妇的熟练花样。在眼花缭乱的一瞬间，爱情的守护神展示了一切知识和技巧。雅罗米尔觉得这个想法美好而深奥。由此看来，他的女友仿佛就是一个爱情的守护神。

有一天，一位同学用嘲讽的口气说，“告诉我，昨夜我看见与你在一起的那位绝代佳人是谁？”

他象彼得[2]否认耶稣基督一样马上否认了她。他说，她只是偶然遇见的一位熟人。他摇着手表示否认。但是，象彼得一样，他内心深处仍然保持着忠实。他的确减少了他俩一起在热闹街头的散步，当没有他认识的人看到他俩在一起时，他感到如释重负，但他并不赞同他的同学，并对他产生了反感。他被红头发姑娘仅有的几件寒酸衣服感动了。他把她衣服的朴素看成是她魅力的一部分（质朴、贫穷的魅力）；也是他自己爱情魅力的一部分，他告诉自己，要爱上一个老练，漂亮、穿着华丽的人并不太难：这种爱是受到偶然的美的机械刺激后一种毫无意思的反应。但是，一个伟大的爱情却寻求从一个不完美的造物中创造出一个可爱的人，这个造物由于她的不完美而更具有人性。

----

[2]彼得。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耶稣被捕时，有人指认他是耶稣同伙，他矢口否认。事见《约翰·马可福音》十四章一天，他正在表白他对她的爱时（无疑，是在激烈地吵过嘴之后），她 说：“我真不知道你看上了我哪一点？周围有那么多更漂亮的姑娘。”

他相当兴奋地解释说，美貌与爱情毫无关系。他声称他爱的正是她身上那些别人也许认为丑的东西。他被热情冲昏了头，甚至开始详细列举。他说，她的乳房很小，发育不全，她有大而多皱的乳头，这只会引起怜悯而不是热情。他告诉她，她的脸上生有雀斑，她的头发是红的，她的身材很瘦，这些都正是他爱她的理由。

红头发姑娘的眼泪夺眶而出，因为她明白这些肉体上的事实（小乳房，红头发）；却没有明白那个抽象的结论。

然而，雅罗米尔完全被他的观点吸引住了。姑娘因自己不漂亮而流下的泪温暖和鼓舞了他。他决心为了擦去这些眼泪，为了把她裹在他的爱情中而献出自己的一生。在感情的迸发中，他甚至设想她过去的情人也是那些使她越发可爱的瑕疵之一。这是一个意志和才智的真正了不起的成就。雅罗米尔也是这样认识的，并着手写了一首诗：说起那个少女总是在我心里，（这行诗作为迭句不断地重复）。他表达了渴望占有她和她所有的瑕疵，她所有的人的完整和永恒，甚至那些玷污了她肉体的旧情人……

雅罗米尔对他的创作充满了热情，因为在他看来，代替了那个光辉和谐的大楼阁，代替了那个人工的场所（在那里一切矛盾都被消除，在那里母亲和儿子和睦地坐在同一张桌子旁），他已经找到了另一座大厦——一座绝对的大厦，一种更严格更真实的绝对。因为假如

不存在绝对的纯洁与安宁，那么还有绝对的感情，在其中一切无关与不纯的东西都被消融了。

他对这首诗非常满意，尽管他知道没有一家报纸愿意登载它，因为它与欢乐的社会主义建设毫不相干。但是，他写这首诗不是为了报纸，他写它是为了自己，为了他的姑娘。当他把它读给她听时，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但所有那些提到她的丑陋，提到撕扯她身子的手，提到老年的地方却又使她再次感到恐惧。

雅罗米尔对她的不安毫不介意。相反，他喜欢和欣赏她的不安。他喜欢她谈论她的疑惧，用冗长的解释和反复保证来平息它们。然而，使他懊恼的是，姑娘并没有分享他对这个题目的喜爱，她很快就把话题引到别处。

雅罗米尔可以原谅姑娘瘦小的乳房（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因为它们的缘故而对她不快），甚至可以宽容那些挤压她身子的陌生人的手，但有件事他觉得不能不考虑：她那没完没了的絮叨。他刚给她读了几行体现他一切思想和信仰精华的诗，他几乎还没有读完，她就已经在愉快地唠叨起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来了。

是的，他愿意用他爱情的镪水溶解她所有的缺点，但是得有一个条件：她必须顺从地把自己放低，进入这个溶解的浴缸，她必须完全把自己浸在这个爱的浴缸里，不准有任何思想偏差，她必须满足于呆在被他的言语和思想淹没的水面之下，她必须完全属于这个世界，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

可她又不停地絮叨起来，谈她的童年，她的家庭，这个话题雅罗米尔觉得特别可惜，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表示他的异议（这是一个完全愚昧无知的家庭，事实上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家庭）。正是由于他们，她不断地跳出他为她准备的浴缸。在这个浴缸里他装满了宽容一切的爱情之水。

他不得不再次听她谈她的父亲（一个来自农村的精疲力尽的老工人），她的兄弟姐妹（这个家庭的人口象兔棚里那样多，雅罗米尔心想：两个妹妹，四个兄弟，她好象特别喜欢其中一位兄弟（他的名字叫简，似乎是一个什么古怪的家伙——在二月革命之前，他一直为一位反共的内阁部长开车子）；不，这不光是一个家庭，这是一个令人厌恶、格格不入的巢穴，它的痕迹仍然深深留在红头发姑娘身上，使她跟他疏远，阻止她完全属于他。那个叫简的兄弟，他不仅是一个兄弟，而首先是一个男人，一个注视她十八年之久的男人，一个了解她许多个人秘密的男人，一个曾与她共用一个浴室的男人（有多少次她一定忘记了关门！），一个在她转变为妇人时期与她生活在一起的男人，一个肯定多次看见过她裸体的男人……

你必须属于我，如果我想要，你就得死在刑架上，病弱、忌妒的济慈[3]给他的范妮写道，雅罗米尔又回到家，回到他童年时代的房间，动笔写一首诗，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想到了死亡，那个使一切静止的伟大拥抱。他想到了那些坚强的人，那些伟大的革命者的死亡，他情不自禁地想写一首出色的挽歌，在共产主义英雄们的葬礼上，这首挽歌将被人们吟唱。

----

[3]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死亡。在那强迫性欢乐的时期，死亡也属于被禁的题目。但是，雅罗米尔确信能发现一个特殊的观点，可以使死亡从它通常的阴郁氛围中摆脱出来（毕竟，他以前写过一些有关死亡的优美诗句；他自己觉得，他是写死亡之美的行家）。他觉得他有能力写社会主义的死亡诗。

他在冥想一位伟大革命者的死：象太阳告别了 / 高山之巅，……

于是他开始写一首题目叫《墓志铭》的诗：我必须死吗？那就让我死于烈火吧……

在抒情诗的领域中，任何表达都会立刻成为真理。昨天诗人说，生活是一条泪谷；今天他说，生活是一块乐土；两次他都是正确的。这并不自相矛盾。抒情诗人不必证明什么。唯一证明的是他自己情绪的强度。

抒情诗的特征就是缺乏经验的特征。诗人不谙世情，但他把从生命里流出来的词语安排

成象水晶一样匀称的结构。诗人自己不成熟，可他的诗具有一个预言的定局，在它面前，他肃然敬立。

呀，我水中的爱人。当玛曼读到雅罗米尔的第一首诗时，她突然想到（怀着一种类似羞耻的感情，雅罗米尔对爱情比她了解得更多。她一点也不知道他在玛格达洗澡时曾企图窥视她。在玛曼看来，“水中的爱人”这句话已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含义，表明了某种神秘的爱情范畴，某种象女巫的宣告一样难以捉摸的东西。

我们可以嘲笑诗人的缺乏成熟，但他身上也有某种令人惊异的东西：他的词语闪烁着发自那内心的露珠，赋予他的诗以美的光泽。这些神奇的露珠不需要真实生活事件的激发。相反，我们猜想，诗人有时象家庭主妇把柠檬挤在色拉上那样超然地挤榨他的心。实际上，雅罗米尔对马赛的码头工人并不是非常关心；但在描写他对他们所怀有的爱时，他的确被他们的境况所感动，慷慨地把他的心倾注在词语上，使它们呈现出活生生的现实。

抒情诗人凭借他的诗创作出他的自画像。但没有任何肖像是完全精确的，诗人给他的真实面貌润色。

润色？是的，他使肖像更富有表情，因为他对自己的外貌呆板感到苦恼。他渴望着他自己的一种形象，希望他的诗会赋予他的外貌一个坚定的轮廓。

他试图使他的肖像引人注目，因为他的真实生活平淡无奇。他诗歌中描绘的那张脸庞常常带有一种热烈。凶狠的表情，弥补了诗人生活中所缺少的有声有色的活动。

但是，如果诗人的自画像要问世，他的诗必须先得到发表。报纸上已登载过雅罗米尔的几首作品，但他还是不满意。在附有稿子的信里，他用热烈、亲密的语气跟那位不知名的编辑交谈，想诱使他给他回信，邀请他会面。然而（这简直很丢脸），甚至雅罗米尔的诗歌得到发表后，也没有任何人象是有兴趣见他本人，或者把他看作一个搞文学的同行跟他打交道：那个编辑从来没有回复。

同学们中对他诗歌的反应也很使他失望。也许，假如他属于当代的杰出诗人——他们的声音由扩音器传播，他们的照片在有插图的周报上闪耀——也许这样他才可以在大学的同学们中间引起一些兴趣。但是，在报纸末版上发表的几首诗几乎没有引起一点轰动。在那些渴望着辉煌的外交或政治生涯的同学们看来，雅罗米尔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不感兴趣的古怪的人，而不是一个古怪得令人感兴趣的人。

在这期间，雅罗米尔是那样热烈地渴求荣誉！他象所有诗人那样渴望着它。啊荣誉，你巨大的神威，愿你伟大的名字鼓舞我，愿我的诗歌征服你，维克多·雨果祈祷。我是一名诗人，我是一名伟大的诗人，总有一天我将受到全世界的爱戴；重要的是，反复提醒自己这一点，祈祷我未完成的不朽之作，伊希·奥登自我安慰。

对赞美的过分渴望不会给诗人的才能抹黑（数学家或建筑师也许会如此）；相反，它正是抒情气质的精髓部分，它实际上给抒情诗人下了定义：凡是把自己的自画像展示给世界，希望由于他的诗而突出在画面上的那些脸会受到爱戴和崇拜的人，就是诗人。

我的心灵是一朵奇葩，散发出奇妙而能嗅到的芳香。我富有才能，甚至也许是天才。伊希·沃尔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雅罗米尔对不负责任的报纸编辑很反感，他挑选了几首诗，把它们寄给一家很有声望的文学杂志。多么幸福啊！两周后他收到一封短笺，信中说他的诗被认为很有前途，并邀请他拜访编辑室他为这次访问做了细致的准备，就象当初他为了与一个女孩约会反复练习一样。他决心要以最深刻的语言感向编辑们“引见”自己。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说明他的身份。作为一名诗人和男人他是谁，他的梦想，他的出身，他的爱，他的恨是什么？他拿起纸笔，把他的一些看法，观点，发展阶段写下来。于是，一天，他敲开了那个门，走了进去。

一位戴眼镜的瘦小男人坐在桌子后面，问他有何贵干。雅罗米尔作了自我介绍。这位编辑再次问他有什么事。雅罗米尔更加大声，清楚地重复了他的名字。编辑说认识雅罗米尔很

高兴，但他还是不明白他究竟有什么事。雅罗米尔解释说，他给杂志寄了一些诗歌，他被邀请来作一次访问。编辑说，诗歌是由他的一位同事在处理，他这会儿出去了。雅罗米尔回答，这太遗憾了，因为他很想知道，他的诗排定在什么时候发表。

这位编辑不耐烦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拉着雅罗米尔的胳膊，把他领到一个大橱柜前，他打开橱柜，让雅罗米尔看堆满了架子的一堆堆稿子。“我亲爱的同志”。他说，“我们平均每天要收到十二个新作者的诗。加起来一年有多少？”

“我不知道。”当编辑敦促雅罗米尔猜一猜时，他窘迫地咕哝道。

“每年共有四千三百八十个新诗人。你想出国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雅罗米尔说。

“那就坚持写下去。”编辑说，“我肯定我们迟早会开始输出诗人。其它国家输出技工，工程师或者小麦，煤炭，但我们最有价值的出口是诗人。捷克诗人可以给予发展中国家宝贵的支援。作为我们诗人的回报，我们将得到电器设备或者香蕉。”

几天后，雅罗米尔的母亲告诉他，看门人的儿子曾在家里一直等他。“他说，你应该去警察总局看他。他要我告诉你，他祝贺你的诗歌。”

雅罗米尔兴奋得涨红了脸。“他真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他离开时一再强调说，‘告诉他，我祝贺他的诗歌。别忘了。”’

“我很高兴。是的。我真的很高兴，”雅罗米尔特别强调说，“你知道，我的确是为了象他这样的人写诗的。我不是为了某一个势利的文人写诗。毕竟，一个木匠做椅子不是为了其他木匠，而是为了人民。”

于是，下周的一天，他踏进了国家安全局的大楼，向接待室的武装警卫通报了自己，等了一会儿，最后他与从楼梯上冲下来，热情迎接他的老同学握着手。他们走进他的办公室，看门人的儿子重复说，“听着，我一点没想到我还有这样一个有名的同学！我自言自语：是他不是他，是他，最后我对自己说，肯定是他，不可能是巧合，没有象这样的一个名字！”

然后他把雅罗米尔领到大厅，指给他看一个大布告栏，上面有几张照片（警察训练狗，训练武器，训练跳伞）和几份印刷通告。在所有这些中间是雅罗米尔一首诗的剪辑，用红墨水勾出花边，它在整个布告栏中占了重要位置。

“怎么样？”看门人的儿子问。雅罗米尔没说什么，但心里很高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一首诗独立存在。

看门人的儿子拉着他的手，领他回到办公室。“我敢说你不会想到，我们这种人也读诗。”他笑道。

“为什么不会？”雅罗米尔说，想到他的诗不是受到老处女们的赞扬，而是受到屁股上挎着左轮枪的男人们的欣赏，这给了他非常深的印象。“为什么不会？今天的警官与资产阶级时期穿着警察服的凶手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你也许在认为，警察的工作与诗歌不相容，可是你错了。”看门人的儿子沉思地说。

雅罗米尔详尽地阐述了这个思想。“说到底，今天的诗人也不同于过去的类型。他们不是被宠坏了的、狂妄的奶油小生。”

看门人的儿子接着说，“我们这一行是很无情的——让我告诉你，我的朋友，它会有多么无情——但偶尔我们也欣赏一下精美的东西。否则，有时人们对他在一天工作中不得不忍受的事也几乎忍受不了。”

然后（他的值班刚结束）他邀请雅罗米尔到街对面去喝几杯啤酒。

“相信我，安全工作决不是轻松的事，”他们在酒馆坐下来后，看门人的儿子继续说。他从啤酒杯里饮了一大口。“还记得我上次说过的那个犹太人吗？哎，他原来是一个十足的下流坯，我告诉你吧。好在我们已经把他严密地关押起来了。”

当然，雅罗米尔一点也不知道，那位领导马克思主义青年小组的黑头发男人已经被捕。

他虽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正在搜捕人，但他确实不知道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捕，甚至还包括许多共产党员；许多人备受折磨，他们的罪行多半是虚构的。所以，对于朋友的通报，他的反应仅仅是吃惊，既没有表示赞许也没有表示遣责。然而，他还是流露出一丝同情，看门人的儿子觉得有必要坚定地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决没有多愁善感的余地。”

雅罗米尔担心他的朋友又在迷惑他，再次走在前面几步。“我为他感到难过，请不要对此惊讶。我没有办法。但你是对的，多愁善感会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

“非常大。”看门人的儿子补充说。

“我们谁都不想要残酷。”雅罗米尔坚持说。

“说得对。”

“但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对那些残酷的人残酷，我们就会犯最大的残酷。”雅罗米尔说。

“非常对。”看门人的儿子赞同。

“对自由的敌人没有自由可言。我知道，这是残酷的，但不得不这样。”

“非常对，”看门人的儿子重申，“我可以告诉你许多这方面的事，但我的嘴是打了封条的。这是我的职责。听着，我的朋友，有些事我甚至不能告诉我的妻子。连我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干的一些事。”

“我明白，”雅罗米尔说，他又一次忌妒起他同学那适合于男人的职业，他的秘密，他的妻子，甚至他对她保守秘密，她还不能反对的这个想法。他忌妒朋友真正的生活，带有粗暴的美（或美的粗暴），不断地超越雅罗米尔的生存（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黑头发男人，他只知道不得不这样做）。面对着一个同龄的朋友，他再次痛苦地意识到，他还没有深入真正的生活。

当雅罗米尔陷入在这些忌妒的沉思默想中时，看门人的儿子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同时咧嘴傻笑），开始背诵贴在布告栏上的那首诗。他把整首诗记得很熟，没有遗漏一个字。雅罗米尔一时不知作何反应（朋友的眼睛一直紧盯着他）。他的脸红了（意识到朋友背诵得非常天真幼稚），但他幸福的自豪感远远胜过了他的窘迫——看门人的儿子喜欢他的诗，并把它背下来了！因此他的诗就象他的使者和前卫，已经独立不羁地进入了男人的世界！

看门人的儿子用单调低沉的语调背完了这首诗。然后他说，这一年他一直都在希拉格郊区别墅的一所专门学校学习，学校偶尔也邀请一些有趣的人来给警察学生讲话。“我们正打算在某个星期天邀请一些诗人来参加一次专门的诗歌晚会。”

他们又要了一次啤酒，雅罗米尔说，“这个主意真妙，让警察来安排一次诗歌晚会。”

“警察为什么不可以？这有什么不好？”

“完全没有，”雅罗米尔回答，“恰恰相反，警察和诗歌，诗歌和警察。也许这两者比人们想象得还要更加紧密。”

“肯定，为什么不？”看门人的儿子说，并表示他很乐意看到雅罗米尔也在被邀请的诗人中间。

雅罗米尔开始有点踌躇，但最后还是愉快地同意了。如果文学不愿向他伸出虚弱、苍白的手，现在生活本身的结实、粗糙的手却紧紧握住了他。

让我们把雅罗米尔的画像再留在我们面前一会儿。他正坐在看门人儿子的桌子对面，手中拿着一杯啤酒。在他身后，遥远的地方，是他童年时代封闭的世界；在他面前，以过去一位同学为化身，是行动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既害怕这个世界，又拼命想进入这个世界。

这是不成熟的基本境遇。抒情态度是对付这种境遇的一种方法：从童年时代的安全围墙中被放逐的人渴望踏进世界，但是因为他害怕它，他就构筑了一个人工的、替代的诗歌世界。让他的诗绕着他运行，象行星绕着太阳一样。他成为一个小小宇宙的中心，在那里没有不相容的东西，在那里他感到象在母腹里的婴儿一样自由自在，因为一切都是由他自己心灵里的

熟悉材料建构出来的。这里，他可以获得在“外面”很难获得的一切。伊希·沃尔克，一位羞怯的青年学生，可以带领革命群众走向街垒；这里，用残酷的诗，纯洁的阿瑟·兰波代别人鞭打他的“小情妇"。但是，那些革命群众和那些情妇并不是由一个敌意的、不相容的外部世界的材料建构出来的，而是诗人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他自己梦幻的材料，不会扰乱他为自己构造的宇宙的统一。

伊希·奥登写过一首美丽的诗，描述一个孩子在母亲的身躯里感到很幸福，他把出世看成是一个可伯的死亡，一个充满光线和可怖面孔的死亡。这个婴儿拼命想要回去，回到母腹里，回到芳香的黑夜。

不成熟的人总是渴望着他在母腹里独占的那个世界的安全与统一。他也总是对相对的成人世界怀着焦虑（或愤怒），在这个不相容的世界里他犹如沧海之一粟。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都是这样热烈的一元论者，绝对的使者；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要建造他个人的诗歌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革命者（他们的愤怒胜过焦虑）要坚持从一个单一的观念里锻造出一个绝对的新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能容忍妥协折中，无论是在爱情上还是在政治上，反抗的学生面对历史激烈地叫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二十岁的维克多·雨果看到他的未婚妻阿黛尔·富歇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把裙边拉得很高，露出了踝部，他便勃然大怒。在我看来，庄重比裙子更为重要，他在一封信中申斥她，又补充说，请重视我的话，否则谁第一个胆敢看你，我就要打这个无礼蠢货的耳光！

成人世界听到这个庄严的威胁，哈哈大笑起来。情人踝部的暴露和人们的笑声深深地伤害了诗人。诗人和世界之间戏剧般的斗争开始了。

成人世界清楚地知道，“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没有任何人是伟大的，或者是永恒的，姐姐同兄弟睡在一个房间是完全正常的。然而，雅罗米尔却感到痛苦！他的红头发姑娘宣布说，她的兄弟要来布拉格，打算跟她一起待一个星期；她要求雅罗米尔这期间不要去她的住所。他忍无可忍，非常生气；不可能仅仅因为“某个人”要到城里来，就期望他把他的女友放弃整整一个星期。

“你不公平！”红头发姑娘反驳说，“我比你小，可是我有自己的住处，我们总是在那里见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到你家里去？”

雅罗米尔知道姑娘是对的，因此他的愤怒不断上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他那缺乏独立的耻辱处境，愤怒使他不顾一切，当天他就对母亲宣布（用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他打算邀请年轻女友到家里，因为这里是他们可以单独相处的唯一地方。

他们彼此多么相似，母亲和儿子！对统一与和谐的一元论时期的怀旧使他们同样着迷。他想重新回到她那母性深处的芳香的黑夜，而她想要永远充当那个芳香的黑夜。当她的儿子逐渐长大，玛曼竭力想象空气一样把他包围起来。她接受了他的一切观点：她成了一个现代艺术的信徒，她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相信她儿子的荣誉，指责那些随波逐流的教授的虚伪。她仍然希望象天空一样把儿子包围起来，仍然希望做儿子所做的事。

那么，她怎么能忍受一个陌生女人不相干的躯体侵入到这个和谐的统一里？

雅罗米尔从她脸上看到了反对，这使他更加顽强。是的，他想寻求芳香的黑夜，他正在寻找旧日的母性世界，但是他已不再在他母亲身上寻找。相反，在寻求他失去的母亲的过程中，他的母亲成了最大的障碍。

她看出儿子的决心，于是她屈服了。一天晚上，红头发姑娘第一次发现她已经在雅罗米尔的房间里；如果他俩不是那样紧张，这本来会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刻；玛曼看电影去了。可她的灵魂似乎仍然徘徊在他们的头上，在注视，在倾听。他们的谈话声比平常低得多。当雅罗米尔搂抱姑娘时，他感到她的身躯冰冷，意识到最好是到此为止。因此，他们没有象预料的那样快乐，整个晚上都在心不在焉地谈话，不断地望着那个通报玛曼就要回来的钟摆，从雅罗米尔的房间出来后必须通过玛曼的房间，红头发姑娘强烈地表示不愿见到她。因此在玛

曼回来之前半小时她就赶紧走掉了，听任雅罗米尔处在很坏的情绪中。

然而，这次经历非但没有使他泄气，相反却只是使他更加坚定。他得出结论，他在家中的地位是不堪忍受的；这不是他的家，这是他母亲的家，他仅仅是一个房客而已。他被激得故意采取倔强的态度。他再次邀请红头发姑娘，用勉强的诙谐来迎接她，试图以此消除第一次曾压在他们身上的紧张不安。他甚至还在桌子上放了一瓶酒，由于他俩谁都不习惯喝酒，他们很快就喝得醉熏熏，完全可以忽视玛曼无所不在的身影了。

那一个星期，按照雅罗米尔的希望，玛曼总是很晚才回家。事实上，她超出了他的愿望，甚至在白天也出去，而他并没有要求她这样。这既非好意，也非让步，只是一个抗议示威。她的流放是为了向雅罗米尔表明他的残忍，她的晚归是为了对他说：你表现得仿佛你是这里的主人，你对待我象对待一位女仆，当我干完了一天的苦活，我甚至不能坐下来歇口气。

遗憾的是，当她在外面的时候，她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漫长的下午和晚上。那位曾经对她感兴趣的同事已经厌倦了没有结果的求爱。她试图（很少成功）与一些老朋友重新建立起联系。她到电影院去。带着病态的满足，她品尝着一个失去父母和丈夫，被儿子赶出自己家门的女人的痛苦情感。她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望着远处银幕上两个在接吻的陌生人，眼泪从她脸上慢慢地滚落下来。

一天，她比往常回来的早一点，打算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面孔，不理睬儿子的问候。她刚一走时她房间，几乎还没有关上门，这时热血一下子涌上了脑际。从雅罗米尔的房间，几步开处，她听见了同女人呻吟声混杂在一起的儿子的呼呼气喘的声音。

她木然地站在那里，接着她突然想到，她不能留在这个地方，听着爱的呻唤——这就等于站在他们旁边盯视（此刻在她想象中，她的确看见了他们，清清楚楚），这是无法忍受的。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完全无能时，她气得麻木，越发狂怒，因为她既不能大叫，也不能跺脚，既不能砸坏家俱，也不能闯进去打他们；除了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她什么也不能做。

后来，她头脑里残留的一点神志清醒的感觉与毫无知觉的狂怒混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突然的、疯狂的灵感。当红头发姑娘在隔壁房间再次呻吟起来时，玛曼用一种充满焦虑关心的声音叫道，“雅罗米尔，我的天哪，你的女朋友怎么了。”

呻吟立即停止了，玛曼冲到药柜前，拿出一个小瓶子，跑回到雅罗米尔房间的门口。她往下推门柄；门是锁上的。“我的天啊，不要这样吓我。怎么了？那个姑娘好点了吗？”

雅罗米尔正抱着红头发姑娘的身躯，她在他怀里急得发抖。他咕噜着说，“不，没什么……”

“姑娘的肚子疼吗？”

“是的……”

“开开门，我给她吃点东西就会好一点。”玛曼说，再次推上了锁的门柄。

“等一下。”儿子说，迅速地从姑娘身边站起来。

“这样痛！”玛曼说，“一定很厉害？”

“等一下。”雅罗米尔说，匆匆穿上裤子和衬衫，把一床毯子扔在姑娘身上。

“一定是肚子，你看呢？”玛曼隔着门问。

“是的。”雅罗米尔回答，微微打开门，伸出手去拿腹痛药。

“你不愿让我进来吗？”玛曼说。一种疯狂驱使她走得更远；她没有让自己被推开，而是冲进了房间。她第一眼看到的是挂在椅子上的胸罩，四处散乱的内衣。然后她看见了姑娘。她在毯子下面抖缩，脸色苍白。仿佛真的刚经历了一次腹部绞痛。

现在，玛曼不得不厚着脸皮干下去；她在姑娘身边坐下来。“你发生了什么事？我刚回家就听见这样可怕的声音……可怜的人！”她摇出二十粒药放在一块方糖上。“对这些腹部绞痛我再清楚不过了！吮一下这个，你马上就会好的……”她把这块糖举到姑娘嘴边。姑娘的嘴唇顺从地伸出来接糖，就象它刚才顺从地伸出来接雅罗米尔的吻一样。

玛曼在极度兴奋的愤怒下冲进儿子的房间。现在愤怒已经平息，但兴奋还在：她盯着那张微微开启的小嘴，感到一阵强烈的欲望，想拉开姑娘身上的毯子，看看她的全裸体。破坏由姑娘和雅罗米尔组成的那个小小的充满敌意的世界的统一；抚摸他所抚摸的东西；认领它，占有它；把两个躯体都裹在她那空气般的拥抱中；把自己浸在他们那藏着邪恶的裸体里（她注意到雅罗米尔的短裤撂在地板上）；粗野而无知地来到他们中间，仿佛这全都是一个腹部绞痛的问题；同他们在一起就象从前同雅罗米尔在一起时一样，用她裸着的乳房去喂他；跨过这一暖昧无知的桥梁，进入他们的嬉戏和他们的爱情；象天空一样笼盖着他们的裸体，与他们合为一体……

她的激动使她感到恐惧。她建议姑娘做深呼吸，然后很快地离开了房间。

警察总局大楼前停着一辆关闭的小公共汽车，一群诗人聚集在周围等待司机。其中有两位警察，他们是这次诗歌晚会的组织者之一，雅罗米尔也在这群人中间。他认识几位诗人的面孔（比如，那位白发苍苍的诗人，他曾参加过雅罗米尔学校的一次会议，朗诵过一首关于青春的诗歌）。虽然最近一本文学杂志发表了他的五首诗，使他的羞怯多少有点减轻，但他还是不敢对他们中任何人说话。为了以防万一，他把这本杂志插在外衣的胸部口袋里，这使得他的半边胸脯象男人一样平坦，另外半边却象女人一样具有挑逗性。

驾驶员终于来了，诗人们（共有十一个，包括雅罗米尔）爬进公共汽车。开了一小时后，车子停在令人心旷神怡的乡间，诗人们走出来，两位警官指给他们看一条河，一个花园，一座别墅，领着他们穿过整幢大楼，教室，礼堂（欢乐的晚会很快在这里开始）；他们被迫窥视每间屋有三张床位的一排宿舍，那些修警察课程的人就住在这里（这些人吃了一惊，跳起来立正，就象在官方视察中采用的那种夸张的军人姿态），最后诗人们被带到指挥员的办公室。等待着他们的是一盘三明治，两瓶酒，穿军服的指挥员，而更妙的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姑娘。他们依次与指挥员握手，咕噜着报出他们的名字。指挥员指着那个姑娘。“这位年轻女士负责我们的电影小组。”他开始向十一位诗人解释（与此同时，这些诗人正在依次同那位姑娘握手），人民的公安部队有自己的俱乐部，在那里正在开展丰富的文化生活。他们有一个戏剧小组，一个合唱队，最近在这位年轻女士的指导下又成立了一个电影小组；目前她还是电影学校的学生，她一直很乐意地在为年轻的警察们提供帮助。他们努力给她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一部高档的摄影机，最新的照明设备，最重要的是，热情的小伙子；指挥员开玩笑地说，他不太清楚，这些热情是因为对电影感兴趣，还是对这位年轻漂亮的电影摄制者感兴趣才激发出来的。

同每个人握完手后，这位年轻女士对站在巨大反射器后的几位年轻人点了点头，霎时，诗人们和指挥员便发现他们自己正在聚光灯的强光下嚼着三明治。指挥员试图进行自然、轻松的谈话，但却不断被姑娘对摄制人员的命令打断。灯光变换了几次，终于摄影机开始轻声地嗡嗡起来。拍电影的几分钟欢乐过去之后，指挥员对诗人们的合作表示感谢。他看了看表说，大家已经在急切地等待着他们了。

“诗人同志们，请这边走，”一位组织者说，开始在一张字上念着他们的名字。诗人们按字母顺序排列起来，听他的信号就齐步走向主席台。台上有一张长桌，每一把椅子都标着诗人们的姓名座位卡。当他们坐下来时，拥挤的礼堂响起了一阵掌声。

这是雅罗米尔第一次出现在人群面前。他心花怒放，这种陶醉感整个晚上都没有离开过他。总而言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诗人们在他们指定的座位上坐定后，一位组织者走到安放在长桌一端的小讲台前，向十一位诗人表示欢迎，然后介绍他们。被提到名字的诗人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鞠躬，大厅里爆发出一阵阵的掌声。雅罗米尔也鞠躬，掌声使他不知所措，好一会儿才注意到看门人的儿子正在前排向他挥手。他点头作答，这个小小的动作全场都看见了，这给了他一种愉快的自在的感觉，因此在晚会过程中他朝他的朋友点了好几次头，就象一个在舞台上感到完全自在、惬意的人。

诗人们是按字母顺序坐着的，雅罗米尔发现自己正好在那位银发苍苍的诗人左边。“我亲爱的孩子！多么叫人惊奇！前几天我在杂志上看见了你的诗。”雅罗米尔很有礼貌地微笑，那位诗人继续说，“我决心记住你的名字。它们的确是出色的诗，我真的很喜欢它们。”他还没来得及继续说下去，那位组织者再次走到麦克风前，要求诗人们选一些他们最近的作品来朗诵。

于是，诗人们按照字母顺序一个接一个走到小讲台前，朗诵几首诗，答谢听众的掌声，然后回到坐位上。雅罗米尔不安地等着轮到他；他担心会结巴，他担心他的声音会颤抖，他什么都担心；他站了起来，象一个梦游者朝小讲台走去；他没有时间思考。他开始朗诵，念了几行诗后他的信心便增强了。诗刚一念完就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持续时间比他前面任何一个诗人都长。

这个奖励增强了雅罗米尔的自信心，他更加信心十足地朗诵第二首诗。他一点也没留意到两台巨大的反射器突然亮了，摄影机就在几步远的地方嗡嗡响起来。他假装没有意识到这一活动，顺畅地继续他的朗诵。他甚至还从纸上抬起眼睛，望了望昏暗的大礼堂，而且还望了望摄影机旁边那个特殊的地点，那位年轻漂亮的制片人就站在那里。又是一阵掌声，雅罗米尔又读了两首诗，听见摄影机的嗡嗡声，看到那拉摄制者的面孔，鞠躬，回到他的坐位上。这时，那位白发银丝的诗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将他庄严的头向后倾，张开双臂，紧紧搂住雅罗米尔的背。“我的朋友，你是一名诗人！你是一名诗人！”然后由于掌声还在继续，他转向听众，低下他满是银发的头。

第十一位诗人表演完后，组织者再次走上讲台，向每个诗人致谢，然后宣布休息片刻，休息之后，任何听众只要有兴趣可以回来与诗人们交谈。“这部分节目不是强迫的，是自愿的，只涉及那些感兴趣的人。”

雅罗米尔陶醉了；人们紧握他的手，聚集在他周围；一位诗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并对雅罗米尔还没有出版一本书表示惊异；他请求雅罗米尔送他一本诗选；另一位诗人邀请他参加一个学生组织安排的一次会议。当然，看门人的儿子也紧挨在雅罗米尔身边，向大家说明他俩从童年时代起就是好朋友。指挥员握着雅罗米尔的手说，“看来，今天晚上的佳冠属于最年轻的诗人！”

然后他转向其他诗人，宣布说他很遗憾，他将不能参加讨论会，因为他得去主持隔壁马上就要开始的舞会。他微笑着打趣说，附近村庄的女孩们全都成群结队地涌向舞厅，因为他的警察们是一群很英俊的小伙子。“不要紧，同志们，我敢肯定，这不会是你们最后一次来这里访问。谢谢你们那些美好而鼓舞人心的诗！欢迎你们不久再来看我们！”他同大家握手，然后离开到隔壁大厅去了，从那里已经传来了舞曲声。

几分钟前还回响着震耳欲聋掌声的礼堂，现在却一片寂静，几乎空了。诗人们聚成一个小圈，在讲台前面等待，对他们表演的反响还在激动着他们。一个警官走到麦克风前宣布：“同志们，休息结束，我把发言权还给我们的贵宾。愿意参加讨论的人请坐下来好吗？”

诗人们回到他们的坐位上，在空荡荡的礼堂前排，大约有十个人面对着他们坐了下来。在他们中间有看门人的儿子；那两个在汽车上陪伴诗人们的组织者，一位拄着拐杖，有一条木腿的老人，还有几个模样不引人注意的男人，甚至还有两个女人。一个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也许是办公室的秘书），另一个就是那位电影摄制者，她完成了她的拍摄，此刻正用一双平静的大眼睛看着诗人们。隔壁欢乐的舞曲声越来越响，也越来越诱惑人，但对诗人们来说，这位漂亮女人的在场却更有意义，更令人鼓舞。坐在台上的诗人与坐在礼堂第一排的群众人数大约相等，这两群人谨慎地互相注视，就象双方足球队排列在场上，等待着开球。令人痛苦的沉默持续着，雅罗米尔对他这一队的能力越来越感到不安。

然而，雅罗米尔低估了他的同伴们。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历过成百次类似的场合，因此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他们的专长。让我们也回忆一下前后的历史：这是一个讨论和开会时代。

形形色色的协会，党团组织，工人俱乐部和联谊会都在忙于组织文娱晚会，邀请各种各样的画家，诗人，天文学家，农学家和经济学家参加会议。这类活动的组织者们由于他们的努力而受到尊敬和奖赏，因为这个时代需要革命活动；但由于缺少革命的障碍，这种热情就不得不引导到开会和讨论中来。而画家，诗人，农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喜欢开会，因为这样可以证明他们不仅是深奥的专家，而且是与群众生动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革命者。

因此诗人们非常熟悉听众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知道这些问题会按照统计法的绝对规律反复地重现。他们知道有人一定会问：同志，你最初是怎样开始写作的？他们知道还有人会问：你写第一首诗时多大？他们知道有人肯定会询问：你最喜爱的作家是谁？听众中间也肯定会有人为了显示自己熟悉马克思主义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同志，你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知道除了提问，听众还会劝诫他们写更多这方面的诗，关于（1）出席讨论会的人的职业。（2）青春，（3）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罪恶。（4）爱情。

最初片刻的沉默不是由于缺乏经验造成的；相反，正是由于诗人们过分按照常规及职业态度行事而引起的。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也应该怪罪于配合不好，因为这群诗人以前从来没有在一起过，他们没有预先商定的开球方式、最后，那位白发如银的诗人打破了沉默，他讲得很漂亮，令人鼓舞，十分钟的即兴演说之后，他邀请这排听众随便提他们想到的任何问题。既然诗人们对这场比赛已热心起来，于是他们显示出口才，自动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让每个诗人都适当地表演一番，巧妙地互相赞扬，时而严肃地回答，时而诙谐地讲一些轶事。所有基本的标准问题都恰当地提了出来，也都恰当地给予了标准回答。（谁不会被那位白发诗人对于何时及怎么写第一首诗的回答所迷住呢？他解释说要不是为了他的猫米基，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诗人，因为正是她激励他在五岁时创作了第一首诗。他开始背诵这首诗，由于对面那排人不知道是不是该把它当真，他开始格格地笑起来，结果所有的人——诗人们和提问者——全都尽情地大笑起来。）

预料中的劝诫也出现了。正是雅罗米尔的老同学首先站起来，发表了一番严肃的言论。是的，诗歌晚会精彩极了，所有的诗人都是第一流的。但是，是否有人注意到，尽管事实上呈献了三十三首诗（假定每个诗人平均三首诗），但却没有一首诗提到国家安全力量，哪怕是间接的？有谁能真正地坚持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人民警察没有起到一个至少值得我们注意和尊敬的三十三分之一的作用呢？

接着，那位中年妇女站了起来。她说她完全赞同雅罗米尔的老同学刚才表达的意见，但她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近来很少有人写爱情？从提问者的队伍里传来一阵压低的笑声。这位妇女继续说：毕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也要相爱，他们会喜欢一些描写爱情的诗。

白发如银的诗人站起来，鞠了鞠躬，然后说，这位女士完全正确。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应以爱情为耻？爱情有什么过错？我是一个老人，他说，但我不怕承认，当看见女人穿着单薄的夏装，显示出她们年轻迷人的身躯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转过头去。提问者的队伍怀着共谋犯罪的同情窃笑起来。老诗人继续说：我应该为这些年轻美丽的女人献上些什么呢？我应该给她们一把系着红缎带的铁锤吗？或者当我来表示我的敬意时，我应该带一把镰刀来插在她们的花瓶里吗？不，我献给她们玫瑰花；爱情诗就象我们献给可爱女人的玫瑰花。

是的，说得对，那位妇女急切地表示赞同。老诗人受到这一反响的鼓励，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束手稿，朗诵了一首很长的爱情诗。

是的，是的，这太美了，那位妇女激动地说。但这时，一位一直在充当这次晚会组织者的警官站起来说，这些诗行的确很优美，但即使是一首爱情诗也应该让人们能分清，它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诗人写的。

但是，社会主义爱情诗同其它爱情诗怎么能有区别呢？那位妇女问，她仍然着迷于老诗人忧郁地低下的白发苍苍的头，着迷于他的诗歌。

当其他人发言时，雅罗米尔保持着沉默，但他知道他一定要讲话，他觉得他的时刻终于到了。毕竟，很早以前，远在他拜访那位画家，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新艺术和新世界的那些日子，他就思考过这个问题。

啊，又是画家，从雅罗米尔嘴里发出的又是画家的声音和话语！

他说了些什么？在旧的资产阶级社会，爱情被金钱、社会地位以及种种偏见所严重变形，它永远不可能成其为自身，它始终只是真正爱情的一个影子。只有在新时代，扫除了金钱的力量和偏见的影响，才能使人成为完整的人，恢复了爱情的光辉。社会主义的爱情诗就是这一伟大的、解放的情感的声音。

雅罗米尔对自己的雄辩感到满意，并注意到一对平静的黑眼睛在疑视他。他觉得，“真正爱情”和“解放的情感”这些词从他嘴里流出来，就象勇敢的船只驶进那对黑色大眼睛的港湾。

但当他讲完后，一个诗人讥讽地微笑说，“你真的认为你诗中的情感比亨利希·海涅诗中的情感还要多吗？维克多·雨果的爱情对你来说似乎太卑贱了吗？你是否想告诉我们，一个象聂鲁达[4]这样人的爱情由于金钱和偏见而变成了畸形吗？”

----

[4]聂鲁达：（1834－1891），捷克十九世纪伟大诗人。

出乎意料的一击。雅罗米尔不知所对；他脸红了，那对黑眼睛目睹了他的耻辱。

那位中年妇女对雅罗米尔同伴的嘲弄攻击感到很高兴，她说：“同志们，你们为什么要干预爱情？爱情永远都是一样的，谢天谢地。”

那位组织者回答：“噢，不，同志，你错了！”

“不，我说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那位诗人迅速插话，“但是，旧日爱情诗和现代爱情诗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情感的力量和真实。”

“那么，区别在哪里？”中年妇女问。

“在这里：从前，爱情——甚至最崇高的爱情——总是对令人厌倦的社会生活的一种逃避。但今天，人们的爱情却与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工作，我们整体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现代爱情诗新的优越所在。”

对面那排人表示赞同这个系统的阐述，然而，雅罗米尔突然轻蔑地大笑起来：“这种优越，我亲爱的朋友，一点也不新。过去的伟大作家难道没有把爱情与社会斗争联系起来吗？雪莱著名诗中的恋人都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共同献出了生命的革命者。这就是你所说的爱情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意思吗？”

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堪的静默。刚才，雅罗米尔还不知道怎样回答那位同行的反对意见，现在轮到他的同行一下子语塞了，于是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一个无法接受的印象）：在昨天和今天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新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幻觉。事实上，那位中年妇女就又站了起来，带着急切的微笑大声说，“我们在等待，同志们。告诉我们——今天的爱情同过去的爱情有什么区别？”

在这关键时刻，当每个人都仓皇失措时，那位有条木腿的男人插了进来。他一直在仔细地听着辩论，但明显表露出不耐烦。现在他费力地站起来，让自己靠在椅子上直立着。“同志们，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他说，同排的人开始对他嚷道，这没有必要，因为他们都非常熟悉他。“我不是向你们自我介绍，而是向诗人同志们，我们的客人。”他反驳说。由于他明白单单介绍他的名字对诗人们来说意义不大，于是他开始简略地叙述他的生世。他在这个地方工作了近三十年；还在科克瓦拉[5]先生的时期他就被雇用在这里了，那位工厂主把这座别墅作为消夏之居。整个大战期间他一直都在这里，盖世太保逮捕了科克瓦拉先生以后，把这幢房子接管过来作为娱乐中心。战后这座别墅曾交给天主教徒，现在它属警察所有。“但是就我看到的一切来说，没有任何政府象共产党那样关心我们劳动人民。”尽管如此，今天

的一切也还不是尽如人意。“在科克瓦拉的时期，在盖世太保时期，在天主教徒时期，公共汽车站总是在别墅对面。”那是多么方便。他只需跨出门就到了公共汽车站。突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就把车站移到离此两条街段的地方。他对他能想到的所有政府部门和机关提出了抗议。没有用。他用拐杖捣着地板：“这座别墅现在应该属于劳动人民！因此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象我这样的一个劳动者却不得不走两条街去赶公共汽车？”

----

[5]科克瓦拉：斯洛伐克民主党人，1948 年曾任副总理。

坐在前排的人回答说（半是不耐烦，半是逗趣），他们已经给他解释过一百次，公共汽车现在要停在那个新建的工厂前面。

那位木腿男人回答，这些他都知道，但是他建议在两个地点都设车站。

同一排的人说，公共汽车在两条街段之内停两站，这真是废话。

“废话”这个词触怒了木腿男人。他说，没有人有权对他这样说话。他用拐杖敲着地板，脸气得通红。不管怎样，在两条街段的距离之间不能修两个车站，这不是事实。他在其它交通路线上看见过有这样的车站。

一位组织者站起来，逐字复述（显然他过去已经这样做过多少次了）捷克斯洛伐克汽车运输部门的决议：特别禁止、公共汽车站之间近于指定的最短距离。

那位木腿男人指出，他曾提过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为什么不把停车站设在别墅和新厂之间呢？

这只会使工人和警察都不方便，他们回答。

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二十分钟，诗人们徒劳地想加入进去。对面的那排人沉浸在他们非常熟悉的话题中；没有给诗人们一个讲话的机会。只有当木腿男人厌倦了他那些同事的反对，闷闷不乐地坐在椅子上后，这场争论才告结束。在接下来的静默中，从隔壁传来的舞曲声响彻了大厅。

没有人想说点什么。一个警官站起来，感谢诗人们的访问和有趣的讨论。白发如银的诗人代表来宾讲话，他说，这场讨论对诗人们来说比对听众更有收益（这是常有之事），要感谢有这个机会的应该是诗人们。

在隔壁房间，一个歌手唱起了流行曲调；对面那排人聚在木腿男人身边平息他的恼怒，诗人们发现他们自己被冷在一边。过了一会儿，看门人的儿子和那两位组织者才走近他们，把他们带上公共汽车。

那位漂亮的电影摄制专业的学生同诗人们一道回去。当汽车穿过黑夜，飞快地驶向布拉格时，诗人们围在她身边，每个人都想引起她的注意。由于机运不好，雅罗米尔发现自己坐得离姑娘太远，不能加入这场娱乐。他想起了他的红头发姑娘，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她是多么不可救药的难看。

汽车在布拉格中心停了下来，一些诗人决定顺道去造访一家酒店。雅罗米尔和那位漂亮的电影摄制者也跟了去。他们围着一张大桌子坐着，聊天，饮酒，然后姑娘提议他们到她的住处去。到这时只剩下几个人：雅罗米尔，白发银丝的诗人，以及出版社的编辑。他们舒适地坐在一间漂亮的房间里，这间屋子在一幢现代别墅的二楼，姑娘正要把它转租出去。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喝酒。

老诗人以一种无人能比的热情专注在姑娘身上。他坐在她身旁，赞扬她的美，给她背诵诗，即兴创作赞美她的迷人的诗歌，不时单腿跪在她面前；抓住她的双手。那位编辑对雅罗米尔差不多也是同样大献殷勤。他没有赞扬他的美，但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是一名诗人，你是一名诗人！（让我们注意，如果一位诗人称呼另一个人为诗人，这与一位工程师称呼另一个人为工程师，或一个农民称呼另一个人为农民完全是两码事。一个农民仅仅是一个务农的人。一个诗人却不仅仅是一个写诗的人，而是一个被上帝选出来写诗的人。只有一个诗人

才能够在一个同行诗人身上发现这种恩典的特征。让我们回忆一下兰波的信：所有诗人都是兄弟。只有一个兄弟才能发现家族的秘密徽号。）

那位电影摄制者一直在盯着雅罗米尔，她的面前正跪着白发苍苍的诗人，她的手成了他热烈赞美的受害者。雅罗米尔很快便意识到姑娘的关注，他心花怒放，也回望着她。多么美妙的一个矩形！老诗人凝视着姑娘，编辑凝视着雅罗米尔，雅罗米尔和姑娘互相凝视。

这种视线几何形只有一次被打乱了，只有短暂的片刻。编辑挽着雅罗米尔的胳膊，把他引到邻接房间的阳台上，然后请求他和他一道从栏杆上往下面院子排尿。雅罗米尔愉快地服从了，因为他极想要编辑记住自己的诺言，出版一本他的诗集。

当他俩从阳台上回来时，老诗人从地上站起来说，该走了。他看得很清楚，他说，他不是姑娘渴望的人。他要求编辑（他远不如老诗人观察敏锐，考虑周到）让这对年轻人单独留下。因为这正是这对年轻人所希望和应得的。正如老诗人所解释的——他们是这个晚上的王子和公主。

当编辑终于也明白了这个形势，准备离开时，老诗人已经挽着他的胳膊，正把他往门口拉。雅罗米尔明白自己马上就要与姑娘单独相处，她正坐在一把大扶手椅里，交叉着腿，弯曲的黑发披在肩上，眼睛直盯着他……

两个人即将成为情人的故事是永恒的，它几乎使我们忘记了历史。叙述这样的爱情故事是多么叫人愉快！忘记浸蚀我们短暂生命的那个怪物（就象水泥逐渐浸蚀会使纪念碑倒塌一样）是多么叫人快活。忘记历史是多么叫人快乐！

但是历史在敲门，要进入我们的故事。它的到来不是身着秘密警察的装束，也不是身着一场突然革命的装束。历史的进场不会总是富有戏剧性的，它常常象污浊的洗碗水一样渗人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历史的入场是身着内裤的装束。

在我们所描述的那个时代，高雅在雅罗米尔的国家被视为一种政治罪行。那时穿的衣服糟透了（战争刚结束，一切东西都还短缺）。尤其是高雅的内裤，在那个阴郁的年代几乎被看成是应该受到严厉惩罚的一种奢侈品！男人们被当时出售的那种难看的内裤搞得烦恼不安（短裤特别宽大，一直到膝部，在腹部上方留了一个可笑的楔形开口），他们求助于主要为运动和健身穿的亚麻运动裤，称为“训练短裤”或“教练员”。于是，那个时代目睹了波希米亚所有男人装束得象足球队员一样，爬上他们妻子和情人床上的这一奇观。那时候的卧室就象一个运动场，但是从服装的美观来看，这并不算太糟：“教练员”具有一种运动员似的轻巧灵便，而且穿起来颜色鲜艳——蓝色，绿色，红色，黄色。

雅罗米尔一般不大注意他的衣着，因为有他母亲为他操心。她挑选他的衣服和内衣裤，她确保他的内衣裤足够暖和不致使他感冒；她对雅罗米尔有多少套内衣裤了若指掌；只要朝衣橱望一眼就能说出雅罗米尔那天穿的是哪一套。如果她发现衣橱里平常穿的内衣裤一件也没少，她就会生气。她不喜欢雅罗米尔穿“教练员”，因为她认为这种短裤不是合适的内裤，只有在运动时才该穿。要是雅罗米尔反对说，标准的内裤很难看，她就会用几乎掩饰不住的愤怒回答，没有人会看见它穿在他身上。因此每当雅罗米尔去看望红头发姑娘时，他总是从衣橱里取出一条内裤，把它藏在他的写字台里，悄悄地穿上色彩鲜艳的“教练员”。

然而，这一次，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晚上会带来什么，他穿了一条可怕的内裤，宽大，破旧，灰暗！

你也许认为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难题，他可以轻易地关掉灯，这样姑娘就看不到他的内裤了，但是，一盏罩着粉红色灯罩的小灯正把多情的光投遍房间，急切地等待着为这两个情人照亮通向共同狂欢的路；雅罗米尔不能想象要姑娘把灯关上。

或者你也许想到，他可能把那条难看的内裤和裤子一起脱掉。但雅罗米尔决不会想到这个主意，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突然一下子把衣服脱光使他害怕。他总是逐渐地脱衣服；他与红头发姑娘在一起时，总是穿着短裤和她作爱，直到最后一刻，才趁着兴奋把

它脱掉。

因此，他恐惧地站在那里，面对着那双黑黑的大眼睛，宣布说他也该离开了。

老诗人极为生气。他告诉雅罗米尔，决不能侮慢一个女人，然后他悄声地对他描绘了等待着的快乐。但是，老诗人的话似乎只是加强了掩藏在他裤子里面的丑陋。在那对美丽眼睛的注视下，雅罗米尔的心在作痛，他朝门口退去。

一到街上，他就悲哀、后悔不已；他无法把这位漂亮姑娘的形象从脑子里赶走。白发苍苍的诗人（他们在一个电车站向编辑道了晚安，这会儿正一道穿过黑暗的街道）在不断地用责备来折磨他，他不仅让人扫兴，而且有失男子风度。

雅罗米尔反驳说，他根本没打算要侮慢那位年轻女士，但是他爱他自己的女友，她也同样热烈地爱着他。

你真死心眼，老诗人说。说到底，你是一位诗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同另一个女人作爱不会损害你的女友。生命是短促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听见这些话真叫人难受。雅罗米尔回答说，在他看来，我们倾注了一切的一个专一崇高的爱情比一千次卑微的风流韵事都有价值得多；他的一个女友包容了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他的女友如此迷人；如此说不尽的可爱，以致对他来说，与这样一个女孩经历一千次意料不到的冒险，也要比唐璜与一千零一个姑娘经历的冒险容易得多。

老诗人站住了；雅罗米尔的话显然感动了他。“也许你是对的，”他说，“可我已经老了，属于一个旧世界的人。我必须承认，尽管我结过婚，我还是很乐意同那个女人待在一起。”

当雅罗米尔继续详细阐述他对一夫一妻制爱情的优越性看法时，老诗人垂着头。“也许你是对的，我的朋友。实际上我知道你是对的。难道我不是也梦想过一个崇高的的爱情吗？一个专一而崇高的爱情吗？一个象宇宙一样无穷无际的爱情吗？但是我错过了机会；亲爱的朋友，因为那个旧世界，那个被金钱和娼妓玷污的旧世界，不是为了爱情而建立的。”

他们两人都有点陶醉了。老诗人搂住年轻诗人的肩膀。他们站在马路中间。老诗人举起手臂。“让旧世界灭亡吧！爱情万岁！”

雅罗米尔觉得这个姿势优美动人，豪放不羁，富有诗意。他们两人朝着布拉格黑暗的深处长久地、热情地大喊：“让旧世界灭亡！爱情的崇高万岁！”

白发苍苍的诗人突然在雅罗米尔面前跪下，亲吻他的手。“我的朋友，我赞扬你的青春？我的年纪赞扬你的青春，因为只有青年人才能拯救这个世界！”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用光着的头去触雅罗米尔的膝盖，用一种忧郁的语调补充说，“我赞扬你的崇高爱情。”

他们终于分手了，雅罗米尔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他的房间。他眼前浮现出一位美丽的、遭到拒绝的女人形象。在一阵自我惩罚的冲动驱使下，他站在镜子前审视自己。他脱掉裤子，以便看到他穿着那条难看、破旧的内裤。他怀着强烈的厌恶，继续对着他那荒唐可笑的丑态看了很久很久。

后来，他意识到他的愤怒根本不是针对自己的。他正在想他的母亲——她为他挑选内裤，她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偷偷摸摸的花招，她熟悉他的每一件衬衫和袜子。他怀着仇恨想着他的母亲，那个用一根无形的长绳套住他的脖子，紧抓住他的母亲。

他开始比以前更加残酷地对待红头发姑娘。当然，这一残忍是掩藏在爱情受了伤害的幌子下：为什么你不努力理解我一点？难道你看不出我的情绪吗？难道我们变得这样陌生，你竟然猜不出什么在使我烦恼吗？如果你真的爱我，象我爱你那样，你应该感觉到我正在想什么。你为何总是对我不喜欢的事感兴趣？为什么你老是对我一会儿讲这个兄弟，一会儿讲那个兄弟，一会儿讲这个姐姐，一会讲那个妹妹？难道你没看出现在我正在考虑许多事，我需要你的帮助和支持，而不是要这些老谈自己的叽哩呱啦吗？

姑娘自然要为自己辩护。谈论我的家庭有什么不好？你不是也对我谈你的家庭吗？难道你的母亲是人；我的母亲就不是么？然后她提醒他（自从那事发生以后，这还是第一次）他

的母亲是怎样侵犯他们的私事，把她自己强加于他们。

雅罗米尔对他的母亲既爱又恨。现在他竭力为她辩护。母亲主动帮助我们有什么不好？这只是表明她喜欢你，她接受了你作为一个家庭成员。

红头发姑娘大笑起来：毫无疑问，你母亲知道肚子疼的呻吟和作爱时的叹息两者之间的区别！雅罗米尔受了侮辱，一脸愠怒，姑娘不得不请求他原谅。

一天，他们正在街上行走，红头发姑娘的手臂插在雅罗米尔的手臂下，他们执拗地沉默不语（只要他们没有互相责备时，他们就沉默不语，只要他们一讲话，他们就互相责备）。雅罗米尔看见两个漂亮的女人朝他们走来。一位很年轻。另一位大一些；年轻的那位更漂亮，更高雅，但另一位也挺好看，而且很有吸引力。雅罗米尔认识她们：一位是年轻的电影摄制者，另一位是他的母亲。

他脸红了，向她们打招呼。两个女人也回敬他们的招呼（母亲招呼他时带着一种夸张的快乐神气）。雅罗米尔手挽着他的丑姑娘，仿佛觉得那位漂亮的电影摄制者看见了他穿着他那可耻的内裤。

他一回到家就问母亲，她是怎么认识那位电影摄制者的。她用卖俏的戏谑回答说，她认识她有一段时期了。雅罗米尔催促她讲详细一点，但玛曼继续回避他的问话，就象一个姑娘逗弄她的情人一样；最后，她才告诉他：这位漂亮聪明的女人大约在两星期前首次来拜访她。她说她钦佩雅罗米尔是一个诗人，希望拍一部关于他的短片；这将是由国家警察电影俱乐部赞助拍摄的一部业余影片，但尽管如此，它肯定会有相当可观的观众。

“她为什么找你？她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雅罗米尔问。

母亲解释说，姑娘想先从她那里得到所有的背景材料，而不想打扰雅罗米尔。实际上，这姑娘真不错，还要求母亲写电影脚本！想象一下吧！初稿已经完成，一位年轻诗人的生活故事。

“你干吗什么也不告诉我？”雅罗米尔生气地问。母亲与那位拍电影学生之间的关系，本能地使他突然很不高兴。

“我们打算让这件事使你吃一惊。我们在街上遇见你，运气真不好。假若有一天你回到家推开门——一切都准备就绪：姑娘，摄制组，摄影机，马上就要开始拍电影。”

雅罗米尔在这件事上毫无选择；一天他回到家，发现那位年轻的电影摄制者已经在房子里。这一次，他穿着红色的“教练员”（自从那个倒霉的诗歌晚会之后，他就不再穿那种难看的内裤），但是，他还是感到象第一次遇见她时那样笨拙，缺乏自信。

这位拍电影的姑娘宣布（没人想费事征求雅罗米尔的意见），他们这一天都将拍记实的背景材料，例如儿童时代的照片；玛曼将作解说。雅罗米尔偶然得知，整部影片设想成一个母亲对诗人儿子的回忆。雅罗米尔很想问母亲心里在想些什么，但他害怕她的回答；他的脸红了。除了两位女人，房间里还有三个男人，围在照明设备周围；雅罗米尔觉得他们在鄙夷地瞧着他；他不敢讲话。

“这些童年时代的照片好极了。我想把它们全部用上。”姑娘说，一边翻看家庭照相簿。

“它们将怎样表现在银幕上呢？”玛曼带着专业上的兴趣问，姑娘使她相信用不着担心。然后她向雅罗米尔解释，最初的连续镜头将仅仅是他那些照片的蒙太奇，伴随着他母亲的话外音回忆。然后镜头将集中在玛曼身上，最后诗人才进入画面：诗人在他出生的房子里，诗人在写作，诗人在花园里散步，最后诗人在开阔的大自然里，他最喜爱的环境中；在乡村一个美丽僻静的地方，他将朗诵一首诗作为影片的结尾（“我的这块可爱的风景假定在哪里呢？”他不快地问。她们回答，他最喜爱的地方当然是希拉格附近富于浪漫气息的地区，到处都是山冈和荒凉的巉崖。“这不真实！我讨厌那些无聊乏味的岩石。”雅罗米尔说，但是没人认真对待他。）

雅罗米尔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电影脚本，并提议他愿意自己为这个脚本做点什么；他反对

道，这个脚本里有太多的琐屑、陈旧的东西（放映一个一岁婴儿的照片真是荒唐！）；他声称知道在这部影片里可以探讨的更有趣的问题；她们要他说得更明确点。他回答说此时此地他还不能讲清楚它，他愿意在某个时候再仔细想一想。

他想不惜一切代价推迟拍摄，但他的努力白费了。玛曼用胳膊搂住他，对她的黑头发合作者说，"他总是给我找麻烦！他从来没有满足……"她戏谑地把自己的脸贴近他的脸。"这不是事实吗？"雅罗米尔没有回答，她又说，"你是我的小捣蛋，承认吧！"

那位拍片姑娘说，一个作者力求尽善尽美是好事，但这次雅罗米尔不是作者。他的母亲和她才是这个电影脚本的作者，她们愿意承担一切责任。雅罗米尔应该允许她们拍摄她们认为合适的影片，正如她们愿意让他写他喜欢的诗歌。

玛曼补充说，雅罗米尔不必担心影片会对他不公正，因为她们俩——拍片姑娘和她本人——都深深地尊敬和喜欢他。她用一种卖弄风情的味道说出这番话，不清楚她是在与他调情，还是在与她新交的朋友调情。

不管怎样，她显得很轻浮。雅罗米尔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有这种行为。就在这天早晨，她去了理发店，把头发做成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式样；她说话声音比平常大，不停地大笑和格格傻笑，运用她听说过的所有妙语，沉着镇静地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一个劲地给摄制组的那几个男人供应咖啡和点心。她用一个密友轻松随便的口吻对那位黑头发姑娘说话（这样就使人联想到一种复杂的姐妹关系），同时降格以从地用手臂搂住雅罗米尔，称他是她的捣蛋鬼（这样就把他踢回到他的少年，童年和婴儿时期）。

（多么不寻常的情景，母亲和儿子，在激烈地拔河！她要把他拉进他的尿布里，他要把她拉进她的尸布里。啊，多么可爱的情景！）

雅罗米尔向不可避免的命运低头了；他看出这两个女人就象两个火车头一样充满了蒸汽，他无法抵抗她们的雄辩；他看出摄制组的那三个男人是讥讽的观众，多半会嘲笑他可能走错的任何一步；他说话很小声，而玛曼和姑娘却谈笑风生，因为观众的在场对她们是有利的，而对他却是不利的。因此他宣布他停止抵抗，准备离开。但是她们反对说（又用卖弄风情的举止），他实在应该留下来；她们哄骗他，如果她们工作时他在一旁观看，这会给她们带来愉快；于是他留下来了，懒洋洋地瞧着那几个男人忙乱地搬弄他们的灯，给那本家庭照片簿拍摄快镜头；间或他走到自己的房间，假装阅读或工作；头脑里一片混乱的思想；在这种郁郁寡欢的状况中，他试图发现一些愉快的事，他想到也许只是为了有机会再见他，姑娘才安排了整个这桩事；他告诉自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母亲只是一个需要耐心躲避的不幸的障碍；他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试图想出一个办法来利用这个讨厌的拍片事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弥补自那夜他象一个懦夫从拍片姑娘别墅逃出来后一直折磨着他的那段插曲；他试图战胜他的尴尬，不时走出去观看拍片进行得如何，希望他和姑娘能重新建立起他俩初次见面时迷住他的那种神奇的眼神连接；但是，姑娘似乎全神贯注在她的工作中，以一种严肃的、讲究实际的样子忙于她的工作，因而他们的目光只是偶尔、短暂地相遇。于是雅罗米尔放弃了在拍片进行中从姑娘那里得到一个反应的任何尝试；他决定等这天的拍片结束后主动提出送她回家。

终于，摄制组的那三个人拆卸了设备，把摄影机和灯运到停放在外面的密封卡车上。雅罗米尔正要走出自己的房间，这时他听见母亲对姑娘说，"咱们走吧，我和你一道。我们也许还有时间在什么地方坐一坐，交谈一下。"

雅罗米尔仿佛觉得他到手的东西从他眼皮底下一下子被拿走了。他冷冷地对姑娘说了声再见，当两个女人刚一离开房子，他也走了出去，怒冲冲地快步朝红头发姑娘的公寓大楼走去。她不在家。他在街上来回走了约半小时，情绪更加阴沉。终于他看见她来了。她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而他脸上却是愤怒的指责。她怎么一直没来家？难道她就没想到他也许会突然来看她吗？她为什么在外面呆得这么晚？

她几乎还没来得及关上门，他就开始脱掉她的衣服。他设想他是在同那位漂亮的拍片姑娘作爱；很快他就听见了红头发姑娘的呻吟；在他的想象中，他把这些声音与那位黑头发姑娘联系起来，这使他兴奋万分，以致他连续几次进入红头发姑娘的身子，但每次都只在她里面待几秒钟。红头发姑娘觉得这十分奇特，禁不住大笑起来。但雅罗米尔这天对嘲笑特别敏感，他没有察觉姑娘的笑是出于鼓励的娱悦。他觉得受了莫大侮辱，便打了姑娘一耳光；她顿时泪流满面，这使雅罗米尔高兴起来；她啜泣着，他又打了她几下。一个女人为我们洒下的眼泪——这是赎救，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雅罗米尔欣赏了一会儿红头发姑娘的眼泪，然后他亲吻和抚摸她，回到家中，痛苦多少有点减轻了。

几天后，拍片又重新开始。密封卡车来了，三个小伙子从车上爬出来（另一群表示轻蔑的观众），接着是那位漂亮的姑娘，她那由别人代替的呻吟仍然在雅罗米尔耳边微响。当然，玛曼也在场，变得愈来愈年轻，象一个乐器，唱着，轰鸣着，大笑着，卖弄风情地离开全部管弦乐器跳到独奏段。

按计划这次摄影机的镜头要集中在雅罗米尔身上；他应该显现在他出生的环境中；在他的写字台前；在花园里（因为根据脚本，他喜爱花园，花坛，草坪，鲜花）；他将和他母亲一道出现，她已经在影片冗长的开头部分讲述了她的回忆。姑娘让他俩在花园里的一个长凳上摆好姿势，督促雅罗米尔开始与他母亲自然、随便地聊天。这种对自发性场面的排练持续了大约一小时，但玛曼并没有泄气。她一直喋喋不休地谈个不停（在实际影片中，他们的谈话是不会听见的；母亲的儿子将表现出是在交谈，由声带播出玛曼预先录好的旁白）；当她注意到雅罗米尔的表情显得不够积极时，她开始告诉他，做他这样一个孩子的母亲是不容易的，一个羞怯、孤僻的男孩总是在不断生气，不是对这件事就是对那件事。

然后她们把他塞进密封卡车，运到布拉格近郊富有浪漫气息的乡村，根据玛曼的信念，雅罗米尔就是在这里怀下的。玛曼一直闭口未向任何人吐露，她为什么觉得这块风景特别珍贵。她不愿意讲——然而她却讲了。她兴奋地谈着，用一种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方式，声称这块乡间对她本人来说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她把它看成是一块爱情的土地。“瞧瞧这片风景，它多么象一个女人。那些丰富柔和的曲线具有一种母性的味道。瞧那些岩石，那些孤独的大鹅卵石！那些凸出在空中坚硬粗糙的鹅卵石不是有一种男人味吗？这不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土地吗？这不就是一块性爱的土地吗？”

雅罗米尔一直在打算反抗；他想告诉她们，她们的影片是一个陈腐的劣品；他高雅的情趣遭到了蹂躏；也许他可以小闹一场，至少可以跑掉，就象他曾经同母亲及母亲的朋友一起坐船游览时逃掉一样，但这一次他不能逃走。他被拍片姑娘的黑眼睛俘虏了，害怕第二次失去她。

她们让他在一块大鹅卵石前摆好姿势，要他背诵他最喜爱的诗歌。玛曼激动万分。有多久了！很久很久以前，就在这块地方，她曾与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作爱；就在这里；她的儿子此刻正在隐隐出现，仿佛象一个蘑菇从地里冒出来。（啊，是的，仿佛在父母把他们的种子撒下的地方，孩子们就象蘑菇一样冒出来！）这个奇异、美丽、不可思议的蘑菇形象使玛曼心醉神迷，她用颤抖的声音讲起她曾渴望死于火中。

雅罗米尔感觉到他的朗诵糟透了，他无可奈何。他提醒自己他决不是那么容易怯场的，他曾对警察听众朗诵过同一首诗，而且朗诵得很流利，很成功。但是这次话语卡在他的喉咙里了；站在一处可笑的地方的一块可笑的岩石前，随时担心被一些牵着狗散步的过路人注视（他母亲在二十年前也感到过同样的不安），他不能把精力集中在他的诗歌上，朗诵得笨拙而不自然。

她们强迫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朗诵他的诗歌，但最后她们放弃了。“甚至当他上大学时，他就害怕每次考试。他经常都是那样恐慌，我简直是不得不把他赶到学校去。”

拍片姑娘说，他们也许可以用一个演员的声音来配音。她要求雅罗米尔再次站在岩石前

面，蠕动他的嘴唇，仿佛他在朗诵。

他照办了。

“我的天哪！”她不耐烦地叫道。“你得象正在讲话那样蠕动你的嘴，不要象刚才那样！演员的声音必须同你嘴唇的蠕动吻合。”

于是雅罗米尔站在岩石前面，不断地张开和闭上他的嘴，摄影机终于开始嗡嗡地响了起来。

两天前他还只穿着一件薄外套面对着摄影机；现在他却得戴上围巾，帽子，穿上冬天的大衣了；落了雪。他应该六点钟在红头发姑娘的房子前与她见面，但已经过了一刻钟，还没有她的影子。

几分钟的等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悲剧，雅罗米尔在前几天经受了那样多的耻辱，他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不得不在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踱来踱去，街上的行人都能清楚地看出，他正在等某个并不急着要见他的人，这样他的耻辱便尽人皆知了。

他怕看手表，这种富有意味的动作将在众目睽睽下证明他是一个徒劳等待的恋人；他把大衣袖子轻轻地拉上去，把袖子边缘卷到表带下，这样他就可以不引人注意地时时觑视手表；当他看到分针已经过了二十分，他变得怒不可遏；为什么他总是要设法早到几分钟，而那位愚笨、难看的人从来不能准时？

终于她出现了，遇到的是雅罗米尔板着的脸。他们走到她的房间，坐下来，姑娘竭力为自己辩白：她一直跟一位女朋友在一起。这是她可能说出的最糟的解释。实际上，当然也许没有什么解释能使雅罗米尔平静下来的，尤其是他一直在等待是由于某个不打紧的女朋友——这一微不足道的实质。他对红头发姑娘说，他很抱歉她因为他的缘故不得不中断与一位女朋友的重要讨论，他建议她马上转身回去。

姑娘发现雅罗米尔的心绪十分烦乱。她说，与她女朋友的会面的确很急迫：那位女朋友要跟她的未婚夫断绝关系，她非常抑郁，因此红头发姑娘不忍离开她，直到她的情绪好了一点。

雅罗米尔说，擦干她女朋友的眼泪太高尚了，他希望她的女朋友会报答她，既然雅罗米尔打算结束他们之间的整个关系。正是这样。他准备断绝关系，因为如果有谁把一个愚蠢女朋友的愚蠢眼泪看得比他重要，他就拒绝与这个人有任何关系。

红头发姑娘发觉事情正在变得愈来愈糟；她说，她非常抱歉，她请求他原谅。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减轻他那受辱的自尊心贪得无厌的要求；他宣布她的道歉一点也没有改变他的信念，红头发姑娘所说的爱情根本不是爱情；也许他认为他把一桩明显的小事过分夸大了；但正是这些芝麻小事暴露了她对他的真实态度；无法忍受的漠不关心，满不在乎的淡然态度，嗨，她对待他就象对待她的一位女朋友，商店的一位顾客，街上的一个行人！请她决不要再说她爱他！她的爱只是对爱情的可怜的模仿！

姑娘意识到事情已经变得糟透了。她试图用亲吻来突破雅罗米尔的仇恨和悲哀；他用几乎粗暴的动作把她推开；她跪下来，把她的头压在他的腹部上；雅罗米尔动摇了，但随即就把她扶起来，冷冷地要她别再触碰他。

仇恨象酒一样涌上他的脑际；这是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使得这种感觉更加令人陶醉的是它从姑娘身上反弹回来伤害和惩罚他的那种方式；这是一种自我折磨的仇恨，雅罗米尔完全清楚，把红头发姑娘赶走，他将失去他拥有的唯一女人；他感觉到他的愤怒是不正当的，他是不公平的；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变得越发残忍，因为吸引他的是深渊：孤独的深渊，自我谴责的深渊。他知道如果没有姑娘他就会感到不幸（他将孤零零一个人），会对自己不满意（因为明知他冤枉了她），但所有这些认识都无力抵御那愤怒的美妙陶醉。他告诉她，他刚才说的话永远适用；她的手决不准再触摸他。

姑娘以前遇到过雅罗米尔的愤怒和忌妒，但这次她从他的声音里觉察出一种狂怒的决

心。她明白为了满足他那莫名其妙的愤怒，雅罗米尔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几乎在最后一刻，在深渊的边缘，她说，“别生我的气，我求求你！不要生气。我对你撒了谎。我根本没有同一个女朋友在一起。”

这使他吃了一惊。“那么你在哪里？”

“你会对我发狂的，你不喜欢他，但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得去看他。”

“你说的是谁？”

“我去看望我的兄弟。简，就是在我这儿住过的那位。”

他勃然大怒。“为什么你总是这样关心你的兄弟？”

“别生气，他对我一点也不重要。同你相比，他一点也不重要。但是你必须得理解——他仍然是我的兄弟，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十五年多。他要走了。要很长时间。我得去跟他告别。”

雅罗米尔对这种多愁善感的告别很反感。“你的兄弟能到哪里去，竟值得你抛弃一切？他要出差旅行几周吗？或者他要到乡下去度周末？”

不，既不是出差旅行，也不是在乡下度周末，而是严重得多的事，但她不能告诉雅罗米尔，因为他会非常生气。

“这就是你所说的爱情？对我隐瞒事情？对我保密？”

是的，她完全明白，爱情意味着彼此毫无隐瞒。但他必须极力理解。她吓坏了，她简直吓得要死……

“吓什么？你兄弟能到哪里去，竟使得你害怕对我讲？”

“你不能猜猜吗？”

不，雅罗米尔猜不出来。（此时，他的愤怒正在慢慢落到好奇心后面。）

终于姑娘向他吐露了秘密。她的兄弟已决定离开这个国家，秘密地，非法地；他预期后天通过边境。

什么？她的兄弟想背叛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背叛革命？她的兄弟想当一个移民？难道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难道他不知道所有的移民都自动成了外国间谍机关的雇员，企图暗中破坏我们的国家？

姑娘点头表示赞同。直觉使她确信，雅罗米尔可能宁肯原谅她兄弟的叛国，也不会原谅她十五分钟的迟到。这就是她不停地点头的原因。她赞同雅罗米尔所说的一切，她说。

“你赞同我有什么用？你应该劝他放弃这个！你应该阻止他！”

是的，她曾极力劝他放弃这个决定。为了使他改变主意她已尽了一切努力。这就是她来迟的原因。也许雅罗米尔现在会理解她为什么来迟了。也许雅罗米尔现在会原谅她了。

雅罗米尔的确原谅了她的迟到。但他告诉她，他不能原谅她兄弟的背叛。“你兄弟站在街垒的另一边。所以他是我个人的敌人。假如一场战争爆发，你兄弟会向我射击，我也会向他射击。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红头发姑娘回答，她向雅罗米尔保证，她坚决站在他这一边，决不忠于别人。

“你怎么能这样说？如果你真的站在我一边，你就决不会让他离开这个国家！”

“我能做什么呢？我又没有强壮到能把他拉回来！”

“你应该立即通知我。我会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却对我撒谎！编造一个你女朋友的故事！他想要愚弄我。现在你竟有脸皮说你站在我一边！”

她发誓她站在他一边，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会对他忠实。

“如果你真是这样，你就会去叫警察！”

“你是什么意思，警察？你肯定不会认为我会把我的亲兄弟交给警察吧！这是不可能的！”

雅罗米尔不能容忍任何反对。“不可能？如果你不马上去叫警察，我去！”

姑娘重又说，兄弟就是兄弟，她简直不能想象向警察告发他。

“那么，一个兄弟对你来说比我更重要罗？”

当然不。但是这与向警察告发他完全是两码事。

“爱情意味着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全无。爱情是完整的，否则它就不存在。我在这里，他在另一边。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而不是站在中间。如果你同我在一起；你就得想我所想，做我所做。革命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谁反对革命就是反对我。如果我的敌人不是你的敌人，那么你就是我的敌人！”

不，不，她不是他的敌人；她愿意在所有事情上与他同心同德。她完全明白爱情意味着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说得对。爱情意味着要么一切，要么全无。与爱情相比，其它一切都黯然失色，其它一切都会渐渐消失。”

是的，她完全赞同，这也正是她的感受。

“这是对真正爱情的最好考验——真正的爱情完全不理会别人的看法。但你总是听别人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顾虑，并用这些顾虑来打我的头。”

她根本不想打他的头，一点也不。但是她害怕伤害她兄弟，极大的伤害，她担心他可能遭到很重的惩罚。

“如果他遭到惩罚怎么办呢？假设他遭到很重的惩罚——这也是公平合理的代价。或者你也许怕他呢？你怕离开他？他怕离开你的家庭？你想一辈子都留在他们身边？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多么恨你的冷淡，你的半心半意，你的毫无能力的爱！”

不，这不是事实，她爱他，也知道怎样爱。

“是的，说得对，”他嘲讽地大笑。“你也知道怎样爱！问题在于你就是不知道怎样爱！你根本不懂得怎样爱！”

她说，这不是事实。

“没有我你能活下去吗？”

她发誓说她不能。

“如果我死了，你能继续活下去吗？”

不，不，不。

“如果我离开你，你能继续活下去吗？”

不，不，她摇头。

他还能问什么呢？他的愤怒消退了，但兴奋仍然还在。死亡突然出现在面前，甜蜜的，赏心的死亡，如果离别发生，他们已相互发誓去死。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没有你我也不能活下去。”她重申，没有他她就不能活下去，他们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又一应，直到他们漂浮在一朵模糊欲望的云上；他们互相宽衣解带，作起爱来。他抚摸她面颊，感到湿漉漉的。太美了，以前他从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一个女人因为爱他而哭。对他来说，眼泪就象一剂神奇的灵丹妙药，给人的状况带来解救和超越。眼泪消解了一切肉体的局限，造成了与无穷的结合；雅罗米尔被姑娘泪湿的脸所感动，意识到他自己也在啜泣；他们交欢，他们的脸和身躯都湿透了，他们溶化在一起，他们的气息和液体象两条河流汇在一起，他们哭泣、作爱，超脱于这个世界之外，象一片湖离开了大地，朝着天空漂流。

后来，他们平静地靠在一起休息，继续抚摸对方的脸；姑娘的红褐色头发纠结成一缕缕可笑的发束，她的脸虚胖，发红；她很难看，雅罗米尔想起了他的诗，那首诗描写他怎样渴望吸收他的恋人，甚至怎样渴望她的丑陋，她的纠结纷乱的红头发，她生有斑点的皮肤，以及那些玷污了她肉体的旧情人；他抚摸她；钟爱地欣赏她可怜的丑陋。他发誓他爱她，她也同样信誓旦旦。

由于他不想放过这一绝对完美的时刻，这以一死相誓的令人陶醉的时刻，他再次说，“没有你我真的不能活下去。绝对不能。”

“是的，如果我失去你，我也会感到特别孤单。这太可怕了。”

他变得僵硬了。“你是说，你可能想象没有我你照样会活下去的情景吗？”

姑娘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暗藏的陷阱。“我会非常伤心的。”

“但是你能够照样活下去。”

“如果你离开我，我还能干什么呢？但是我会非常孤独的。”

雅罗米尔明白了，他一直成了误会的受害者；红头发姑娘并没有真的以死为誓。当她说没有他她就不能活下去时，她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惯常的爱情行话，一句漂亮的措辞，一个比喻；可怜的傻瓜，她对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一无所知——向他发一点悲伤的誓言——而他只知道绝对！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生存或是死亡！带着苦味的讽刺，他问，“那么你会伤心多久呢？一天？或者甚至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她笑了。“我亲爱的泽维，我不可能在一星期内恢复过来……”她紧紧靠着他，用她身躯的接触来表示，她的悲哀几乎不可能以星期来衡量。

但是，雅罗米尔在沉思着这件事。她的爱究竟值多少呢？几星期的悲哀。很好！那么，什么样的悲哀？一点挫折。一星期的悲哀又是什么呢？毕竟，没有人能够一直悲痛。她在早晨忧伤几分钟，晚上忧伤几分钟。加起来会有多少分钟？她的爱值多少分钟的悲哀？他值多少分钟的悲哀？

他试图想象他死后她的生活，平静，沉着，泰然地跨过他死亡的深渊。

他不愿重新开始的狂暴、忌妒的谈话；他听见她的声音在问，为什么他看上去那样苦恼；他没有回答；温柔的声音就象一贴无效的止痛膏。

然后他站起身，开始穿衣。他已不再愤怒；她不断地问他为什么那样悲伤，他若有所思地抚摸她的面颊代替回答；接着他盯着她的眼睛说，“你打算自己去警察那里吗？”

她原以为他们美好的作爱已经永远消除了他对她兄弟的恶意，因此他的问题使她吃了一惊，不知作何回答。

他再次问她（悲伤地、平静地），“你打算自己告诉警察吗？”

她结结巴巴地说了点什么。她想对他表示异议，同时又害怕对抗。然而，她结结巴巴说出的话的意思是清楚的，雅罗米尔说，“我懂。你不想去那里。我自己来处理它吧。”他又抚摸了一下她的脸（怜悯地，悲伤地，失望地）。

她困惑了，讲不出话来。他们接吻，然后他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玛曼已经出去了。当他还在睡觉那会，她已把他所有的衣服摆在一把椅子上：衬衫，领带，裤子，外套，当然还有内裤。要除去这个二十年的习惯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个早晨，当他看见那条折叠的淡灰色内裤，它那可笑的不成形状的式样，开口上实际用来控制小便的钮扣，他不由得狂怒之极了。

是的，那天早晨他起来，就象一个人起而迎接重大的、决定性的一天。他拾起内裤，把它伸得远远地审视它；他怀着一种近于钟爱的仇恨仔细察看它。然后他咬住裤子的一头，用手紧紧抓住另一头，使劲地一拉。他听见布撕开的声音。他把撕坏的内裤扔在地板上。他希望母亲会看见它撂在那里。

然后他穿上一条黄色的“教练员”，穿上玛曼为他准备的衬衫，领带，外套和裤子，离开了家。

他在接待室里交出身份证（这是进入国家安全局大楼的惯例），然后爬上通往三楼的楼梯。瞧瞧他上楼的样子。他意识到了每一步！他看上去好象他肩上正扛着他的命运；他爬楼梯仿佛他不仅是在爬向一幢楼房的更高一层，而是在爬向他自己生活的更高一层，从那里他将可以眺望一个崭新的全景。

所有的迹象都是吉利的；当他踏进老同学的办公室，看见他的面孔时，他就知道，这是一个朋友的面孔；它对他微笑；它现出令人愉快的惊讶；它是使人快慰的。

看门人的儿子说，他很高兴雅罗米尔来看望他。雅罗米尔心里漾起了极大的欢乐，他在给他拿来的椅子上坐下。他第一次真正感到他面对着他的老同学，就象一个意志坚强的成年人面对着另一个成年人；平等对平等；男人对男人。

他们随便聊了一会儿老朋友之间的应酬话，但对雅罗米尔来说，这只是一个愉快的序曲，在此期间，他急切地等待着幕启。“我来看你的主要原因是，”最后他用一种严肃的语气说，“我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我得知有个人打算就在这几小时之内逃离祖国。我们必须设法阻止他。”

看门人的儿子变得格外留心起来，向雅罗米尔问了几个问题。雅罗米尔迅速而准确地回答了。

“这是一桩很严肃的事情，”看门人的儿子说，“我本人不能处理它。”

他领着雅罗米尔穿过长长的走廊，进了另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他把他介绍给一位穿着便服年纪较大的人。在看门人的儿子介绍雅罗米尔是他的一位老同学后，那个人给了雅罗米尔一个同志式的微笑；他们叫来一个书记员作笔录；雅罗米尔不得不提供精确的情报：姑娘的名字；她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她的年龄；她的家庭背景；她父亲，兄弟，姐妹们的职业；她告诉他关于她兄弟打算叛逃的确切时间与日期；她兄弟是什么样的人；雅罗米尔对他有何了解。

雅罗米尔说他知道得很多，因为姑娘经常谈到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认为这件事十分重要，匆匆忙忙地赶来告诉他们，把他们看作他的同志和同胞。姑娘的兄弟仇恨我们的社会制度。这是多么不幸！他来自一个下层的贫苦家庭，但因为他曾经给一个资产阶级政客当过司机，现在心甘情愿成了那些谋叛国的人的工具。是的，他可以完全肯定地这样说，因为姑娘曾把她兄弟的观点十分清楚地转告过他。据她说，他很乐意枪毙共产党员。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种人——他唯一阴谋目标就是破坏社会主义——一旦通过边境会干些什么。

三个人用简洁有力的平淡语气向书记员口授了这一陈述，那位年纪较大的官员告诉雅罗米尔的朋友，赶快去做必要的安排。看门人的儿子冲出去后，这位官员对雅罗米尔的帮助表示感谢。他告诉他，如果全国人民都象他一样警惕，社会主义祖国就会不可战胜。他说，他希望他们的见面不会是最后一次。“你一定知道我们的祖国有多少敌人，”这人说，“你长期和大学里的学生在一起，毫无疑问你认识许多文人。当然，他们大多数都是诚实的人，但他们中也有不少捣乱分子。”

雅罗米尔钦敬地望着警察的脸。在他看来，这张脸很美，纵横交织的深深皱纹证明了一个毫不妥协，精力充沛的生活。是的，雅罗米尔也希望他们的见面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很高兴能尽微力。他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

他们握着手，朝对方微笑。

带着印在他脑子里的微笑（一个真正的人的美好、起皱的微笑），雅罗米尔离开了警察总局。他在通往人行道的那段台阶上面停了一会儿。一个晴朗严寒的早晨笼罩在城市屋顶的上方。他吸了一口冷空气，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活力，差一点要唱起来。

他首先想径直回家，坐在他的桌前写诗。但走了几步他便停下来；他不想独自一人。他觉得在过去那一小时内，他的容颜已变得坚强起来，步伐更加坚定，声音更加果断。他希望让人看见他新的化身。他经过大学，对每一个认识的人讲话。没有人谈论他看上去与平常有什么不同，但是太阳仍然在照耀，一首未写的诗仍然在房顶上翱翔。他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满了几张纸，但对写出的东西并不满意。

于是他放下笔，沉缅于白日梦中；他梦见一道神秘的门槛，青年人要想成为成年男人必须跨过这道门槛；他知道这道门槛的名字：它的名字不是爱情，而是责任。要写有关责任的诗是很难的。这个词能唤起什么意象呢？但是雅罗米尔觉得，正是这个严厉、刻板的词可以唤起新的、意想不到的意象。毕竟，他写的责任与这个词的旧的含义不同，不是由外部的权

力强加的，而是人们为自己创造，自由选择的责任，这种责任是自愿的，体现了人类的勇敢和尊严。

这些想法使雅罗米尔热情洋溢，它们帮助他勾勒出一幅崭新的自画像。他再一次渴望让人看见这个新的变形，于是匆匆奔向红头发姑娘的住处。又是快六点了，她应该早就回到了家。但她的房东告诉他，她上班还没有回来。房东说，大约半小时前有两个男人一直在找她，他也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雅罗米尔要消磨时间，他在红头发姑娘住的那条街上来回漫步。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有两个男人似乎也在踱来踱去。他心想他们也许正是房东提到的那两个人；然后他看见姑娘从街对面走来。他不想让她看见他，于是他迅速闪进一个黑暗的门洞，瞧着她轻快地走向那幢楼房，消失在里面。他感到不自在，也不敢动。接着他看见那两个男人紧跟在她后面。几分钟后，他们三个人都出来了；这时他才注意到一辆汽车停放在离大门几步远处；那两个男人和姑娘爬进汽车，然后开走了。

雅罗米尔明白了，这两个温文尔雅的人多半是警察；但除了一种冰冷的恐惧感，他还感到惊奇，他这天早上的行为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行动，它使一连串真正的事件调动起来。

第二天，他匆匆赶到姑娘的房子，以便她刚一下班回来就截住她。但是房东告诉他，自那两个男人把她带走以后，这位年轻姑娘还没有回来。

他心慌意乱。第二天一早他又去警察总局。看门人的儿子仍然显得很亲热，热情地握住他的手，笑语吟吟。当雅罗米尔询问他的女友为何还没有回家时，他告诉他不要着急。“你使我们跟踪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得把那些病菌摆在放大镜下面。”他带着一种暧昧的微笑说。

雅罗米尔再一次走出警察总局大楼，步入一个晴朗严寒的早晨；他再一次吸了一口冷空气，感到浑身充满了命运感。然而，有一样与前一天不同。现在他想到，由于他那个决定性的行为，他已经步入了悲剧的领域。

是的，当他走下通往大街的那段长长的台阶时，他正是这样对自己说的：我已经步入了悲剧的领域。他朋友那句笑里藏刀的话，我们得把那些病菌摆在放大镜下面，激起了他的想象。他意识到他的女友现在正落在一帮陌生男人的手中，任凭他们摆布，她正处在危险之中，持续几天的审讯肯定不是闹着玩的事。他也回忆起他的朋友跟他讲过的有关那位黑头发犹太人的事，有关他工作中更冷酷无情方面的事。所有这些念头和想象以一种甜蜜、芬芳和庄严的物质充满了他，以致他觉得自己变得愈来愈大，象是一个有生命的悲哀的纪念碑，大步穿过了街道。

他心想，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两天前费力写的那首诗为什么没有价值。两天前他还没有理解自己的行为。两天前他还想写有关责任的诗。可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责任的庄严产生于爱情血淋淋的、劈开的头！

雅罗米尔走在街上，被自己的命运弄得很茫然。后来他回到家，发现一封信。特此邀请你下周某某日来见一些我想你会觉得趣味相投的人。信的署名是那位拍片姑娘。

尽管这个邀请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允诺，雅罗米尔仍然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证明了这个漂亮的拍片姑娘并不是一个失去的机会，他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个奇特的念头掠过他的头脑，这封信在这一天来到，在他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悲剧的境遇的这一天，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显然，这一切都有着某种更深沉的意义。他内心充满一种模糊的、令人鼓舞的感觉，他这两天所经历的一切已经终于使他有资格泰然自若地凝视黑头发拍片姑娘令人眼花缭乱的美丽，怀着男子汉的自信心参加她的聚会。

他的感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诗歌，他在桌前坐下。不，爱情和责任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他对自己说。那是用一种曲解的、旧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么爱情要么责任，要么爱情要么革命，——不，不，没有这样的两难处境。他并不是因为爱情

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是的，事情正是如此。雅罗米尔使他情人的安全遭受危险，正是因为他爱她胜过其他男人爱他们的女人；正是因为他知道，爱情和洋溢着纯洁感情的光明的新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为了未来的世界牺牲一个具体的、充满生气的女人（红头发，矫小，健谈，有雀斑的脸）是可怕的。这种牺牲，是我们时代唯一真正的悲剧，是值得写出一首伟大诗歌的！

他坐在桌前写作，在房间里踱步，他觉得他正在创作的这首诗是他所有诗歌中最伟大的一首。

这是一个心醉神迷的夜晚，比他能够想象的所有爱情的夜晚还要迷人；这是一个神奇的夜晚，尽管他独自一人在他童年时代的旧房间里。玛曼在隔壁。雅罗米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一直在生她的气。事实上，当她敲门问他在干什么时，他对她很温柔地讲话。他解释说他需要安静和集中精力。“我正在写我一生中最伟大的诗。”他说。玛曼笑了（母亲的微笑，善于接受、富有同情的微笑），让他处在安静中。

最后他上床睡觉。他突然想到，就在此时此刻，他的女友肯定正被一群男人围住——警察，审讯员，看守。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她。观看她换上囚衣，透过单人牢房的窗子窥视她坐在桶上小便。

实际上，他并不真的相信这些极端可能性的真实（他们多半只是录下她的口供，然后就会放她走）。但是幻想却不能控制住；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象她坐在单人牢房里，由一个陌生男人看守着，审讯员脱掉她的衣服。有件事使他困惑：这些幻想竟然没有激起丝毫的忌妒！

你必须属于我，如果我想要，你就得死在刑架上，济慈的叫声穿过了多少岁月在回响。为什么雅罗米尔应该忌妒呢？红头发姑娘现在比以前更加属于他：她的命运是他的创造；当她朝桶里小便时，正是他的眼睛在瞧着她；当看守粗暴地对待她时，正是他的手在抚摸她；她是他的牺牲品，他的创造品；她是他的，他的，整个属于他的！

雅罗米尔不再忌妒，这个晚上，他象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沉沉入睡了。

第六章　　中年男人

我们故事的第一章包括了雅罗米尔生活中的十五年，而第五章尽管篇幅一样长，却仅仅包括了一年。在这本书里，时间流动的速度刚好与真实生活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速度反而慢了下来。

这是因为我们是从一个了望台来观察雅罗米尔的故事，这个了望台是我们在他临死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对我们来说，他的童年在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月份和年头难以察觉地融合在一起。随着他和他母亲从朦胧的地平线上出现，朝着我们的了望台愈走愈近，一切都渐渐变得清晰了，有如一幅高度写实的绘画，在每一片叶子上表现出每一条叶脉。

正如你的生活是由你选择的那种职业和婚姻所决定、我们的小说也是由我们了望台的角度所限定：我们能够完全看见雅罗米尔和他母亲，而其他人物只有当他们出现在这两个主角面前时我们才能瞥见他们。我们选择了这个方法正如你选择了你的命运，你我的选择都同样是不可改变的。

然而，每一个人都遗憾他不能过其他的生活。你也会想过一过你所有未实现的可能性，你所有可能的生活。（啊，做不到的泽维尔！）我们的书就象你一样。它也渴望成为它本来可能成为的所有其它小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幻想着建立其它的了望台。在那位画家的生活中间，或者在看门人儿子的生活里，或者在红头发姑娘的生活里竖立起一个了望台怎么样？毕竟，我们对这些人真正知道些什么？我们知道的几乎不比雅罗米尔这个傻瓜更多，他对任何人都知道得极少。如果我们追随看门人儿子的生涯，雅罗米尔只是在有关一个诗人和老同学的短暂插曲中出现一两次，那它会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或者我们可以追随那位画家的故事，最终得知他对他亲爱的玛曼的真正想法，他曾经用她的肚皮作为一块画布。

人不能跳出他的生活，但小说也许有更多的自由。假设我们匆匆地、悄悄地拆除我们的了望台，把它移到别处，至少暂时移开怎么样呢？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移一段很长，很长的路，远于雅罗米尔的死！也许一直移到这里，移到今天，已经几乎没有人（他母亲几年前也去世了）还记得雅罗米尔。

天哪！想象一下把一个了望台建造得如此之近！也许顺便访问一下曾与雅罗米尔一起坐在警察礼堂讲台上的所有诗人！他们那时朗诵的诗歌在哪里？没有人再回忆这些诗歌，作者本人将会否认写过它们。因为他们感到害臊，每一个人都感到害臊……

那个遥远的时期实际上留下了些什么呢？今天，人们把那些日子视为一个政治审讯；迫害，禁书和合法谋杀的时代。我们这些还记得的人必须作证：它不仅是一个恐怖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抒情的时代，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那堵人们被囚禁在后面的墙是由诗歌筑成的。在墙的前面还有舞蹈。不，不是死的舞蹈！而是一个天真的舞蹈。天真伴随着血腥的微笑。

你说，那是一个蹩脚的抒情时代吗？不完全是！带着信奉者的盲目眼光描写那个时代的小说家，制造出虚假的、不成功的作品。但同样盲目地与那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诗人，却常常留下美好的诗歌。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通过诗歌的魔力，一切陈述都变成了真理，只要这些陈述是依靠激情的力量。诗人们显然深深地感到他们的激情郁积着，燃烧着。他们火热感情的蒸气在天上蔓延开来，象一道彩虹，一道横跨监狱高墙的美丽彩虹……

但是不，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了望台建造在今天。我们并不关心描写过去，不关心在愈来愈多的镜子里捕捉它的形象。我们选择那个时代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它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那个时代似乎提供了一个捕捉兰波和莱蒙托夫、抒情和青春的绝妙的圈套。如果不是捕捉一个英雄的圈套，小说又是什么呢？让对那个.时代的描写见鬼去吧！我们只对一个年轻的诗人感兴趣！

因此，我们称做雅罗米尔的那个年轻人决不能完全脱离我们的视界。是的，让我们暂时离开我们的小说，让我们把我们的了望台移到雅罗米尔生命的尽头，把它安在由截然不同的材料构成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心里。但我们别把它再往前安在雅罗米尔死后三年之外，在这个时间内，雅罗米尔还没有被完全忘记。让我们制作一个章节，这一章节将与故事的剩下部分有关，就象一个小宾馆与一座乡村庄园的关系。

这个宾馆就在这座庄园的另一头。是一幢自成一体，独立于主要房屋的建筑。它可能已经转租出去，庄园的住户没有它也完全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在夏日的一天。厨房里的气味和人们的说话声从庄园漂进了宾馆开着的窗户……

让我们假设这个宾馆的角色由一个男人的公寓房间来扮演：一个有装衣服壁橱的门厅，一间有着纤尘不染的浴缸的洗澡间，一个到处放着脏碟子的小厨房，一间同时用作起居室和卧室的大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宽沙发，一面大镜子，四面墙都是书架，几幅装了框的绘画（古代油画和雕刻的复制品），两把扶手椅之间有一张咖啡桌，一个面朝屋顶和烟囱的窗户。

这是春天的一个傍晚。房间的主人刚回到家。他打开旅行袋，取出一条折皱的工装裤，把它挂在壁橱里。然后他走进里屋，打开窗户，凉爽的新鲜空气漂进房间；这人走进浴室，打开浴缸上面的热水龙头，开始脱衣，满意地审视自己的身躯；他已有四十多岁，但自从他开始干体力活起，他一直都感到身体状况很好；他的头脑好象更加虚弱，可他的胳膊和大腿

却变得更加强壮。

他在浴缸里伸长四肢，把一块木板横放在浴缸上，用作临时凑合的桌子。几本书摆在他面前的木板上（对古希腊和古罗马作者的离奇的兴趣！）；他愉快地泡在热水中，沉浸在书本里。

蓦然，门铃响了。一声短的，两声长的，停了一会儿，又是一声短的。

他不喜欢被不速之客打搅，为此他同他的朋友和情人还安排了一套信号。但是，这是谁的信号呢？

也许他逐渐变老了，记忆力正在消失，他懊丧地想。

“等一会儿！”他叫道，从浴缸里出来，不慌不忙地擦干身子，穿上浴衣，把门打开。

一位穿着厚厚冬大衣的姑娘站在门外。

他马上认出了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把我放了。”她说。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我在等你下班回来。”

他帮她脱掉大衣——厚厚的、褐色的，破旧的——把它挂在衣架上。他注意到她身上穿的正是她最后一次看望他时穿的那套衣服，同样的外套，同样的冬大衣。三年前的一个冬天似乎给这个春天的下午抛来一股寒气。

姑娘也很惊异地发现房间没有改变，而在这期间，她的生活中已发生了多少变化。“这里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她说。

“是的，是这样。”

他指了指她最喜欢的那把椅子。当她刚一舒适地坐定，他就连珠炮般地向她发问。你饿吗？你确实不想让我给你准备份三明治吗？你从这里准备去哪儿？你打算回家吗？

她告诉他，她的确准备回家，她已经走到了火车站，但还是决定回来先见他一面。

他仍旧穿着浴衣。“请原谅，”他说，“让我穿些衣服。”他走到门厅，把背后的门关上。在他穿衣之前，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当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时，他解释说发生了一件事，他不能在当晚去看她。

他对坐在他房间里的那位姑娘没有任何义务；然而，他还是不想让她无意中听到他的谈话，因此他把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在他讲话时，他一直望着衣架上那件破旧的褐色大衣。它使空气中充满了怀旧的音乐声。

自从他最后一次看见她已经过去三年了，而他们认识已经有五年了。他认识许多更迷人的女人，但这个姑娘却具有一些罕见的品质。他认识她时，她大约十七岁，坦率得逗人，性欲很强。她渴望使他幸福；在十五分钟内她就明白了他忌讳谈爱情，他没有作任何解释，她就顺从了，只在他明确要她来时才来看望他（几乎每个月不到一次）。

他毫不掩饰他对同性恋女人的偏爱；在一次性交的放纵中，姑娘在他耳边悄声说，她曾在一个浴场如何引诱了一个陌生女人，接着描述了她们怎样作爱。这个故事使他感到愉快，在意识到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时，他被姑娘想取悦于他的多情感动了。并非所有姑娘的爱情业绩都是有想象力的。她把他介绍给她的一些女朋友，她鼓励并组织了一系列愉快的性爱的娱乐活动。

她明白她的中年情人不但不要求忠贞，而且如果他的情妇在别处卷入更为认真的爱情事件，他会感到更加安全。因此她天真轻率地以叙述她目前和过去的恋爱来款待他，他觉得这些恋爱有趣而娱人。

此刻，她正坐在扶手椅里（这个男人在此期间已穿上一条宽松裤和一件毛衣）。她说，“我刚离开监狱时，看见了许多马。”

“马？什么马？”

她解释说，早晨，当她刚跨出监狱大门时，一些人骑在马上正好驰过。他们高高地坐在马鞍上，仿佛他们从这些动物身上长出来，形成了一个超人的怪物。姑娘感到自己渺小，微不足道。在她头的上方，她听见了喷鼻声和大笑声，吓得她紧紧靠在监狱的墙上。

“从那儿出来后你到哪里去了？”

她去了电车站。太阳变得很暖和，她感到穿着厚大衣很不舒服。过路人的注视使她感到窘迫，担心电车会很拥挤，人人都会张嘴凝视她。很幸运，电车站除了一个老妇人什么人也没有。发现只有一位老妇人在那里，这真是福气。

“于是你决定先来看我？”

责任要求她应先回家去看望她的父母。她已经去了火车站，在售票窗前排上队，但轮到她时，她却跑开了。一想到回家她就感到沮丧。她饿了，买了一份色拉三明治。她坐在公园里，一直等到四点钟，她知道他在这个时间会下班回家。

“我很高兴你先来这里。你来真是太好了。”他说。

“你记得，”他顿了一顿又说，“你还记得你说的话吗？你说你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

“这不是事实，”姑娘说。

“是的，是事实。”他微笑说。

“不，不是!”

这当然是事实。三年前的那天她来见他时，他打开了酒橱，想要倒点白兰地。姑娘摇着头说。“不，不要给我倒，我决不会再在你的房间里喝任何东西。”

他很惊异。姑娘继续说，“我不会再来看你了。今天我来这里正是为了告诉你这个。”

他仍然显得很惊异。她告诉他，她真的爱上了她对他讲过的那个年轻人，她已决定不再欺骗他了。她来请求她的中年朋友同情她的处境，希望他不会生气。

尽管这位中年男人喜欢多姿多彩的性爱生活，但他基本上还是具有田园诗般的气质，重视他冒险中一定的宁静和秩序。的确，这位姑娘不过是在他爱情群星中闪烁的一颗羞怯的小星，但即使是一颗星星突然脱离了它在天空中固有的位置，也会给天上的和谐带来不受欢迎的紊乱。

而且，他感到没有被理解，受到了伤害。姑娘有一个爱她的小伙子，他难道不是真正地感到高兴吗？不正是他要她告诉他有关那个年轻人的一切，不正是他给她出主意怎样赢得那个年轻人的爱吗？事实上，那位年轻的情郎使他感到如此逗趣，以至他甚至把那家伙写给姑娘的诗歌保存了下来。他觉得这些诗人令人恶心，但他对它们感兴趣，正如他对他周围正在崛起的世界感兴趣一样，他从温暖舒适的浴缸里观察着这个世界。

他愿意用他所能聚集的一切玩世不恭的仁慈保护这对年轻的恋人，姑娘的突然决定象十足的忘恩负义使他受到冲击。他发现很难控制自己不让姑娘看出他的愤怒。看到他脸上的不悦，她讲了许多话来替她的决定辩护；她反复声明，她真诚地爱她的小伙子，决心对他绝对忠实。

而此刻，三年后她又来到这里，坐在同样的椅子里，穿着同样的衣服，告诉他，她从来没有说过这类话!

她没有在说谎。她属于那些少有的人，他们分不清事实和愿望，把他们合乎道德的希望误认为是事实。当然，她完全记得她对自己的中年朋友说过的话；但是当她意识到她不应该说那样的话时，她就拒绝回忆真实存在的事实。

当然她记得：那天下午，她同她的中年伙伴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一点，超过了她的打算，因此未能赶上与那位年轻人的约会。小伙子觉得受了极大的侮慢，她意识到只有一个同样极其严重的借口才能平息他的愤怒。因此她编造出同一个想叛离祖国的兄弟待了一下午的故事。自然，她不可能想到年轻的情人会催促她向警察告发她的兄弟。

于是就在第二天，她一下班就跑到她的中年朋友那里去讨主教她怎样对那年轻人描述这

场大吵大闹。他还建议，她应该让那家伙感到，他间接地成了她家的救星，因为如果没有他决定性的影响，她兄弟本来会实行他那愚蠢的计划，并且无疑会在边境被抓住，或者甚至会被边防哨兵击毙。

“你同那个年轻人的谈话结果到底怎样？”

“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刚从你这里回去，他们就逮捕我了。他们正在我房子前面等着我。”

“结果你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谈一谈？”

“没有。”

“但他们肯定已告诉了你，他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

“你真的不知道？”中年男人吃惊地问。

“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娘回答，耸了耸肩，仿佛表示她也不关心。

“他死了，”男人说，“他们把你带走后不久他就死了。”

姑娘的确不知道这事。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她听见了那个年轻人哀怜的话语，他曾想把爱情和死亡放在同一个天平上。

“他自杀的吗？”她用一种温和的声音问，听起来似乎愿意马上原谅。

男人笑了。“噢，不，一点也不是这样。他只是生了病，随后就死了。他的母亲搬走了。你在那幢旧别墅里再也不会找到他们的一点痕迹。不过在公墓里却有了一块很大的黑色墓碑。就象一位伟大作家的墓碑。这里埋葬着一位诗人……这是他母亲刻在石头上的话。在他的名字下面，他们还刻下了你给我看过的那首墓志铭，那首愿意死于烈火的墓志铭。”

他们陷入了沉默。姑娘在思索着这个事实，那位年轻人并没有自杀，而是死得很平常。甚至他的死都在背弃她。不，从监狱出来后她就永远不想再见到他，但是她没有考虑到他已不再活着的可能性。如果他已不存在了，那么她三年囚禁的根由也就不复存在了，一切都变成了一场噩梦，毫无意义，纯属虚幻。

“吃点晚饭好吗？”他问，“来帮我一下。”

他们走进厨房，切了一些面包，做了火腿和色拉三明治，开了一听沙丁鱼罐头，找了一瓶酒。

这是他们过去一直遵循的程序。对姑娘来说，知道这种固定的生活始终在等待着她，毫无变化，未被搅乱，她仍然可以很快进入它，这是一种令人安慰的感觉。此时此刻，她觉得这是她所知道的最美好的一点生活。

最美好？为什么？

这是一部分十分安全的生活。这个男人对她很好，从来不要求什么；她没有什么要感到内疚和负责的；跟他在一起，她总是很安全；这是当人们暂时摆脱自己的命运时所感到的那种安全；她就象剧中的一个人物那样安全，当第一幕结束时，有一个休息时间；其他人物也摘下他们的面具，变成在随便交谈的普通人。

这位中年男人很久以来就觉得自己处在他生活的戏剧之外；战争一开始，他同他年轻的妻子一道逃到英国，当了一名飞行员与德国人作战，在一次对伦敦的空袭中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回国后，他决定留在军队里服役，与雅罗米尔决定学习政治学正好是同一个时候，但他的上级认为他与资本主义英国的关系太密切，他在政治上不很可靠，不能在人民的军队里服役。于是，他到了一家工厂干活，他背弃了历史以及它富有戏剧性的表演，背弃了他自己的命运。他完全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身上，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中和他的书本中。

三年前姑娘来向他告别，因为他只为她提供了一个插曲，而那个年轻人却要为她提供一生。此刻她正在这里用力咀嚼火腿三明治，呷酒，很高兴她的中年朋友自愿给她提供幕间休息，渐渐地把自己裹在幸福的安宁中。

她得到休息了，很想谈谈话。

空盘子里只剩下面包屑，酒瓶也空了一半，她详细叙述了她在监狱里的经历，谈到同狱囚犯和看守，语气是那样漫不经心，毫无悲悯。如同她的习惯，她详尽讲述了她觉得有兴趣的细节，用一种缺乏逻辑但令人愉快的叙述流把这些细节连接起来。

可这次她谈话的方式有点奇怪。通常，她的谈话虽是天真地兜着圈子，但最终仍然指向事情的核心，然而。这一次，她的话始终围绕着核心转，仿佛想隐藏它。

但是这核心是什么呢？中年男人终于明白了。他问，“你的兄弟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他们放了他吗？”

“没有……”

现在他才明白，姑娘为什么从售票口跑开，她为什么这样害怕回家。她不仅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她还是一个给她兄弟和她全家带来灾难的罪人。他可以想象审讯员为了强迫她招供而使用的那些手段，为了逃避那些折磨她的人，她是怎样使自己纠缠在一个新的，更有破坏性的怀疑的圈套里。她怎么才能向她的家庭解释，不是她告发了她的兄弟，而是某个神秘的甚至已不再活在人世的年轻人？

姑娘沉默不语，她的中年朋友不禁产生了一阵怜悯。“今天不要回家。等一等。你有足够的时间。你得把这一切仔细想一想。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在我这里。”

他把手放在她的脸颊上。他没有抚摸她，他只是轻轻地，温存地用手按着她的皮肤。

这个动作是那样爱怜，姑娘顿时热泪盈眶。

自从妻子死后（他非常爱她），他对女人的眼泪就不在意。他怕它们就象怕女人再会迫使他积极加入她们生活戏剧的危险一样。他把眼泪看作是竭力想诱捕他，把他从自己非命运的田园诗般状态中拖出来的触须，他憎恶地躲开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手掌一接触到湿漉漉的眼泪时就吃了一惊的原因。他甚至更加吃惊地发现，此刻自己完全无能为力抵抗它们令人肠断的力量。这一次，他知道它们不是冲着他洒下的爱情眼泪，它们不是欺骗、不是敲诈，也不是卖弄。它们是纯洁单纯的，从姑娘眼里自然而然地流下来，就象悲哀或欢乐从一个人身上不易觉察地显露出来一样。他没有防护物来挡住它们的天真单纯，他的灵魂深深地感动了。

他想到他与这位姑娘交往的整个期间，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对方。他们总是替对方着想，给对方短暂的快乐。他们是满足的。没有必要责备。在姑娘被捕的时候，他曾尽了一切可能去解救她，从中他得到了特别的满足。

他把她从椅子里扶起来，用手指擦着她淌满泪水的脸，温柔地搂抱她。

在舞台侧面某处，在三年前我们离开的一个故事里，死亡一直在不耐烦地等待着。此刻，死亡的骸骨正投射出一个长长的阴影，落到中年男人和他年轻伴侣的场景上，突然的黑暗使这间暖和舒适的房间感到了寒冷。

男人正温柔地抱着她，但她却一动不动地蜷缩在他怀里。

这种蜷缩意味着什么？

她在把自己交给他。她已把自己置于他的怀里，愿意留在那儿。

但是蜷缩意味着她没有对他开放！她已交出自己，但她仍保持着封闭。她的双肩耸在一起以便掩住胸部，她的头没有转向他的头，而是靠在他的胸口上。她正窥视着他毛衣的黑暗处。她把自己安全地密封起来交给他，在他的拥抱中得到保护，就象在一个钢制保险箱里。

他抬起她低着的、泪湿的脸，开始亲吻她。他是出于同情而不是肉欲的刺激，但这种情形常常产生一连串无意识的、很难逃避的反应。他试图用他的舌头撬开她的嘴，但没有成功；她的嘴唇闭得紧紧的，拒绝回报。

真奇怪，他愈是不能从她那里得到回应，淹没了他的同情浪潮就愈是强烈，他开始意识

到，在他怀中这位姑娘的心灵已经从她躯体里抽出去了。这个血淋淋切除的创伤还没有愈合。

他摸着她可怜的、骨瘦如柴的身子。降临的黑暗抹掉了所有明显的轮廓，使他俩的身体失去了界限和外形，他同情的浪潮越发增强了，与此同时，他的躯壳内感到他已能够从肉体上爱她了！

这是完全出乎意外的。他没有肉欲而感到了肉欲，他由于兴奋而产生了兴奋！也许这仅仅是纯粹的仁慈，由于某种神秘的变质而转成了肉体的觉醒。

这个兴奋来得如此突然，不可思议，他浑身都充满了激情。他急切地抚摸她的身子，试图解开她衣服的钮扣。

她奋力挣脱出来。

“不，不！请不要！我不想要！”

由于只靠话语似乎不能阻止他，她挣脱了他的怀抱，退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这是为什么？你怎么了？”他问。

她一声不响地紧紧靠在墙上。’

他走到她跟前，抚摸着她的脸颊。“好了，好了。你不是怕我，对吧？告诉我，怎么啦？你发生了什么事？”

她站在角落里，默然无语，找不出话来。在她眼前，她又一次看见那些马经过监狱大门，高大、健壮的动物与它们的骑手配在一起，形成一个骄傲的整体。与它们肉体的完美相比，她是那样矮小，那样可怜，她真想与附近任何物体融合在一起，与树干或墙融合在一起，以便藏在它们的无知无觉之中。

“你怎么了？”他又说。

“我不应该来这里。我但愿你老了。很老很老。一位老太婆。或一位老头子。”

他默默地抚摸她的脸庞，然后请她帮他铺床（房间里已经一团漆黑）。他们紧挨着躺在宽沙发上，他用一种温柔、安慰的声音跟她说话，他已多年没有对任何人这样说话了。

对性爱的渴求已经完全消失，但他浑身却充满了一种温柔的同情，它是那样深沉，那样强烈，以致不能自己。他点亮一盏灯，凝视着姑娘。

她仰卧着，紧张，尴尬，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她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对她干了些什么？打她？恐吓她？折磨她？

他不知道。姑娘沉默不语，他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她的前额，她的面颊。

他抚摸了她很长时间，直到他觉得她眼中的恐惧似乎正在消除。

他抚摸了她很长时间，直到她闭上她的眼睛。

房间的窗户开着，春夜凉爽的空气流了进来。房间再次陷入黑暗之中，中年男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姑娘身边。他听着她的呼吸声，她不安的辗转声，当他觉得她已经入睡时，他轻轻地抚摸她的胳膊，在她悲伤的自由的新时期，他能够为她提供第一夜的休息，这使他感到幸福。

我们把小说这一章比做的宾馆也有一扇开着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我们仍然可以听见不久前我们离开的那部小说的声音。你听见远处死亡不耐烦的跺脚声了吗？让它等一等，我们还在这间房子里，在另一本小说里，在另一个故事里。

另一个故事吗？不，不是真的。在中年男人和姑娘的生活中，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这段插曲仅仅是故事里的一个停顿，而不是故事本身。他俩的相遇几乎不会使他们卷入一场冒险。它只是在等待着姑娘的痛苦之前这位男人赐与她的一个短暂的间歇。

在我们的小说中，这一部分也仅仅是一个宁静的插曲，在这个插曲里，一个无名的男人出乎意料地点亮了一盏仁慈的灯，在它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之前，让我们再凝视它几秒钟，那盏宁静的灯，仁慈的灯……

第七章　　诗人死了

只有真正的诗人才知道在装着镜子的诗歌之屋里是多么孤独。远处的枪炮声透过窗子依稀可闻，心中渴望着奔向广阔的世界；莱蒙托夫正在扣上他军服的钮扣；拜伦正在把一只左轮枪放进他床头柜的抽屉里；沃尔克在他的诗里正在与大众手挽手前进；哈拉斯正在激昂地发出押韵的诅咒；马雅可夫斯基正踩在他自己的歌喉上；一场光荣的战斗正在镜子里激烈进行。

小心，我恳求你！假如一个诗人走错一步，迈出他的镜子领域，他就将毁灭，因为他不是一个好射手。如果他放一枪，他将把自己打死。

啊，你听见他们来了吗？一匹马正在高加索一条弯曲的山路上疾驰，马鞍上坐着佩带手枪的莱蒙托夫。又传来马蹄声，车轮辗轧声：这是普希金，拿着手枪，朝一场决斗驶去。

我们现在听见的是什么？是一辆电车，一辆缓慢的、摇摇晃晃的布拉格电车。它正把雅罗米尔从一个郊区载往另一个郊区；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一条领带，一件冬大衣和一顶帽子。

哪一个诗人从未幻想过他的死亡？哪一个诗人从未在他的想象中描绘过它？我必须死吗？那就让我死于烈火吧。你认为这只是偶然的想象游戏引起雅罗米尔想到一个燃烧的死吗？完全不是。死亡是一个启示；它说话；死的行为有它自己的语义学，一个人怎样死，死于哪种环境，并非无足轻重。

杨·马萨里克[1]死于 1948 年，当看到自己的命运被定数的坚硬龙骨碰得粉碎时，他坠落在布拉格一个宫殿的院子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三年后，诗人康斯但丁·比布尔[2]——遭到他视为自己同志的人追捕——从同一城市的一幢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象伊卡尔斯[3]一样，拥抱他的环境是大地，他的死象征着空间与块面，梦与觉醒之间的悲剧冲突。

----

[1]杨·马萨里克（1886－1948），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外交家，捷克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之子。1948 年二月革命后留任外交部长，几星期后发现他坠在契尔宁宫的院子里。

[2]康斯但丁·比布尔（1898－1951），捷克当代诗人。

[3]伊卡尔斯：希腊神话中人，以蜡与羽毛造成之翼逃出克利特岛，因接近太阳其翼融化，坠海而死。

杨·胡斯[4]和杰尔达诺·布鲁诺[5]不可能死于刀剑。也不可能死于刽子手的绞索，而只可能死于火刑柱。他们的生命因此变成了信号灯，灯塔，火炬，照耀着许多世纪。因为肉体是短暂的，思想是永恒的，闪烁着光芒的实体是思想的形象。

----

[4]杨·胡斯（约 1369－1415）。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被教会处以火刑。

[5]杰尔达诺·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因反对经院哲学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

另一方面，奥菲莉亚[6]决不可能死于火中，而必须死于水里，因此水的深度与人的深度是紧密联系的。对那些溺死在他们的自我中，他们的爱情中，他们的情感中，他们的疯狂中，他们的内省和混乱中的人来说，水就是他们致死的环境。民歌描述了姑娘们因她们的情人没有从战场上归来而投水自杀的故事；哈丽艾特·雪莱[7]投河自尽；保尔·策兰[8]去参

加聚会，死于塞茵河。

----

[6]奥菲莉亚：《哈姆雷特》中的女子，因哈姆雷特待她冷热不定，溺死在水中。

[7]哈丽艾特·雪莱（1795－1816），原名哈丽义特·威斯持勃鲁，雪莱的第一个妻子。1814年分手后、于1816年投河自尽。

[8]保尔·策兰（1920－1970），原名保罗·安切尔，奥地利诗人。

他下了电车，朝黑头发姑娘的别墅走去，这座别墅曾经目睹过他象胆小鬼一样地逃掉。

他在想着泽维尔。

最初，只有雅罗米尔。

然后雅罗米尔创造了泽维尔，他的替身；他的第二存在，梦幻一般的、喜欢冒险的。

现在，清除梦幻与现实，诗歌与生活，行动与思想之间冲突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为了结束泽维尔和雅罗米尔之间的分裂，两者必须合而为一。幻想的人必须成为行动的人，梦想的冒险必须成为生活的冒险。

他正在走近别墅。又感到了从前那种缺乏自信的痛苦。喉痛加剧了他的紧张（因为他感冒了，玛曼那天晚上不想让他当他到了门口时，他犹豫了。为了鼓起勇气，他不得不回忆他最近的成就。他想到了红头发姑娘，她的受审，想到了警察和他仅仅凭借力量与意志而调动起来的，一连串事件……

“我是泽维尔，我是泽维尔，”他不断地对自己说，然后摁了门铃。

聚集在房间里面的人都是年轻的男演员，女演员，画家，以及布拉格艺术学校的学生：别墅的主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把这幢房子的所有房间都辟作聚会场所。拍片姑娘把雅罗米尔介绍给几个人，递给他一个高脚酒杯，请他随便饮他最喜欢的酒，然后就离开了他。

雅罗米尔穿着一件黑外套，白衬衫，打着领带，他感到非常拘谨和呆板；其他人都穿得很随便，有好几个男人穿着毛衣和宽松的裤子。他在椅子里局促不安，最后脱掉他的外套，把它扔到椅背上，松开领带，解开衬衫，这样才使他觉得好了一些。

来宾们在企图引起大家注意方面一个胜过一个。年轻男演员的举止就象在舞台上，不自然地高谈阔论；每个人都想给别人留下机智或有创见的深刻印象。雅罗米尔饮了几杯酒后，也想在聚会上出出风头。有几次他成功地甩出一句他觉得很机智的嘲讽话，引起了人们几秒钟的注意。

喧闹的舞曲透过墙壁咚咚咚地传过来。几天前，政府把二楼的第三间房子分配给了一家新房客。留给玛曼和雅罗米尔的两间房子就象一个宁静的小巢，被四面八方的嘈杂声包围起来。

玛曼听见了音乐声；她独自一人，她在想那位拍片姑娘。第一次看见她，她就感到在这位漂亮的姑娘与雅罗米尔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危险。她极力与她交朋友，以便在迫近的战斗中，为她儿子获得一个战略地位。现在她羞惭地意识到，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徒劳的。姑娘甚至没有想到邀请玛曼参加她的聚会！他们完全把她推在一边。

这位拍片姑娘曾经向玛曼吐露，她之所以在警察电影小组工作，只是因为她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需要政治上的保护，使她能够继续她的学业。玛曼明白了，这位富有心计的姑娘特点就是把一切都变成为她的利益服务。她不过是利用玛曼作为一块踏脚石，来得到她的儿子。

大家的竞争还在继续：有人演奏钢琴，几对男女在跳舞，高声的谈话和笑声从一堆堆的人群中传来。每个人都想用妙语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在大庭广众中超群出众，哪怕一瞬间也好。

马尔特诺夫[9]也在那里：高大，英俊，穿着他那优雅的军服，佩着短剑，被女人们围住，还真有点适合于歌剧呢。啊，这个男人使莱蒙托夫多么激怒！上帝不公平地赐给一个傻

瓜一张漂亮的脸，却给了莱蒙托夫一双短腿。但是，假如诗人缺少一双长腿，他却有一种杰出的嘲讽才智，这种才智可以使他高出于众人头上。

----

[9]马尔特诺夫：沙俄军官，与莱蒙托夫决斗并杀死他的人。

他走近马尔特诺夫赞赏的圈子，等待着他的机会。然后他开了一个粗鲁的玩笑，察看着人们脸上的惊愕神情。

终于（她离开了很长时间），她出现在房间里。“你玩得愉快吗？”她问，一双褐色的大眼睛盯着他。

雅罗米尔觉得，那个神奇的时刻又回来了，那个神奇的晚上，他坐在她的房间，他俩的目光只望着对方。

“不，我玩得不愉快。”他说，直盯着她的脸上。

“你厌烦了？”

“我是因为你才来这里，而你总象是在别处。如果你不能花点时间和我在一起，那你干嘛要邀请我？”

“可这里有那么多有趣的人！”

“他们全都不过是我登上去得到你的阶梯！”

他感到自信，对自己的口才很满意。

“今天这里有非常多的阶梯！”她笑着说。

“也许代替阶梯，你可以指给我一条秘密的通道，好让我更快地得到你。”

她仍然笑着。“我们试一试。”她说，拉着他的手，把他引出房间。她领着他上了楼，来到她自己房间的门口。雅罗米尔的心开始怦怦跳了起来。

它毫无必要跳动。房间里挤满了别的男男女女。

隔壁房间的灯早就熄了。已经是深更半夜。玛曼在等待着雅罗米尔，她想到她的失败，但接着她告诉自己，她毕竟只输了一仗，还会继续战斗下去。是的，她将继续为他而战；没有人能够把他从她身边夺走，没有人能够把她推在一边。她决心永远跟随他。虽然她坐在一把椅子里，但她却觉得她在跟随雅罗米尔，她在走进漫漫长夜，追随他，为了他。

姑娘的房间里人声嘈杂，烟雾弥漫。其中一位客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一直在注意地看着雅罗米尔。

“我想我听说过你。”他终于对雅罗米尔说。

“听说过我？”雅罗米尔反问，他受宠若惊。

那男人问雅罗米尔，他是否就是那个从儿童时代就常常去拜访一位画家的人。

雅罗米尔很高兴，一个共同的熟人就这样把他与这个团体联结得更加牢固，他急忙点了点头。

那男人说，“但是你已经很久没去看他了。”

“是的。”

“为什么不去？”

雅罗米尔不知道说什么好，耸了耸肩膀。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你认为这会妨碍你的前程。”

“我的前程？”雅罗米尔勉强地笑了笑。

“你正在发表诗歌，你正在出人头地，我们的女主人为了增进她的政治表现，拍了一部关于你的影片。但是你的朋友，那个画家却不许展出他的作品。我肯定你知道他们指控他是人民的敌人。”

雅罗米尔沉默不语。

“哎，你知道这件事还是不知道？”

“我好象听说过一些。”

“他的画被认为是颓废的资产阶级垃圾。”

雅罗米尔沉默不语。

“你知道你的那位画家朋友目前在于什么？”

雅罗米尔耸耸肩膀。

“他们把他从教学工作中赶走，他现在在当建筑工人。因为他不想放弃他的信念。他在夜里，在人工的光线下做画。但尽管如此，他却是在画美好的画。不象你的诗，一派令人作呕的屁话。”

又是一个粗鲁的玩笑，接着又是一个，直到英俊的马尔特诺夫终于感到了侮辱。他当众警告莱蒙托夫。

什么？诗人必须放弃他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的权利吗？他必须为运用了他的才智而请求原谅吗？决不！

莱蒙托夫的朋友们规劝他。毫无必要为了一派胡言去冒决斗的险。最好是把事情平息掉。你的生命，莱蒙托夫，比一些称作荣誉的难以捉摸的东西更有价值。

什么？还有比荣誉更珍贵的东西？

是的，莱蒙托夫。你的生命，你的写作。

不，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荣誉！

荣誉只是你虚荣的欲望，莱蒙托夫。荣誉只是镜子里瞬息即逝的一个映象，被一个微不足道的观众瞥见，一到早晨它就会消失！

但是莱蒙托夫还很年轻，他过的每一秒钟都象永恒一样广大无边。看着他的这群女人和绅士就是人类的眼睛。他要么以一个男子汉的坚定步子从他们面前大步走过，要么就不值得活下去！

他感到耻辱的污泥渗入了他的脸，他知道带着这样一副羞辱站污的面孔，他一分钟也不能再留在这里。他们徒劳地想使他平静下来，徒劳地想安慰他。

“没有用，”他说，“有些冲突是完全不可能和解的。”他站起来，由于激动而紧张，转身朝着那个陌生人。“就个人而言，我很遗憾，画家现在成了一个普通劳动者，他没有合适的光线。但是从客观上讲，他在靠蜡烛光画画还是根本不画，这都毫无区别。他绘画中描绘的那整个世界已经僵死多年。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完全在别的地方！这就是我不再去看画家的原因。与他争论那些不存在的问题已毫无意义。我祝愿他好。我没有必要反对死人。愿大地轻轻地覆盖他们。我对你也说同样的话，”他指着那个男人。“愿大地轻轻地覆盖你。你已经死了，可你甚至不知道这一点。”

那个男人也站起身，建议，“在一个诗人和一具尸体之间来一场较量也许很有趣。”

雅罗米尔的血涌上头脑。“来就来，让我们来试试。”他说，朝着那男人挥动拳头。然而，他的对手抓住雅罗米尔的胳膊，把他猛地扭过身去，然后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裤子后裆。

“我把这位诗人同志存放在哪儿？”他问。

那些年轻的来宾刚才还竭力想让这两个对手平静下来，此刻却忍不住大笑起来。那个男人用伸长的手臂举起雅罗米尔，大步穿过房间，雅罗米尔就象一条绝望的、被捉住的鱼在空中猛烈摆动。那男人到了阳台门前，打开门，把雅罗米尔放在门槛上，对准他重重地踢了一脚。

一声枪响，莱蒙托夫抓住他的胸部，雅罗米尔倒在阳台冰冷的水泥地板上。

啊，捷克的土地！啊，枪声的光荣变成在裤子上给一脚的玩笑的土地！

但是，嘲笑雅罗米尔拙劣地模仿莱蒙托夫，这是对的吗？嘲笑我们的画家模仿安德列·布勒东，甚至模仿到穿一件皮大衣，养一条德国狼狗，这是对的吗？难道安德列·布勒东本人

不是一个竭力仿效的某种崇高东西的模仿品吗？拙劣的模仿不正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吗？

不管怎样，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几笔改变这个情景。

一声枪响，雅罗米尔抓住他的胸部，莱蒙托夫倒在阳台冰冷的水泥地上。

他穿着一条沙皇军官的节日制服，站起身来。他孤零零地大难临头。他不能求助于文学史料的安慰，来赋予他的打击以冠冕堂皇的意义。没有一把手枪来慈悲地结束他怯懦的耻辱。只有嘲弄的笑声从窗户传来，这声音使他永远蒙受羞辱。

他俯在栏杆上朝下望。哎，阳台还不够高，他没有把握跳下去是否会摔死。天气刺骨的冷，他的耳朵在发烧，他的脚冰冷，他不断地替换着脚，全然不知所措。一想到门也许会突然打开，露出笑嘻嘻的面孔，他就感到恐惧。他被捉住了。在一场笑剧里中了圈套。

莱蒙托夫并不怕死，但他却怕嘲笑。他想从阳台上跳下去，可他不敢，因为他知道，尽管自杀是悲剧的，而未遂的自杀却是可笑的。

（等一等！多么奇特的警句！毕竟，自杀成功与否都是同样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动机，需要同样的勇气！那么，怎样区别悲剧和可笑呢？仅仅靠偶然的成功？到底怎样区别渺小和伟大呢？告诉我们，莱蒙托夫！仅仅靠舞台道具吗？手枪还是裤子上的一脚？仅仅靠历史把布景推到舞台上吗？）

够了。在阳台上的是雅罗米尔，穿着白衬衫，领带松开，冻得浑身发抖。

所有革命者都喜欢火焰。帕西·雪莱也幻想过一种燃烧的死。他想象的情人们总是一道死在火刑柱上。

雪莱设想他和他妻子在这个幻想中。然而，他还是死于溺水。他的朋友们仿佛希望纠正命运的这个语义错误，在海岸上堆起一大堆火葬柴，把他那被鱼啃啮过的尸体投进火焰之中。

难道死亡也想嘲弄雅罗米尔，赐给他严寒而不是烈火？

因为雅罗米尔渴望死。自杀的念头象夜莺的鸣啭一样迷住了他。他知道他的感冒很重，他知道他会招致重病，但他决心不回到房间。他不能忍受再遭屈辱。他知道，只有死亡的拥抱才能安慰他，他将把他的身心都献给这个拥抱，他将在这个拥抱中获得伟大。他知道，只有死亡才能替他报仇，把那些嘲笑他的人变成杀人凶手。

他突然想到在门外躺下，让冰冷的水泥从下面冰他，可以加速死亡的来临。他坐了下来。水泥地相当冷，几分钟后他的屁股就麻木了。他想躺下，但没有勇气把他的背紧靠在冰冷的地板上，于是又站了起来。

寒冷完全裹住了他，它在他的鞋子里，在他的裤子和短裤下，它把它的手伸进他的衬衫里。他的牙齿在打战，喉咙疼痛，不能吞咽，直打喷嚏。他感到迫切想小便。他用麻木、笨拙的手指解开钮扣，朝着下面的院子撒尿。他发现握着阴茎的手颤抖得很厉害。

他在水泥地板上跺着疼痛的双脚，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诱他打开那扇通向折磨他的人们的门。他们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劝他？他们醉成那样了吗？还是他们是那样残忍？他在冷地里究竟待了有多久？

房间里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

雅罗米尔走到窗前，看见只有一盏罩着粉红色灯罩的小灯还亮着，在沙发边。他继续朝里望，终于看清有两个裸着的躯体紧紧搂在一起。

他浑身颤抖，牙齿打战，继续透过窗子往里望。半拉开的窗帘使他看不清被男人压住的那个女人身躯是否就是拍片姑娘。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就是她，她的头发是又黑又长的。

但那男人是谁？雅罗米尔知道这是谁！他从前已经目睹过这整个场景！冬天！群山！白雪覆盖的平原，窗户里一个女人和泽维尔！但今天，雅罗米尔和泽维尔应该合为一体！泽维尔怎么能这样背叛他？泽维尔怎么能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同雅罗米尔的姑娘做爱？

房间里现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的头脑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耻辱。只有可怕的寒冷。

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打开玻璃门，走了进去。他什么也不想看见，既不朝左望，也不朝右望。他迅速地穿过房间。

走廊里的灯亮着。他跑下楼梯，推开他放外套的那个房间的门。里面很黑，从走廊里透来一线微弱的光，照亮了几个酣睡者的轮廓，他们在沉重地呼吸。他一边四处摸索他放外套的椅子，一边还在不住地颤抖。但他没能找到它。他打了个喷嚏。其中一位酣睡者翻了个身，咕哝着骂了一句。

他走到过道里，从衣架下取下他的大衣，穿在衬衫外面。匆匆走出了这幢房子。

送葬行列已经出发了。最前面，一匹马拉着放有棺材的马车，伊希·沃尔克的母亲走在马车后面。一床白垫子的一角从黑色的棺盖下面伸出来。它伸出来就象是在责备，她孩子（他只有二十四岁）的最后安息处造得很差。她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他头下面的垫子重新搞好。

棺材停放在教堂中央，四周都是花圈。祖母还在一场中风的恢复中，不得不用手指抬起她的眼皮。她在检查棺材，她在检查花圈。其中一个花圈的缎带上写着马尔特诺夫的名字。“把它扔出去。”她命令道。她的老眼，在不能活动的眼皮下，忠实地监护着莱蒙托夫最后的旅程。他只有二十六岁。

雅罗米尔（还不到二十岁）躺在他的房间里。他在发高烧。医生诊断是肺炎。

激烈的吵架声震动着墙壁，但寡妇和她儿子居住的这两个房间却组成了一个宁静的岛屿。玛曼没有听见隔壁房客的喧闹声。她头脑里全占着药，热茶，冷敷。从前有一次，当时他还很小，她曾连续守护了他许多日，激动地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现在，她决心再次激情地、忠实地守护他。

雅罗米尔睡着了，语无伦次地发着呓语，醒过来，又重新发着呓语；高烧的火焰舔着他的身躯。

火焰？他毕竟将变成烈火吗？

一个男人站在玛曼面前。他想跟雅罗米尔谈话。玛曼拒绝了。那男人提到红发姑娘的名字。“你儿子告发了她兄弟。现在他们都被捕了。我必须同他谈一谈。”

他们面对面站在玛曼的房间里，但对玛曼来说，这个房间现在只是儿子房间的一个延伸。她守卫着它，就象武装的天使守卫着天堂的大门一样。来访者刺耳的声音使她气愤。她推开门，指着雅罗米尔的床。“那么好吧，他就在那儿，跟他谈吧。”

那男人看见了那张通红的、谵妄的脸。玛曼用平静的坚定语气说，“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儿子清楚他的所做所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当她大声说出这些雅罗米尔以前经常使用而她觉得格格不入的话时，她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些话把她和儿子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他们现在结合成了一个灵魂，一个头脑。她和儿子组成了一个以同样物质构成的宇宙。

泽维尔提着书包，里面装有一本捷克语笔记本和一本生物学课本。

“你要到哪去？”

泽维尔微笑着指着窗外。窗户是开着的。外面阳光明媚，从远处传来城市的喧声，许诺着冒险。

“你答应带我一直走的……”

“那是从前。”泽维尔说。

“你想要背弃我？”

“是的，我要背弃你。”

雅罗米尔愤怒得闭住了气。他对泽维尔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仇恨。直到最近为止，他还相信他和泽维尔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但现在他意识到泽维尔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人，是他的仇敌！

泽维尔抚摸他的脸：“你很可爱，亲爱的，你真美……”

“你干嘛对待我象对待一个女人那样？你疯了吗？”

但是泽维尔不会放弃：“你很美丽，但我必须背弃你。”

泽维尔转身朝开着的窗户走去。

“我不是女人！你不懂吗？我不是女人！”雅罗米尔在他的背后不断地喊叫。

热度消退了一点，雅罗米尔环顾着房间。墙上光光的；那个穿着军官制服的男人的照片不见了。

“爸爸在哪里？”

“爸爸走了。”玛曼温柔地说。

“怎么会呢？谁把他从墙上取下来了？”

“是我，亲爱的。我不想让他俯视着我们。我不想让任何人插在我们中间。互相撒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有件事你应该知道。你父亲从来就不想让你生下来。他不想让你活。你懂吗？他要求我确保你不会生下来。”

雅罗米尔被发烧弄得精疲力竭，没有力气提问或争论。

“我漂亮的孩子。”玛曼说，她的声音在颤抖。

雅罗米尔意识到，此刻正对他讲话的这个女人始终都爱着他，从来没有躲避他，从来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忌妒。

“我不漂亮，母亲。你才漂亮！你看上去真年轻！”

玛曼听到儿子的话，高兴得真想哭泣。“你真的觉得我漂亮吗？可你长得太象我了！你从来不想听这个。但你确实长得象我，我很高兴。”她抚摸他的头发，那头发又黄又细。她吻着它。“我亲爱的！你有天使的头发！”

雅罗米尔感到疲倦不堪。他没有力气去寻求任何别的女人。她们都离得远远的，通向她们的道路是那样漫长无边。“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任何女人，”他说，“除了你。你是所有女人中最美丽的。”

玛曼哭了，亲吻他。“你还记得那个温泉疗养地吗？在那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多么美好的日子。”

“是的，母亲。我一直都是最爱你的。”

玛曼透过一大滴幸福的眼泪看见了这个世界。她周围的一切都消融了；一切都跳出了形式的桎梏，一切都在跳舞欢庆。

“这是真的吗，我最亲爱的？”

“是的。”雅罗米尔说。他把玛曼的手按在他滚烫的手掌里，他疲倦了，太疲倦了。

土冢已经隆起在沃尔克的棺材上，沃尔克的母亲已经在从墓地往回走。石头已经压在兰波的棺材上，但他的母亲，据传说，让他们打开家族墓室。你看见她了吗？那个穿着黑衣服的严厉的老妇人？她正在检查黑暗、潮湿的墓室，确信棺材是在适当的位置，完全关严了。是的，一切都很完好。阿瑟在那里，他不会跳掉。阿瑟永远不会再逃走。一切都很完好。

到底将是水？不是火？

他睁开双眼，看见一张脸俯在他上面，有着微微向后缩的下巴和纤细的黄发。这张脸离他那么近，就好象他俯在一个平静的池塘上面望着他自己的肖像。

不。不是火焰。他将死于水。

他望着水里他自己的脸。突然，他看见巨大的恐怖从那张脸上掠过。这就是他最后看见的东西。

一九六九年六月-----------------

译后记

译后记景凯旋我国读者对于东欧文学也许并不算太陌生。早在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及其同人就对这块与我们相似土壤上的文学尤为关注，并在《小说月报》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上作了大量翻译介绍。裴多菲，显克微支，密茨凯维奇，哈谢克，恰佩克这些东欧作家的作品在过去岁月也早已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良师益友。这里还不算出生在布拉格的现代派文学的两位大师卡夫卡和里尔克，他们尽管属于德语系统，但无疑却是东欧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是这片土地培养了他们最初的文学情愫。然而时过境迁，这十年来我们在向世界文学的开放过程中，对当代东欧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相对来说却冷落了不少。这里的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一些东欧作家的作品中有着某种我们怯于正视的东西。

捷克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便是如此。这不仅在于作者那特殊的经历：他 1929 年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参加过捷共，当过工人，爵士音乐者，布拉格高级电影学院的教授，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后，他的作品遭到禁止，遂于 1975 年移居法国；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的作品表现了直面真实人生的勇气和良知，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以及对人的本性和处境的深刻思考。昆德拉的另外两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经在国内出版。《生活在别处》是他的又一重要作品，这部作品使他于 1973 年首次获得一项重要的外国文学奖——法国梅迪西斯奖。诚然，获奖本身从来不是衡量作品艺术高下的标准，但却无疑是一个作家文学影响和名声的标志。

《生活在别处》是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肖像画。昆德拉以其独到的笔触塑造出雅罗米尔这样一个形象，描绘了这个年轻诗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具有“发展小说”的许多特点。就其题材而言，表现一个艺术家（或知识分子）是本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展示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也只有复杂的人物才能承担。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诗人创作过程的分析是微妙而精细的。创作过程当然不仅指下笔写作的过程，而且更广义地指一个诗人的全部成长过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意图下，这部书最初曾被题名为《抒情时代》。作者所要表现和所要探究的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激情，它的产生和它的结果。因而这本书又是一本现代心理小说，表现了一个诗人的艺术感觉的成长。书中每一章节的名称都展示了诗人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他怎样读书，怎样恋爱，以及怎样做梦等等。关于时代的全貌和他人的活动都迟到了远处，一切观察的焦点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并且与他的内心活动有关。有如激情的涧水，在时间的乱山碎石中流过，两岸的景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溪流将流向沃野还是沙漠。换句话说，作者在这里所关心的是诗人心理和精神上的发育。为了潜入到人物意识中最隐秘的角落，作者采用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时间与空间交织（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常常出现在同一段叙述中），现实与梦幻交织（第二章《泽维尔》完全是一个梦套一个梦），情节的跳宕，思考的猝然与不连贯，故意模糊主语的陈述，这些都使此书更接近于诗歌而不是小说。假如我们把书中这些抒情性的因素去掉，这部作品的内容就剩不下什么了。这种形式使我们更能切近诗人的内心活动，感触到诗人的激情是怎样产生和燃烧的。

在一个诗人的心目中，最使他交织着复杂感情的是什么？是母亲。母亲与诗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最神秘的联系。诗人们常常把他心中最神怪的东西比作母亲（尽管这已是一个用滥的比喻），而母亲对幼小诗人的成长又往往起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在本书中，主人公雅罗米尔与他母亲玛曼之间的关系便是全书最主要的关系。他们一个是遭逢了爱情不幸，把全部爱

都转移到儿子身上的母亲，一个是生性敏感，渴望着母爱的儿子。自雅罗米尔呱呱坠地起，他就被置于玛曼无所不在的监护眼光下。她把他幻想成古希腊英俊的神祇阿波罗，把他呀呀学语的每句话都记在笔记本上，她带他去富有浪漫情调的温泉疗养地旅游，在夜里一道坐在户外倾听远处河水的喧声，她第一个欣喜地发现了他的诗歌天赋，始终鼓励他成为一个诗人。她把所有的感情都押在了儿子身上，当她发现儿子有了情人后，隐伏在她心中的激情便暴发为强烈的忌妒和颇费心思的计谋，极力要把儿子拉回到自己身边。玛曼这种专制的占有性的母爱，自然合影响到雅罗米尔的性格，他的羞怯、感伤、虚荣、脆弱、专横都和母亲身上这种最隐秘的激情有关。显然在这点上，这部小说具有弗洛伊德学说的色彩。正如本书作者在《为了告别的聚合》中借主人公雅库布的口所表达的，“弗洛伊德发现了婴儿的性欲，告诉我们关于俄狄浦斯的事。只有伊俄卡斯卡（即俄狄浦斯的母亲——笔者注）还保持着神秘，没有人敢扯下她的面纱。母亲的身份是最后和最大的禁忌，也正是在这里，掩盖了最大的灾难。”在天性敏感的孩子心里，母亲就是他生活的纽带与轴心，唯有母亲是真实的存在，他爱她，恨她，可又无法从她那里逃脱。在劳伦斯的名著《儿子与情人》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母与子之间的这种微妙战斗。保罗之所以不能进入其他女人的世界，恰恰是因为他不能摆脱母亲莫瑞尔大大的感情桎梏。同保罗一样，雅罗米尔也始终渴望着在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中，摆脱童贞，摆脱母爱，从而跨过生活的门槛，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无论他进到哪里，他都感到母亲的灵魂始终和他在一起，阻碍着他进入生活。所不同的是，保罗的母亲最后死了，这位他有可能重新进入生活，而雅罗米尔直到在他母亲身边死去时，他一直都没有真正长大成人。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部小说视为一部弗洛伊德学说来阐释母子关系的作品，那又未免太概念化了。自从弗洛伊德揭示了人性中的“恋母”情结，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母予冲突的题材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主题有着明显的狭隘性。把一切都归于性欲既不可靠，也不可信。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所要表现的当然不仅在此，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所要探讨的是人身上深刻的激情，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时代的若干事件正是由这些激情所产生的。

对于雅罗米尔来说，母亲代表看身边狭窄的世界，他所要逃离的不仅是母爱的桎梏，而且也是平庸实在的日常生活。青春、爱情、革命，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三个声部，作者象一个钢琴家，摸索着手找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弹出一个和谐的主题音乐（作者在小说中就经常出面直接加以评述）。这一主题在书名《生活在别处》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生活在别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来说，周围是没有生活的，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这正是青春的特色。在青春时代，谁没有对荣誉的渴望？谁没有对家庭的反抗？谁没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举目四望，我们周围的生活平庸狭窄，枯燥乏味，一成不变，每天的日子都被衣食住行所填满，毫无色彩，毫无光亮。正是为了逃脱这一恼人的生存现实，人们才赋予自己激情和想象。对青年人来说，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可怕的，那是老年人日暮黄昏的平静和死寂，青年人拒绝承认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实在，总是向往着动荡的生活，火热的斗争。这就是青春、爱情和革命之所以激荡着一代代年轻的心灵的原因。显然，三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富于诗意和崇高感。为了表现这些，作者采用了类似电影中闪回的手法，在描写雅罗米尔渴望逃脱自我，走向广阔世界的《诗人在逃跑》一章中。穿插描写了诗人雪莱，兰波，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沃尔克，哈拉斯的故事或诗歌。兰波为了逃离家庭，从家乡跑到巴黎；莱蒙托夫为了逃避上流社会，投身军旅来到高加索；雪莱为了宣传自由解放，带着传单前往爱尔兰。他们对现实的反抗，对爱情的追求，对战斗的幢保，对荣誉的渴望，无不表现出在本质上令人惊异的一致。“我必须死吗？那就让我死于烈火吧。”熟悉这些诗人和他们诗歌的主人公雅罗米尔写道。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不久他爱上了一个红头发姑娘，他很快就体验到爱情给他带来的占有的激情；他参加集会，参加五一游行，辩论，呼口号，他的诗歌发表在杂志上，没有比这些更令人激

动的了，革命似乎张开双臂在欢迎他。因而当他面对眼前的爱情与历史运动时，他象所有的浪漫诗人，象 1968 年巴黎大学造反的学生，象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充满豪情地喊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如果说我们为了超越自身的生存状况必须具有对崇高的感受的话，那么我们就还应当记住，崇高往往也会导致绝对和专制。这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心灵中没有崇高的东西，人会显得卑微渺小，感到自己无所归依，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总是以追求崇高为荣。然而悲剧也就在这里，反抗与专制，崇高与残酷，这是一个事物的两极，它们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或一个事物身上。历史上无数成功的反抗和充满激情的爱情无不如此。雅罗米尔对崇高的热烈追求最终变成了对情人的无情告发。当红头发姑娘由于误了约会，为了平息他的愤怒，遂编造了一个她兄弟企图背叛祖国的荒唐借口时，雅罗米尔毫不迟疑地就告发了他们。她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谎话，我们不得而知，这也许是根于捷克民族那种随便的天性，有时候任何严肃的问题都会被他们变成一场玩笑，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玩笑却是愚蠢的，不负责任的。不管怎样，她和她的兄弟都因此而被捕入狱，从而毁掉了他们的一生。

尽管如此，悲剧的主人公仍然是雅罗米尔。他自认为是在维护一个崇高的事业，结果却使他的女友无辜地身陷囹圄。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意味着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从美学的角度看（美学在康德那里正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犹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雅罗米尔的悲剧就在于，他还年轻，他不知道他生活在一个梦想已成为现实，现实已成为永恒的时代，身边的世界已经没有战壕和街垒，只有开会和秩序；他不知道文学和现实是不能相容的，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不知道人对崇高感的激情中同时也包含了残酷的成分，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是生活的别处还是此处。一句话，他不知道蝴蝶与蛹之间在美学上有质的不同，在已经没有诗歌的时代，却以为他还可以象兰波、雪莱、莱蒙托夫那样扮演一个诗人的角色，结果时代只给了他一个表演残忍而不是表演崇高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情人的毁灭，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他的死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当年的红卫兵的命运。

雅罗米尔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值得我们同情。他心灵丰富且敏感，也很有才华。同唐吉诃德，哈姆雷特，欧根·奥涅金，毕巧林，安德列公爵，拉斯科尔尼科夫，莫索尔一样，他身上也同样怀有一种对于绝对的激情。他之成为告密者和迫害者，不是出于对秩序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而是出于对崇高的追求。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激情并没有使他成为反抗现实的人，而是成为了现实的合作者，这使他的悲剧失去了崇高的意味。为了迎合时代追求荣誉，他可以转过头来痛诋曾经热烈崇奉的现代主义艺术；甚至还可以告发他的女友。如果说我们对他的这个行为还觉得情有可原的话（他毫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那么他在出卖女友后为自己所作的一番内心辩解却使我们顿生反感，“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我们甚至都很难判断这一切到底是卑鄙还是幼稚！但是，这句话却显然表明了一种为人熟知的逻辑。它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论下已显露理论端倪，而在二十世纪则大放实践光彩。它的实质就在于：当历史法则与道德法则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道德法则：为了将来几百万人的幸福，牺牲今天几百人的幸福是值得的；为了历史的前进，牺牲人这一历史的主体是值得的。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既然如此，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前进？它的终点又在哪里？

困扰着二十世纪许多知识分子的正是对历史发展的这一崇高激情。这是一个最没有思想而人们却普遍声称获得了最正确思想的时代。似乎经过几千年的蒙昧期，人们终于走出了历史的宿命论，一劳永逸地掌握了客观的必然规律，从此一切都变得简单和明快了。在一次文

学授奖会上，昆德拉曾引用过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闪烁着智慧的民间谚语倒是比许多大部头的文人著作更有力地表明了，在人们自诩找到了终极真理的背后，在人们声称最完整最深刻地认识了这个世界的背后，事实上却掩藏着思想上的多少狂妄和无知，绝对和专横，尽管它们往往还是拾前人的牙慧。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愚昧，一种现代的愚昧罢了：小说中有一个绝妙的象征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思想的实质，在幼年的雅罗米尔画笔下，出现在画面上的人一个个都顶着狗头。这也许是尚属天真的孩子继皇帝的新衣之后又一个最伟大的发现。对于这种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画家笔下的狗头人身形象，我们在十年文革满街走着的游行人群中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有上帝和孩子才会忍不住笑起来。

毋庸置疑，《生活在别处》不是一部纯然写实主义的作品。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灌注了他对人类激情的怀疑和对现代愚昧的探索。他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个性，而是人物的共性。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诗歌批评"的小说。他的目的在于总结各个时代诗人们的表演和作用（包括象诗人一样怀有激情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他们写照，为兰波、雪莱、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艾吕雅、叶赛宁以及现代许多捷克诗人写照。因而书中很少有对人物个性的着意刻划，甚至全书中除了诗人雅罗米尔（意谓"他爱春天"）和他的母亲玛曼（音同"妈妈"），没有一个人物是有名有姓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红头发姑娘"，"拍片姑娘"'"画家"，"看门人的儿子"等等人称谓，即使两个主人公，母亲和儿子，也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代表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和他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的思考的确是从现实扩展到了历史，从一个社会扩展到了整个人类。更确切他说，他是想借助于时代这个实验室，研究人性的崇高与邪恶，透视人身上最黑暗最深刻的激情，以及揭示这种激情可能导致的悲剧，浪漫主义的悲剧，毫无价值可又深刻的悲剧。

《生活在别处》完成于 1969 年，当时正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部小说出版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正是中国广大知青开始下乡插队的年头。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别处"已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无奈了。从当年反抗苏联入侵到后来承认现实的捷克青年，也和从当年的红卫兵到后来的知青一样，他们的命运都好象总是在激情和无奈这两种悲剧之间的摇摆。

这部小说第一次问世是在 1973 年，以法文版的形式刊行，第二年又在美国出了英文版。译者彼得·库西是一位翻译家，作家和斯拉夫文学研究者。《为了告别的聚会》英译本也是他翻译的。他的译笔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精神和语言特点。多年后他又对《生活在别处》的译本重新作了修改。昆德拉本人亲自为这个修订本作了序。本书即是根据《企鹅丛书》1986 年版的这个修订本翻译的。英译本对原书中引用的人名没有作注，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书中许多人名系由译者注出。

1988 年 5 月于南京------------------